



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

——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

李 兴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李兴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4

ISBN 7-307-02867-0

I. 从… II. 李… III. 国际关系—苏联、东欧—1945~1991
IV. D8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3035 号

责任编辑:张俊超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支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epd@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湖北省安陆市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83千字 插页:1

版次: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7-02867-0/D·412 定价:16.5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者,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运用俄罗斯（苏联）、东欧国家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在总结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国际政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为视角，对冷战时期（1945～1991年）的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作了宏观的、专题式的考察和研究。本书认为，必须把苏东双方看成是时而平行、时而交叉且有变化的紧密联系的两条红线。在该时期的苏东关系中，苏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双方关系的性质。苏东关系最终走向破裂，苏联要负主要责任，其中，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是主要原因。但同时也不能否定，在该时期的苏东关系中存在着真诚的国际主义因素，苏联作了很多的牺牲，尤其是在苏东同盟成立的初期。苏东从战后全面结盟，到1989年后分道扬镳，是各种因素综合、互动的结果。苏东全面结盟不能完全归功于苏联和斯大林，因为战后东欧走向社会主义，尽管苏联因素起了不可缺少的巨大作用，但东欧并非完全迫不得已，而是有其本身一定的历史的、思想的和现实的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的建立，是苏联因素、东欧基础和国际形势相结合的产物。1989年后东欧剧变，苏东分道扬镳，也不能完全怪罪于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东欧国家的民族性格，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东欧执政党的错误和失误，东欧一些领导人的个性和思想，以及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和影响。西方对苏东的军事遏制战略与和平演变战略对苏东关系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目 录

序	1
绪论	1
一、选题的意义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1
二、本书研究之视角	14
三、本书的主要观点及章节安排	28
第一章 历史的楔子	33
第二章 苏联模式与苏东关系	53
一、苏联模式在东欧的建立（1945~1953年）	53
二、苏联模式在东欧的危机的萌芽与苏南冲突 （1948年）	66
三、苏联模式在东欧危机的连锁爆发与东欧国 家民族主义的顽强表现（1953~1988年）	71
四、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与东欧国家民 族主义的高涨（1989~1991年）	81
第三章 经互会与苏东关系	91
一、经互会的成就与苏东关系	92
二、经互会的问题与苏东关系	106
第四章 华沙条约与苏东关系	135
一、华沙条约的积极作用与苏东关系	135
二、华沙条约的问题与苏东关系	146

第五章 苏联政策与苏东关系	166
一、斯大林时期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 (1944~1953年)	167
二、赫鲁晓夫时期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 (1953~1964年)	184
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 (1964~1982年)	190
四、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的东欧政策与 苏东关系(1982~1984年)	203
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 (1985~1991年)	205
第六章 西方的苏东战略与苏东关系	229
一、西方的军事遏制战略对苏东关系的影响	229
二、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东关系的影响	238
三、西方的苏东战略的得失	255
第七章 苏东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因素	262
第八章 苏东交恶中的东欧原因	282
小结与思考	304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22
一、主要中文参考文献	322
二、主要外文参考文献	328
附录：陈之骅、徐天新先生对本书的鉴定意见	337
后 记	339

序

青年学者李兴博士的专著《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新近问世，该著是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撰写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并于博士后期间继续研究的最终成果。它历时六载，六易其稿，凝聚着作者的大量心血和辛勤汗水，的确来之不易。我认为这对于国内国际关系学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特别是弥补了我国在苏东关系研究领域中的明显不足。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首先，从选题来看，冷战期间（1945～1991年）的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既是战后社会主义苏联东欧集团内部的关系，也是战后雅尔塔国际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可以说该选题既属于国际关系史，也属于世界当代史和国际共运史，是一个跨学科的、交叉性的选题。研究该题目，不仅具有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分析当代国际关系的成败得失，总结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对外决策机构提供参考和借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同时，该选题时空跨度大，时间跨越半个世纪，空间涉及8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容纷繁复杂，驾驭的难度大，颇富挑战性。

其次，从研究视角和方法看，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学、国际政治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方法，不仅把过去人们比较熟悉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研究视角，而且把国家民族主义（State-nationalism）和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作

为新的研究视角，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横向与纵向相结合，专题和总论相结合，史实与理论相结合，分析和综合相结合，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苏联政策、国际形势、政治文化和东欧原因诸方面来对冷战时期的苏东关系进行立体式的考察和系统的专题研究。全书详略得当，重点突出，错落有致。比如“苏联模式与苏东关系”一章，着眼于从政治角度研究，落脚点在东欧；“苏联政策与苏东关系”一章，着眼于苏联的东欧政策，侧重点转为苏联。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把经互会和华沙条约这两个地区性的国际组织作为研究冷战时期苏东关系的两条线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在书中引用了不少俄罗斯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这得益于作者1997年赴俄罗斯进修期间查阅并带回了一批档案材料。

第三，从观点来看，该书力避人云亦云，突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作者一方面批评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认为苏东关系最后走向破裂，苏联要负主要责任。同时指出，这一时期的苏东关系中曾经存在过真诚的国际主义因素，尤其是苏东同盟的初期，苏联作了很多牺牲。与国内外的某些看法不同，本书认为冷战时期苏东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是各种因素综合、相互作用的结果。苏联与东欧全面结盟是与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关的。战后苏东全面结盟不能完全归功于苏联和斯大林，因为战后东欧走向社会主义，虽然苏联因素的作用很关键，但东欧并非完全迫不得已，而是有其一定的基础的。1989年东欧剧变，也不宜完全怪罪于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东欧国家的民族性格，国家民族主义，执政党的错误和失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领导人的个人因素，等等，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和影响。同时，本书客观公正地分析了西方的苏东战略对苏东关系的影响。

此外，作者对社会主义发展同各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对国

际主义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对和平演变与苏东剧变的关系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思考。思考不透的，作者坦率相告，把问题提出来，以虚心求教。例如，作者“坦率地说，对于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我们至今仍不知道怎样做，才算是唯一正确的绝对真理，但我们知道苏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我们还知道，在多种操作方法中肯定会有一种方法可以相对地接近真理，只是这种方法尚未被人们找到并运用于实践。”（见本书“绪论·国际主义视角”，第19页）。这种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很值得提倡，这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概而言之，该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尊重历史事实，多层次地展现了战后苏东关系的复杂画面，充分揭示了这一关系兴衰演变的深层原因，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发展过程的种种特点和规律性。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将为我国冷静地重温和正确认识战后国际关系提供一定的帮助，也将为我国探究新的世纪的国际秩序与格局提供一些新的思考点。我认为这正是其主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当然，该书并非毫无缺陷。由于题目大，内容多，受研究视角的限制，书中个别地方不免有重复之处。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苏联模式”、“华沙条约”和“苏联政策”等各章中均都提到。书中个别观点似乎仍然可以商榷。由于出版周期太长，一些最新的有关档案材料也没有完全引用进来。但是，白璧微瑕，瑕不掩瑜。李兴的这部专著仍是一部下了苦功的难得的力作，值得一读。

李兴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就把国际关系作为主攻方向。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又回到北京大学从事了2年的博士后研究。1998年博士后出站后，

作为引进人才和骨干教师调到武汉大学，专门从事国际关系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由于我们在同一个教研室工作，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他要求我为其书作序。鉴于此著的学术价值及对学科建设的意义，我便欣然命笔，作斯文谨为之序。

罗志刚

1999年12月于武汉

绪 论

一、选题的意义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自 1945 年苏东同盟关系建立以来，世界各国政界和学术界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对苏东关系密切注意，兴趣有加。1989 年的东欧剧变、苏东同盟垮台且分道扬镳，一方面使国内外政界、学术界惊讶不已，另一方面又使人们对苏东关系史的兴趣骤增：苏东同盟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它凭什么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又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苏东关系的历史，无疑既是一个当代的国际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现代历史课题。研究从苏东同盟到苏东剧变的历史（1945～1991 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很深远的现实意义。因此，各国学者均认识到本选题的重要性。

西方学者在苏东关系史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著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他们最先是把注意力放在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的关系上，出版了不少著作。其中包括英国皇家国际问题学会编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争端》（牛津大学出版社，1948 年版）；费·马克累恩的《异教徒：约西普·布罗兹·铁托的生平和时代》（纽约，哈帕尔公司，1957 年版）；（美）乔治·霍夫曼、弗雷德·华纳·尼尔：《南斯拉夫与新共产主义》上下册（美国 20 世纪基金会，纽约，1962 年版）；（美）弗雷德·华纳·尼尔：《铁托主义

的实践》(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58年版); (美) 查尔斯·麦克维尔:《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纽约圣马丁印书馆, 伦敦麦克米伦公司, 1957年版); (美) 丹尼森·拉西诺:《南斯拉夫的新实验 1948~1974》(伦敦赫斯特公司, 1977年版); (英) 弗雷德·辛格尔顿:《东欧的背景》(1965年版);《二十世纪的南斯拉夫》(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76年版); (西德) 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商务, 1979年版); (英) 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 1939~1973》(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5年版); F·尼尔:《铁托主义在行动中》(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58年版); 艾伯特·梅斯特:《社会主义与工人自治》(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6年版); 等等。苏波关系是他们比较注意的又一个领域。这方面的著作有: 弗洛拉·刘易斯:《处境危险的波兰人: 一个充满希望的历史文件》(伦敦, 1959年版); 康恩拉特·希罗伯:《十月的春天》(伦敦, 1956年版); 弗兰克·吉布奈:《严寒的革命》(纽约, 1959年版); S·希尼特曼:《华沙的异端》(纽约, 霍里松出版社, 1959年版); 理查德·司塔尔:《波兰在 1944~1962: 一个被监禁了的民族的苏联化》(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出版社, 1962年版); 斯蒂莱:《独立的卫星国》(纽约, 布雷格出版社, 1965年版); 阿达姆·布罗姆凯:《波兰的政治: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7年版); 布热津斯基:《在共产党经济体制变革中波兰的催化剂作用》(1971年春《波兰评论》); 尼古拉斯·贝瑟斯:《哥穆尔卡: 他的波兰和他的共产主义》(纽约, 芝加哥, 旧金山等出版公司, 1969年版); 等等。另外, 关于前苏捷关系的著作有: (美) 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纽约维肯出版社, 1971年版); 戈顿·布鲁克—谢泼德、戴维·弗罗伊德:《捷克的胜利与悲剧》, 在 1968 年英《星期日电讯报》连载。关于涉及到前苏联与保加利亚的关系的专著有: L·德林编:《保加利亚》(纽约, 普雷格出版社, 1957年版); 马歇尔·米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保加利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尼桑·奥伦：《被操纵的革命：保加利亚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共产主义》（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关于民主德国的有：埃德温娜·莫尔顿：《东德和华沙同盟集团：缓和政治学》（西方评论出版社，1978年版）；等等。

关于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主要著作有：（美）罗宾·雷明顿的专著：《华沙条约》（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出版社，1973年版）；《华沙条约：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美国维明顿，1982年版）；P·维尔斯：《共产主义的国际经济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M·卡塞尔：《经济互助委员会》（牛津，1965年版），等等。

系统地分析苏东某一段时期的关系的著作有：多莲·沃里纳：《东欧的革命》（伦敦，吞斯提尔出版社，1950年版）；保罗·津纳主编：《民族共产主义与东欧人民的反抗》（纽约，1956年版）；托马西克：《民族共产主义与苏联的战略》（华盛顿公务出版社，1957年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一致与矛盾》（马萨诸塞，1967年版）；林恩·戴维斯：《冷战开始：苏美在东欧问题上的冲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理查德·司塔尔：《东欧共产主义统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1977年版）；（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 1945～1970》（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1970年版）；（美）凯尔迪什：《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美国圣母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美）J·布朗：《苏联与其东欧盟国 1968～1975》，（商务，1980年版）；（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纽约诺顿出版社，1978年版）；（美）约翰·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美国钟表出版社，1980年版）；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美斯坦福大学，1986年版）；《东欧和苏联》（伦敦，1991年版）；J·F·布朗：《东欧与共产主义规则》（伦敦，

1988年版); 乔治·斯科夫林:《东欧的政治》(牛津, 布莱威尔出版社, 1993年版); 等等。

在苏东剧变以后, 西方学者和政论家们对苏东关系史的兴趣并没有减退。他们召开了关于苏联东欧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 出版了许多卷本的论文集(剑桥, 1992年版)。美国前驻苏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也不甘寂寞, 于1995年推出洋洋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美国兰登出版公司, 1995年版)。英国本·福凯斯推出了《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的专著(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95年, 第2版)。

苏东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起源方面, 有A·B·格列科:《社会主义阵营的起源》(《苏共党史问题》1986年第10期); A·马鲁谢维奇:《东欧人民民主革命》(莫斯科, 1984年版); 多尔古洛夫:《现代的主要革命力量: 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发展、影响的增长》(莫斯科, 1979年版); 波戈莫洛夫:《社会主义世界: 社会进步的无价之宝》(莫斯科, 1981年版); 《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与东欧国家 1944~1949》(莫斯科, 1995年版); 杜宾斯基:《社会主义阵营: 发展的基本方向》(莫斯科, 1976年版); 《社会主义阵营和全欧经济合作》(莫斯科, 1972年版); 洛沃巴什:《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 结果与前景》(莫斯科, 1975年版); H·比利缅科:《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莫斯科, 1976年版); 《社会主义国家接近的基本方向》(莫斯科, 1982年版); 《社会主义与国际关系》(莫斯科, 1975年版); 《40年代下半期苏联与中东欧国家》(《苏联斯拉夫学》1991年第6期); 特·沃洛根基拉、格·马拉施科、阿·洛斯科娃:《人民民主: 神话还是现实? 1944~1948年中东欧社会政治进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华沙条约方面, 有C·弗拉基米尔、杰伯罗夫:《华沙条约与北约: 两种方针, 两种政策》(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 1979年版); H·科里科夫:《和平与社会主义的联盟》(莫斯科, 1975

年版)；苏联科学院：《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合作》(莫斯科，1988年版)；K·萨维洛夫：《国际关系中和平与稳定的强大因素》(莫斯科，1980年版)。《华沙条约组织》(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86年版)；《华约国家的对外政策》(莫斯科，1986年版)；《华约和北约：欧洲力量对比》(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在经互会方面，有贾基、潘科夫：《经互会：一体化问题》(莫斯科，1978年版)；拉贝金、雷巴科夫、谢多夫：《新的阶段上的社会主义阵营》(莫斯科，1978年版)；《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莫斯科，1978年版)；米哈伊洛夫：《社会主义一体化的现阶段》(莫斯科，1980年版)；施良耶夫、索科洛夫：《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前景》；施缅涅夫、什嘉宾、弗鲁姆金：《经互会成员国在农业方面的合作》(莫斯科，1976年版)；勃·佳金、勃·班科夫：《经互会：一体化问题》(莫斯科，1978年版)；勃·佳金、阿·巴尔科夫斯基：《经互会：历史、现状、未来》(莫斯科，1986年版)；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多边经济合作》(莫斯科，1972年版)；勃·米海洛夫：《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一体化》(莫斯科，1980年版)；弗·卡尔采夫、阿·科米萨洛夫：《经互会：合作的发展》(莫斯科，1975年版)；尤·克里姆诺夫：《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莫斯科，1978年版)；尤·希尼雅克夫：《经济互助委员会》(莫斯科，1984年版)；克·米库里斯基主编：《经互会——一个合作的新阶段》(莫斯科，1986年版)；姆·科瓦列沃依、弗舍瓦科夫：《社会主义一体化：发展和完善过程》(莫斯科，1976年版)。在苏东领导人的关系方面，有《东欧各国首脑》一书出版(莫斯科，1990年版)。

关于国别之间的关系，有阿·阿·舍瓦科夫：《苏联同罗马尼亚的关系 1944~1949》(莫斯科，1985年版)；《苏联同匈牙利的关系 1945~1948》(莫斯科，1969年版)；《苏联与匈牙利：科学技术合作的30年》(莫斯科，1981年版)；《苏联与匈牙利

的关系文件与材料 1971~1976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77年版);《苏联与匈牙利的关系文件与材料 1977~1982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84年版);B·C·巴尔萨达洛娃:《苏联同波兰的关系 1945~1949》(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80年代的波兰危机及其在社会意识中的反映》(莫斯科, 1993年版);《苏联与保加利亚的关系: 1944~1948年》、《苏联与保加利亚: 合作与接近》(莫斯科, 索菲亚, 1982年版);《苏联与保加利亚的关系文件与材料 1948~1970》(莫斯科, 1974年版);《苏联与保加利亚的关系文件与材料 1971~1982》(莫斯科, 1985年版);《苏联与民主德国的关系: 1949~1955年文件与材料》(前苏联外交部, 前民主德国外交部编, 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74年版);《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 合作与接近》(莫斯科, 布拉格, 1980年版);《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 1945~1960年》(莫斯科, 1972年版);《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 1961~1971年》(莫斯科, 1975年版);《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 1972~1976年》(莫斯科, 1977年版);《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 1977~1982年》(前苏联外交部, 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编, 1984年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在实践中》(前苏联“国际关系”出版社, 保加利亚“党的书籍出版社”, 1974年版);《苏联同南斯拉夫 1948年》(《苏联斯拉夫学》1990年第4期);姆·贾·谢里瓦洛娃:《70年代的苏罗关系》(《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罗马尼亚》, 莫斯科, 1983年版);《苏联同南斯拉夫 1984年》(《苏联斯拉夫学》1990年第4期);《1947~1948 情报局的活动》(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尤·思·格连科:《斯大林与铁托》(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91年版)。在党的关系方面, 有《苏共和捷共的关系》, 《苏共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关系》, 《苏联与匈共的关系: 历史与现实》(莫斯科, 1985年版)。在文化方面, 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丰富》(莫斯科, 1980年版); 岗达洛夫:《兄弟国家意识

形态和文化的合作》(莫斯科, 1975年版); 缅里利科夫、古利里奇等: 《现阶段斯拉夫国家的文化合作》(基辅, 1979年版)。

在对苏东关系史的断代研究方面, 有《苏联与东欧: 政治体制的演变和崩溃 40年代中期—80年代末》(《苏联历史》1991年第1期); 《40年代中期与下半期的苏联与东欧》(《苏联斯拉夫学》1991年第6期); 《东欧50~60年代的政治危机和冲突》(莫斯科, 1993年版); H·比利缅科: 《社会主义国家接近的基本方向》(莫斯科, 1982年版); 《社会主义与国际关系》(莫斯科, 1975年版); 《70年代苏联与欧洲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维·特·布德金拉: 《伟大十月和社会主义阵营》(基辅, 1987年版); 《历史转折关头的东欧 1989~1990》(莫斯科, 1991年版); 《东欧的宪法之变 1989~1990》; 《东欧社会主义: 建立、改革及其崩溃》(莫斯科, 1992年版); 《政权与知识分子: 东欧战后发展中的教训》(莫斯科, 1993年版); 《冷战时期苏联的外交政策 1945~1985》(莫斯科, 1995年版); 等等。

东欧一些学者也披露了一些材料, 作了一些研究, 尤其是东欧剧变以来。如(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 《苏南冲突经历 1948~1953》(萨拉热窝“光明”出版社, 1969年版)。(匈)雷尼·彼德主编: 《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经过和历史教训》, 是由1981年匈牙利《人民自由报》一组文章编辑而成的(《人民自由报》, 苏科特出版社, 1981年版), 不过, 其观点是官方的, 称匈牙利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匈)山多尔·科伊奇: 《匈牙利悲剧》(西德德意志出版公司, 1979年版); (南)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莫斯科的岁月 1956~1958年》(萨格勒布大学出版社, 1977年版); (波)欧文·魏特: 《目击者——哥穆尔卡译员的自述》(伦敦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 1973年版); (波)扬·普塔辛斯基: 《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华沙国内出版社, 1988年版); (捷)泽曼: 《布拉格——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纪实》(英

国企鹅丛书公司，1969年版)；(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科隆欧洲出版公司，1978年捷克文版)；(捷)伊日·贝利康：《永无尽头的春天——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自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菲舍尔出版社，1976年德文版)；以及杜布切克关于布拉格之春的一些回忆材料。保加利亚学者伊·巴也娃：《斯大林以后的东欧1953~1956年 波兰 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索菲亚)，尤·沃洛巴什：《东欧前主人政治肖像》(莫斯科，1994年版)；(保)托多尔·日夫科夫：《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关于苏东关系的论文更多。

西方学者和苏东学者对这一阶段苏东关系的研究往往带有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色彩，严肃的学术著作比较少。西方学者只是一味地攻击前苏联是“铁幕”、“赤色帝国”、“东欧的宗主国”；向东欧“输出革命”或“半输出革命”；而东欧是“被奴役国家”，是前苏联的“卫星国”、“附庸国”、“仆从国”；“东欧共产党的统治不是靠人民的拥护，而是靠苏联军队来维持的”，“苏联剥削东欧”。认为“斯大林主义”对于东欧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引起了东欧人民的反感”；“斯大林主义”“完全改变或延缓了”东欧的现代化进程，是历史的“大倒退”，“好像给牛套上了副马鞍”；东欧共产主义政权是“苏联帝国主义的工具”，没有前苏联坦克的支撑它们“必然垮台”^①；热情称赞南斯拉夫的“反斯大林主义”，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匈牙利革命”和“布拉格之春”，谴责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变态的恐惧心理”，苏东同盟是一场“不幸福的婚姻”，等等^②。有的西方学者在研究苏东关系时强调苏联对前东欧的统治和东欧对前苏联的反抗^③。还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前苏联在东欧的统治是大苏维埃国家的扩张主义和民族政党官僚阶层权力垄断相结合的产物，预言“只要前苏联还存在着党的官僚垄断和扩张主义的统治，东欧国家则没有脱离苏维埃帝国即获得真正独立的机会”，

前苏联扩张主义与东欧民族主义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认为：“所谓的‘民主德国’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或民众意愿基础……是前苏联和共产党命令之创造”^⑤。美国学者罗杰·卡内特在总结前苏联的东欧政策时认为，“40年来，前苏联领导层基本上将东欧作为前苏联国内制度的延伸来对待：斯大林时代把东欧看成实际上的封地，而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把东欧当成一个次要的伙伴”^⑥。

与西方学者相反，80年代中期以前，苏东学者歌颂苏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大家庭”、“社会主义兄弟般的合作”、“牢不可破的友谊”，社会主义阵营“是现代最强大的力量”，“是和平与世界进步的中流砥柱”。这方面的著作不胜枚举。东欧只有极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揭露了前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行径^⑦。进入80年代下半期以来，随着前苏联“公开性”、“民主化”的发展，随着一些有关苏东关系的档案材料的解密，苏东学术界对匈牙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价逐渐发生了变化，批评前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声音时有所闻。比如：关于匈牙利事件，过去苏联和匈牙利的出版物中异口同声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认为之所以发生反革命事件的原因在于匈劳动人民党领导的某些错误，机会主义分子的背叛，内部反动派的颠覆活动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直接干预。正式出版物中一般称之为“反革命暴乱”或“反革命叛乱”。但匈牙利学者贝·萨博在其著作《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第一阶段的理论和政策（1948~1957）》中就有意回避了对匈牙利12天起义事件的叙述；相反，在埃·久里科的普及读物中则分析了这些事件，他本人回避了称之为革命还是反革命，只是强调在起义期间人民中有称之为革命的，起义者声称要从错误和犯罪中还社会主义本来面目^⑧，匈牙利党的高级领导人伊姆雷·波日高伊通过无线电发表讲话，拒绝称1956年事件为反革命事件。他依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历史委员会经过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认为这一事件

是一场“人民的起义”^⑨。前苏联史学家达希切夫还公开发表文章，直言不讳地指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对东欧诸国的政策。他批判斯大林无视民族地位，竭力强迫许多国家沿用他的社会主义模式^⑩。在东欧剧变以后，前苏联《苏联历史》杂志社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学术座谈会——“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和崩溃（20世纪40年代中~80年代末）”。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前苏联科学院国际经济和政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会上不同的观点进行了交锋。但基本都同意1956年事件为“人民的起义”，1989年事件为“反极权主义的革命”；有人认为，东欧落后于世界，前苏联要负主要责任；也有人认为极权主义和专横主义在东欧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并不仅仅是由于前苏联军队和斯大林的原因；还有人认为，“苏东关系是建立在谎言、欺骗和对相互利益的不正确的理解上面的”^⑪。也有人骂“东欧国家剥削前苏联，因为与它们的合作是建立在对前苏联不利的基础上的”^⑫。无独有偶，匈牙利一位高级研究员也认为，前苏联经济已经支撑不住整个东欧，于是苏想扔掉这个包袱^⑬。对于1989年的东欧剧变，前苏联学者们的看法也众说纷纭。有人从两大体系对抗的角度非常悲哀地看待东欧发生的变化；有人乐观地称这是专制的结束和民主革新的开端；有人企图证明，这是社会主义必然的命运；还有人只承认这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不是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⑭。近年来，有些俄罗斯学者从指导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角度出发，对前苏联过去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历史的反思和检讨，如H·西蒙尼亚发表文章谴责“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把对外扩张主义作为巩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由此建立前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在‘两种体系’全球范围对立的背景下，前苏联常常不得不采用军事手段来确保其‘盟友’（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对自己的忠诚”^⑮。

我国学术界历来把苏东关系看作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学者过

去对苏东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全面歌颂，认为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华沙条约是“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坚强保证；热情歌颂前苏联对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深情厚谊”和“前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原则”^⑯。一种是全盘否定，抨击前苏联是“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东欧进行殖民统治”，抨击“苏修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不过是以苏修为宗主国的殖民帝国的别名”，“把东欧视为其争夺世界霸权的‘桥头堡’”，把经互会当作其推行殖民统治的工具^⑰。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了一批研究苏东关系史的著作，其中姜琦主编的《东欧三十五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马细谱主编的《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这两部著作分别从历史的角度涉及到了战后的苏东关系。姜著认为东欧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有其客观基础，并非全由前苏联军队带进来的；又认为东欧各国之所以普遍建立高度集权的前苏联模式，是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的^⑱。另外，我国苏东学术界还出现了一批客观评价苏东关系发生的变化的研究成果。1989年苏东剧变以后，我国学术界加强了对这一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国际事件的研究，苏东关系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为了便于我国读者全面了解东欧问题的来龙去脉，世界知识出版社陆续推出“动荡的东欧系列”，其中包括以下若干种书：《东欧剧变纪实》、《战后东欧的艰难历程》、《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卡达尔与匈牙利》、《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布拉格之春与捷克斯洛伐克》、《日夫科夫与保加利亚》、《齐奥塞斯库与罗马尼亚》、《苏联与东欧》、《西方与东欧》。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比较有学术性和客观性的研究著作，其中《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江流、陈之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苏联剧变研究》（江流、徐葵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是两本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不过，从总结苏东演变的经验教训出

发，这两部著作更多地是批评了前苏联在处理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犯了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错误。刘邦义根据他在波兰接触到的大量第一手档案材料和口碑材料，出版了《哥穆尔卡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较详细披露了哥穆尔卡当政时期的波苏关系。陈之骅主编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详细地涉及到该时期的苏东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颇有新意。张月明的专著《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也从思想和改革的角度涉及到了前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这里所讲的东欧是一个地域政治概念，它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8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南斯拉夫不属于苏东同盟，阿尔巴尼亚后来也退出。从时间来看，无论是西方学者、苏东学者还是我国学者，过去都只注重前苏联与东欧或东欧个别国家在某一段时期的关系的研究。从国别来看，国内外学术界比较重视对前苏联与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关系的研究；从事件来看，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力相对集中在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1956年波兹兰事件、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80~1981年波兰事件、1989年东欧剧变等事件的研究上，对苏东关系缺乏宏观的、整体的研究。另外，自80年代下半期以来，尤其是1989年苏东剧变以来，前苏联和俄罗斯方面在《近现代史》、《历史问题》、《苏联历史》（现改名为《祖国历史》）、《肯塔弗尔》（原《共产党人》）、《苏共党史》及《国际生活》、《斯拉夫学》（原《苏联斯拉夫学》）、《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分册》、《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自由思想》等历史政治类杂志上披露了大量的有关苏东关系方面的档案材料及研究成果。另外，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中心、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中心、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等机构曾经披露了一些有关苏东关系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苏南冲突、1956

年波匈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80~1981年波兰事件、1989年东欧剧变的材料，可惜这些材料及研究成果在我国苏东关系史的研究工作中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的反映。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苏联帮助东欧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使苏东同盟关系建立，到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维护苏东联盟的两条纽带——经互会和华沙条约最终解散，苏东关系的时间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空间范围之大涉及中东欧地区9个国家，头绪多，内涵广。从内容上讲，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关系；从层次上分，又包括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党际）、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民族之间的关系（民间），等等，不一而足。必须着重指出的一点是，由于体制的原因，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关系实际上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党的关系决定着国家关系，党的关系是国家关系的集中表现。在一般情况下，党的关系是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党的关系的好坏决定了国家关系的好坏，国家关系的好坏取决于党的关系的好坏。国家关系好，必以党的关系好肇其始；国家关系坏，也必以党的关系坏发其端。前苏联经常通过调整党的关系来调整国家关系。虽然党的关系与国家关系不能截然分开，但党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关系。党的关系重在思想政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而国家关系重在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等等具体方面，而且各国的具体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对于苏东党之间的关系，本书在“前苏联政策与苏东关系”一章将有所涉及，但本书的重点在国家关系。本书将从国际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政治文化三个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国际政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苏东国家关系进行宏观的、系统的、专题式的研究，并以期求教于国内有关专家、学者。

二、本书研究之视角

影响苏东关系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既有军事的，也有文化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民族的，也有个人的；既有意识形态的，也有国家利益的等等。本书以国际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政治文化作为研究视角，如同一条红线，贯穿全文。

（一）国际主义视角

国际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是同时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国际主义也经历了一个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到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8～1917年）：从国际主义产生到俄国十月革命。这一阶段国际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典型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工人无祖国”。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公社和第二国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反面说明了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不能有效地防止军国主义和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就要遭到削弱。

第二阶段（1917～1945年）：前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存在时期。在实践中，第一次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消灭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努力实行社会主义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在认识上，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从以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即推进世界革命为核心，到以苏联内部的民族团结、反对大俄罗斯主义为核心^①。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某些国际主义思想，但又作了实用主义的发挥，把苏联一国的利益等同于无产阶级国际利益，把保卫苏联视为国际主义的中心内容；在国

内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从而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本身的发展带来了灾难。

第三阶段（1945~1989年）：苏东社会主义同盟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东部地区和亚洲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阵营，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具有了国际法的意义，因而又可称之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与以前各阶段相比，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既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级阶段，其社会基础也极大地扩大了，内涵也更丰富了。1989年东欧剧变后，雅尔塔体系崩溃，国际冷战格局结束，苏东分道扬镳，国际主义这个提法先后从各国执政党的党纲中删去。不过，苏东同盟关系的正式瓦解仍应以1991年华约和经互会的解散为标志。

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大家庭、苏东同盟的存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国际主义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其发挥作用的唯一的时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存在时期。国际主义在这一时期的苏东关系中起到了特殊的、至关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在国际冷战的格局下，国际主义使苏东结成一个紧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盟，以共同对抗西方国际帝国主义。不可否认的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经互会和华约建立之初，国际主义因素是非常突出的。东欧一些国家（如波、捷、匈等）传统上是亲西方而仇俄的，罗马尼亚的反俄仇俄的民族意识更严重，它们的民族和文化特性也与前苏联迥然不同，如果没有国际主义因素，而仅仅依靠武力控制和高压把东欧捆绑在前苏联的战车上，使苏东同盟维持近半个世纪之久，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否则也就无法理解：西方对东欧的军事遏制与和平演变战略何以在相当长时间里迟迟不能奏效？这也就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战后东欧资产阶级失去政权、“西方失去东欧”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而东欧也并非完全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

应该说，国际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创始人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最卓越的贡献之一。在阶级社会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也是一种国际的力量，无产阶级只有实行国际团结，才能最终战胜国际资本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如何处理好国际利益和民族利益，无产者的阶级属性与民族、国家属性的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现实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国际主义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如在第一国际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热情地支持巴黎公社。在他们看来，巴黎公社是国际主义的，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世界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同时，巴黎公社又是爱国的、符合法国的民族利益的，因为它是反对本国的卖国政府和普鲁士侵略者的。巴黎公社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加速帝国主义的崩溃”等战斗口号，这些战斗口号既是国际主义的——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也是爱国的，因为它反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拿自己的生命去为剥削者厮杀，反对统治阶级拿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去作赌注，去作冒险的游戏。由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才有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的东部地区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多国社会主义体系，这是国际主义和民族利益相互结合的又一个成功的例证：东欧被视为继苏联以后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排头兵，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空前提高的政治威望有助于东欧共产党夺取政权；另一方面，也应该客观承认，东欧已基本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是东欧人民自觉的选择，他们已经厌倦了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同时，在国际共运史上，国际主义遭受挫折的情况也不鲜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各国绝大多数工人党都抛弃了国际主义的信念，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鼓励各国无产阶级为了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而相互厮杀。第二国际破产了。国际主义没有能够战胜国家民族主义。1920年苏波战争爆发后，苏俄红军为了“解放”波兰并激起欧洲革命攻入波兰境内直通华沙城下。意想不到的，红军此举伤害了波兰人民的民族感情，激起了波兰人民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红军失利后撤并被迫于次年在里加签订了和约。苏波战争的失利使列宁对欧洲革命与世界革命从理论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总结这一事件时承认：“我们没有能争取到维斯瓦河西岸和华沙的波兰工业无产阶级（这也是我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②。在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以国际主义作为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有其成功的一面。在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巩固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制度、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扩大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影响等方面，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谁战胜谁”的激烈斗争中，在“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全球性较量中，国际主义曾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威信和影响不断扩大，以至于到70年代凡重大的国际问题如果没有前苏联、没有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参加是不能解决的。但是，国际主义是一种带有强烈的阶级斗争色彩的意识形态，以国际主义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处理得不好就会导致忽略社会主义各国具体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同盟关系一方面使苏东国家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使其利益的冲突更加直接而频繁，正如刺猬原理：离得太远，则冷；挤得太紧，又扎人。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各国具体利益更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国的基础不同，具体国情和条件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国际主义有新的发展，要求更高层次上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并不排斥、否定各国具体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相反，它与各国具体利益相一致，

并促进其繁荣与发展。当然，这也要求人们的认识水平有进一步的提高。一般来说，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做到国际主义并不难，因为这是大的“立场”问题；而在经济、科技领域要做到真正的国际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这是具体的“利益”问题。开始做到国际主义也较容易，长久坚持可就不简单了。从思想上、理论上一般地认识国际主义，也相对容易；深刻而透彻地理解国际主义的实质，就不那么简单了；要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和操作国际主义，更是难上加难。真正的国际主义既要无产阶级的共同的国际利益为重，同时又要尊重各国的独立自主，与各国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辩证地统一。不能以一种利益去服从另一种利益，也不能为了一种利益而牺牲另一种利益。如果为了一己之利而牺牲别国、异族的利益，或是伤害它们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那就谈不上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与民族自决权、民族的自由发展和对人权的绝对尊重是不矛盾的。

遗憾的是，由于主观上的民族主义和客观上各国利益的多样性，苏东双方都曾经滥用国际主义，利用国际主义旗号掩盖自己民族主义的动机。在这方面苏联要负主要责任：苏联推行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宣称“苏联的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②，而把是否坚持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评判东欧各国是否实行国际主义的唯一标准。勃列日涅夫主义即是其系统的理论根据。而东欧各国也在利用国际主义这面旗帜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如乌布利希主义就把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置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之上。波兰和匈牙利也公开地把自身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国际利益之前。国际主义在很多情况下被扭曲了，变成双方尤其是苏联手中的一张牌，以致国际主义声名受到严重影响，令东欧国家反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苏东矛盾越来越多，隔阂愈来愈深。在“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的条件下，所有这些积怨和矛盾就如同火山骤然爆发，其势如排山倒海，苏东同盟的大厦顷刻间土崩瓦解。但这并不表明国际主义思想本身有

什么过错，而是苏东各方对国际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对国际主义的运用与操作出了问题，犯了错误。时代的发展和国际斗争并不是不需要国际主义，而是对国际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水平赶不上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理想使东欧在二战后脱离了西方而与苏联走到了一起，那么可以说，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种种错误和问题又使东欧脱离苏联回到了西方的怀抱。

坦率地说，对于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我们至今仍不知道怎样做，才算是唯一正确的绝对真理，但我们知道苏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我们还知道，在多种操作方法中肯定会有有一种方法可以相对地接近真理，只是这种方法尚未被人们找到并运用于实践。但有一个原则我们是很清楚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应做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有机结合，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

（二）国家民族主义视角

由于受冷战思维的影响，过去国内外史学界比较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在苏东关系中的作用，而相对忽略了对国家利益因素的研究。国家民族主义是国际关系中恒常起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

美国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是分层次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是该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其次，是经济利益，它是国际关系中恒常起作用的物质力量；再次，是国家的权力（即一个国家控制他国的能力、机会和可能性）和国际威望^②。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更迭，但其国家利益却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民族主义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相一致或吻合的、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即民族主义的国际表现，可以称之为国家民族主义，它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为基本单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是某个民族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带有倾向性的

思想、情绪、态度，或推行的运动和行为。国家民族主义反映了某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以及当今世界的关系，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本方式，因而也是一种能在国际政治中发生作用和影响的力量和因素，具有全民性和共同性的特点，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排它性。国家民族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特点和民族性格。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是国家民族主义的主要载体^②。

在国际关系中，如果某个国家既看重自身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比较健康的正当的国家关系；如果越过了这一界线，为满足自身利益而牺牲或侵犯他国利益，国家关系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而陷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泥坑。历史上的所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均由此而来。维护自身正当的民族国家利益，抵御外来侵犯势力，这就属于爱国主义、民族自卫主义的范畴。可见，国家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对于国家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性质应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斯大林关于德国法西斯的一段论述是关于国家民族主义思想的极好的脚注。他说：“德国侵略者即希特勒分子是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掠夺欧洲并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罪恶的进攻……希特勒分子自称为‘民族社会党人’。能不能认为希特勒分子是民族主义者呢？不，不能，实际上希特勒分子从事收拾德国领土、重新合并莱茵区和奥地利等地时，还有相当的根据可以认为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但是，在他们侵占了别人领土和奴役了欧洲各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兰西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底海沿岸人等等，并开始争夺世界霸权以后，希特勒的党就不再是民族的党，因为它从这个时候起就成了帝国主义者、掠夺者和压迫者的党了。”^③

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两

篇宣言也典型地体现了国家民族主义思想。战争伊始，马克思认为“在德国方面，这场战争为防御性的战争”，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恶魔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号召法国的工人阶级反对这场侵略战争，而德国工人阶级要防止“这场战争失去纯粹的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⑤。而当战争进入法国境内、德国方面战争的性质由防御转为掠夺以后，马克思号召法国工人阶级应该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⑥，而号召德国工人反对德国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可见，马克思对正当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把握是非常严格而准确的。

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多次提到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大国民族”^⑦。临终前他在谈到民族问题时又指出：“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⑧其实，列宁的这一观点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民族国家之间都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不能抽象地谈论国家民族主义问题，而要把大国、强国的国家民族主义与小国、弱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区别开来，联系国际关系的实际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大国、强国往往表现为进攻性、主动型的国家民族主义，比较容易走向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而小国、弱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则往往表现为防御性的、被动型的国家民族主义，在外来强力的威胁和逼迫下经常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如1956年波茨坦事件中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中的匈牙利），在极端情况下走向盲目的排外主义（如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阿尔巴尼亚就有这种倾向）。当然，这也并不完全排除小国和弱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争取与自己的国力不相应的影响，甚至损害或侵犯别国的利益的情况（如70~80年代越南侵略柬埔寨战争），走向狭隘民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民族主义既可体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又可以表现在军事、文化诸方面，分别表现为政治民

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军事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全球区域性一体化和各种超国家组织的出现，各国学者对民族国家的前途问题竞相发表自己的看法。70年代末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相互依存和技术的发展，国际政治国内化及国内政治国际化，全球一体化，民族国家正在衰弱并走向“消亡”，因此像“民族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这些概念已经失去了研究分析问题的意义^⑳。美国学者亨廷顿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世界政治正在步入一个新阶段，“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 and 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因而独立的民族国家不再成为全球事务的主要活动成员^㉑。亨廷顿的观点一出立即遭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学者的驳斥和反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福阿德·阿贾米驳斥“文明冲突论”解释不了诸如科威特战争、中东和谈等这类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指出“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㉒。中国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批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民族国家“仍旧是当今国际关系之行为主体”^㉓。

事实上，民族也好，国家也好，都是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各种意义上的利益集团。民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取得独立地位，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只要民族国家存在，民族国家利益就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民族国家利益的实现和满足要通过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才能实现：或支配与反支配的过程，或摩擦与对抗的方式，或表现为平衡、协调、妥协，或以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形式，等等。因此，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以及以其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应该说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恒常起作用的、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美国著名学者卡尔·多伊奇坚持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力量中心的观点，认为“只要民族国家仍然是人们完成其事业的

最重要的现实工具，它们就会继续成为这样的中心”^④。相邻民族之间，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战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具体利益之争。英国著名政治家邱吉尔曾说过，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大英帝国的利益才是永恒的。1989年10月，我国改革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⑤又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端的。”^⑥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从国际政治的实践来看，国家民族主义是东欧剧变的直接原因之一。苏东剧变使地球上增加了不少新的民族国家。原来苏东境内许多国内民族主义问题一跃而成为国家民族主义问题。国家民族主义成为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

苏联东欧都是民族国家。在苏东关系（1945~1991年）中，苏联是大国、强国，又由于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主义的故乡”、“世界革命的基地”、实际上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因而有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其国家民族主义常常越出健康发展的轨道，经常粗暴干涉东欧各国内政，压制东欧各国意愿，侵犯东欧各国利益，表现出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是一种进攻性、侵犯性的国家民族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模式在东欧的建立，即西方学者所谓的“苏联化”，是苏联国家民族主义的集中表现，经互会和华沙条约是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工具，而苏联的东欧政策不可能不反映苏联本身的国家利益，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

而东欧是小国、弱国，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周边大国的夹击之中，历史上屡受蹂躏和屈辱，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的传统。因而在苏东关系中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常常表现为对苏联大国主义的不满和反抗，维护自己正当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要求走符合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具有防御性、反抗性的特点。有些东欧国家还试图以各种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

一部苏东关系的历史（1945~1991年），是苏东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民族主义力量并存、合作和冲突的历史。这两种力量的对比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国际形势的紧张和苏联的高压政策可以使东欧暂时保持沉寂；当苏联放松控制和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时，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就非常顽强地表现出来，就像“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段时期的苏东关系中充满了不平静，相悖的历史传统和不同的国家利益就是其历史基础和现实原因。也就是说，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苏东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的过程，国家民族主义是其中虽非唯一却至关重要的原因。

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苏联对东欧的关系中只有大国主义一种内容。在苏东关系中苏联也有作出自我牺牲的一面，如保卫东欧国家的边界和安全，帮助东欧国家建设和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东欧国家的利益，等等，就受到了东欧国家的欢迎。在苏东关系中苏联也有灵活、成功的一面。苏东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也决非没有和平共处的时光。不然的话，苏东同盟能维持近半个世纪之久是不可思议的。同时也应该承认，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决非全部应予肯定。有些国家传统上有仇俄的民族心理，如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人对俄罗斯也没有好感。有的国家有轻视俄罗斯的民族优越感，如作为德意志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继承者之一的民主德国，自认为在经济上比苏联优越。个别国家民族主义走向了极端，如60~70年代的阿尔巴尼亚实行盲目的排

外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也是影响苏东关系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 政治文化视角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雅尔塔体系崩溃，国际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了新的动态。过去在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下，政治和军事因素占有主导地位。随着国际冷战格局结束，与经济因素同时，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日益上升。国际政治中文化因素作用的变化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和政论界的广泛注意。如荷兰著名哲学家 C·A·皮尔森教授提出了“文化战略学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的冲突”论；西方有些学者还提出了“民主和平论”、“霸权和平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战略。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史学家萨哈罗夫教授也主张不再以阶级斗争学说而以文明形态解释世界历史^⑤。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就文化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文化霸权”与“文化多元”、“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关系的讨论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一般意义的广义的文化，而是与国际政治有关系的、带有政治性质的文化。为此，国内外学术界均有人提出“政治文化” (POLITICAL CULTURE) 这一概念。这是当代国际政治学和社会学中日益广泛得到应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这个概念同“文化”概念本身一样，有着突出的模糊性特征，迄今国内外学者对“政治文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或看法。

为了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开展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工作，笔者觉得有必要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并应用于当代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政治文化是直接或可能直接地与国际政治相关的、广义的文化，它既包括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或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法律体系等范畴，还包括民族属性（血缘）、社会心理、国民性格、国民素质、民

族凝聚力、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人际关系、风俗习惯甚至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知识创新力、地缘、语言文字、文明类型等范畴。它们作为要素，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对国际政治发生自身的影响。和平演变也是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因此也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一国内部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社会体制在某些情况下与对外政策也有关系。政治文化是多角度、多层次、多结构、多侧面的，其内涵与外延的伸缩性很大。当然，在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时代，政治文化属于文化范畴，但不能把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都看成是政治文化，以至于草木皆兵，闭关锁国。

在国际政治中，政治文化诸要素既不是同时起作用，也不是平均起作用，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一种情况下以这种因素为主，在另一种情况下以另一种因素为主。如在1958年柏林危机这个问题上，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因素为主，其他因素相形逊色。而在德国统一这个问题上，则以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因素为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则退居次要地位。国际政治中政治文化诸因素的作用也是分层次的，民族、宗教、社会心理、国民性格的作用要比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深层的心理结构要比物化的政治文化更恒久。

作为一个多层次、多要素、多矢量的综合体，政治文化的不同要素或矢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显学”的顺序是不同的。如法国大革命前的王朝国家（君主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民族国家、冷战结束前的政治（国家）意识形态等就先后充当了这种角色。当政治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等实际利益相一致或吻合时，政治文化的作用就表现为直接的、明显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如上面所讲的柏林危机，看起来似乎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背后还有实际政治利益的作用和影响在起作用。当政治文化与实际利益不一致时，往往是实际利益占据上风，但政治文化仍然是潜在的，如1991年海湾战

争期间，阿拉伯国家内部发生战争，伊拉克导弹袭击以色列，企图分化、瓦解反伊统一战线。以色列吃“哑巴亏”而不敢还击，怕的就是激起阿拉伯国家的愤怒，导致反伊统一战线的破裂。冷战后，政治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在国际政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

政治文化具有区域性、集团性的特点，受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影响，过去人们只重视军事、经济等“硬权力”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政治文化这个“软权力”的作用长期遭到掩盖，受到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忽视。它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作为一种潜流，对国际政治、国家交往和民间交流仍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影响。文化因素的作用是客观的、恒常存在的，不可忽视的，而且比民族国家、比政治制度更基本、更久远。由于国际政治的状况是由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政治文化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并且往往是隐藏在背后的，其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决定性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文化因素的作用上升了。西方学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崭新的国际政治现象，看到了国际政治中文化因素作用的变化，但他们往往走向了极端，过于夸大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或者说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上升为政治文化，把政治文化又直接与现实政治挂钩，从而使政治文化的研究陷入歧途。笔者认为，政治文化既不是国际政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政治文化只为国际政治活动提供背景材料和活动舞台。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兴亡是一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过程，是由各种原因和因素综合、互动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中，既有相近又有很多不同的政治文化，迥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既有尖锐矛盾又有真诚合作的历史前提，构成苏东国家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的历史基础。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苏东阵营的瓦解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政治文化是研究冷战时期苏东关系史的一个新视角。

三、本书的主要观点及章节安排

总之，1945~1991年的苏东关系既丰富而生动，又复杂而微妙，应具体而审慎地进行剖析，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在苏联与东欧的相互关系中，苏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事物的性质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虽然对于苏联来说，有些错误不可避免，有些错误难以避免，但有些错误本可避免却没有能够避免，因此苏东关系的破裂和反目成仇，苏联要负主要责任。其中，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是重要原因。但同时也不能否定，在苏东关系中存在着无可否认的国际主义因素。难道能把苏东关系与历史上俄罗斯人与蒙古人的关系相提并论？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相提并论？显然不能，后两者只有武力的征服，没有任何共同的基础。也不能把社会主义阵营时期的苏东关系与社会主义阵营之前或之后的苏（俄）东关系混为一谈，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时期的苏东存在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存在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于这一点应该历史地看。苏东关系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国家利益、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领导人的个人心理和素质等因素的作用，还有国际形势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再加上政治文化因素的背后“支撑”，等等。这些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综合的、互动的、对立统一的。因此，与国内外的某些学者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苏东全面结盟不能完全归功于苏联和斯大林，苏东分道扬镳也不能完全怪罪于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东欧走向社会主义并非迫不得已，而是有其相当的社会基础；苏东关系最终破裂，东欧的国民性，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及东欧某些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与意识形态上的实用主义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和影响。

本书共分8章，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苏联政策、国际

形势、政治文化和东欧原因等几个方面来对 1945~1991 年的苏东关系进行专题式研究。第一章：“历史的楔子”，着重谈了俄罗斯与东欧国家不同的国情、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及 1945 年以前的双边关系，作为全文的铺垫。第二章：“苏联模式与苏东关系”，着眼于从政治角度研究，落脚点在东欧。第三章和第四章：“经互会与苏东关系”、“华沙条约与苏东关系”，分别着眼于从经济和军事角度研究，把经互会与华约作为研究苏东关系的两条线索。第五章：“苏联政策与苏东关系”，着眼于从苏联政策的角度研究，探讨了战后各个时期苏联对东欧所采取的政策，重点探讨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对苏东关系的影响，落脚点在苏联。第六章：“西方的苏东战略与苏东关系”，着眼于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研究，重点探讨西方的军事遏制战略与和平演变战略对苏东关系的影响。第七章：“苏东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因素”，谈了有很多相同（同质）又有很多不同（异质）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性格是决定战后苏东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第八章：“苏东交恶中的东欧原因”，既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东欧国际主义的一面；又重点探讨了东欧的民族性格、东欧国家民族主义，执政党的错误、失误及其领导人个人因素对双方关系的负面性作用。另外，在开头的绪言部分谈了本选题的研究概况和本书研究的三个视角：国际主义视角、国家民族主义视角和政治文化视角，并提出作者的主要观点。作为本书研究的一点心得，在结尾部分附有“小结与思考”一节，对全文作出总结，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最后附上本书的中外文主要参考书目。

注 释

① 作为例子，如（美）凯尔迪什主编：《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罗伯特·塔克主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文集》，纽约1977年英文版；乔·肖夫林：《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实践》，英国《研究》杂志1988年第10期；（美）小杰克·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第22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② 参见J·F·布朗：《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 1968~1975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约翰·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见艾伯哈特·舒尔茨：《从历史角度看苏联东欧集团内部的关系》，《苏联东欧译丛》1982年第3辑。

④ 参见（美）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 费恩克·瓦利：《寻求一个统一的德国》，第23页，巴尔的摩，琼斯·霍布金斯，1967年版。

⑥ 《作为合作的冷战：超级大国在地区冲突处理上的合作》，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0年版；《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1年第2期，第62页。

⑦ 如（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⑧ 《1956年匈牙利事件·匈牙利历史学家评价的演变》，（俄）《近现代史》1992年第3期，第18~19页。

⑨ （俄）《近现代史》1992年第3期，第21~22页。

⑩ 原载（联邦德国）《东欧》杂志1989年第4期，转引自《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9年第6期，第96页。

⑪ ⑫ （苏）《苏联历史》1991年，第39、44页。

⑬ 参见阚思静：《卡达尔执政失败原因析》，《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1~22页。

⑭ 参见B·A·穆萨托夫：《东欧：变化的过程》，（苏）《近现代史》1991年第2期；尤里·克良泽夫：《东欧的民主革命·原因与后果》，（苏）《共产党人》1990年第14期。

⑮ (俄)《远东问题》1993年第2期,《东欧中亚问题译丛》1994年第2期,第33~34页。

⑯《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日社论:《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万岁》;参见《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原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中译本。

⑰ 参见《苏修推行殖民主义的工具——“经互会”》,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⑱ 参见姜琦、张月明著:《东欧三十五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⑲ 参见李兴:《十月革命后列宁国际主义思想探析》,《俄罗斯研究》1994年第6期;李兴:《列宁斯大林国际主义思想探析》,《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6期。

⑳ 参见姜长斌:《里加条约的历史意义》,《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

㉑《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在实践中》,莫斯科,1974年俄文版。

㉒ 参见(英)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1990年中文版,第1495页。

㉓ 参见李兴:《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民族研究》1995年第11期全文转载。

㉔《斯大林文选 1934~1952》,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㉕ 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6、292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㉗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

㉘《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2页,人民出版社。

㉙ 参见《民族主义与国际政治》,《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78年第72卷。

㉚(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季刊》第72卷,第3期。

㉛(美)亨廷顿:《驳〈对文明的冲突〉的批评》,美国《外交季刊》第72卷,第5期。

㉜ 刘靖华:《冷战后世界冲突问题——评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2期;参见赵世瑜:《未来的文明与文明的未来——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汤一介：《哲学研究》1994年第3期。

⑳ (美)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第6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㉑ ㉒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㉓ 见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史学家柳·巴·萨哈罗夫于1996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所作的学术报告。

第一章 历史的楔子

1989年令人震惊的东欧剧变虽已成为历史，但仍然发人深省：苏东曾经凭什么走到了一起，又何以最终分道扬镳？

苏东从战后全面结盟到80年代末分道扬镳，从“牢不可破的友谊”到“全面断绝关系”，^①是一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过程，是种种因素综合、互动作用和影响的结果。目前国内外交界和学术界积极探究个中缘由，或从国家利益、国家民族主义视角，或从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角度，或从国际形势变化和西方和平演变的侧面，或从苏东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层面，众说纷纭，精彩迭呈^①。但对于从民族属性、国民性格、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心理、地缘政治等历史基础方面来谈苏东关系则注意不够。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已有的、既得的、从前人那里直接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②作为民族国家，民族性格、社会心理是根深蒂固、万难更改的，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不至于会被轻易遗忘。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战前苏东关系与战后的苏东关系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战后苏东关系是对战前苏东关系的继承和发展，战前苏东关系是构成战后苏东关

系的历史的铺垫。从苏俄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东关系，构成了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的直接的历史前提。事实上，既有相近之处又有诸多不同的政治文化、迥然不同的民族意识和历史传统，既有尖锐矛盾又有真诚合作的历史前提构成苏东国家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的历史基础。弄清这个历史的基础，不仅对于研究社会主义阵营时期的苏东关系，而且对于认识和预测目前俄东关系的现状和前景，都有很好的现实意义^③。

—

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来探讨苏联与东欧的关系，首先就必须搞清楚在国际政治背后起着支撑作用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学和社会学中正在走红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这个概念同“文化”概念本身一样，有着突出的模糊性特征，迄今国内外学者对“政治文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或看法。概括起来，国内外学者都把“政治文化”定义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内与政治有关的一种情绪，一种态度，一种能力或一种行为^④。笔者认为，传统的文化概念，以及国内外学术界远未统一的各种政治文化概念，内涵太狭小，亟需更新和拓展。政治文化应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而且外延极其宽广的概念，完全可以借用到国际政治领域中来。国际政治中的政治文化，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的、比较宽泛的广义上的文化。除了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法律体系等一般意义上的狭义的政治文化之外，还包括国民性格、民族心理、国民素质、民族凝聚力、宗教信仰、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甚至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知识创新能力、地理位置等可能与国际政治间接有关的范畴。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和科技都有可能被利用为国际政治斗争的手段。苏东双方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既有相近之处，又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苏东在政治文化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地理位置上看，苏东都处于欧洲的东部地区，远离欧洲文明的中心——西欧，与西欧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格局。斯拉夫文化、拜占庭文化（东正教文化）在该地区有相当大的影响。在11~13世纪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共同抵抗和反对鞑靼蒙古人及德意志十字军的入侵^⑤。由于地处偏远，该地区受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比较晚，也比较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余波只是波及到了中欧（波、匈、捷），到东南欧已成强弩之末，对俄罗斯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当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起来的时候，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却出现了“农奴制的再版”，农村公社大量存在。西欧总是力图使欧洲东部成为农产品和原料产地，而自己充当生产机器设备的先进工业国。无论是在文化的发展方面，还是在民族国家的形成方面，以及向资本主义过渡方面，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相对于西欧都比较晚，既有民主、自由主义传统，也有独裁、专制主义传统^⑥。因此它们必须补上“农奴制改革”和工业（技术）革命这两课，因而自近代以来其经济、科技相对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因为落后非要向西方学习不可，另一方面民族自尊心、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特别重，不愿屈人之下，力争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这种共同的命运使该地区在某种意义上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地理单元。

其次，苏东政治文化又有很大的不同。

其一，俄罗斯与东欧八国在血缘、民族等方面就不尽相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出身于同一血统的斯拉夫人，他们在公元7世纪最终分为三支，即西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即罗斯人，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祖先。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就生活在今天的东欧地区。西斯拉夫人主要包括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而南斯拉夫人主要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和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是马扎尔人的后代。阿尔

巴尼亚人是古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后代。而罗马尼亚人则是古达契亚人和罗马军团的后裔。至于民主德国的情况则比较特殊，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国际冷战的产物加入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

其二，俄罗斯与东欧各国的宗教、语言、文化也各有不同。1054年东西基督教会分裂后，斯拉夫人按宗教分为两大集团：俄罗斯与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属于东正教会集团。东正教斯拉夫人使用基里尔字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属天主教会集团，天主教斯拉夫人使用拉丁字母；在文化上他们分别属于基督教文明的两个文化圈：拜占庭文化圈和拉丁文化圈。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在文化上明显地倾向于西方。俄罗斯文化是一种村社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专制主义；而波、匈、捷等则是拉丁文化或西方文化，以个人为中心，崇尚民主、自由。有的俄国学者认为俄罗斯历史上政权与社会是“有机统一”的，源于希腊—拜占庭古代文化；而西方文化是源于古罗马文化^⑦。匈牙利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匈牙利语与东欧任何一种语言均不相同，属于芬—乌戈尔语系。罗马尼亚信奉东正教，但传教语言用拉丁字母。阿尔巴尼亚信奉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信奉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巴尔干半岛扼欧亚两大洲要冲，是东西两大文明的交汇地带，其文明形态有不完全雷同于东西方的独特之处。民主德国居民主要信奉新教和天主教。作为德意志民族和文化的继承者之一，民主德国属于典型的西方文明圈。

由于国力弱小，各国的领土、宗教、民族和历史矛盾错综复杂，加之东欧在联系欧亚两洲方面令人垂涎的战略地位，正如英国著名政论家麦金德所说：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⑧因此历史上东欧从来就是周边强国激烈争夺和鱼肉的对象。东欧人民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传统。在反对外国侵略的长期斗争

中，东欧人民形成了酷爱独立、憎恨侵略的历史传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贯穿东欧近代史的一条红线。“‘民族主义’是最为激动人心的力量和精神”^⑩。多少世纪以来，他们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举行了无数次民族起义，牺牲了无数英雄儿女。哥穆尔卡曾说：“在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像波兰民族这样敏感地对待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的民族。”^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就是这种爱国精神的集中写照。仅波兰在19世纪三十多年时间里（1830~1863年）就举行了4次英勇的民族起义（1830年、1846年、1848年、1863年）。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称赞的：“世界上很少有几个地方像东欧那样，诗人、作家、艺术家如此关心政治和社会活动，如此革命，如此爱国并有独立思想；世界上也很少有像东欧那样，用文学、艺术、音乐等作品来激励人民反抗国内外的压迫者和镇压者的暴政。政治和社会思想像一根线贯穿了这些国家的艺术。”^⑫

近代东欧的历史与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是紧密相联的。俄罗斯是世界历史上一位迟到的巨人。直到16世纪初大俄罗斯民族（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支）和俄罗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最后形成。^⑬不过，早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性质和具体内容上与后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在15世纪80年代以前，俄罗斯是一个被侵略和被征服的民族和国家，摆在俄罗斯民族和国家面前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异族的统治和奴役，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总的来说，该时期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然而，随着俄罗斯的崛起和沙皇政府的羽翼渐丰，俄罗斯民族主义逐渐蜕变成为为本民族及其某些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而不惜损害别的民族利益的民族沙文主义，越来越显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到处从事侵略、扩张和奴役其他民族国家的活动。^⑭由于东欧拥有俄罗斯梦寐以求的出海口——波罗的海和黑海，又是通往欧洲心脏的必经之

地，故历代沙皇都特别重视对东欧的争夺。沙俄力图建立一个囊括整个东欧范围即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德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恩格斯也认为，对于沙俄来说，如果不将其边界推进到但泽—的里雅斯特一线，它是不会有安全感，不会停止扩张的。^⑭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波兰又被沙俄视为保证其对欧洲的统治的地理据点。19世纪末，沙俄伙同普鲁士和奥地利3次瓜分波兰，夺取波兰62%的领土。波兰被灭亡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沙俄又攫取了普奥原来所占领的波兰领土的大部分，并在这部分领土上建立了波兰王国，俄国沙皇成为波兰国王。波兰被宣布为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夺取黑海出海口，沙俄不惜与土耳其多次刀兵相见。1828年终于把罗马尼亚两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

泛斯拉夫主义是沙俄向巴尔干斯拉夫国家扩张的理论依据。“救斯拉夫民族于水火，给东正教徒以自由”是其意识形态口号。泛斯拉夫主义最早起源于西斯拉夫人。他们不满于或受威胁于异族的压迫与奴役，寄希望于在斯拉夫民族各国组成的联邦中求得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俄罗斯接过泛斯拉夫主义旗帜并把它运用于政治领域，宣传俄罗斯是斯拉夫民族的领袖，俄国东正教会负有宣扬真理、慈爱和精神自由的世界使命，声称“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两个罗马（指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作者注）已经衰落，第三罗马依然存在，而第四罗马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俄国肩负着拯救斯拉夫民族乃至世界的历史使命。^⑮俄罗斯舆论界认为，“我们应该力所能及地帮助我们的受压迫的兄弟，因为这不仅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也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因为对于斯拉夫人来说这是历史的公理，历史的规律性”^⑯，“斯拉夫人的战争就是我们的战争”^⑰。1876年俄罗斯还掀起了一个为南方斯拉夫人募捐的热潮，其中三分之二是不富裕的老百姓，甚至是穷人捐献的。但沙皇政府骨子里并不愿“无私地”帮助南方“斯拉夫兄弟”，对于这种自发的人民运动并无快意，而是进

行限制，害怕引起革命。沙皇政府也不希望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一个南方斯拉夫人的独立国家，甚至希望保持现状对俄国更为有利。^⑩俄国还以泛斯拉夫主义掩盖自己大国沙文主义的动机，借口东欧斯拉夫人与俄罗斯同种、同教，语言、文化相同或相近，“利害相关”，“命运与共”，以斯拉夫民族“解放者”的姿态出现。1857年，俄国代表在一次对摩尔多瓦贵族地主和教会首领的讲话中公开说：“先生们，你们回想一下，有一种联系比政治关系更牢靠，这就是宗教关系，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属于东正教这个大家庭，它在东方而且以俄国为首。”^⑪通过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俄国取得了对大保加利亚（版图从爱琴海至黑海包括两海海峡）的控制权。柏林会议后，俄国为了控制和影响塞尔维亚而与奥匈帝国展开了争夺，俄积极参与了塞尔维亚的铁路建设。^⑫

正统主义是沙俄维护霸权、干涉别国内政的另一个意识形态工具。所谓正统主义就是保护欧洲“正统”秩序（君权神授的封建制度）和国家体系，镇压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俄国出钱出枪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革命，并亲自镇压了波兰的民族起义和罗马尼亚革命。沙俄成为欧洲的宪兵。

正因为数百年来沙俄对东欧国家赤裸裸的武力吞并和打着各种旗号的武力控制，东欧很多民族和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形成了反俄、仇俄的历史传统。反俄是波兰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和表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斯洛伐克与俄罗斯在民族、宗教和文化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又由于历史的原因，如俄国帮助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914年俄国为了塞尔维亚而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它们对俄国的态度相对要友好一些。不过，南斯拉夫人对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蒙古式”的、“亚细亚式”的“诡诈”与野心不是没有觉察，也不是没有戒心^⑬。如塞尔维亚的外交大臣约万·里斯蒂茨在私下里就曾揭露说，俄国的亲斯拉夫派实际上是

“真正的亲俄罗斯派，他们把斯拉夫人中弱小的民族看作是填进俄国欲壑的可口的食物”^②。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种族、尤其是这一种族的唯一强有力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这种理论的发明是最适合俄罗斯政策的目的的），这在中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③

二

从俄国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这一段在时间上离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成立最近，是战后社会主义阵营成立的前夜。这一时期苏俄（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④。

1917~1924年为第一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东欧各国普遍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战后波兰宣布独立。苏俄予以承认，并宣布废除沙俄与东欧国家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不同，东欧各国在政治、外交上都追随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敌视、封锁和包围苏维埃俄国。波、罗、捷、塞等国甚至还直接参加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⑤。罗马尼亚还趁机夺取了比萨拉比亚。捷、罗、南三国还在法国的支持下成立了旨在抗衡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国的军事政治组织——小协约国。苏联则从“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主要从道义上支持1919年的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1923年保加利亚的起义。这一阶段苏东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恐怕要数1919~1920年发生的苏波战争。波兰企图通过这场战争夺取历史上曾经属于它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而苏俄则力图通过这场战争推翻波兰资产阶级政权，以推进世界革命。今天看起来，这场战争是历史上两国领土争端的继续，只是由于时代的不同，战争被赋予了新的阶级内容。战争的结果事实上是红

军失败了。1921年3月，苏波签订和约，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划归波兰。苏俄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能够战胜波兰的民族主义。1922年4月，苏俄成功地与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相互取消债务，恢复了外交和领事关系，冲破了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和包围。1924年6月，阿尔巴尼亚发生了革命政变，建立了该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府，正式从外交上承认了苏联^⑧。这是从法律上正式承认社会主义苏联的第一个东欧国家。1924年对于苏联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从外交上、法律上承认苏联的一年。苏俄从思想认识上也实现了从推进世界革命向谋求和平共处的过渡。

1925~1934年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苏东关系的特点是“和平共处”。东欧诸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继续奉行反苏和亲西方的方针。虽然国际帝国主义对苏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失败了，但苏联亦无力再在欧洲推进“世界革命”。苏联对东欧事务基本上采取“不介入”的政策，维持某种“均衡”，以抓紧时间集中力量从事本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尽量推迟世界大战的来临。1926年与德国签订了为期5年的《苏德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发展与德合作，挫败了英国策划反苏统一战线和挑拨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阴谋。苏与波兰政府进行了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1932年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还与一些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波、捷、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共同签订了非战公约。随着苏联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增强，特别是由于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东欧诸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不得不改善与苏联的关系。1933年底捷克一家自由派报纸上刊登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现在）不是俄国应该明确对我们的态度，而是我们应该明确对俄国的态度。1.6亿人口的大国并不怎么需要我们，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却需要它。如果中欧策源地（指德国——作者注）再一次制造紧张局势，我们就不得不转向东方寻求援

助。”^②1934年，匈、罗、捷、保、阿等东欧国家相继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③。东欧国家与苏联的建交，尤其是小协约国中的伙伴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与苏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对南斯拉夫影响很大。南社会舆论界对政府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与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④

1935~1938年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由于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苏联力图与英法尤其是法国及其东欧盟国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苏联积极呼吁集体反击法西斯侵略，支持“东方洛迦诺计划”以对付德国的威胁。《东方公约》原打算包括苏、波、捷、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德国参加，其目的是制约德国，但由于德国反对，欧洲大国英法或拒绝或消极，而波兰声称只有在德国参加的情况下波才参加。东方公约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1935年5月，苏法、苏捷互助条约先后签订。这是苏联推行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的主要成果。但苏捷条约的作用要受法国的制约，因为捷“不愿把自己的政策的方向从西方转到东方”，“不愿单方面与俄国联系”^⑤。而法国并无意与苏联建立反德军事联盟。所以这两个条约自签订之日起就成为一纸空文。在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中，苏联号召集体反对法西斯势力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但此项建议没有得到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的支持^⑥，同罗马尼亚的关于签订互助条约的谈判也破裂了。为了满足希特勒的贪欲以自保，英法不惜牺牲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英法德意于1938年9月制造了“慕尼黑阴谋”，使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复存在了。在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只有苏联是唯一同情和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欧洲大国。苏曾明确地向捷表示，如果法国仍忠于对捷的条约义务并予以援助，苏将予捷以有效的援助^⑦。可是法国实行“绥靖政策”，参与了慕尼黑阴谋。而波兰和罗马尼亚在英法的唆使下不同意红军越过其国境实施援助。捷是苏联的邻国，英法在决定与苏联安全紧密相关的一个国家的命运时把苏联排除在外，不能不引起苏联的严重警惕和担

忧。慕尼黑事件标志着小协约国集团的破产，也说明了苏联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失败了。

1939~1941年苏德战争之前是苏联加强自身安全、在东欧国家的领土上建立“东方战线”的阶段。这一阶段苏联一方面继续争取与英法联合，制止法西斯挑起新的世界大战；同时与德国接近，以避免英法祸水东引。1939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明确指出要避免使苏联卷入战争冲突。由于苏与英法互相缺乏信任，英法的盟国——波兰不愿意接受苏联的援助，坚决反对苏联红军入境迎击德军。波军统帅雷兹·斯米格威声称：“德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而俄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⑳苏为自保，转于1939年8月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还附有《秘密附属议定书》，其中关于东欧的内容有两点：一是划分了德苏两国在波兰的势力范围，大致以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一线为界；关于东南欧，苏联提请注意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而德国声称它对该地区在政治上完全不感兴趣。尽管主持签订该秘密条约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至死都不承认有这项密约的存在^㉑，但历史档案的披露无情地揭穿了他的谎言^㉒。苏德条约签订后，苏承认了德国的傀儡斯洛伐克国，并且同贝奈斯的流亡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苏联红军立即进入波兰东部，占领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波军腹背受敌，张皇失措，大批官兵被红军俘虏。苏内务部把其普通士兵、从中校到将军的军官、军政要员、谍报员、反谍报员、宪兵、狱吏、警察分别关押在不同的战俘营，并强迫其中部分人为苏联修建公路和铁路^㉓。苏联方面宣称波兰是“凡尔赛体系的畸形儿”，宣布“波兰国家和政府已不复存在”^㉔，声称“这种形势构成对苏联的威胁，迫使它无法再继续保持中立”^㉕。这是波兰历史上第5次遭到瓜分，第二次亡国。根据近年来披露出来的材料，苏联内务部于苏德战争爆发前不久在卡廷森林等地方杀害了数万名波兰军官^㉖。作为构筑从波罗的海至黑

海的“东方战线”的一部分，苏联不仅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夺取了芬兰的部分国土，而且还武力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迫于国内要求与苏结盟的强大压力和双方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苏联与南斯拉夫政府于1941年4月5日签订了《苏南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规定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若缔约一方遭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要对缔约国实行友好政策^④。南希望藉此得到苏联的军事和道义上的支持。

1941年6月~1945年5月是苏德战争时期。东欧分属于两大敌对的集团。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或主动或被迫加入了以德国为首的法西斯轴心国，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则站到了以苏联为主要代表的反法西斯同盟国一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苏联还支持波匈共产党组织武装力量参加对德作战。波兰实行“两个敌人”的战略，视德国为主要的敌人，同时也视苏联为波兰民族的敌人。苏德战争的爆发使苏波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双方开始合作打击共同的敌人。苏从监狱和劳改营中释放了波军战俘，并帮助在苏境内建立步兵师配合苏军作战^⑤。但双方的矛盾、摩擦仍不断发生。后来，苏支持波共领导的卢布林政权以与英美支持的波兰流亡政府相抗衡^⑥。保加利亚虽是德国的盟国，但保军拒绝希特勒的命令，公开拒绝与苏军作战^⑦。而法西斯的其他东欧盟国都追随德军出兵对苏作战，罗马尼亚还趁机夺取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1944年苏联红军越过国境，进入东欧对德作战，解放了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攻下了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只有阿尔巴尼亚苏军未曾进入。在战争胜利的前夕，苏美英等世界大国就开始酝酿战后东欧的安排。1944年10月，斯大林与邱吉尔达成了口头协议，划分了苏联与其他国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罗马尼亚，俄国——90%，其他国家——10%；南斯拉夫，俄国——50%，其他国家——50%；匈牙利，俄国——

50%，其他国家——50%；保加利亚，俄国——75%，其他国家——25%^④。1945年4月30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9日成为“欧洲胜利日”，德国东部地区为苏军占领。战后苏联的领土西移，包括原属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以及原属捷克斯洛伐克、后希特勒把它转赠给匈牙利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⑤。苏从罗马尼亚手中收回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作为补偿，波兰的西部边界向西移动到奥德河—尼斯河一线，兼并了原属德国的部分领土。战后波兰的边界问题成为战后国际政治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

另外，由于东欧地区与俄罗斯及后来的苏俄历史上都是比较落后的农业—工业国或工业—农业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相似，以生产粮食、原料和工业半成品为主，故在东欧各国之间，以及东欧与俄罗斯及后来的苏联之间，经贸的互补性不强，加上政治气候的影响，苏东经济联系很不密切。相反，东欧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经济互补性很强，各有所需，因而东欧经贸传统上是面向西方的。战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十分薄弱。苏在东欧国家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最多也没有超过3%，而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对外贸易额中，苏联分别只占1.8%、0.45%和0.4%^⑥。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36~1939年）苏联与罗马尼亚的进出口水平太低，以至于苏联政府代表怀疑是否有继续与罗马尼亚保持贸易联系的必要^⑦。而从1918年到1940年间，苏与南斯拉夫的贸易额最多的年份也只有40万卢布，1924~1927年之间贸易几乎完全停止^⑧。直到经互会成立前夕的1948年，苏东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还是非常简单的，东欧各国恢复经济所必需的大量机器设备和零配件仍然主要从西方国家进口，资本主义国家在东欧各国对外贸易额中的比重：捷克斯洛伐克——68%，匈牙利——66%，波兰——59%，罗马尼亚——29%，民主德国——25%，保加利亚——22%^⑨。这说明了苏东阵营在成立之前是缺

乏共同的经济基础的。

三

1945年以前的历史说明，俄罗斯（苏）与东欧国家之间在文化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斯拉夫文化，拜占庭文化，东正教文化；加之地缘政治和历史发展的相似性，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往往构成一个与西欧不同的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单元。但不同也是显著的，如中欧国家（波、匈、捷）的天主教文化（或西方文化），不同于俄罗斯的村社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崇尚民主、自由、个性，而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专制主义。巴尔干半岛则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不完全等同于俄罗斯文化。俄罗斯（苏联）与东欧国家既有缓和与合作的时候，更有对抗与仇恨的一面。东欧一些国家历史上有反俄和仇俄的民族心理和情绪。在有些国家（如波、匈）反俄成为爱国主义的试金石，俄国成为“敌人”的同义词。俄东之间也没有形成发达的经济联系和统一的大市场，这给战后的苏东关系，包括社会主义阵营时期的苏东关系带来了深层的影响。事实上，既有相近之处又有诸多不同的政治文化、迥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既有尖锐矛盾又有真诚合作的历史前提正是苏东国家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的历史基础。

历史上东欧是一个充满了不稳定的和悲惨的世界。从地理位置而言，它扼欧亚交通的要冲；就文明形态而论，它是东西文明的分野；斯拉夫人、马札尔人、罗马尼亚人在这里毗邻而居，却互不相让；土耳其、德意志和俄罗斯长期在这里角逐；东正教与天主教的争雄由来已久，新教和穆斯林也各有地盘；本世纪初，苏维埃俄国与帝国主义协约国集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在这里较量；苏俄世界革命战略与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在这里争斗；两次世界大战皆以东欧为发端。巴尔干成为欧洲的火药

桶，全球最敏感的神经中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又成了苏美冷战的起源，雅尔塔体系的板块“交合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这里直接对峙和交锋。东欧成为两种社会制度对抗的前沿阵地，今天又是体制选择和模式转换的试验场，北约东扩与反北约东扩的拉锯带。波黑和科索沃问题正是由于世界列强的参与才变得错综复杂。自始至终，只要有机会，俄罗斯就积极参与对东欧的角逐，从来不打算放弃对该地区的影响和控制，把它拱手让给西方。俄罗斯与东欧之间恩恩怨怨，千丝万缕，斩不断，理还乱。俄（苏）东关系明显地体现了该地区风云多变的历史特点。

东欧内部的民族矛盾，种族纠纷，宗教冲突，领土争端，意见分歧，利益摩擦，互相拆台，十分激烈^④。历史上就有两次巴尔干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东欧国家总是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阵营互相厮杀。又如在领土问题上，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之间有特兰西瓦尼亚之争；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之间有马其顿之争；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之间有科索沃之争；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之间有南多布罗加之争；甚至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之间也有德钦之争。另外，“大匈牙利”、“大保加利亚”、“大罗马尼亚”、“大塞尔维亚”的思想在各国远不是没有市场^⑤。这说明，东欧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并不团结，远不是铁块一块；东欧国家也远不是愿意永远充当“小伙伴”。这既是东欧历史上常遭到异族蹂躏的原因之一，客观上也构成了战后苏东关系的历史基础之一。

国家利益、民族性格、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都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扩张主义和专制主义是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与精神^⑥。19世纪法国政论家德·托克维尔曾经把俄国和美国这两个当时正在崛起的伟大民族进行了很有意思的对比，他说：“正当美国人在同大自然的束缚搏斗的时候，俄国人却在同世界上别的人种厮杀……美国使用锹镐征服世界，俄国人则用剑戟征服世界。为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美国总是根据本身的利害得失开辟个人发挥聪

明才智的自由途径；俄国人则把社会的一切力量集中于某一个人。美国人把自由作为行动的基本手段，俄国人则以服从作为行动的根本准则。两者出发点不同，道路各异。尽管如此，看来他们都在上帝意志的驱使下，为今后能够掌握半个世界的命运而奔命。”^①在战前对东欧的关系中，苏联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东西；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在苏联的东欧政策中确有国际主义的因素。东欧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传统，但东欧民族性格中也有某种不成熟性，民族意识太强，民族自尊心过重，无政府主义，过于敏感，甚至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和盲目排外主义的倾向。另外，从众心理重，依附心理较强，自立能力较弱，总是企图托庇于某一大国以寻求保护，因此历史上经常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现象。如依靠俄国战胜土耳其后，俄德的势力大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实行议会民主制，投靠法英寻求庇护。法西斯德国崛起后，东欧各国又一窝蜂实行军事独裁制度。东欧国家这种不成熟的民族性格也影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东关系，如战后东欧各国纷纷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与苏联结成同盟，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89年又一边倒向西方，苏东交恶，因苏联模式的弊端而全盘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因斯大林的错误而完全否定斯大林的全部，把苏东同盟时期称为“苏占时期”、“殖民时期”。近年来，东欧国家已经加入或要求加入北约和欧盟，出现了“东欧西行”的局面。东欧国家的这种民族性格实际上也构成了苏东最终交恶的一个潜在的历史根源。

注 释

① 参见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江流、徐葵主编：《苏联剧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李兴、周雪梅：《论苏联模式与苏东关系》，《东欧中

亚研究》1996年第2期。关于国家民族主义（STATE - NATIONALISM）概念，参见李兴：《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李兴、周雪梅《论苏东交恶中的东欧原因》，《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1期。李兴：《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外交与苏联的兴亡》，《科学社会主义》1999年第6期。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册，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 参见李兴：《剧变后中欧国家与苏联、俄罗斯关系的演变及其前景》，《欧洲》1996年第2期。

④ 关于政治文化的定义，国内外学术界看法不一。西方学者参见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另一位学者卡瓦纳夫在他的《政治文化》（1972）一书里对政治文化的定义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参见贡恰罗娃：《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文化》，《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版》1988年第5期；А·И·良波夫、В·齐思佳科夫：《政治文化》，《莫斯科大学学报·社会政治研究》1994年第1期；格·缅耶尔：《极权社会和准极权社会的政治文化》，《莫斯科大学学报·社会政治研究》1994年第5期。中国学者参见任晓：“政治文化的反思”，《中国书评》1994年创刊号（香港）；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赵宝熙：《“和为贵”、中庸之道和武士道精神——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⑤ 《关于11~13世纪波兰、罗斯及其邻国的珍贵文献》，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⑥ 参见И·涅依别洛夫、Ю·马尔哥利斯、Н·尤尔科夫斯基：《俄罗斯的民主和自由主义传统》，（俄）《历史问题》1996年第2期；（奥）路德维希·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圆桌会议：《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和崩溃》，（苏）《苏联历史》1991年第1期。

⑦ 参见：（俄）Н·丹尼涅夫斯基：《欧洲文明与俄罗斯》，《欧洲选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⑧ 参见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20~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⑨ (英) 罗宾·奥格:《东欧 1740~1985 从封建主义到共产主义》,伦敦,1986年版,“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一节。

⑩ 哥穆尔卡:《关于波兰目前的局势》,第71~7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⑪ (美) 约翰·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第23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⑫ 参见(苏)B·B·马夫罗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⑬ 张建华:《俄国历史上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其基础》,《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

⑭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⑮ R·赫坦巴哈:《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第131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参见M·C·马思宁:《“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国家的复兴问题》,《莫斯科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俄文版。

⑯⑰⑱ 《苏联与南斯拉夫人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联系》,第52~53、54页,第78~82页,莫斯科,1957年版。

⑲ 列·博依库:《欧洲外交和罗马尼亚事业的胜利(1856~1859)》,第138页,雅西,1978年版。

⑳ 参见思·恩·且契科:《19世纪70~80年代俄罗斯与塞尔维亚的社会关系》,第12~22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㉑ 关于俄罗斯人具有“蒙古式”的、“亚细亚式”的“诡诈”的提法是马克斯·维伯的发明,参见(美)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主义力量的对比研究》,第454页,1989年版。

㉒ 麦肯奇:《塞尔维亚人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英文版,第156页。

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6~5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

㉔ 关于这一时期具体阶段的划分,还可参见B·马杰尔斯基:《关于两战期间苏波关系的分期问题》,《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1995年第4期;关于1939~1941年间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国际关系和中东欧国家(1939年11月~1940年8月)》,《苏联斯拉夫学》1991年第1期;《德国侵苏前夕的国际关系与中东欧国家(1940年11月~

1941年6月)》，《苏联斯拉夫学》1991年第4期。

⑤ 参见《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档案文件集 1917~1945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2年俄文版。

⑥ 参见列舍特里科夫、斯米尔洛娃：《苏阿冲突是怎么回事》，（苏）《共产党人》1990年第9期，第107页。

⑦⑧⑨ A·A·舍瓦科夫：《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关系与欧洲安全问题 1932~1939年》，第97、218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

⑩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档案文件集 1917~1941年》，第274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⑪ 尤·弗·波列索夫：《1924~1945年苏法关系》，第253页，莫斯科，1964年版。

⑫ 方连庆等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 1917~1945》，下册，第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⑬ 温斯顿·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第349页，英文版。

⑭ 参见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22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⑮ 参见（俄）《历史问题》杂志1993年第1期。

⑯⑰ 波兰科学院政治学所：《波兰与苏联的关系 档案文件集 1939~1941年》，第20、40页，第74、76页，华沙，波俄文对照版，1992年版。

⑱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4卷，第448页，莫斯科，1946年版。

⑲（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 上册》，第4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⑳ 参见（俄）《历史问题》杂志1993年第1期。

㉑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档案文件集 1917~1945年》，第361~375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㉒ 见弗·格·祖也夫：《波兰简史：从远古到现代》，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㉓ 《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在实践中》，莫斯科、索菲亚，1974年版。

㉔（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下册，第148页，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④ 参见格·思·马尔楚里：《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与社会主义世界》，第 131 页，莫斯科，1982 年版。

⑤ 《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第 36 页，莫斯科，1955 年版。

⑥ A·A·：舍瓦科夫《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关系与欧洲安全问题，1932～1939 年》，第 260 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7 年版。

⑦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档案文件集 1917～1945 年》，第 378 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⑧ 《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第 127、155、180、208、234、261 页。

⑨ 《在通往全欧合作道路上的东欧》，（苏）《近现代史》俄文版，1990 年第 1 期第 80 页。

⑩ （苏）格·思·马尔楚里：《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和社会主义世界》，第 129 页，莫斯科，1982 年版。

⑪ 参见（奥）路德维希·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第 171～17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⑫ （日）三好修：《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第 50～51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 年版。

第二章 苏联模式与苏东关系

苏联模式是苏联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苏联模式在东欧的建立也是战后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是贯穿苏东同盟时期的一条红线，也是联系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条生命线。一部苏东关系的历史（1945～1991年），既是苏联从最初推行苏联模式，继而维护苏联模式到最后放弃苏联模式的过程，同时也是东欧从最初接受苏联模式，继而反感苏联模式和改革苏联模式，最后抛弃苏联模式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既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东欧从最初建立、发展，继而出现危机，到最后全面失败的过程，也是东欧国家民族主义从最初在某种程度上遭到压抑，继而逐渐聚积和上升，最后全面复兴的过程。当然，这些过程是互动的，非常复杂、曲折的，风云激荡的。这一时期还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矛盾的历史现象：当东欧领导人醉心于苏联模式时，就会疏远本国人民；而当他们比较倾向于本国人民时，又会搞僵与苏联的关系。

一、苏联模式在东欧的建立 (1945～1953年)

(一) 何谓苏联模式

我国及原苏联学者一开始不承认存在模式，改革后才认识到有模式。苏联模式这个概念最早见诸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70

年代以来被广泛地采用。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模式的理解还很不一致。大多数学者从论述某个问题的角度去解释苏联模式。比如，国外有的学者认为苏联模式是“由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管理机构所管理的完全或几乎完全国有化的‘统制经济’模式”^①，是“以处在经济发展特殊阶段上的特定历史阶段为基础的单一的和一元化的社会主义模式”^②，或干脆称之为“兵营式共产主义”^③。中国学者则有的认为苏联模式“基本是一个备战体制”^④，有的认为苏联模式“最根本的特点是突出‘国家’二字”^⑤，还有的认为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时期开始在苏联产生的那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形式”，它“是由若干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子系统——斯大林的理论模式、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思想文化模式、社会管理模式和对外关系模式等构架的一个总模式”^⑥。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要弄清苏联模式，首先必须区分清楚模式与基本制度这两个概念的关系。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具体模式是指方法，表面的具体的形式；而基本制度则是指内在的、本质的结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包括：共产党的领导；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等等。基本制度规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本质属性和主要特征，而具体形式、模式则是为基本制度服务的。“苏联模式”是指苏联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是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为了行文方便，本书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简称为“苏联模式”）；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不等于只有“苏联模式”这一种形式，社会主义有符合各国国情、民情的多种模式和形式。因此，笔者认为，上述对苏联模式的诸种解释，虽各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若论对苏联模式的界定，则或不够全面，或过于笼统。所谓苏联模式，应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其特点是高度集中。表现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国不分；表现在经济上是指令性计

划体制，行政管理方法，片面强调高速、优先地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农业全盘集体化，忽视人民生活急需的轻工业和农业，忽视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表现在思想文化上，是用行政命令手段实行统制。苏联模式萌芽于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极盛。苏联模式主要是在战争年代、战争环境下，在国内外“谁战胜谁”的激烈斗争中形成的，因而表现为一种备战体制。苏联模式有其历史的功绩，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苏联模式以斯大林为代表人物，因而又称为斯大林模式。但苏联模式并非以斯大林上台而开始，也并非随斯大林去世而结束。苏联模式并不适用于东欧，甚至并不总是适用于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危机就开始暴露。但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苏联模式对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特殊的、至关重要的影响^⑦。

（二）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的建立

东欧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各不相同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力量相当强大，已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而其他国家也具备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苏联强大的武装力量、政治作用与影响的存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两者缺一不可。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由于国际因素的影响，各国基本上都是按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

1. 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关于东欧是否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或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和政界人士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西方绝大多数学者一贯持否定立场，他们认为，苏联把其模式或社会主义输入到东欧，对东欧实行“近乎殖民地式的统治”，使东欧成为“卫星国”，称之为“被奴役国家”，苏联之“解放”东欧不仅是其国家影响的扩大，而且

也是其党和政府机关控制范围的扩大^⑧。近年来苏联和俄罗斯有些学者也认为，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非常狭窄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斯大林体制是从外面强加给东欧的。当一二代人去世后，斯大林主义的支柱也就消失了^⑨。（东欧）文化和精神传统，战前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无论如何不会导致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人在一些国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巩固了新的政治制度归根到底源于镇压和恐怖政策^⑩。我国也有个别研究者同意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东欧革命是苏联从外面强行“输入”的^⑪。也有的俄罗斯学者坚持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思想活生生的证明^⑫。1968年侵捷前夕，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时，勃列日涅夫曾理直气壮地说：“你们那里有一些人企图向舆论界证明，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灌输自己的方法、形式、经验，干涉内政……历史学家们找不到任何一条关于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灌输自己的经验的证据。是你们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结构形式，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因此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谴责苏联的。”^⑬

而苏东剧变以来，各种关于东欧各国对苏联和苏联红军没有好感、是苏联迫使东欧各国接受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纷纷出版^⑭，全盘否定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说法似乎占了上风。

笔者认为，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客观地、辩证地看待历史，不因一时形势的变化、表面的现象而人云亦云，以至于失去了客观的科学依据。作为政治家的勃列日涅夫的说教固然不足为凭，但全盘否定也是不客观的，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应该说，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苏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对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不宜一概否定。

（1）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

在东欧国家中，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曾经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第二国际主要的创始成员和影响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之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德国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也是第二国际的成员。在德波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领袖人物，如德国的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波兰的罗莎·卢森堡（后转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捷尔任斯基等。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东欧的影响更是直接的、巨大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在东欧一些国家发生了革命运动，成立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如德国新成立的共产党，领导了1919年的柏林革命，并一度在德国南部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匈牙利1919年建立了库恩·贝拉等领导的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1923年在保加利亚发生了季米特洛夫等领导的工人起义。在波兰、南斯拉夫等国也纷纷成立了共产党。各国共产党基本上都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列宁制定了参加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件，其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机会主义是极重要的内容。在列宁领导苏俄（联）时期，一直推行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路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合法存在的，他们赢得了不少实际的政治经验和群众的支持。保加利亚人民把共产党看成是美好未来的希望，许多非共产党员也愿意为共产党服务^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东欧大部分人民的头脑中是有影响的^⑯。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代表。铁托就曾说，他亲眼目睹战争中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口里呼喊斯大林的名字死去^⑰。战后，整个东欧出现了向左转的倾向，人们要求实行最激进的变革，与过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主义思想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东欧人民还希望借助于共产主义思想，使自己的祖国从几百年的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与发达的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东欧要求实现变革的广泛程

度是前所未有的^⑧。

(2) 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共产党，发生过革命运动，甚至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各国共产党很早就展开了反对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如1933年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对德国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5年以季米特洛夫为总书记的共产国际召开七大，确立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以后，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德意法西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致力于反法西斯这一共同的事业。如在苏联的帮助下，他们在苏境内建立了反法西斯武装力量，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很多共产党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所有这些都给东欧各国人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相比之下，东欧各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使人民对他们大失所望。战前，东欧各国政府追随法英等西方大国，反苏反共，希冀得到它们的庇护。可是，法英为了自保，祸水东引，对德意实行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先是出卖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接着又对德国实行“静坐战争”，“坐待”自己的盟国——波兰灭亡，以应付国内舆论的压力。而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各国政府同德意法西斯同流合污，奴役本国人民。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武装力量为了打击共产党，竟同侵略者和卖国贼合作^⑨。阿尔巴尼亚索古王朝的通敌卖国，捷克贝奈斯政府的软弱无力，波兰流亡政府战略上的失误（实行德苏“两个敌人”战略）和军事上的冒险（1944年8月华沙起义牺牲惨痛），也使本国人民颇为失望。“正是在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搞臭了自己的名声”^⑩。历史的教训使人民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增加了对共产党的好感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逐渐削弱了。

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力量对比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波、匈、捷虽然都算不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美、英、法、德相比还有相当差距，但也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工业。民主德国原是德国的一部分，其基础更好一些；巴尔干国家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工业国或农业国，但资本主义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所有东欧国家都出现了无产阶级，并登上了本国甚至欧洲历史舞台，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波兰的纺织工业向来发达，尤其是西里西亚的北部地区，曾经是欧洲的“主要中心之一”。捷克斯洛伐克继承了奥匈帝国全部工业的70%，尤以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最为发达。1920~1929年，捷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①。以1929年为100，匈工业产品指数1937年升至129.5，1938年下半年又升至135.8，1939年上半年则达到了137.5。1939年，工业和建筑业合占国民收入的38.4%，工人达200万，占全国人口的22%。生产和资本相当高度地集中^②。保加利亚虽是落后的农业国，但在巴尔干战争以前，资本主义发展得也很快，尤其是轻工业和加工工业。从1921年起的10年内，保的工业产量也增加了一倍。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工人运动日益高涨^③。经过19世纪的资产阶级改革后，罗马尼亚经济也发展迅速。1936年前，罗的工业产量增加了一倍。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也发展起来^④。又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各国统治阶级威信扫地，力量遭到了削弱，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和影响，人民的觉悟也大大提高了。战争为革命造成了极好的机遇，战争教育了人民，战争促进了革命。人民革命与反法西斯斗争结合起来了。这构成了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基础。

(3) 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基础

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显示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苏德战场是反法西斯德国的主战场，苏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同时也为东欧各国的解放起了重大的作用。所有这些使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偏差，

原谅了斯大林模式过去所犯的错误^⑤。再说，根据国际条约苏联驻扎在东欧的军队对东欧各国来说也是一个现实的客观存在。东欧各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斯拉夫国家害怕德国卷土重来，需要借助于苏联的力量。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积极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这是它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东欧各国共产党始终是东欧舞台上矢志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奋斗。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到1944年底已达80万人，实际上还在彻底击败法西斯之前南共就已经夺取了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承认。其领袖人物铁托的威信早已超出党的范围而成为民族英雄^⑥。阿尔巴尼亚是东欧国家中唯一的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国家，苏联军队根本没有进入其国境。它们最初都依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位西方学者认为，南斯拉夫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着强烈的革命潜在力量，甚至对共产主义有很深的同情，因此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在他看来是不足为怪的^⑦。因此，南阿两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说是具有社会基础的。苏联军队也很快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捷共产党直到1948年才完全夺得政权。匈牙利曾经是纳粹德国的盟国，因此苏联在那里驻扎有大量的军队，但匈共直到1947年才夺取政权^⑧。这说明，这两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不仅仅是依靠苏联的力量。

其他东欧各国共产党也都提出了各自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如保共提出的最近目标是消灭君主制和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波共提出的目标是民族解放和建立新波兰；罗共提出的目标是建立独立、主权、安全和繁荣的罗马尼亚；匈共的目标是推翻霍尔蒂法西斯统治并进行国家的民主改造；捷共的目标是彻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德共的目标是建立反法西斯民主制度。这说明，苏联出兵东欧“铲除”法西斯势力是与各国民族革命的要求相一致的。但人民民主革命的要求决不是苏联的进军才带来的。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并把这个斗争同苏军粉碎法西

斯武装的斗争结合起来，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内部因素的作用，那么，苏军的援助顶多也不过是使这些国家摆脱掉法西斯德国的奴役罢了，人民民主制度还是建立不起来。又由于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各国共产党没有其他成功的经验可循，加上本身认识水平的局限性，没有认识到苏联与东欧的国情是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具有多样性的，于是包括南斯拉夫最初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也正因为如此，东欧各国党的领导人对苏联是充满感情的，强调学习苏联经验。保共十大会议决议指出：“对于我们保加利亚人来说，实践经验证明了苏联榜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以及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新社会的共同规律。”^②季米特洛夫也号召全党要“全面研究、最广泛地应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经验”^③。1947年8月，哥特瓦尔德讲到：“冷静地分析国际局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只有同苏联与其他斯拉夫国家的联盟才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和独立的可靠的保障。”^④“日益广泛地采用苏联的经验，逐步地接近苏联的范例，这就是人民民主国家发展的主要方法之一”^⑤。甚至铁托1948年也讲：“如果没有苏联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对法西斯侵略者的胜利；也就不可能有南斯拉夫的解放；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新南斯拉夫的成立。”^⑥“永远与苏联在一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既是东欧各国的座右铭，同时也是东欧党和人民发自肺腑的声音。

总之，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东欧各国本身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与苏联扫荡法西斯势力两相结合，加之国际冷战格局逐渐拉开，美苏实行阵营对抗战略的结果。苏联是外因，东欧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尽管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先天不足，有些国家（如波、匈、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力量相当强大，但不能说其没有一定的客观的思想基础、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战后东欧政治上整个出现了向左转的倾向，人们的普遍情绪是同“最彻底的、最激进的力量站在一起反对旧世

界”^④，因而不能全盘归因于苏联和斯大林。同时，虽然苏联因素在各个国家所起的具体作用不同，但对于整个东欧尤其是中欧国家来说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有的国家里甚至是决定性的（如民德、波、匈）。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东欧各国社会进程和历史发展要求的。

2. 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建立的三阶段（1945～1952年）

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的建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其主要内容一是民族革命——消灭德意法西斯和推翻本国法西斯反动统治，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其内容之二是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势力和各种反动势力，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东欧的解放大体分为几种不同的方式：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主要是依靠本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苏联红军在解放过程中只起了配合作用。苏南联军攻下贝尔格莱德后，苏军很快撤走；苏军根本未曾进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在战争过程中法西斯力量日益削弱的情况下，共产党团结全国各阶级阶层爱国力量举行起义，推翻了本国的法西斯反动政府，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获得解放，并转入同盟国一边。其他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民主德国，主要是依靠苏联红军的“铁犁”把那里的法西斯势力铲除掉而获得解放的。各国代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各个阶级阶层的政党联合执政，共产党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不占绝对的优势，正如捷共领导人哥德瓦尔特所说：“我们不能单独统治，而他们（资产阶级）同样也不能单独统治。他们不能不要我们而进行统治，我们也不能不要他们。比起我们不能不要他们来，他们在更大程度上不能不要我们。”^⑤共产党内部又分亲苏派和“民族派”。经济上是包括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等各种成分并存的综合经济（或混合经济），史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既能为国内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又能为苏联和西方国家所接受；既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完全

等同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这种组织形式接近于反法西斯时期的人民阵线或祖国阵线，在当时比较符合东欧各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传统。东欧各国先后实行了一些民主措施，土地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等是 1945～1947 年进行的，而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是 1948～1949 年进行的。各国依靠贫农，没收了地主、战犯、法西斯分子和各种反动势力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对富农进行限制和排挤。^④此举意在打击各国封建势力和农村的资产阶级势力。土地改革使各国农村出现了中农化的倾向，虽然没有苏联那么明显。匈牙利和波兰两国的土改相对比较温和，没有出现中农化的倾向。波兰的中农只占全体农民的 35%，匈牙利只占 16.4%。50 年代初匈拥有不足 5.7 亩土地的农户占全体农户的 80.7%，土改后匈农村仍然保留着小农性质。^⑤南斯拉夫的情况有点特殊：南是一个小农国家，战前农民都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他们是小块土地所有者。所以南共考虑到广大农民的要求和本国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没有像苏联那样实行土地国有化。因为那样就有可能触及到南农民对土地占有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造成工农之间的社会纠纷。这是南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特点。^⑥各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完成为下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其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无产阶级政党全面夺取政权，多党联合政府为共产党一党专政所取代，人民民主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实行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原来多成分的混合经济向程度不同的公有制转化。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南、阿和捷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其他国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在有的国家，如民主德国，苏联的帮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波、匈、捷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共产党反对派是相当有力量的，在波兰几乎发生了内战。^⑦共产党为了斗败它们，壮大自己的力量，一是扩大党的队伍，如捷克 1946 年共产党员人数为

1 159 164 名,不到 1948 年底就达 250 万, 占总人口的 18%^④。在 1948~1949 年, 匈牙利劳动党党员达 100 万; 保共党员达 49.6 万, 而其全国居民才 700 万; 德国统一工人党党员达 175 万; 阿劳动党建国初才 1.9 万名成员, 1950 年就达 5 万^⑤。二是合并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与工人党、社会民主党合并, 成立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1948 年, 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 成立罗马尼亚工人党; 捷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 成立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匈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 成立匈劳动人民党; 保工人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 成立新的保工人党; 波工人党与社会党合并, 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 在此之前, 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苏联的帮助和影响下, 东欧各国共产党经过艰难复杂的斗争终于于 1947~1948 年期间先后赢得了大选的胜利, 成功地把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反对派赶出了政府。东欧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是不同的, 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是通过人民战争或武装起义的道路, 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和本国资产阶级, 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捷、匈、罗、波在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的过程中, 没有发生过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 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⑥。与此同时, 东欧各国先后采取了一些国有化措施, 把主要生产资料, 大中型企业, 交通, 电讯, 银行, 金融, 对外贸易等等收归国有, 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农村, 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创办了合作社, 鼓励农民走集体化和公有制的道路。

第三阶段, 在各国党内清除“铁托主义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 反对“民族共产主义”, 确立了各国党内“国际派(莫斯科派)”的掌权地位, 按苏联模式通过了新宪法。各国开始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优先发展重工业, 在农村搞集体化。1948 年情报局与南斯拉夫(其实是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爆发了冲

突，铁托被指责为“民族主义集团”，南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随后在东欧各国开展了一场广泛的清除“铁托主义分子”的运动，一大批各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为牺牲品。如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罗马尼亚的巴特勒什卡努，阿尔巴尼亚的科奇·佐治，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克列门蒂斯。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卡达尔、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也被抓起来投进了监狱。各国“国际派”掌权后，陆续按照苏联模式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或两年，或三年，或五年，或六年；均规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如波兰六年计划（1950~1955年）规定工业生产增长85%~90%，年均增长速度为11%~12%，农业生产增长35%~45%，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55%~60%^④。1951年，匈牙利劳动党二大明确指出“应加快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即重工业的发展”，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号召要把缺乏钢铁资源的匈牙利建设成为一个钢铁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规定1951~1953年工业总产量的增长率，要从原来规定的57%上升到98%，重工业从70%上升到130%，轻工业从50%上升到70%。斯洛伐克的工业生产量从75%上升到168%。在民主德国也通过决议加速发展重工业^⑤。各国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的比重是很高的，如1950年民主德国——9.6%，捷克——16.9%，波兰——21%，罗马尼亚——11.2%，保加利亚——20%，匈牙利——23%，南斯拉夫——23.1%^⑥。特别是朝鲜战争开始以后，斯大林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临，要求各国增加军队、军费开支和技术装备。^⑦只有阿尔巴尼亚1949~1950年期间轻工业超过了重工业的增长：同1948年相比，1950年轻工业增长59%，而重工业只增长44%。阿尔巴尼亚工业发展方针之所以有别于其他东欧国家，源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极端落后，不能够为较快发展重工业提供自己的资金积累。不过，阿劳动党把这个方针只看成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党决心要把阿尔巴尼亚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家。^⑧与此同时，各国在农村展开了农业集体

化运动。随着冷战的加剧和苏联压力的增大，运动普遍采取了暴风骤雨、行政命令的方式。波、匈、捷按公有化程度从低到高分3~4种形式；保加利亚只有一种公有化程度较高的形式。围绕着农民合作化问题，波匈党内的斗争很激烈。波兰50年代中期生产合作社的经营只占全体农业可用地的近8%^⑧。

这样，在经过了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党内反对“铁托主义”的斗争三阶段后，东欧各国在政治上先后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经济上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计划经济形式。除了民主德国（1952年）和波兰（1952年）在时间上稍晚外，其他东欧国家纷纷以苏联宪法为模式，通过了新宪法。保加利亚是1947年11月；罗马尼亚是1948年4月；捷克是1948年5月；匈牙利是1949年8月。南斯拉夫更早在1946年就按苏联模式通过了宪法^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东欧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二、苏联模式在东欧的危机的萌芽与苏南冲突 (1948年)

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是苏联模式在东欧危机的萌芽。苏南矛盾的激发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南在被开除出情报局以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在当时适合于南斯拉夫本国特点的自治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模式。

（一）苏南冲突的根源

苏南冲突是有一个过程的。在1948年以前，两国的基本社会政治目标和主要民族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南共长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45年两国签订双边条约。南是情报局的积极发起人之一，情报局总部及其编辑部所在地最初也设在贝尔格莱德^⑩。铁托和卡德尔等南共领导人多次谈到南斯拉夫与苏联在对

外政策方面没有分歧，但另一方面，两国个别具体任务、特殊要求和利益有所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南共反对流亡政府，因为该政府同侵略者和卖国贼合作企图消灭南共游击队。英美庇护南流亡政府。苏从自身整体利益出发，要求南共把解放斗争同充分考虑巩固反法西斯联盟这一任务结合起来。观点的差异曾引起南共的不满。其二是苏军在南的表现极差，曾多次发生苏军强奸、奸杀、抢劫事件，南认为“苏军的道德水平连英军都不如”，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快，他写信给铁托指责说这是对为南的解放流血牺牲的苏联红军的侮辱。^⑤其三是的里雅斯特问题。的里雅斯特是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交界处的其归属权历史上有争议的一块地区。1945年5月南军进驻的里雅斯特，不久又在英美压力下被迫退出，南努力要从英美的手中和意大利的反对下把该地区合并进南斯拉夫，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但斯大林惟恐这会加剧他与西方的冲突，制止了南的行动。南认为是苏与西方大国达成了交易，因而表示不满。铁托说：“我们要求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我们不想按别人的账单付钱；我们不想充当可兑换的货币；我们不想让别人把我们卷入势力范围之争……我们不再依赖于任何人，让他们签署和谈吧……今日的南斯拉夫不再是别人交易的对象。”^⑥此事苏方一直耿耿于怀。苏南冲突还与战后建立南保联盟的问题有关。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有反复。他先曾主张建立一个包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阿尔巴尼亚）的联邦，但反对建立一个包括整个东欧国家的大联邦，同时对南未同苏商量就把军队开进阿尔巴尼亚大为光火。1948年2月，苏和南保领导人在莫斯科进行谈话（铁托没有参加），斯大林以粗暴的口气指责南保领导人没有经苏联的同意就擅自行动，把苏联置于既成事实面前，猛烈批评了建立包括所有东欧国家在内的联邦的思想“是企图震惊世界”。奇怪的是，斯大林同时又指示立即以南保联邦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宣布阿尔巴尼亚将属于这个联邦。他认为“这个问题

已经成熟了”^⑤。但铁托反对南与保加利亚建立一个充当“特洛伊木马”的联邦^⑥。另外，在经济上，苏和南成立了两个联合公司，一个是空运公司，一个是多瑙河航运公司，这两个公司都实际上为苏联所控制，苏方代表凌驾于南法律之上，并认为他们应享有治外法权。双方贸易不平等，南获利很少。联合公司引起了分歧和矛盾。苏还企图在南设立自己的情报网，并认为其军事专家和文职官员理所当然应享受优厚待遇（比南同事高出数倍的工资，并要求配备勤务兵等等），不能容忍南执行比较独立的对内对外政策^⑦。苏还指责南共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没有搞阶级斗争，没有实行土地国有化。南农村存在土地私有制和土地买卖。政治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没有起领导作用，而是民族阵线起领导作用。南只有民族阵线的纲领，没有共产党的纲领。共产党处于半合法状态^⑧，等等。实际上是对南没有完全遵循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不能容忍。针对苏与情报局的指责，南共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立场，说明“我们正在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⑨。苏指责南“极端狂妄自大”，“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由于两国关系的恶化，苏军事专家和文职人员先后从南撤走。1948年6月，苏操纵情报局通过了开除南斯拉夫的决议。《真理报》发表文章攻击：“南斯拉夫铁托民族主义集团往何处去？”^⑩与此同时，双边贸易关系也大受影响。与1948年相比，1949年的贸易额只及八分之一^⑪。以后，更是断绝了一切往来。至此，苏南交恶已无可挽回。斯大林操纵东欧其他国家掀起了一场反对南斯拉夫和“铁托主义”的政治运动。第一个起来对抗苏联和斯大林的党就这样被“革出了教门”。根据最新披露出来的档案材料，苏联曾多次策划和组织针对铁托的暗杀活动。但南党和人民并没有被吓倒，铁托说：“不管我们之中的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苏联多么爱，但他决不会因此对他自己也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还要少爱一些。”^⑫南斯拉夫正是在苏联和情报局的重重压力下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南斯拉夫模式的社

会主义自治道路。

（二）从苏联模式到南斯拉夫模式

南斯拉夫是东欧国家中第一个制定五年计划（1947～1951年）的国家。这个计划典型地反映了苏联模式的特点，即加速工业化和电气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规定与战前相比，五年计划的完成使工业生产增加5倍，熟练工人将从35万增加到75万，劳动生产率增加66%，发电量增加4倍，而农业比战前的产量增加20%^①。直至苏南冲突爆发前的1948年春，西方观察家认为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似乎最为亲苏，最彻底地“共产化”而且最无情。他们把南斯拉夫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卫星国^②。苏南关系破裂以后，南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从社会主义后退，驳斥苏和情报局的无理指责，以行政高压手段加速实行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在1946年底颁布的第一个国有化法令把主要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基础上，1948年4月，南颁布了第二个国有化法令，把所有的工业、零售商业、保险公司和文化保健机构也都收归国有^③。1949年1月，南共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要求把农业集体化“更加放手、更加快速地”进行下去。在此之前，南集体农庄（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发展是缓慢的，1946年——454个，1947年——779个，1948年——1318个，五届二中全会后，1949年，南集体农庄增加了4倍，达6626个。1950年前达6797个，拥有社员200万，合作社的土地达230万公顷，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④。在发展军事工业方面，由于苏东国家经济封锁和施加政治压力，1950年南军费高达6亿多美元，占用了国民收入的23%。在政治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牢牢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实行这种苏联模式，虽然1949～1951年加速集体化在数量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生产水平下降，农民屠宰牲畜现象很严重，以逃避交税。农业生产和城市需求的供应仍然处于困难的状态^⑤。南党和人民开始探索自

己的道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重新学习马列主义的运动，从经典作家关于“权力分散”、“工人自治”、“非官僚化”的思想中得到了启发。1950年6月，南颁布了“工人自治法”，创立了工人自治委员会的管理形式。自治形式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展开，然后逐渐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及其他非生产性领域（如文化、科学、环保、教育、批发及零售商业、交通运输等等）^⑥。南将市场结构引入并逐步代替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自主权，个人劳动报酬与经济效益挂钩。1953年3月，政府又颁布法令解散已经建立的、实行集权管理体制的集体农庄，允许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规定农民可退社。鼓励个体农业和多种经营。在工业的发展路线上，轻工业和重工业二者并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企业与市场直接挂钩，甚至可以到西方市场上出售商品。与此同时，南共的领导方法也发生了某些变化，试图逐渐取消党的工作的行政方法，而代之以说服教育的方法。党的工作机构急剧地减少了，从1950年的11 930个到1952年的4 599个。该年，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同一思想者的联盟。南斯拉夫不是直接实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通过南共联盟起主导作用^⑦。铁托后来检讨说：“（以前）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也犯了错误，因为我们照抄了苏联的方法。我们仿效苏联的榜样，而且是错误地仿效。”^⑧这以后，铁托关于批判苏联模式的思想更加明确和系统化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刚一平息，铁托就对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苏共领导“错误地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问题，而个人崇拜实际是一种制度问题”，“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决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做到的事”^⑨。

南斯拉夫模式最初带来很好的效果：1958年在人均收入增长方面，南已跃居东欧国家前列。与工业基础较好的捷克相比，南斯拉夫工业的年增长率为12%，而捷只有10.9%；南国民生

产总值增长率居世界第二位，而捷远远落后于某些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南各大城市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而捷各地商品都极为短缺。南斯拉夫的繁荣与东欧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①。

苏南冲突既是意识形态之分歧，也是双方民族主义的表现。苏联竭力强调前者，抨击南斯拉夫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违反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南斯拉夫则反驳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其实质是斯大林企图把苏联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而南斯拉夫不愿接受，并走出了自己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模式。苏南冲突及其以后形成的南斯拉夫模式动摇了苏联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标志着苏联模式危机的萌芽，为社会主义从单一模式走向多样化开辟了道路。

三、苏联模式在东欧危机的连锁爆发 与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顽强表现 (1953~1988年)

这一阶段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89年东欧剧变以前，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东欧国家民族主义这一对矛盾的统一体都处于量变、积累时期。标志着苏联模式危机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层次上由浅而深；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力量在不断地聚积和上升，程度上由小而大，形成了对苏联模式的数轮冲击。

(一) 东欧国家对苏联模式的三轮冲击

第一轮，捷克斯洛伐克比尔森事件和民主德国东柏林事件(1953年)，表现了对俄国人、对斯大林的反感，这是民族情绪、民族感情层次上的。

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这构成了这两起事件的国际大气候。比尔森事件发生在6月1日，东柏林事件发生在6月17日。捷克的小气候是，部分地由于对政治清洗所产生的恐惧和紧张气氛，部分地由于抗议币制改革（它强使人民以50旧克朗换1个新克朗），6月1日，在比尔森斯柯达汽车厂发生了工人的骚动，从最初抗议币制改革到要求自由选举，并攻打了市政府，洗劫了法院，把斯大林、哥特瓦尔德的塑像抛出窗外，还同警察、公安部队发生了冲突，造成了流血事件。事后很多事件的参加者遭到了逮捕和惩罚^①。然而比尔森事件还是产生了影响，远的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下文有专门论述），近的就是半个月后在民主德国发生的东柏林事件。其直接原因是提高劳动定额问题。1953年6月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通过了旨在提高各阶层人民生活水平的“新方针”的决议，发表了公报，但没有改变5月28日关于提高劳动定额10%的决定。由于工人们的不满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16日，东柏林五千多名建筑工人首先发动罢工，举行示威游行。次日，罢工浪潮席卷了整个民主德国，有272个乡镇，30万人卷入了罢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5%^②。民德政府已无法控制局势，最后不得不由苏联驻军出动一个装甲师和大批坦克来驱散人群。但苏军的行动十分克制。据统计，死亡人数为21名，近400人受伤。

尽管昂纳克直到去世前还一口咬定6月17日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一直实行的那些政策——从果酱掺假到工人往返车票提价等等”经济原因^③，但实际上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民主德国成立后，不但要照样支付苏联巨额赔款，而且要处处照搬苏联的方式，事事仿效苏联的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消费品和农业生产的结果使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况且日耳曼人历来就有优于斯拉夫人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优越感。全盘苏化，唯苏独尊，伤害了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加深了他们的抵触和反感情绪。无独

有偶，比尔森也是捷克的著名工业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由美国军队解放的，其居民比大多数本国人民更为亲西方一些，对俄罗斯民族有文化上的优越感^⑦。虽然这两起事件都没有明确地提出反苏的口号，但可以说第一次在东欧推行苏联模式的国家中显露出反对推行苏联模式的迹象，表现了对斯大林、对俄罗斯人的不满和反感，是民族情绪、民族感情层次上的。但这些事件本质上不是要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对斯大林主义即苏联模式表示不满^⑧。苏联当然也觉察到了捷克特别是民主德国的反苏情绪。这次事件以后，苏主动免除了民主德国尚未还清的25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还把33个大企业移交给民主德国。德国统一社会党也检讨了自己工作的错误，决定减少重工业的生产而增加食品工业、民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并且暂时停止了农业集体化^⑨。

第二轮，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56年），表现了对苏联模式的怀疑与拒绝，主张走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民族特色、民族道路层次上的。

这两起事件有许多共同点：都发生在1956年，时间上几乎是前后衔接和交叉的。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发动了非斯大林化的运动，构成了两者共同的国际大环境。波匈是两个极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民族，战后贝鲁特、拉科西等领导人极力在本国推行苏联模式，积累了很深的矛盾，造成了政治、经济危机，这是共同的国内小气候。在这两起事件中两国民族道路的代表人物，以前还因此受过迫害的哥穆尔卡和纳吉被重新推上了历史舞台^⑩。直接针对苏联，是两起事件的共同特点之一，波兰人喊出了“俄罗斯人滚出去”、“布尔什维克滚出去”、“要哥穆尔卡”的口号，匈牙利人喊出了“苏军撤出匈牙利”、“独立、自由”、“要纳吉”的口号。反过来，苏联也对两国进行了种种威胁，施加了各种压力。

但这两起事件的不同点也是很多的：波事件基本只限于波兹南地区，最先工人们提出的是经济要求，由于得不到及时而有效

的解决，后来才上升为政治事件。死亡人数 74 人，伤 575 人。由于该事件而东山再起、重新担任党的第一书记的哥穆尔卡正确地处理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一方面，顶住了赫鲁晓夫的压力，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反对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坚持独立自主的“波兰道路”；另一方面，又维护波苏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团结和友谊，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煽起反苏反社会主义情绪，维护苏联和苏共的声誉，不使那些有政治阴谋的人得逞^⑧。他认为波兹南事件并不说明人民对社会主义不满，而正好表明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不满^⑨，强调波苏团结是波兰国家安全的基石，明确指出波兰发生的一切“不能归罪于斯大林，不能归罪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⑩。而在匈牙利事件中，由于匆忙被推上台的纳吉·伊姆雷面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局势表现得束手无策和优柔寡断，在各种压力下一味妥协、退让，不加分析地满足一些人不合理的要求。国内外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也趁机浑水摸鱼，推波助澜，制造混乱。事件的发展复杂化了，席卷了匈牙利全境而无法收拾，事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苏军两次出兵，终致酿成匈牙利全民族的大悲剧^⑪。

最重要的还有两起事件的后果不同：哥穆尔卡强调“波兰道路”，波兰的历史特征和民族特点，其实也是对传统苏联模式的改革，希望走出一条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波兹南事件后，波兰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改变传统的重工轻农发展次序，对农业合作化进行了整顿，强调按自愿原则发展合作社，解散经营不良的合作社。合作社从 1955 年的 9 695 个减少到 1956 年底的 1534 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从 1955 年的 20.5 多万户到 1958 年的 2.5 万户；其所占用的土地从 1955 年的 11.2% 到 1958 年的 1.4%^⑫，而倾向于推行低级形式的农业小组。在政治方面，加强与教会及其他党派的合作与联盟，在人民政权中第一次出现了非共产党人担任部长的情况，发展工人委员会形式，加强地方人

民会议的自治性。但改革只是持续了几年，由于遇到巨大的困难和障碍，哥穆尔卡很快就从改革方针后退，放弃了波兰道路。他重新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恢复了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工人委员会名存实亡。同时加强思想控制，如查封大学生刊物《直言周刊》^⑧。更有甚者，哥穆尔卡1968年支持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⑨。在内政外交上追随苏联亦步亦趋，放弃了独立自主的波兰道路，重新又回到了苏联模式的窠臼。因而他既成为波兰战后第一次危机的战胜者，又成为1970年第二次危机的制造者而黯然下台。

匈牙利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兰事件的影响下，人们对拉科西个人迷信、破坏法制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不满，对拉科西不顾匈牙利国情盲目照搬苏联模式不满，要求“匈牙利道路”的代表人物纳吉·伊姆雷上台。上台伊始的纳吉宣布匈政治上取消一党制，恢复多党联合政府，这与他原来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形式”的思想也基本上是一致的^⑩；也体现了匈牙利人民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满，要求走自己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后来由于各种势力的卷入使事态的发展复杂化了。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有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开始觉醒，他们发出了“这并不是我们原来的意愿”的声音。后来2/3的大学生自动退出战斗。工人和正直的共产党员开始自动地组织起来，用工具和石块向手持武器的暴徒进行反击^⑪。纳吉后来事实上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而被动地被事件推着走。苏联出兵平息了匈牙利事件，扶持卡达尔建立新政府，另创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恢复匈牙利国内秩序。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1989年匈党和政府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纳吉平反。东欧剧变后，苏东许多学者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称之为“民族起义”、“反极权主义的革命”。

第三轮，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匈牙利改革（1968年），对苏

联模式的偏离。这是对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层次上的。

如果说波匈事件因为要走民族特色道路，在运动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反苏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布拉格之春”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1968年4月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党中央通过了标题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行动纲领，是赫鲁晓夫改革在东欧激起的最后一次高潮。标志着“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的出现。该模式的主要内容有：政治上扩大民主，“要大力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以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过去的专制方式”，加强法制；党政分开，捷共“把民族阵线当作是政治纲领，这种政治纲领不把政党分为执政党和反对党”^⑦，“今后政府主要向国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⑧，宣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在对外关系上，要用捷克的观点去阐述和对待一系列国际问题，采取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⑨。在经济上，克服封闭性，除了与苏东国家加强联系外，还与其他国家发展互利的经济关系。重视农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视市场、经济手段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要进行经济改革。在文化上要增加外国报刊的进口与发行。^⑩这个纲领带有捷克斯洛伐克民主的民族特性和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色彩，主要表现为一场政治的和思想的运动。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苏联模式有很大的不同。苏领导人认为，捷的实质是在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捷领导人第一步是要把捷变为南斯拉夫，然后再转变成类似奥地利式的国家^⑪。苏与民德、波、匈、保等东欧国家多次向捷施加压力，华约的军队也以演习为名开进了捷克。如果说1956年波匈事件尤其是匈牙利的局势确实有失控的危险的话，捷克斯洛伐克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但苏联反而对捷克的局势特别的担忧，对捷克的问题特别的重视。7月份，苏捷两党在切尔纳会谈，勃列日涅夫率全体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而1956年波兰事件时，赫鲁晓夫只带了三名政治局委员；至于匈牙利事件，苏派往匈的也只有两名

政治局委员^②。1956年出兵匈牙利的只有苏联一家，而1968年出兵捷克是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捷克事件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也特别大，如果说出于阵营对抗思想东欧各国是一致赞成苏联出兵匈牙利的话（铁托反对第二次出兵），那么出于发展模式 and 意识形态之不同去镇压捷克，却引起了苏东国家的分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是坚决反对华约五国出兵的。苏、波、匈内部也有人同情布拉格，反对入侵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在莫斯科红场组织游行。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如果说苏是“应邀”到匈牙利“镇压反革命”的话，那么华约五国入侵捷克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因为在杜布切克等捷克党领导人被苏联人抓走后，党内无人敢出头露面“邀请”外国军队来“镇压反革命”，因而只好露骨地说“捷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影响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③。捷人民与入侵者展开“帅克式斗争”，秘密召开的捷共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坚持改革方针，支持被逮捕的领导人。在不给捷克改革定性为“反革命”的前提下，捷领导人在苏的压力下被迫屈服了，同意苏军暂驻捷克（实际上是无限期地驻扎下去）。“布拉格之春”就这样被苏联的坦克无情地碾碎了。一年后，苏联扶植胡萨克上台取杜布切克而代之，全盘否定1968年的改革，肯定了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④。苏联模式又恢复了。而且旨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维护苏联模式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也出笼了，成为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系统的理论工具。

与捷克失败的改革相比，匈牙利卡达尔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平息以后，新政府立即着手整顿秩序和恢复社会治安，提出“谁不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口号；其次，制定新的临时经济政策，改变国民经济中的有关比例关系，调整重工业中的某些比例失调现象，增加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生产。对经济管理体制也进行重大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农业合作社从1956年9月的4858个，34.3万成员，到12月底

只有 2089 个合作社，11.9 万成员。取消粮食义务交售制，提高农产品价格^⑤。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卡达尔公开宣称他代表的共产主义是“从革命中产生而且不愿同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集团的共产主义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新型的共产主义……我们的共产主义是匈牙利式的。它有点像第三条道路，既同铁托主义没有关系，也同哥穆尔卡的共产主义没有关系……它既不是受苏联的启发，也不是受其他类型的共产主义的启发。它是匈牙利的民族共产主义……这‘第三条路线’来源于我国的革命”^⑥。从 1968 年始，匈牙利开始改革。匈的改革与捷克基本同时，都是在苏联 50~60 年代改革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匈改革的重点是在经济，且在此之前作了较充分的酝酿，重在“实干”而不在“宣传”；而捷重在思想、政治，声势浩大，令人瞩目。匈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发展小企业经济形式，以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满足人民的需要^⑦，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人民生活明显提高。在政治上，始终不渝地强调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⑧。匈牙利的改革一度成为成功的范例，人们称之为“匈牙利模式”或“匈牙利的独特道路”。改革的成功提高了匈牙利的国际地位和卡达尔的国际声望。卡达尔悄悄地偏离苏联模式，但又掌握好“度”和“分寸”，极度谨慎，不至于越轨，并没有完全脱离苏联模式，而是在苏联模式范围内的改革、完善和发展，因而又能成功地与苏联保持紧密的“友好关系”。苏联能容忍、默许其偏离正统的苏联模式的行为。为此，卡达尔也付出了代价，他曾违心地追随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改革，并对国内改革的力度和深度适时地进行调整，灵活地作出让步。

（二）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首次挑战——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1980~1981 年）”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 1981 年评价波兰团结工会时，模仿 1956 年哥穆尔卡的口吻说：“这是一次群众性的

工人的抗议，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而是反对对社会主义原则的破坏；不是反对人民政权的，而是反对不好的领导方法；不是反党的，而是反对党的政策中的失误；不是雇佣者的抗议，而是对自己的共和国主人翁感的阶级的抗议。”^④事实证明，他大错特错了。如果说1956年波兹南工人走上街头是为了抗议苏联模式及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波兰1970年事件只是对1956年事件的重演；1975年波兰的修宪风波和捷克的“77宪章”运动说明了东欧知识分子对政治现状及与苏联结盟的不满，那么，1980年发生的波兰事件则情况严重得多，工人们一改过去上街而变为静坐罢工和占据工厂，并且工人与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了^⑤。在国民经济一团糟的波兰成立团结工会，意义非同小可。这是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工人阶级成立的公开的、合法的、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它一成立会员人数就达数百万，最多时达一千多万，其中有一百多万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员，占该党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包括三分之一的党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⑥。团结工会还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公开的大力的支持。对于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必须绝对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权。共产党掌权是苏联模式的重要标志。团结工会对共产党构成了直接的、强有力的挑战，波兰自此形成了两大政党争夺政权的局面，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敌对势力较量的前沿阵地^⑦。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推动下，团结工会自成立时起取代统一工人党夺权的企图就初露端倪，声称“要创建我们所理想的波兰”。1981年9月，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党的纲领，完全抹煞了36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攻击波兰统一工人党，宣称现政权已无力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和有效地进行活动，必须由团结工会来接管政权。大会通过了告东欧人民书，号召东欧工人建立类似波兰团结工会之类的组织。团结工会的矛头不仅是针对苏联模式的，而且是针对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就是西方学者也看得很清楚，“1956年和1970年的骚乱只是暂时改变了波兰

的方向。而1980年开始的骚乱与前两次不同，它反映了一种严重得多的病症，已经不是新领导人上台和满足人民的暂时利益所能医治的了”^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积极支持团结工会，企图颠覆波兰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也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塔斯社谴责团结工会一大（1981年）是一场“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闹剧”，《真理报》把团结工会称为“反革命”，谴责波兰党的领导一再向反革命势力妥协、让步，“波兰的形势不仅危险，而且濒于危机的边缘”，强调波兰对“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承担着“义务”^⑮，担心波兰会脱离苏联模式，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美苏对波兰事件的态度虽截然相反，但看法却非常相似。雅鲁泽尔斯基揭露外部敌对势力的阴谋说：“波兰问题又时兴起来，受到充满敌意的关注。从外部煽动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和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指望削弱我们联盟的可靠性，离间波兰同其邻国的关系，使我们的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特洛伊木马’。”^⑯为了拯救“已处于深渊的边缘的祖国”，击败团结工会极端分子“肢解社会主义波兰国体的明目张胆的欲望”，避免“一代人的成果、从灰烬中建立起来的波兰家园再变成废墟”^⑰，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党和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断然采取强硬措施，实行军管，取缔团结工会，维护了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为愤怒，对波兰实行了经济制裁。“自由欧洲”、“美国之音”等西方电台，喋喋不休地进行反波反共宣传，煽动波兰人民起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西方经济制裁给波兰带来130亿美元的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波兰提供了贷款、原料和商品等援助，帮助波兰人民克服了困难。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1988年团结工会东山再起，并于次年大选中获胜，组成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的、由共产党反对派为主体的政府。

四、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 与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高涨 (1989~1991年)

在有利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把苏联模式连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起扔掉了。由于东欧都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由于地缘政治等原因发生了连锁反应。这次雪崩式的激变是本质上的、根本性的。从广度来讲，以波兰和匈牙利肇其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终其端，除了罗马尼亚发生了流血的军事政变并构成其高潮(1989年)、南斯拉夫爆发了内战，阿尔巴尼亚发生了流血冲突(1991年)外，其余各国均采取了和平的“天鹅绒革命”的形式，其特点是上层的变化比下层的变化来得快^⑩。从深度来看，政治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以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模式，政党政治拉开了序幕；经济上，以私有制为目标，实行私有化，甚至休克疗法，按照西方经济模式改造原有经济体制；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虽然仍由原来的共产党掌权，但其纲领与性质均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或建立“政治多元化基础上的民主和法制国家”、“福利国家”为其奋斗目标。外交上全盘倒向西方，对苏联疏远与冷淡。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分裂、改名，沦为反对党甚至受迫害的对象，财产被没收，活动遭禁止，党员大量退党，组织瓦解，思想涣散。原来各国的反对派（如波团结工会，捷公民论坛，匈民主论坛，等等），除了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外，纷纷上台执政。各国竞相更改国名、国歌、国徽，修改宪法，把“社会主义”、“人

民”甚至“共和国”的字样完全去掉了，恢复其历史上的原来面目。如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名为匈牙利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还有的恢复了原来的国家机关枢密院（议会），如波兰与罗马尼亚，或总统制（如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⑩。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修改了宪法，国家改变了性质，国旗改变了颜色，倒向了西方^⑪。东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东欧的失败，苏联模式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苏联模式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形象。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拉莫夫斯基在大选失败后总结教训说：“强加于我们并被我们接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如此大的范围内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⑫比如在波兰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囊括全国居民的90%以上的天主教会是在共产党和团结工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支持了团结工会。更改国名不仅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放弃，而且意味着对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的复归。在1989年的这场政治巨变中，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与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兴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过去在国际冷战格局和苏联的高压下，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受到了压制；在戈尔巴乔夫放手和国际形势缓和的形势下，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力量如火山、雪崩爆发，不可遏止。这集中表现在东欧国家急于摆脱苏联的控制和人民的反苏情绪上。在这一剧变过程中，苏联对波兰承认了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矢口否认的“卡廷森林事件”；承认1956年出兵匈牙利和1968年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是错误的，是对这些国家主权的粗暴干涉。这些事件均在各国得到了平反。各国反苏情绪高涨起来。瓦文萨指责苏波同盟时期为“苏占时期”，对苏关系冷淡；原民主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联邦德国的一部分。民族意识、民族情绪抬头，有些国家的群众（如波兰）甚至对俄语都很反感；以苏联国徽为样板的匈牙利国徽换上了1849年人民起义的旗帜，“上帝保佑我们匈牙利”的歌词传遍

了匈牙利^①。东欧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还特别体现在东欧各国更改国庆日这一问题上：如波兰取消原来的7月22日的国家复兴节（国庆节），即1944年在苏联支持下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发表关于战后波兰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宣言的日子，规定5月3日为正式国庆日，即1791年波兰君主共和国的议会通过波兰历史上第一部具有民主、进步意义的宪法的日子。匈牙利将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爆发的日子定为国庆日，以代替原来的4月4日（苏联军队解放匈牙利纪念日）国庆日。捷克斯洛伐克除了原来的5月9日为国庆日外，又把10月28日——捷摆脱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成立第一共和国的日子定为正式国庆日；保加利亚也拟将3月3日——保从土耳其奴役下解放日定为国庆节^②。对苏联的敌意是明显的。

正如飞去来器原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对东欧的放弃，导致了苏联模式连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东欧垮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反过来又反作用于苏联模式的大本营——苏联自身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迅猛高涨。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宣布政治上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经济上搞“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东欧突变促进了苏联模式在其故乡寿终正寝。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加紧向西方体制或半西方体制过渡。

注 释

① 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中译本，第16页。

②（南）米·尼科列奇：《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中译本，第273页。

③（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将来》，第492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④ 徐天新：《赫鲁晓夫与斯大林模式》，《苏联历史问题》1987年第1期。

⑤ 柳植：《“一国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苏联历史问题》1984年第1期。

⑥ 蔡伟：《论斯大林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4届博士学位论文。

⑦ 关于对苏联模式的种种看法，参见（南）马尔科维奇、（美）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苏联学者圆桌会议：《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建立、发展及其崩溃（20～80年代）》，《苏共党史》俄文版1990年第12期；中国苏联学者学术座谈会：《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考察——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改革与新思维〉》，《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李兴、周雪梅：《论苏联模式与苏东关系（1945～1991）》，《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2期。

⑧ 参见约翰·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中译本，第84页，美国钟表出版社1980年；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360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美）凯尔迪什主编：《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美国圣母大学，1962年；诺宾·奥肯：《1740～1985年的东欧：从自由主义到共产主义》，1986年，伦敦。

⑨（苏）《苏联历史》1991年第1期，第25页；参见（苏）《苏联斯拉夫学》1991年第6期，第3页。

⑩（苏）《苏联历史》1991年第1期，第14页。

⑪ 参见姜毅：《苏东联盟与苏联的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4届博士学位论文。

⑫（苏）《苏联历史》1991年第1期，第46页。

⑬《离开真理哪里也不去——关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新材料》，（俄）《肯塔弗尔》1993年第4期，第86页。

⑭ 如《冷战时期苏联的外交政策 1945～1985》，其中有专门的一章“战后东欧发展中的苏联因素（1945～1948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版；特·维·沃洛根基娜、格·帕·马拉施科、阿·弗洛斯科娃：《人民民主：神话还是现实？》，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⑮ 参见约翰·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第 92～93 页。

⑯ 参见约翰·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第 15 页；(美) C·布雷德利·沙尔夫：《民主德国的政治与变革》，春秋出版社，1988 年；斯蒂芬·费希尔—盖拉蒂：《东欧各国共产党》，东方出版社，1986 年版；(英) 艾萨克·多依彻：《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⑰ (南) 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第 59 页，新华出版社，1987 年版。

⑱ 参见(联邦德国) 彼德·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第 10～13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

⑲ 《苏联学者论 1948～1953 年的苏南冲突》，《国际共运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第 46 页。

⑳ ㉑ 《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 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 1944～1949》，第 444、458 页，莫斯科，1985 年版。

㉒ (意) 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 第六卷 下册 当代各国经济》，第 180～182 页，商务印书馆，1991 年。

㉓ (苏) 伊斯莱梁、涅仁斯基：《匈牙利现代史》，第 102～103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㉔ 参见(保) 科谢夫、赫里斯托夫、安格洛夫著：《保加利亚简史·下册》，第 349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

㉕ 参见(罗) 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罗马尼亚通史简编》，商务印书馆，1976 年。

㉖ ㉗ 参见《40 年代中后期的苏联与中东欧国家》，(苏)《苏联斯拉夫学》1991 年第 6 期，第 6 页。

㉘ 见(美) 乔治·霍夫曼、弗雷德·华纳·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第 87 页，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

㉙ 参见休·色东—沃森：《两次大战期间的东欧 1918～1941》，第 256～265 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46 年版。

㉚ 《保加利亚共产党十大决议》，第 219～220 页。

㉛ 《季米特洛夫选集》，第 2 卷，第 671 页，莫斯科版。

㉜ 哥特瓦尔德：《永远跟苏联在一起！》，《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

主!》1953年第19期,第14页。

③(苏)《近现代史》1988年第4期,第28页。

④(捷)姆林纳日:《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⑤(苏)克·扎罗多夫:《不同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第82页,莫斯科,1959年版。

⑥(苏)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189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⑦(苏)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58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参见(意)卡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 第六卷 下册 当代各国经济》,第17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⑧参见马细谱:《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201页,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

⑨参见(联邦德国)彼德·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第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⑩(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第62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⑪(苏)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148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⑫参见康春林:《论东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方式》,《苏联历史问题》1988年第2期。

⑬见马细谱:《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209页,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

⑭⑮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178~179、176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⑯《一个流亡者的历史:马加斯·拉科西在苏联(1956~1971)》,(俄)《肯塔费尔》1993年第6期,第79页。

⑰(苏)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180~181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⑱(苏)《苏联历史》1991年第1期,第41页。

⑲黄宗浩译:《苏联二次大战后的外交政策》,第236~237页,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

⑤① 参见(南)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第49~51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⑤②⑤③⑤④(苏)《近现代史》1988年第4期,第31、26、33、34页。

⑤⑤ 参见苏联《苏共中央致南共中央的秘密信》,(俄)《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

⑤⑥《苏共中央致南共中央的秘密信》,(俄)《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第146~148页。

⑤⑦ 参见《苏南1948年秘密通信》,(俄)《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

⑤⑧(苏)《真理报》1948年9月8日。

⑤⑨(苏)《近现代史》1988年第4期,第38页。

⑥① 菲利斯·奥蒂:《铁托传》,第252页,纽约,麦格劳山图书公司,1970年。

⑥②(美)丹尼森·拉西诺:《南斯拉夫的新实验1948~1974》,第2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参见马细谱:《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14页,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

⑥③(美)乔治·霍夫曼、弗雷德·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册,第127页。

⑥④⑥⑤(美)丹尼森·拉西诺:《南斯拉夫的新实验1948~1974》,第27、47~4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⑥⑥ 弗·贾古连科:《南斯拉夫农业的发展》,莫斯科,1981年版,第19~20页。转引自(俄)《近现代史》1990年第1期,第17页。

⑥⑦ 参见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338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苏《经济问题》1988年第10期,第41~42页。

⑥⑧ 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341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⑥⑨(南)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第106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⑥⑩《关于匈牙利事件》,第30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⑦①⑦②(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第224~225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⑦③ 参见(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第149~153、

149 页，新华出版社，1983 年版。

⑳ 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第 226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

㉑ 参见（德）赖因霍尔德·安德特、沃尔夫冈·赫兹贝格：《倒台——昂纳克答问录》，第 157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㉒ 参见约翰·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第 240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㉓（美）凯尔迪什：《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第 6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年。

㉔ 关于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的主张参见《苏联与东欧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和崩溃（40 年代中期～80 年代末期）》，（苏）《苏联历史》1991 年第 1 期，第 18 页；关于主张改革的纳吉 1949～1952 年就农业问题同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的分歧，其中包括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和集体化的速度问题参见《1956 年匈牙利事件·匈牙利历史学家评价的演变》，（俄）《近现代史》1992 年第 3 期，第 28 页。

㉕（波）扬·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第 48～55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

㉖（南）德·米利伏耶维奇：《波兰在十字路口》，第 55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年版。

㉗《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第 55 页；参见 B·雷赫洛夫斯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与帝国主义的区别对待政策》，（俄）《国际生活》1987 年第 8 期。

㉘ 参见 B·A·穆斯达夫：《苏联与匈牙利：1956 年事件 新的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3 年第 1 期。

㉙（苏）格·马拉施科等：《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 362 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㉚ 斯蒂芬·费希尔—盖拉蒂：《东欧各国共产党》，第 243 页，东方出版社，1986 年。

㉛ 参见《离开真理哪里也不去 关于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新材料》，（俄）《肯塔弗尔》1993 年第 4 期，第 80 页。

㉜ 参见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第 33 页，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⑧ 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 326 页，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 年。

⑨ ⑩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摘要），转引自（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诺·亚·麦德维杰夫：《政治日记·选译》，第 131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

⑪⑫⑬（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第 444、480、519～520 页，新华出版社，1983 年版。

⑭ P·比霍亚：《捷克斯洛伐克 1968 年，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5 年第 1 期，第 36 页。

⑮（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第 560、562～564 页，新华出版社，1983 年版。《杜布切克回忆 1968～1969 年》，《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⑯《苏共与捷共的国际主义合作：历史与现状》1984 年俄文版。

⑰ 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 361 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⑱（英）威廉·肖克罗斯：《罪行与妥协——卡达尔·亚诺什和革命以来的匈牙利政治》，第 76 页，新华出版社，1981 年版。

⑲ 参见 T·杰别尔、B·伊奇托夫根：《匈牙利的小经济形式》，（苏）《经济问题》1988 年第 8 期。

⑳ 参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0 年 11 月）》，卡达尔·亚诺什：《论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 1957～1985》，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㉑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东欧局势的演变与前景》，第 30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

㉒（美）S·比亚勒：《波兰与苏联的统治》，《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 年第 1 辑，第 51 页。

㉓ 刘祖熙：《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第 163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

㉔ 参见（联邦德国）彼德·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第 5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俄）B·H·沃罗科夫：《1980～1981 年波兰事件：来自老广场的观点》，（俄）《历史问题》1995 年第 10 期。

㉕（美）约翰·莱夫特韦奇·柯里：《波兰危机与生存策略》，《苏联东欧

问题译丛》1982年第2辑，第46页。

⑩ 参见不破哲三：《斯大林与大国主义》，第105~10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⑪⑫ 《雅鲁泽尔斯基选集（1981~1987）》，第12、55~56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⑬ 参见（俄）С·洛沃巴什：《80年代以来的东欧：趋势与问题》，（俄）《历史问题》1995年第4期；（俄）格·缅耶尔：《东欧的政治文化》，《莫斯科大学学报·社会政治研究》1994年第4期，第5页。

⑭ 《东欧的民主革命：原因与后果》，（苏）《共产党人》1990年第14期，第109~110页。

⑮ 《历史转折关头的东欧：1989~1990》，《东欧的改宪 1989~1990》，莫斯科，1991年版。

⑯ 波兰《代表大会论坛报》1990年1月29日。

⑰ 关愚谦：《苏联东欧风云变幻录》，第130页，1991年版。

⑱ 《东欧剧变纪实》，第15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第三章 经互会与苏东关系

1949年苏联与其东欧盟国成立的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简称经互会），至1991年解散前，除了苏东国家外，还包括蒙古、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本文把经互会组织作为研究冷战时期苏东关系的一个新视角，故不涉及到经互会非东欧成员国。

经互会是阵营对抗的产物，是在国际冷战格局展开的形势下，苏联对美国马歇尔计划和西方的封锁、禁运政策的反应，也是苏东政治同盟关系向经济方面合乎逻辑的发展。苏联通过经互会切断了东欧与西方传统的经济联系，使东欧外贸从传统的面向西方转向面向东方。因而，经互会是苏东经济一体化的工具，是联系苏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条纽带。反过来，经互会又使苏东经济与世界市场隔绝，并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冷战。

经互会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经历了若干个阶段，总的趋势是合作一步步加深。50年代，其经济合作仅限于流通领域，活动特点是其方式和范围都比较简单和有限，主要是协调苏东国家之间在原料、食品、机器设备等方面的短期双边贸易，以易货贸易的形式为主，建立在“官僚协议”的基础上^①。其成立之初政治色彩比较重，经济活动比较少，甚至没有明确的经济纲领。1951~1953年经互会没有召开过例会^②，直到1959年才制定经互会的章程。从60年代起，经济合作推广到生产领域，开始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协调，实行专业化与协作。首先从机器制造业开始。这种合作一般具有多边长期的性质。1971年经互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综合纲要》，规定在15~20年内分阶段实现生产、

科技、外贸和货币金融的“一体化”，使从过去的“个别一体化”过渡到“综合一体化”，最后达到全面的“经济一体化”。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协作，被视为经济一体化的基础。1985年通过了《2000年前经互会国家长期科技合作综合纲要》，开始了经互会国家科技领域的一体化进程。经互会内部相互贸易和经济、科技合作有助于从总体上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能力，对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需求不同，一体化合作机制的非市场性（建立在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封闭性（与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的相对隔绝），以及经互会不具备像欧共体那样的超国家性（决议需所有成员国同意才能有效），所以经互会内部也充满了问题与矛盾。同时，经互会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国际经济组织，其具体活动方式的政治色彩日益减弱并不断地经济化，从以发挥政治职能为主的政治经济组织逐步向以发挥经济职能为主的经济政治组织转变。由于经互会内部问题与矛盾的发展，加之东欧剧变的影响，经互会于1991年6月宣布解散。

在经互会中苏联是核心，其经济实力超过其他成员国的总和。半个世纪以来，经互会的成就是巨大的，它是经互会得以存在的基础，也使经互会日益成为苏东团结的保障。在这方面首功应归于苏联。经互会内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复杂的，严重的，苏联亦难辞其咎。无论是经互会的成就还是经互会的问题，都对苏东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一、经互会的成就与苏东关系

经互会成立时实际上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地区性的国际经济组织，因而其成就首先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使东欧在经济上从传统的面向西方转向面向东方。东欧传统的经贸方向的东移，对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来说，是政治上的一个胜利，它使

东欧摆脱了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控制的危险，为巩固苏东社会主义制度，加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形成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经互会的发展与苏联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在经互会活动的初期，苏联给了东欧国家大量无偿的和有偿的援助。这对于东欧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在经互会活动期间，苏联长期是东欧国家急需的能源、原料的主要提供者；苏联是东欧国家最大最可靠的商品市场，也是东欧各国最大的外贸对象。由于与苏联的经济技术合作，东欧国家得到了不少实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彼此间的差距。东欧更多地从经济上需要苏联，苏联更多地从政治上需要东欧。经互会的建立和活动也符合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符合经互会各成员国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经互会的经济意义越来越重要，经互会逐渐从带很强政治色彩的政治经济组织转化为以经济性质为主的经济政治组织。

（一）经互会使东欧外贸从传统的面向西方变为面向苏联

由于东欧地区与俄罗斯及后来的苏俄历史上都是比较落后的农业—工业国或工业—农业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相似，以生产粮食、原料和工业半成品为主，故在东欧各国之间，以及东欧与俄罗斯及后来的苏俄和苏联之间，经贸的互补性不强。加上政治气候的影响，联系很不密切。相反，东欧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互补性很强，各有所需，因而东欧经贸传统上是面向西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十分薄弱。苏在东欧国家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最多也没有超过3%，而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对外贸易额中，苏联分别只占1.8%、0.45%和0.4%^③。如战前（1936~1939年）苏联与罗马尼亚的经济关系就曾使苏联政府代表怀疑是否有继续与罗马尼亚保持贸易联系的必要^④。

直到经互会成立前夕的1948年，苏东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还

是非常简单的，东欧各国恢复经济所必需的大量机器设备和零配件仍然主要从西方国家进口，资本主义国家在东欧各国对外贸易额中的比重：捷克斯洛伐克——68%，匈牙利——66%，波兰——59%，罗马尼亚——29%，民主德国——25%，保加利亚——22%^⑤。由于苏东国家对马歇尔计划的拒绝，西方国家对苏东的经济封锁、禁运等报复行动，以及经互会的成立和活动，经互会东欧成员国无论是与苏联还是自身内部的贸易往来都增多了，而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明显地减少了。

苏联与经互会六个东欧成员国的贸易额
在该国贸易中所占的比重(%)^⑥
(1955~1969年)

年代	保加利亚	匈牙利	东德	波兰	罗马尼亚	捷克斯洛伐克
1955	51.5	22.9	39.8	38.8	54.1	33.3
1960	52.1	30.7	45.0	31.1	39.6	34.3
1965	51.2	35.4	45.1	33.0	38.7	36.6
1966	48.5	32.5	41.2	32.2	33.0	33.1
1967	50.7	34.3	42.0	35.1	27.9	35.2
1968	54.2	37.8	43.3	36.4	28.4	33.3
1969	55.0	35.7	40.7	36.6	27.5	33.6

70年代以后，苏东贸易额有增无减。见下表。

苏联与经互会国家的外贸 (单位: 10 亿卢布)⑦

年 代	1970 年	1975 年	1980 年	1981 年
出口	6.3	13.4	24.3	28.6
进口	6.0	12.9	21.5	23.6
按 1975 年 可比价计	19.5	26.3	33.9	34.4
年 代	1982	1983	1984	1985
出口	31.1	34.5	38.2	40.1
进口	27.6	30.8	34.6	37.6
流通额	58.7	65.3	72.8	77.7
按 1975 年 可比价计	36.3	37.3	39.0	

再具体以波兰为例

苏联与波兰的贸易的增长

(单位: 百万卢布对上一个五年增长的%)⑧

1950 年是 1946 年 的 %	1955 年是 1950 年 的 %	1960 年是 1955 年 的 %	1965 年是 1960 年 的 %	1970 年是 1965 年 的 %	1975 年是 1970 年 的 %
209.2	159.3	122.1	171.7	173.4	206.5

与此同时，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以1955年为例，经互会内部的出口和进口，在各国外贸出口和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阿尔巴尼亚分别是97.3%和97.2%，匈牙利是87.2%和87.6%，罗马尼亚是79%和79.6%，东德是65.6%和63.1%，捷克斯洛伐克是62.6%和65.0%，波兰是57.9%和60.7%^④。根据一位西方学者的研究，1958年，东欧国家与苏联的商品交换额占东欧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37.0%，而与西欧、北美和日本的贸易额只占其总额的20.8%。次年，苏份额在东欧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上升为40%^⑩。而苏联与经互会东欧国家的贸易额占苏贸易总额的比重，1959年为52.4%，1960年为53%，1980年一度降为49%，1985年又上升为54.9%，同年，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换额只占其外贸总额的26.7%^⑪。

（二）经互会的成就及苏联在其中的作用

经互会的成就更重要的和更直接的表现经济在科技方面，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个意义越来越重要。半个多世纪以来，经互会无论是在总体经济和科技方面，还是在国别经济与科技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6年，经互会有近4.6亿人口，占地球上居民的10%，但它们生产的国民收入占全世界国民收入的25%，生产全世界工业产品的33%，钢产量的32%，电力的22%，矿物肥的35%，水泥的22%；开采全世界煤的29.3%，石油的23%，天然气的40%；掌握了全世界先进技术的20%的专利。而同期，欧共体在全世界电力生产中只占5%，钢——17%，矿物肥——13%，煤——8%^⑫。与1950年相比，至1987年，经互会国家国民收入总量增长了8.3倍，工业总产量增加了14倍，外贸额增加了36倍，农业增加了1.7倍，每个人的实际收入平均增加了4倍。而同期欧共体国家国民收入增加了2.5倍，工业生产增加了2.7倍，对外贸易增加了30倍，农业

生产只增加了约 1 倍。按人均计算，在煤、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钢铁等重要工业产品方面，经互会国家超过了欧共体。如果说，1960 年经互会的电能生产量只是欧共体的 95%，那么 1985 年这个比例就成了 144%，煤的开采量相应地从 135% 上升为 445%，生铁的冶炼从 86% 上升到 174%，钢从 88% 上升到 178%，硫磺从 62% 上升到 181%，水泥从 87% 上升到 160%。1951~1985 年，经互会国家在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方面的产品总量增加了 43 倍，而同一时期欧共体只增加了不到 4 倍^⑬。经互会国家的发展速度也是比较快的。1950~1983 年，其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为 6.7%，工业产值的年增长速度为 8.3%，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别只有 3.8% 和 4.2%；即便在其经济转入缓慢发展的 1970~1983 年，它在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方面仍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三者国民收入的增长分别为：181%，142% 和 167%；三者工业产值增长分别为：200%，137% 和 164%^⑭。1981~1985 年，经互会国家国民收入的增长额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 6 个百分点，比“共同市场”国家高 11 个百分点^⑮。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互会成员国中原来的农业工业国或农业国已跨入世界先进工业国之列。原来基础较好的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早已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波兰在许多重要的产品指标方面也跨入了世界前十名。匈牙利成为一个拥有发达的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国家。原来基础较差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已由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农业国，其发展速度在经互会国家中 fastest。尤其是由于国际分工，东欧国家某些部门的发展，如保加利亚的电子工业，捷克的原子能电站的主要工艺设备，匈牙利的电子计算机等等，都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与此同时，经互会国家的科技队伍已超过了 142 万多人，相当于全世界科技工作者的 1/3。在经互会国家大约有 200 个科学院机构和 3 000 个其他科研机构参加科技合作，共完成了二万多个科研和实用项目，研

制出了 1 700 种新的机器、机械和仪表，改进了近 1 300 个工艺流程，制造了近 1 400 种新材料、新产品和新制剂。每年注册的技术发明达 13 万项，约相当于世界发明总数的 40%，其中采用的有 6 万项^⑯。

作为经互会的核心，经互会的发展和成就与苏联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首先，苏联给予了经互会东欧国家大量有偿的与无偿的援助。这些援助对于东欧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时期。在东欧各国发展工业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了各国特别是农业国家以很大的支援，以及财政的和技术的帮助，供应了它们必需的原料、燃料、机器、设备。如 50 年代，阿尔巴尼亚从苏联得到了纺织、木材加工和糖果点心等公司所需要的设备，以及为水泥、煤、石油、铬矿开采所需要的设备。仅 1949~1957 年，苏联就为阿 39 个大的工业项目提供了整套设备。1951~1955 年，苏联还为罗马尼亚 4 个大型的热能电站和火电站，高炉和平炉，以及石油加工与拖拉机厂提供了设备^⑰。又如，鉴于保加利亚 1949 年发生了灾荒和欠收，苏联无偿送给该国 16 万吨小麦以帮助其渡过困难^⑱。在 1949~1956 年期间，苏联向波兰提供了几十个项目的贷款。其中包括 30 个大型工业企业：列宁钢铁联合企业，华沙的优质钢厂，斯卡维纳的铸铁厂、制铝厂等等。在雅沃日诺、泽兰、迪霍伍和斯卡维纳等地，根据苏联的设计建成了并且用苏联的设备装备了大型发电站；苏联还帮助建成了亚尼库夫的制碱厂，肯杰仁的氮肥厂，奥斯威辛的化学联合企业及其他许多项目。在 1950~1955 年间，有 425 兆瓦特的发电能力是用苏联供应的设备建成的电站发出的^⑲。1950 年 5 月，苏联满足了民德统一社会党和民德政府的要求，减少了部分二战的赔款。1950 年 5 月，苏德之间签订了关于苏在德的股份公司的备忘录，根据该文，有 23 家最大的苏联股份公司转交给了民德政府所有。1952~1953 年，又把其他 93 家类

似的苏联公司无偿地转交给了民主德国^②。根据1952~1954年的协议，苏联供应民主德国铁、锰、铬等矿物，及原油的100%，生铁的64%，焦炭的44%，铁锰合金的75%，其他铁合金的85%~100%，棉花的100%。苏联还在创立民主德国的冶金业和培养其冶金干部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③。1952年根据民主德国政府的要求，苏联同意以借贷的形式供应民德农业机器，以及民德开矿业和建筑业所需要的设备。1953年8月，苏联同意民德停止赔款。这一年，苏联供应民主德国价值5.9亿卢布的商品。其中包括粮食商品、石煤、黑色金属、焦炭、铜、铅、铝、棉花及其他商品^④。1949~1955年苏联与民德的贸易额增长了2.9倍，从1949年的10亿金马克到1955年的39亿6千7百万金马克^⑤。对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也有援助。1963年，苏联由于欠收，粮食不足，不得不从国库拿出黄金，向加拿大购买了600万吨粮食，花去黄金850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苏还保障供给捷克斯洛伐克140万吨粮食^⑥。同年，苏联还援助了波兰^⑦。1984年，苏联帮助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建立的企业的工业产量，占各国工业总产量的比重分别为：钢，1700万吨——28%；电，16700亿度——36%；生铁，1200万吨——36%；水泥，700万吨——11%；居住面积，500万平方米——30%^⑧。1956年波匈事件以后，以及1980~1981年波兰危机以后，苏联都在经济上给予了它们以真诚而及时的帮助^⑨。

其实，经互会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说得到了苏联的帮助或合作。经互会各国社会主义基础的建立，应该说有苏联的一份功劳。

其次，苏联是东欧国家能源、原料的主要供应者。苏联的能源资源占经互会总储量的90%，其中煤储量是91%，石油是92%，天然气是79%^⑩。而东欧各国除了罗马尼亚石油储量较多以外，能源资源都非常缺乏。如其中最发达的民主德国自然资源总储量只占世界总储量的1.8~2%，居世界第96位。民德发

展工业的能源和原料绝大部分来自经互会，主要是苏联。从苏联的进口可以满足其石油需求的80%以上，天然气和生铁需求的100%，铁矿石约80%，钢产品和铝约70%，皮棉及锯材的90%以上。捷克斯洛伐克是经互会主要的钢铁生产国，但其所需铁矿石的60%来自苏联。保加利亚的能源储量几乎微乎其微，匈牙利的能源资源也少。波兰的煤炭储量虽然还可以，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年产量突破不了2亿吨，况且其他原料比较贫乏。据一份比较可靠的材料，1958~1959年苏联提供了波兰铁矿进口的74%，锰矿——近100%，铬——67%，石油——近100%，磷灰石——100%，棉花——66%，亚麻——95%，镍——100%，锡——90%，铅——58%，石棉——60%，谷物——43%^⑳。

在苏联向经互会国家的出口结构中，能源、原料类商品占有主导地位，并且增长的速度很快。如果说1950年苏能源、原料向东欧的出口只占其生产量的1%，那么1983年增加到17%；1976~1980年比上个五年增长了47%，1981~1985年又比上一个五年增长了20%。1985年，苏联供应经互会东欧成员国石油和石油制品的84.5%，天然气的99.9%，电能的81.9%，铁矿石的71.5%，矿物肥的57.0%，圆木的83.4%^㉑。

苏联在经互会国家能源生产、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㉒

年 份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生 产	69	75	80
出 口	60	75	83
进 口	24	16	11

苏联供应经互会国家燃料和能源情况②

年 份	1951~1955	1956~1960	1961~1965	
石油和石油制品（单位：百万吨）	8.9	33.3	99.8	
天然气（单位：百万立方米）	0.6	1.0	1.6	
石煤和无烟煤（单位：百万吨）	8.1	29.1	61.8	
电能（单位：千万度）	10.5	—	2 300	
年 份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3
石油和石油制品（单位：百万吨）	193.4	310.6	430	263
天然气（单位：百万立方米）	7.7	30.5	94	91
石煤和无烟煤（单位：百万吨）	61.6	73.6	—	—
电能（单位：千万度）	13 900	39 900	64 000	54 000

为了供应东欧国家能源，苏联修建了不少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输送管道。“友谊”输油管的输油能力每年可达1.05亿吨，延伸达一千九百多公里，从苏联的古比雪夫经莫齐尔（苏）到波兰的普沃茨克，然后再到东德的施韦特；另有一条支线，沿着西南方向，通过苏联的布罗迪和乌日戈罗德，到捷克的布拉迪斯拉发

和匈牙利的萨兹豪洛姆陶。“兄弟”天然气管道要狭小一些，到1978年底，该管道系统将能供应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的所有东欧国家。还有一条“和平”联合输电网联络着西乌克兰和东欧两地区，仅1971~1975年就送电八百亿千瓦^③。70年代世界“石油价格革命”之前，苏联出口的石油一般低于世界平均价格。经互会国家仅从苏联进口能源和原料这一项，每年可节省资金几十亿美元。

再次，苏联是东欧国家巨大而可靠的产品销售市场。苏在东欧各国对外贸易中均占第一位，是东欧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经互会国家外贸总额的60%是在经互会内部进行的，占其国民收入总额的18%。波兰外贸中有近1/3是销往苏联的^④。与民主德国的经济科技合作在苏联的对外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占苏联对外贸易的11%。从民德的进口中，占63%的是机器和设备，满足苏进口需求的20%^⑤。1960年在罗马尼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总额中，苏约占55%，占罗马尼亚外贸总额的约40%，到1965年则分别为60%和39%^⑥。对于经互会大多数国家来说，苏联是销售其机器和设备的最大最可靠的市场。保、匈、民德和捷克等制造的机器设备的30%~40%是销往经互会市场的^⑦。1956~1967年，苏联从经互会国家进口了14000辆客车车厢（占苏生产量的76%），44000辆货车车厢，及价值11亿卢布的食品和轻工业设备^⑧。1984年，经互会东欧国家出口的机器产品的62%是输往苏联市场的，约占苏联进口机器产品的2/3。80年代初期，经互会国家的供货满足了苏对海运和河运船只及自动装卸机需求的40%，1/3的客车车厢，13%的公共汽车，约20%的轧钢设备，近50%的自动电话设备。全国有15%的生产面积采用东欧经互会国家的农业技术。到80年代中期，从经互会国家进口的设备生产了蔬菜罐头的40%，糖和糖果点心的30%，奶制品的15%。各类消费品和粮食在东欧国家向苏联的进口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从经互会东欧国家进口粮食来满足

苏联的需要有很大的意义。1981~1985年，苏联从经互会东欧国家进口了价值400亿卢布的日用消费品。这些商品或者国内不能生产，或者国内生产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需要。80年代上半期，在日用消费品方面经互会东欧国家对苏联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43%，或其粮食与原料生产的45%。苏联内部，在鞋、家具、衣服和罐头等轻工业消费品的零售商品中，不下于15%的比重是经互会东欧国家提供的。仅1981~1984年，苏联就从经互会国家获得了近2亿双皮鞋，200万吨肉，250万吨新鲜的水果^③。在相互出口的总额中，经互会国家对苏联出口的比重，1970年为35.9%，1985年上升为38.4%^④。

科技合作是经互会活动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经互会的科技潜力占世界的1/3，而苏联又在其中独占鳌头。苏联的科技实力占经互会总实力的70%。科技合作一方面有利于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避免重复研究和浪费。另一方面，又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一些大项目、大课题的攻坚，并迅速取得成果。据专家的估计，仅由于避免重复的科学研究与工作可使经互会国家每年节省50亿~70亿卢布^①。1970年以前，苏联转让给经互会其他成员国27000多套科学技术资料，而从这些国家得到了一万五千多套。据某些经济学家计算，转让给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科技资料的价值（按世界价格计算）将近150亿卢布^②。由于科技合作，东欧一些国家无偿或有偿地从苏联得到了很多重要的科技资料，如通过科技合作，罗马尼亚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研究2459个迫切的国民经济问题的科学技术资料^③。经互会成立后近20年，苏向匈牙利提供了3500套技术资料，而从匈牙利得到了1500套^④。经互会内部这种相对开放的科技合作，使东欧国家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研究与生产。经互会国家还在很多领域，如宇航研究、电子计算机和机器人、土地和海洋资源、化学、生物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共同成果。如为了共同研究和开发机器人，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关于建立“机器人

国际科技中心”的协议，规定共同研究和开发 5 种类型的自动化设备，12 种类型的工业机器人和操作机，以及 26 种类型的机器人综合体。苏捷几十个科研和生产组织参与了该项工作^⑤。苏捷科技合作使捷克斯洛伐克在各类机器人与电子计算机方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85 年底，经互会成员国通过了《2000 年前科技进步综合纲要》，确定了以后重点发展 5 大关键性的项目，即国民经济电子化、综合自动化、原子能源、新材料和生物工程，规定纲要任务的完成将从总体上至少促进 2000 年前劳动生产率提高 1 倍，以及单位国民收入所消费的能源和原料的减少。该年，经互会国家在机器制造领域的合作是在 90 个关于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和合作化以及 64 个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和条约的基础上实现的，涉及到了 16 000 种产品。由于这次合作，创造出了 180 多种新的产品，研究出了二十多种新的现代技术。由于相互合作和供应，明显地减少了在机器与设备方面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⑥。

与苏联等国的科技合作还有助于使经互会东欧国家节省十分短缺的能源和原料，从而提高生产效益。由于经济与科技的合作，保加利亚减少了其原料的浪费，1981~1984 年，平均每年节省达 2.5%；匈牙利由于生产成本的降低保障了其五年计划的国民收入增加 20%~30%；民主德国这一时期原料、能源消耗平均每年降低 6.1%；同期，罗马尼亚每年原料的消费降低 2.5%~4%；捷克斯洛伐克在五年计划的头四年每年降低黑色金属的消费量 5.4%，原料、能源消费量的 2.4%。估计苏联 1981~1985 年在原料、资源的消费方面要节省 150 亿卢布，相当于其 1984 年创造的国民收入的 3%^⑦。在民主德国，以前在钢铁生产中废品率达 76%，在铜的生产中约占 68%，在纸和纸板的生产中约占 50%。可见，其原料与资源的浪费是不小的。通过科技合作，民主德国每年节省最重要的原料、燃料和材料达 6.1%，节省次要资源达 12%（1984 年为 11.5%）。1981~1985 年，保

加利亚黑色金属废料的再加工增加了45%，而有色金属废料的加工增加了15%~20%，废纸的加工增加了1倍。与1980年相比，捷克斯洛伐克1985年节省了1200万吨燃料。从1978年起，匈牙利石油产品的年消费量也减少了2700万吨，石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从原来的41%降到了32%^④。1981~1984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增加了40%（142亿马克），依靠的就是减少了生产的消耗主要是能量与原料的消耗。如果说1980年生产1000马克的国民收入需要花费1896马克的话，那么到1985年就只需1704马克。其能源、原料和材料的降低平均每年达5.2%^⑤。同一时期，由于采用了科技成果和改善了劳动组织，节约了22亿个工作小时，仅1984年一年，就节约了5.076亿个工作小时。而匈牙利这年工业能源消耗降低了6%^⑥。

使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接近和拉平是经互会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在经互会的章程，还是在经互会1971年综合发展纲要中都有明文规定。由于国际劳动分工和协作，由于社会主义一体化的发展，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确在缩小。经互会国家原来的基础是很不平衡的，除了民主德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是较先进的工业国外，其余都是落后的农业国或农业—工业国家。半个世纪以来，各国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落后国家由于其超低经济水平，发展速度更快一些。以1959年为例，经互会各国的工业增长率分别是：保加利亚—24.9%，阿尔巴尼亚—19.7%，匈牙利—12%，民主德国—12%，波兰—9%，罗马尼亚—11.1%，苏联—11%，捷克斯洛伐克—10.9%^⑦。经互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在逐步缩小。1950年，经互会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为3.2:1，工业发展水平的差距为4.6:1，农业发展水平为2.1:1，到80年代初，三者之比依次是：1.6:1；2.2:1和1.7:1^⑧。无独有偶的是，1981~1985年间，经互会各国生产性国民收入增长率和工业产量增长率均为18%^⑨。这种经济结果不能说与一体化毫无

关系。再以保加利亚为例，它是巴尔干半岛上最落后的农业国，战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战后，在苏联的援助下，保加利亚积极参加经互会一体化活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全国已建立起了以起重运输机械、农业机械、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电机产品为主体的机器制造业系统。保在按人均计算的电子工业生产和出口方面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不仅如此，1980年，在其他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单位国民收入的能源消耗量都高出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45%的情况下，匈牙利的这个指标低于大多数欧共体国家的水平。而只有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单位国民收入的金属消耗率等于或小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④。

二、经互会的问题与苏东关系

在经互会存在的近半个世纪（1949～1991年）中，经互会对于改变东欧国家传统的贸易方向，保护东欧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取得经济科技领域的突破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苏联作出了很多牺牲和贡献。另一方面，由于经互会组织的非市场性，相对封闭性，经济基础的非平衡性，及操作程序的非强制性等特点，导致与其资本主义对于欧共体相比，经互会迎接科技挑战不力，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增长速度下降，形成对苏联经济的依赖，经互会内部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的问题与矛盾增多，最终在苏东剧变中解散。所谓非市场性，是指经互会的合作机制不是像欧共体那样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物物交换，易货贸易，协议价格，行政管理，质量不过硬，内部缺乏竞争；所谓相对封闭性，一是指经互会国家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隔离，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不接轨；二是指经互会内东欧成员国的相互的经济联系也不多，而是与苏联垂直联系，以苏联为中心，高度集中。当然，这也不是完全绝对的，后期在形势的逼迫下也开始发生变化，把外贸关系开始转向

西方。所谓不平衡性和非强制性，是指经互会各国经济基础与需求的不平衡，以及经互会活动的协商性，一致通过原则，非强制性，不具有欧共体所拥有的在经济领域内的决议高于成员国法律的权力。由于经互会的这些特点，使它 70 年代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耗尽了本身发展的能量和潜能，经济和技术发展速度慢下来了，总体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包括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以及东欧内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矛盾突出出来；相互的贸易减少了，对西方的外债增加了。由于国际分工的发展，苏联又是经互会的核心，东欧各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需要程度大大超过苏联对东欧的需要程度，形成了各国对苏联的经济依赖关系。

（一）经互会：非市场性，相对封闭性，不平衡性

考察经互会活动的非市场性，必须首先考察其高度集中和垂直联系的特点。经互会的贸易活动基本上是以苏联为中心呈放射状向东欧扩散。经互会成立之初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斯大林时期苏联随意规定贸易条件^⑤。虽然赫鲁晓夫时期有所改变，但不是由市场来决定价格而是人为地规定价格却基本上一直延续下来了。一直到 60 年代以前，都不是以世界市场价格作价格基础，而采取“自己的价格基础”^⑥。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石油的价格，这是苏联向东欧国家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最先是五年一作价，价格是人为规定的，与国际市场价格不挂钩，苏联吃了很大的亏。而 70 年代中期，世界石油、原材料价格上涨 15 倍，苏联坚持要改为以前 5 年国际市场平均价格作为经互会内部制定年度贸易价格的基础，5 年不变，从而使石油价格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引起了苏与东欧国家之间的价格之争。从 1975 年以来，苏向东欧出口的原料每年都要涨价，如 1977 年涨了 200%。作价规定的改变使苏联得到了不少好处，引起东欧国家的不满。但苏联的商品涨价还没有达到世界市场的水平。苏认为还需要提高

能源的价格，因为能源的低价“意味着燃料出口国向进口国提供优惠。由于这种优惠基本上是单方面提供的，因此保证交换的所有参加国获得平等的物质利益，便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⑤。后来又改为商品1年一作价，即便这样也与国际市场价格并不接轨^⑥。由于价格由官僚协议，经互会内部又实行专业化合作和国际分工，规定某些国家放弃生产一些产品，而另一些国家又必须生产某些产品，造成了许多商品独家经营，舍此无它，以致经互会内部“竞争已完全绝迹”^⑦。这样一来，产品的质量自然就没有保障。经互会变成了各国竞相推销次品的场所。技术进步的动因大大地削弱了。商品的价格和质量问题常常成为苏东矛盾的导火线。其次，转账卢布是经互会成员国的国际集体货币，它以苏联卢布为基础，并基本与卢布等值。但它只能用于经互会内部的结算，合同、信贷与支付，不能用于生产，更不能作为国际货币使用，同时苏联也就成了这些国家货币兑换的决定者^⑧。即便在经互会内部，多余的转账卢布也不能转换成所需要的商品，贸易顺差的一方也不能得到现汇，而只能在对方的市场上购买商品，经互会内部的经贸关系缺乏价值的共同等价物^⑨。至于在与西方的贸易上，转账卢布什么职能也不能发挥，不能起到真正的货币的作用。苏经济学家施梅廖夫称转账卢布是“没有出生就死了的胎儿”^⑩。这样一来，经互会就与国际市场基本上是脱轨的。正如一位西方专家所指出的：“从发挥作用这个意义上讲，经互会不像欧共体那样是一个真正的多边组织，它只是一个双边联系的组织，其目的是协调计划，维持‘订货’。”^⑪

受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影响，经互会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的、独立的经济体系。苏经济学界所谓“国际经济机制”就是指经互会国家内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形式和方法的总和^⑫。经互会内部的，主要是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相互供销服务占了主导地位，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联系不很密

切。经互会长期对西欧经济共同体采取不承认、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直到 1988 年才正式相互承认。经互会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 60% 是在内部进行的，平均占国民收入总值的 18%。不仅能源资源，而且其他最重要的原料的 80%~90% 都是经互会内部自给自足的。苏联机器技术产品进口的近 60% 来自经互会国家，相当于经互会国家对设备、工具等投资的 35%^⑤。1981~1985 年经互会各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 44%。在外贸交易的地区结构中经互会各国相互交易的比重最高，五年间相互间商品流转总额增加了 63%，相互间的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增长幅度大致相同^⑥。到 1986 年，来自经互会国家的机器技术产品占苏联进口的 71.1%，或东欧这类产品出口的 45.8%^⑦。另外，与欧共体国家有近一半的燃料要依赖于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不同，经互会煤炭可满足内部需要的 99.2%，石油的 69%，天然气的 93%，铁矿砂的 76.7%，粗铁的 96%，黑色冶金产品的 66.3%，木材的 70%，生活日用品的 61%^⑧。自欧共体成立以来，苏东国家一直是其第三大贸易伙伴，排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美国之后；而对于苏东国家而言，欧共体是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大的贸易伙伴。经互会生产世界工业产品的 1/3，而欧共体才 17%，但欧共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达 36%，而经互会不到 10%^⑨。苏东国家的货币都是不能自由兑换的，存在着支付手段的障碍，因此它们能进口多少共同体国家的货物，取决于它们能向西方世界出口多少货物。经互会的封闭性还表现在其内部关系方面。一是以苏联为中心，在经互会贸易额中苏联的比重是比较大的（以 1988 年为例，见下表），而东欧成员国相互经济联系比较松散。

经互会欧洲成员国贸易额占经互会贸易额的比重 (%)^①

年 代	1950	1960	1970	1980	1985	1986	1987
保加利亚	3.0	4.5	6.3	5.9	6.6	6.8	6.8
匈牙利	7.9	6.9	7.9	9.2	9.5	9.7	10.5
民主德国	10.7	16.6	15.4	11.4	11.9	12.4	12
波兰	19.9	10.6	11.7	11	8.8	9.5	9.6
罗马尼亚	5.6	5.1	6.2	7.3	5.0	5.0	5.2
苏联	39.7	42.2	40.1	41.8	43.8	41.7	40.8
捷克斯洛伐克	17.3	14.1	12.2	9.0	9.3	9.9	10

由表可见，苏联的比重一般都在40%以上。苏联是经互会的核心，是东欧各国贸易的主要对象。但即便如此，经互会与其资本主义对手欧共体相比，其内部开展的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是极小的，确切地说，只占国际贸易量的1/10，而欧共体的贸易量为经互会的6倍^②。经互会的封闭性还表现在经互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都是通过政府协议，而不是企业、公司之间直接联系。到1988年只有一千六百多个苏联企业与经互会的其他成员国建立了直接的经济联系，它们的商品流通额不到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总的商品交换额的0.8%，在发展生产合作方面没有起到多少作用^③。经互会国家间订有关于直接生产联系的条约与合资企业的协议分别有1600与50个，执行的结果要么就没有完成，要么完成得不好，速度慢。其中包括1988年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企业间签订的关于直接联系的条约二百个。直接联系的企业所完成的贸易占经互会国家之间贸易的比重是很小的，保加利亚的这个比重还不到2%~2.5%^④。很显然，这种贸易方式发挥不了企业和生产者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经互会的

非市场性，封闭性还表现在经互会 50、60、80 年代的改革上。在 50 年代中期以前东欧国家都是仿照苏联经济模式。第一次改革浪潮可称之为从斯大林遗产中解放出来；第二次改革浪潮还是保住了传统的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只有第三次改革浪潮体现出了“激进改革”的势头。第二次改革已经表现出企图使经济机制非集权化。经互会国家领导打算拒绝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体系（苏联 1965 年，捷克 1966 年，匈牙利 1968 年），实行只是从上面协调管理的原则，权力下放，结果导致了 60 年代初期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苏联的七五计划没有完成。由于苏联的领导害怕改革走得太远会扩大企业的权力，导致工会更多地要求提高它们的作用并建立工人委员会，而这些无疑会危及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苏最后对改革都持反对立场^⑦。

经互会的不平衡性表现在经互会成员国基础的不平衡与需求的不平衡。经互会成立之初，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其成员国分为三类：苏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工业国家，它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工业在国民收入中占主要地位。以 1950 年社会产品的部门结构为例，民主德国为 62.9%，捷克斯洛伐克为 63.2%，民主德国还在机器制造、化学、电子、光学等部门拥有较高的科技水平^⑧。至于苏联，它在 1937 年二五计划完成后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战前其经济实力已上升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匈牙利和波兰构成了农业—工业国家类型。40 年代末，工业和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相等。其工业也没有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工业的发展水平。农民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较大，而工人的比重较小。匈牙利分别是 52.0% 和 19.5%，波兰相应是 57.2% 和 20.5%^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构成第三类国家。它们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民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保加利亚——66.2%，阿尔巴尼亚——81.7%，罗马尼亚——41.4%。在人民民主政权建立

和土地改革前，罗还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残余，在保加利亚封建土地制度更是占了主导地位。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保加利亚为 81.9%，阿尔巴尼亚为 87%，罗马尼亚为 74.1%^⑦。第一类国家希望通过经互会再上一个或几个台阶，使自己成为经济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类国家希望通过经互会使自己成为工业国或工业——农业国；第三类国家希望通过经互会使自己变成农业——工业国，甚至工业国家。各国的愿望很不相同。又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如在保加利亚和苏联生产近 100% 的电动起重机；在波兰和苏联生产 95% 的挖掘机；在匈牙利和苏联生产 80% 的公共汽车；在苏联生产 90% 的石油设备（装置）；在罗马尼亚和苏联生产 95% 以上的熔铁炉设备；在民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生产 95% 的印刷设备^⑧。因为各国生产的产品不同，需求也很不相同。经互会作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经济组织，是建立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的，明文规定经互会“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议，须得到经互会有关成员国的同意”，东欧国家反对建立一个“超国家”权力的一体化中心组织，担心影响民族经济的发展，危及国家主权。这种情绪在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经济落后国家尤甚。这样一来，经互会既不具有强制性，也不具备像欧共体那样的超国家性^⑨，也就是说，经互会本身既不是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领导中心，也不是引导一体化进程方向的机构^⑩。而国际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一个集中的强制性计划，经互会的这种非强制性必然要影响其经济一体化水平，经互会的作用受到了限制。西方有的学者称它为“充其量只不过充当了一个双边关系的情报交换所”^⑪。这里，实际上就涉及到了一个重大问题：一体化与民族经济、民族利益的关系。由于各国经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需求的差距很大，而经互会不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与苏联垂直联系的基础上，对各国也缺乏强制约束力，因此经互会很难将这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经互会的问题与苏东关系

正是由于经互会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和行政管理的基础上，忽视商品货币关系；不是建立在开放有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经济关系意识形态化；不是像欧共体那样建立在经济结构及发展水平相近、并且具有某种超国家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基础和需求很不相同、在操作上也不具备某种超国家的强制性的基础上的。经互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很好地迎接科技革命的挑战，尤其是70年代以后，经互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1. 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了，经济效益差，外债沉重。

70年代以前，经互会国家的发展曾经有过高速度，甚至还快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由于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政治热情，有大批以前的农民和小生产者进城参加到工人阶级中来，增加了新的劳动力，又是实行的粗放经营方式的结果^②。当时国际上石油、原料的价格也比较便宜。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也与当时各国经济的超低发展水平有关。

70年代以来，由于战后初期刺激经济发展的某些动力消失了，粗放经营使经济增长达到了饱和状态；国际市场上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保护关税，限制进口，国际市场缩小了，美国有意识地哄抬贷款利息，提高美元汇率，这对于国内极端缺乏能源且内部市场非常狭小的东欧国家来说不啻于一次沉重的打击^③。特别重要的一点是：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兴起的新科技革命，经互会国家没有能抓住机会，迎头赶上去，实现由粗放经营（数量）向集约经营（质量）的转化，以致于发展速度慢下来，差距拉大了。如在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总产值两个方面，经互会国家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1976～1980年；1981～1985年）的增长速度分别是：36%、22%、17%，46%、26%、

18%。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量增长的速度下降了，如1950~1960年，从20%上升到36%，10年时间内上升了16%；1961~1985年，1/4个世纪才上升了4%，人民的实际收入也下降了^⑧。国民收入中工业的增长，保加利亚从1966~1970年的10%下降到1976~1980年的6.8%，相应的，匈牙利从7.5%下降到4.65%，民主德国从6.5%下降到5.1%，波兰从8%下降到2.3%，罗马尼亚从12.5%下降到9.4%，捷克斯洛伐克从6.1%下降到3.5%，苏联从8.7%下降到4.9%^⑨。从国别来看，1975年以后，苏联失去了对美国的速度优势。美国经济效益比苏联高。如苏联钢的成材率只有70%多，比美低10%。生产同样多的机器，在钢—钢材—机器的生产过程中，苏联每年比美多损耗钢3000多万吨^⑩。这样，虽然苏钢产量超过美国，但所生产的金属工业品却比美国少。据苏联官方统计，苏联社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40%，工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55%（美统计只有41%）。苏联的农业投资额是美国的5倍，农业劳动力是美国的6倍，然而其主要农作物谷物和肉类只及美国的51.42%和34.6%（1982）。苏联官方承认其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20%~25%（美统计只11%）^⑪。根据苏联经济学家博洛金的统计，1987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为美国的3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30%，苏联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只为美国的25%，农业劳动生产率只为美国的9%^⑫。苏联在80年代前半期几乎每年都要花巨额外汇进口粮食。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还优于苏联，农轻重三者比例比较协调，对外经济影响能力也比苏联大得多。又拿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比较，民主德国劳动力占总人口的53.8%，联邦德国劳动力只占总人口的44.2%；可是民主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只及联邦德国的49%。1988年，民主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500亿马克，而联邦德国为21220亿马克，民主德国只约相当于后者的16%；民主德国人均国民收入为9306美

元，而联邦德国为 15881 美元^⑳。同时，在形势的逼迫下，经互会国家开始把贸易关系也转向西方，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往来增加了。1965~1975 年，经互会国家与西方的外贸额增长了 4 倍，从 100 亿美元到 500 亿美元。在经互会国家对外贸易的总额中，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从 1970 年的 23.7% 上升到 1980 年的近 30%。相应地，在匈牙利，从 24.8% 上升到 34.8%（1981 年）；在民主德国，从 25.9% 上升到 27.4%；在波兰，从 27.1% 上升到 29.2%；在捷克斯洛伐克，从 22.4% 上升到 23.0%；苏联从 1970 年的 21.2% 上升到 1983 年的 30.1%，即从 47 亿卢布上升到 384 亿卢布^㉑。但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机器、设备多，出口占主导的却是原料、初级产品。经互会出口到欧共体的机器技术产品只占其向欧共体出口的 5%，而欧共体出口到经互会的工业产品则达 60%^㉒。又由于向西方大量借贷，经互会国家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逆差和欠西方的外债日益严重。仅 1974 年，经互会国家对西方的贸易逆差分别是：波兰——14 亿美元；匈牙利——4 亿美元；捷克斯洛伐克——1.18 亿美元^㉓。据统计，到 1975 年，经互会欧洲七国的硬通货外债是 320 亿美元，而到 1986 年底，已高达 1119 亿美元。其中，苏联——312 亿美元，波兰——392 亿美元，匈牙利——151 亿美元，民主德国——125 亿美元，保加利亚——47 亿美元，捷克斯洛伐克——37 亿美元，罗马尼亚——55 亿美元^㉔。东欧经济最发达的民主德国对西方的债务增长得很快。如果说 1980 年为 133 亿美元，那么 1989 年为 216 亿美元^㉕。沉重的外债包袱不可避免地要给经互会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阻碍作用，何况大借外债也没有使波、匈等东欧国家与国际市场接轨。由于经济制度不同，东欧国家也缺乏支付手段，加之有苏联的控制，东欧国家不可能加入国际市场体系，从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经互会组织的相对封闭性质。同时，东欧国家从西方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引起了苏联的不满。经互会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于西方国家，

并且差距在扩大。以 1950~1970 年两大集团的国民总产值为例，若论发展速度，20 年来（1950~1970 年）东方集团（包括苏联东欧）增长了接近 2 倍（从 238 亿美元到 686 亿美元），而西方集团（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和日本）增长不到 1 倍半（从 922 亿美元到 2254 亿美元）。两者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东方集团的发展水平原来只有西方的 1/4，但到 1970 年却为西方集团的 30%。但如果从国民总产值的绝对量来看，差距却扩大了：从原来的 684 亿美元到 1970 年的 1568 亿美元^⑤。同时由于照搬苏联模式，经济部门的发展也极不平衡，1950~1985 年，经互会国家工业生产总共增长了 13 倍，其中机器和设备的生产却增长了 35 倍^⑥，造成了国民经济部门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2. 内部矛盾突出，相互贸易减少。

内部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苏联与经互会东欧成员国之间的，主要围绕着商品的价格、质量、数量、金融体系等方面展开；一类是经互会内部以苏联为代表的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专业化生产的安排，及科技合作、共同开发等方面。

苏东矛盾首先表现在能源价格和数量方面。苏联是东欧能源的主要供应者。到 60 年代后期，苏称它的能源储备连国内都无法满足，也无法到国际市场上赚取硬通货，更无法填补东欧的能源缺口。70 年代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苏联抱怨东欧付给自己的价格大大低于国际标准，要求改变以前实行的基本上是固定的价格，改为以前五年世界市场平均价格为基础，每五年调整一次价格，以后又改为一年调一次。苏联从石油调价中得利，引起了东欧国家的不满^⑦。如 1974 年经互会国家购买苏联的石油每桶付 15~16 卢布，从 1975 年起就得付 36~38 卢布，折算成西方的价格，即意味着每桶从不到 3 美元到 6 个多美元。该年苏联给经互会国家提供的石油为 5730 万吨，经互会国家得向苏联付款 22 亿卢布，比上年多付 13 亿卢布或 45 亿马克。仅民主德

国（1500万吨）就得多付给苏联17亿东德马克^⑳。但即便如此，苏联向东欧出口的石油价格还是低于国际价格（每桶10美元左右）。据一位学者分析，1984年东欧购买苏联石油支付的实际价格大大低于世界市场的60%。苏联强调，向东欧出口石油遭受的损失比出口到国际市场要大得多。苏联每年获得的80%以上的硬通货靠的是能源出口^㉑。苏联有的学者认为“东欧剥削苏联，因为与它们的合作是建立在対苏联不利的基础上的”^㉒。同时，还出现了能源数量问题上的矛盾。按照经互会的协议，苏联在1990年以前应充分满足经互会欧洲成员国对能源的需求。但苏联在1980年宣布，苏联在1981~1985年期间只能供应东欧国家4亿吨石油，比原来许诺的减少了20%；1982年，苏联政府又宣布在此基础上再削减20%，东欧国家大为不满。苏联与东欧的矛盾还表现在其他商品的价格方面。东欧时常指责苏联压低进口商品的价格，抬高出口商品的价格。早在50年代，波兰的哥穆尔卡就曾指责苏联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进口波兰的煤，使波兰经济遭到损失，直到苏联向波兰补偿22亿卢布才作罢。又据一位美国学者关于苏联对东欧和对西方的两种官方销售价格的研究（这项研究包括1957~1958年的48种基本商品和1959年的50种基本商品），按照国际价格计算，苏联剥削了东欧，东欧国家多支付给苏联的数额是：1957年——1.04亿美元；1958年——1.62亿美元；1959年——3.5亿美元，1960年——3.77亿美元^㉓。1965年，民主德国计委主任阿佩尔为了抗议苏联向民德高价销售它们的商品、使民德有可能遭到300亿马克的财政损失的企图而开枪自杀^㉔。据另一位西方学者的统计，1945~1956年，苏联总共大约从东欧经济中搜刮了20亿美金^㉕。

按照经互会内部的国际分工原则，苏联生产电动起重机、挖掘机、公共汽车、石油设备（装置）、冶金和矿石开采设备、轿车、拖拉机、农业机器和金属切割机床。保加利亚生产交通一起重设备，其中包括电动小车、电动卡车、电动起重机、马达、食

品设备和液压设备。匈牙利生产公共汽车、载重汽车和轿车的主要部件、工具、机床和农业技术。民主德国主要生产轮船、车厢、农业机器及冶金和化工设备。波兰生产轮船、内燃机和车厢、交通机械和化工设备、农业机械、金属切割机床。捷克斯洛伐克向经互会国家出口载重车、动力设备及食品和纺织工业设备^⑩。生产的国际分工与专业化，造成了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与此同时，供货与需求之间经常发生矛盾。由于供货的质量问题而经常相互指责。苏联批评捷不履行合约，产品质量差，延误供货，致使苏联一些工程项目不能按时投产，捷反过来抱怨同苏联的合作使捷的机械产品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因而丢掉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市场，减少了外汇收入。匈牙利政治局委员涅尔什·雷热公开对苏联表示不满说：“我们（指匈与苏联）之间有这样的争论。甚至领导人一级也应该进行争论。不能指望在数量、质量以及价格上避免争论。我们之间这种争论是有的。”^⑪匈还认为自己的钢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是因为苏联供应的铁矿砂质量太差，把责任推到苏联身上。据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977年10月29日的报道，波兰和匈牙利可能设想参加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被苏联否决。但后来匈牙利还是提出申请要求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防“苏联经济伞漏雨”^⑫。捷克抱怨苏联石油涨价。苏联对保加利亚也有不满，说保把高精产品卖给西方赚取外汇。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同齐奥塞斯库就互供产品质量低劣而互相指责。罗马尼亚和波兰不愿把粮食卖给经互会市场，而去卖给西方市场赚取外汇^⑬，使苏联与经互会其他成员国既眼红，又不满。经互会事实上变成了各国相互推销次品的市场。更有甚者，有些国家（如波兰）把苏联“援助”或从苏联便宜买来的石油或粮食又转手销往西方，赚取黄金和美元，使苏联领导人大大为恼怒^⑭。苏联也强迫东欧国家高价购买其“软商品”（质量次商品），以补偿据称由于便宜出售能源而蒙受的损失。东欧国家被迫向苏联大量提供低息贷款，

以帮助苏联开发国内能源储藏。苏联还要求东欧用可兑换货币和高质量（“硬”）商品支付一部分能源。即便如此，苏联还是两次（1982年，1991年）把主要出口给东欧的石油转向国际市场，以补偿其硬通货收入的下降。但是，一些东欧国家也有对付苏联的办法，通过暗示该国家存有某种地缘政治上不稳定的迹象，迫使苏联以石油换取自己的“软商品”，甚至赤裸裸地向苏联索要石油、美元。波兰的卡尼亚就曾经这样干过^⑭。

经互会内部的矛盾还表现在经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以苏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代表，欠发达国家以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等为代表。经互会国家成立国际经济合作银行，法定资本为3亿转账卢布。缔约各方分摊的法定资本股金（份额），根据它们在相互贸易中的出口总额规定如下：

保加利亚——1700万卢布	匈牙利——22100万卢布
民主德国——5500万卢布	蒙古——300万卢布
波兰——2700万卢布	罗马尼亚——1600万卢布
苏联——11600万卢布	捷克——4500万卢布

苏、捷、民主德国三国占总额的72%^⑮。在生产国际分工和专业化问题上，经互会倾向于使发达国家发展工业，欠发达国家发展农业。民主德国等发达国家希望以现有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得到更多的机会^⑯。那些经济欠发达国家坚决反对。它们强调国家主权、民族经济，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其中以罗马尼亚态度为最激烈，它坚决反对自己永远充当经济发达伙伴的原料“供应者”的角色。罗发表文章说：“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旨在建立自身具有代议性质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发生着作用，其决议要参加国立即执行，不再需要参加国政府机关的决定。这类形式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严重损害各国的主权职能，严重损害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独立的完全实现……”^⑰又说：“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追随某些现代资产阶级经

经济学家的‘理论’，这个理论说，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首先应该发展机械化程度不太高的农业，或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轻工业部门，实际上，这些理论追求的是要维持这些国家的落后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属地位。”^⑩经互会企图把罗的经济导向农业，而罗并不愿永远充当一个进口机器设备的农业国。罗强调经互会的任务是“缩小”和“拉平”成员国之间的差距。罗计划在加拉蒂地方搞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赫鲁晓夫大不以为然，反应冷淡^⑪。保加利亚的经济结构和水平与罗马尼亚相近，它们在经互会内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也随声附和道：“社会主义一体化的发展要在本国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作得不要太快，不应该使各国的民族利益和人民的感情受到损害。”^⑫赫鲁晓夫想把阿尔巴尼亚变成一个靠海的美丽的旅游之地，而阿领导人想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强国。苏联的建议极大地刺痛了阿领导人的自尊心^⑬。由于欠收，1960年，阿要求苏联提供5万吨小麦，等了45天没有结果，最后阿不得不用硬通货从法国购买小麦。苏联要求阿支付黄金^⑭。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从1962年经互会第15次例会时起，阿就被非法排斥在经互会会议之外，阿从此不再参加经互会的活动。对于科技活动、科学发明商品化的倾向，保加利亚表示反对，认为这有利于较发达国家，而不利于欠发达国家，从而不利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⑮。东欧各国的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不愿因经互会的约束而损害自身的利益。发达国家潜意识里认为欠发达国家拖了自己的后腿，沾了自己的光，如经济比较落后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发展速度是经互会中最快的，匈牙利也比较快，发达国家中只有民主德国的发展速度要快一些^⑯。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结构与民主德国很相似。它们认为经互会的约束妨碍了其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而恼火，并为经互会内部的国际专业化要考虑到各国的利益平衡而大失所望。因为经互会从未超越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双边或多边条约的界线，而这些条约只是就有限的产品设计和产品

标准化达成协议。经互会内各国的专业化生产是独家经营，其他国家不得进行竞争性生产。这对于有较高工业化程度和生产率优势的国家是不利的，何况经互会在资金等方面还要优先照顾欠发达国家^⑳。在经互会内部，苏联本身处于一种比较矛盾的双重地位：对于东欧不发达的成员国来说，苏联充当了经济发达国家的角色，因为苏联也生产了不少尖端产品；对于东欧较发达的的成员国来说，它又充当了原料供应国的角色，进口大量机器设备，使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带有很强烈的发展中国家的色彩。据匈1973年《人民自由报》报道，匈向苏联出口的68%是工业品，而从苏联进口的62%是原料和半成品^㉑。从民德进口的也大多是先进设备。80年代以来，由于经互会内部的矛盾，对苏联与经互会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带来了不良影响。苏联的出口以燃料、原料商品为主，而进口则以制成品、机器和设备为主。这种商品交换结构对于苏联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苏联同盟国经济关系的发展遇到了障碍：商品流通额有下降的趋势，在相互核算中不平衡增加了，出现了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债务^㉒。苏联与匈牙利商品流通渠道的不灵活，使双方对于发展新的经济往来不感兴趣。这导致了双方贸易额的下降。1987年为97亿卢布；1988年为94亿卢布；1989年，估计是88亿卢布^㉓。苏联与民德的贸易额也在下降，1985年为152亿卢布；1989年估计只有137亿卢布^㉔。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额也从1987年的136亿卢布下降到1989年的125亿卢布，1990年进一步下降^㉕。

3. 东欧对苏联经济的依赖。

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1) 苏联是世界上幅员最大的国家，又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它拥有全世界铁矿储量的40%，锰矿储量的80%，石煤储量的60%，石油储量的33%，天然气储量的40%，木材储量的65%。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之一，很多产品的生产居于世界前列。(2) 在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指经互会国家）

中，苏联占工业总产量的 75%，农业生产的 60%，国民收入的 70%，资本投资总量的 80%，经互会科技潜力的 3/4，社会主义阵营面积和人口的 90% 与 69%。以 1976 年为例，在经互会国家某些商品的总产量中，苏联所占的百分比分别是：原油——96.3%，铁矿——96.4%，生铁——77.1%，粗钢——72.9%，谷物——74.3%，水泥——68.1%，电力——5.3%，天然气——86.2%，煤——52.2%^⑳。依靠苏联的供应，经互会国家基本上满足了自己对石油和生铁的需要，石油产品、金属轧材，磷肥需求量的 3/4，棉花、石煤和铁矿的 3/5，铁矿的约 90%，木材的近 80% 均为苏联提供。60 年代，苏联主要向经互会国家出口以下三类商品：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燃料、电力；矿产、金属及其制品。这些商品在苏向经互会国家出口中的比重，1960 年为 59.8%，1970 年为 60.9%。70 年代，由于国际市场上燃料、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苏联向经互会国家出口燃料和电力的比重增加了：1970 年为 14.6%；1975 年为 26%；1980 年为 39.7%；1985 年约为 50%^㉑。苏联的机器设备在发展经互会国家的能源、冶金、化学工业、交通、农业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的贷款对于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具有很大的意义。以 1985 年为例，苏联与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在工业和设备方面的贸易中处于出超地位（单位：百万美元）^㉒。（见下表）

国家	出口	进口	差额
保加利亚	1353.8	3146.2	-2792.4
匈牙利	588.8	2511.7	-1922.9
民主德国	901.4	5175.1	-4273.7
波兰	744.6	2735.9	-1961.3
罗马尼亚	365.4	904.9	-539.5
捷克斯洛伐克	659.3	3971.2	-3311.9

同时，苏联还是东欧各国最大最可靠的商品销售市场。苏联甚至还是这些国家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产品以及农产品的主要购买者^⑭。正因如此，在经济方面东欧对苏联的需要程度大大高于苏联对东欧的需要程度，再加上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增强，形成了东欧各国对苏联经济的依赖。以波兰为例，1945～1970年期间，苏联供应了波兰7000万吨石油，约4000万吨石油产品，1.4亿多吨铁矿，近170万吨棉花。也正是依靠从苏联进口，波兰满足石油和天然气需要的95%，铁矿需要的85%，有色金属需要的55%，棉花、木材需要的60%^⑮。1981年苏联向波兰提供6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达40亿美元。苏联通过特殊装运，向波兰提供它急需的原材料，从而使波兰更加依赖于苏联^⑯。波兰有一份材料说，即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波兰人“不怕坦克”，就怕苏联“关闭石油输送管道”。又如民主德国，它从苏联购进大量原料，如无烟煤、焦炭、黑色及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棉花、肉类、植物油脂，它很难找到另外的可靠的原料供应国来替换苏联^⑰。再如，过去罗马尼亚是参加经互会活动最少的国家，它们之间的贸易额从占罗贸易的70%下降到40%，但两伊战争爆发后，罗马尼亚为了满足石油需要不得不寻求苏联的援助。1981年11月，齐奥塞斯库无可奈何地抱怨说：“我们提议（苏联集团）党的领导人会晤……但被告知，兄弟党反对这样做，因为他们有其他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但我们认为，对共产党来说，这里不可能有比经互会中的合作更为重要的事情。”^⑱匈牙利报纸也发表评论说：“苏联是我国最重要的外贸伙伴，占我国整个对外贸易的35%。我们向苏出口的工业成品占对苏出口的68%，而我们从苏进口的62%是原料和半成品。这对我们是多么重要。举几例来说：切佩尔钢铁厂4/5的原料来自苏联。我国经济结构改革纲领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匈苏合作。”^⑲1990～1991年，苏联能源出口量大幅度下降和价格上涨对东欧国家带来了“能源冲击”。捷克斯

洛伐克总统哈维尔指出，这次能源危机给他的国家带来了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问题：“石油不仅仅是生意和钱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定。”保加利亚总理也断言，“1991年在与石油供应有关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将面临最严峻的困难”。总之，事实表明，“能源冲击”使东欧国家短期内陷入了混乱^⑬。由于苏联在经互会内的实力地位，东欧国家对苏联经济的依赖，苏联实际上控制了经互会，并利用该组织为自己谋取民族利益。苏控制东欧国家的战略原料和稀有金属，捷、匈、东德、保的铀矿几乎全部为苏联所控制。匈盛产铝土，但苏联不准匈发展炼铝工业，而是低价收购铝土，再向匈供应铝锭。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希米亚中部和摩拉维亚南部铀矿丰富，其中9/10都送给了苏联，由苏联专家领导开采、运输和勘探工作。只有苏联自己拥有资料，这些资料对捷克的同行也是严格保密的^⑭。凡苏联能大量生产的机器设备，就不许其他成员国生产，或迫其压缩生产。例如，东德被迫放弃传统的飞机、拖拉机和大气缸汽车制造工业，匈牙利被迫放弃普通卡车和收音机制造工业。在价格问题上，苏有时也不顾“兄弟情义”，攫取高额利润，如苏联卖给东欧一些国家的原子反应堆，价格比国际市场高4倍^⑮。经互会内，苏联在双边或多边的国际贸易公司中起主导作用。经互会的总部设在莫斯科，俄语为经互会的工作语言，转账卢布是以苏联卢布为基础的，1969年经互会组织设立的国际科学和技术情报中心也设在莫斯科，苏联利用经互会排挤不听话的阿尔巴尼亚，而拉进与自己关系改善的南斯拉夫（1965年）。苏联利用东欧国家的资金和劳动力来开发苏联本身的资源和从事建设事业，如《1976~1980年经互会成员国多边一体化措施协调计划》规定：苏联和其他成员国共同建设10个项目，其中在苏联领土上有8个。10个项目的总预算为90亿转账卢布，由苏东国家承担各半。在苏联境内的项目建成后，所有权归苏联，东欧各国只按投资比例获利。东欧各国，既包括经济较发达国家民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

国，也包括经济较不发达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派遣了成千上万的熟练工人，包括到苏联度假的大学生到苏联各地从事各项建设，如开发资源、架设输电线路、铺设铁路、建造住宅和收割庄稼，等等^⑬。在苏东共建项目中，规模较大、耗资较多、参加国最多的是“友谊”输油管、“和平”电力网和“兄弟”输气管等项工程。

总之，经互会的成立对于对抗马歇尔计划，防止东欧的离心倾向，使东欧国家把传统的贸易方向从西方转向苏联，发展和保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解决东欧国家的能源和市场问题，提高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迅速取得成果，避免重复研究与资源浪费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苏联作了巨大的牺牲，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既是经互会组织成立和存在的基础，使经互会成为联结苏东的一条纽带。同时，经互会的使用也是一步步加深的，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再到科技领域；从双边关系到多边关系。经互会也在不断地调整、改革、开放，如1987年，经互会第43次（非常）政府首脑会议在决定继续使用转账卢布的同时；规定欧洲成员国（除民主德国、罗马尼亚）的货币可以相互自由兑换。后又毅然宣布自1991年元旦起实行自由兑换外汇，国际市场价格，企图向自由市场经济迈出重大的一步。

但是，与其资本主义对手欧共体（现为欧洲联盟）相比，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欧共体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各国平等，内部人员、资金、技术、商品、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并且是鼓励技术和经济的公平竞争的。而经互会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的，以苏联为核心，内部不存在竞争。欧共体对外贸易大进大出，是开放的，与国际市场接轨；而经互会的经贸活动主要限于内部，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体系，与国

际市场不是接轨的。欧共体的组织机构享有一部分相当大的权力，并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权限范围内欧共体机构通过的法令要高于各国的法令，各成员国政府和议会必须服从，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欧共体的决策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就使欧共体能发挥比较有力的协调作用。而经互会建立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实行全体一致原则，这就使其功能的发挥受到了限制。这种非强制性的特点使经互会很难将民族利益与国际利益，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欧共体各国经济结构、经济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需求相同或相近，而经互会国家经济技术水平严重的不平衡，需求的差距很大，两者虽都是经济政治一体化组织，但经互会的政治色彩更重一些，各国经济民族主义也更厉害得多。随着经济的国际合作趋向的进一步发展，经互会愈来愈满足不了市场的挑战。经互会本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和政治同盟的基础上的，随着经济问题的暴露，其成员国经济发展的新的要求，内部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多，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随着 1989 年的东欧剧变，联结苏东集团的这条经济纽带自然也就维系不下去了。

注 释：

① 参见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 367 页，华东师范大学 1993 年版。

② (苏) 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 268 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③⑤ 《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第 36、127、155、180、208、234、261 页，莫斯科，1955 年版。

④ 《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关系与欧洲安全问题》，第 260 页，莫斯科，1977 年版。

⑥《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经互会》，第134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⑦见经互会秘书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体系中的苏联》，第13页，莫斯科，1986年版。

⑧《苏联与波兰：国际主义联系——历史与现实》，第2卷，第276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⑨（苏）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188~189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⑩（美）凯尔迪什：《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第263、2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⑪经互会秘书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体系中的苏联》，第13页，莫斯科，1986年版；参见（美）凯尔迪什：《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第2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⑫经互会秘书处：《经互会：问题与答案》，第7页，莫斯科，1986年版。

⑬A·格拉波夫斯基：《社会主义一体化的潜力》，（苏）《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87年第2期，第14~16页。

⑭（苏）《国际生活》1985年第3期；参见杨家荣：《经互会四十年：成就、问题与前景》，《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1期，第2页。

⑮（苏）A·塔拉索夫：《经互会成员国1981~1985年经济状况述评》，（苏）《经济问题》1986年第9期。

⑯参见（苏）《共产党人》1979年第3期；1985年第4期；《经互会》，第21页，莫斯科，1984年版；Ю·И·别良科夫：《世界经济中的经互会国家》，第50、67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4年版。

⑰（苏）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188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⑱V·契尔文科夫：《保加利亚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前进》，《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49年第6期，第10页。

⑲路德威克·波尔：《友好和互助关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0年第6期，第69页。

⑳㉑㉒《苏联与民主德国的关系 1949~1955年·文件与材料》，第7~10页，苏联外交部、民德外交部编，1974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4年版。

㉓《离开真理哪里也不去 关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新材料》，（俄）《肯塔弗尔》1993年第4期，第85页。

㉔《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4期，第79页。

㉕经互会秘书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体系中的苏联》，第15页，莫斯科，1986年版。

㉖参见刘邦义著：《哥穆尔卡评传》，第20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B·И·沃罗科夫：《1980~1981年波兰事件：老广场的观点》，（俄）《历史问题》1995年第10期，第101页。

㉗勃·佳金、勃·班科夫：《经互会：一体化问题》，第93页，莫斯科。

㉘路德威克·波尔：《友好和互助的关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0年第6期，第69页。

㉙经互会秘书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中的苏联》，第14~16页，莫斯科，1986年版。

㉚克·米尔库里斯基：《经互会合作的新阶段》，第115页。

㉛经互会秘书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体系中的苏联》，第16页，莫斯科1986年版。

㉜（美）理查德·弗·司塔尔：《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美）《当代史学》1978年第4期。

㉝《苏联与波兰：国际主义联系——历史与现实》第2卷，第277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8年版。

㉞《苏联的对外政治活动和外交活动（1985年4月~1989年10月）》，（苏）《国际生活》1989年第12期，第71页。

㉟《社会主义年代的罗马尼亚 1948~1978》，第12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㊱经互会秘书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体系中的苏联》，第9页，莫斯科，1986年版。

㊲《苏联与波兰·国际主义联系——历史与现实》第2卷，第262、277

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③④ 经互会秘书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体系中的苏联》，第20～21、15页，莫斯科，1986年版。

④ 《经互会基本文件》，第5页，莫斯科，1981年版。

④ (苏)《经济互助委员会——25年》，第186～187页，1974年版。

④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0年第6期，第93页。

④ (苏)《苏维埃贸易报》1973年3月27日。

④⑦ A·戈拉波夫斯基：《以统一方针通向共同目的（致经互会第40次会议）》，(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85年第9期，第6、8页。

④ B·卡宾多诺夫、奇·伊奥尔丹诺夫：《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科技领域的一体化》，(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87年第1期，第108页。

④⑨⑤ 苏共中央社科院社建经验交流所：《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阵营的经验——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第130、100、99页，莫斯科，1987年版。

④ 参见莫斯科《经互会成员国的经济合作》。

⑤ 《巨大的发展——1959年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几点总结》，《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0年第5期，第112页。

⑤ 胡燕芬：《经互会国家合作和一体化的作用、问题和发展前景》，《苏联东欧问题》1990年第2期，第14页。

⑤ O·巴科维茨基等：《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的经验和前景》，(苏)《苏联历史》1986年第4期，第5页。

⑤ (美)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36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 (苏)P·叶夫斯基格涅耶夫：《经互会国家的经济机制和一体化》，(苏)《经济问题》1986年第1期。

⑤ (苏)《世界经济与政治》1981年第1期，第85页。

⑤ 关于经互会的国际市场价格，参见(苏)B·斯涅波夫：《经互会国际市场价格》，(苏)《经济问题》1987年第7期。

⑤ (苏)《新世界建设者的联盟：经互会30年》，第27页，新闻出版

局，1979年版。

⑥ 黄宗浩译：《苏联二次大战后的外交政策》，第239页，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

⑦ 参见经互会秘书处：《经互会》，第24页，莫斯科1986年版。

⑧ 《苏东国家逐步调整各国经贸发展战略》，《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5期。

⑨ 卢传敏：《东欧剧变与经互会的命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年第6期。

⑩ (苏) P·叶夫斯基格涅耶夫：《经互会国家的经济机制和一体化》，苏《经济问题》1986年第1期；转引自《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7年第3期，第91页。

⑪⑫ 苏共中央社科院社建经验交流所：《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阵营的经验——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第97、103页，莫斯科，1987年版；参见经互会秘书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体系中的苏联》，第9页，莫斯科，1986年版。

⑬ (苏) A·塔拉索夫：《经互会成员国1981~1985年的经济状况》，(苏)《经济问题》杂志1986年第9期；《苏联东欧译丛》1987年第2期，第64页。

⑭ B·Г·佳根：《经互会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合作的战略方向》，第5页，莫斯科，1988年版。

⑮ 胡燕芬：《经互会国家合作和一体化的作用、问题和发展前景》，《苏联东欧问题》1990年第2期，第75页。

⑯ 见经互会秘书处：《经互会1988年统计年鉴》。

⑰⑱ (意) 卡·奇波拉：《欧洲经济史 第六卷·下册·当代国际经济》，第205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⑲⑳ B·M·沙思季特科：《经互会国家——直接联系和商品货币手段》，第27、36~37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㉑ ADAM,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60S, MACMILLAN PRESS, 1989. 转引自(俄)《国外社会科学·历史》，1990年第5期，第88~89页。

⑦⑧⑨⑩ 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莫斯科1989年版，第50、56、61、273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⑪ B·格尔比奇里科夫：《致经互会第40次会议》，（苏）《国际生活》，第18~19页。

⑫ 参见苏《经济互助委员会——25年》，1974年版。

⑬ Г·格奥尔基涅夫：《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第124页，莫斯科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

⑭ 经互会秘书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体系中的苏联》，第10页，莫斯科，1986年版。

⑮ 《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经济合作》，第30页，莫斯科，1981年版；《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合作》，1986年第2期，第109页；参见苏共中央社科院社建经验交流所：《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阵营的经验——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第8页，莫斯科，1987年版。

⑯ 苏共中央社科院社建经验交流所：《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阵营的经验——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第99页，莫斯科，1987年；参见Ю·Н·别良科夫《世界经济中的经互会国家》，第63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4年版。

⑰ 《两种制度的竞赛：幻想与事实》，（苏）《美国》1978年第5期。

⑱ 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参见陈佩尧：《北约战略与态势》，第1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⑲ （苏）《论据与事实》1991年第26期。

⑳ 见世界银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第1卷，英文版，1990年第4~5期。

㉑ Ю·Н·别良也夫：《世界经济中的经互会国家》，第248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4年版。

㉒ 苏共中央社科院社建经验交流所：《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阵营的经验——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第103页，莫斯科，1987年版。

㉓ （英）《卫报》1975年4月17日；英《国际商情内幕》1976年2月17日。

㉔ （美）《纽约时报》1988年3月16日；另根据杨家荣：《经互会四十

年：成就、问题与前景》，《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1期，第5页提供的数字计算。

⑳ A·B·巴达波夫：《80年代民主德国的危机和德国的统一》，（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5期，第139页。

㉑（意）卡·奇波拉：《欧洲经济史 第六卷·下册·当代国际经济》，第194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㉒ B·卡弗尼洛夫：《经互会国家在机器制造领域的合作》，（俄）《经济问题》1987年第5期，第131页。

㉓ 参见（美）J·布朗：《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第43~44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㉔（西德）《新德意志报》1975年2月18日。

㉕（美）约翰·克莱默：《东欧和1990~1991年的“能源冲击”》，（美）《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91年第5~6期。

㉖（苏）《苏联历史》1991年第1期，第44页。

㉗（美）凯尔迪什：《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第2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㉘（西德）《世界报》1971年4月28日；转引自王文修：《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经互会》，第293~294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㉙ 黄宗浩译：《苏联二次大战后的外交政策》，第239页，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

㉚ B·格尔比奇里科夫：《致经互会第40次会议》，《国际生活》，第8~19页。

㉛ 新华社布达佩斯1972年4月27日电。

㉜（美）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36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㉝ 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3期，第90页；《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4期，《波兰》一节。

㉞《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4期，第79页。

㉟ 参见（美）约翰·克莱默：《东欧和1990~1991年的“能源冲击”》，美《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91年第5~6期；参见B·И·沃罗科夫：《1980~

1981年波兰事件)，(俄)《历史问题》1995年第10期。

⑩《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重要文件选编》，第334～3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⑪参见(美)C·布雷德利·沙尔夫：《民主德国的政治与变革》，第194页，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⑫《合作与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代》第9期；转引自王文修：《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经互会”》，第247～248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⑬(罗马尼亚)《经济问题》第7期，转引自王文修：《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经互会”》，第249页，三联书店，1978年。

⑭(法)卡特琳·迪朗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第8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⑮萨科夫、斯托伊洛夫：《保加利亚与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1974年版。转引自王文修：《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经互会”》，第292～293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⑯(苏)费奥尔多·布尔拉茨基：《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第8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⑰佩罗·兹拉塔尔：《霍查政治传记》，第246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⑱(保)阿罗约：《国际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1974年版。

⑲杨家荣：《经互会四十年：成就、问题与前景》，《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1期，第1页。

⑳参见(美)C·布雷德利·沙尔夫：《民主德国的政治与变革》，第193～194页，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㉑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73年8月19日。

㉒㉓㉔㉕《苏联的对外政治活动和外交活动(1985年4月～1989年10月)》，(苏)《国际生活》1989年第12期，第69、70、71、73页。

㉖(美)理查德·弗·司塔尔：《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美)《当代史学》杂志1978年第4期。

㉗(苏)阿·布科夫：《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第140页，

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7年版。

⑳ B·卡弗尼洛夫：《经互会国家在机器制造领域中的相互作用》，（苏）《经济问题》1987年第5期，第140页。

㉑ Г·格奥尔基涅夫：《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第117～118页，莫斯科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

㉒《苏联与波兰：国际主义联系——历史与现实》，第2卷，第278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8年版。

㉓㉔（美）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369、36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㉕（美）C·布雷德利·沙尔夫：《民主德国的政治与变革》，第193页，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㉖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73年8月19日编辑部文章：《为了共同的目的》；转引自王文修：《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经互会”》，第286页，三联书店，1978年。

㉗ 约翰·克莱默：《东欧和1990～1991年的“能源冲击”》，（美）《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91年第5～6期。

㉘（西德）《总汇报》1974年8月21日。

㉙《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0日。

㉚《俄国人从东欧抽调成千上万名劳动力》，（英）《每日电讯报》1975年4月9日；1975年4月11日塔斯社莫斯科电。

第四章 华沙条约与苏东关系

华沙条约是 1955 年苏联与其东欧盟国（不包括南斯拉夫）在华沙签订的。华沙条约很明显是一个典型的军事政治组织。它是维系苏东同盟的一条有力的纽带同时也是苏联控制东欧的重要工具。在华沙条约存在的 36 年间（1955～1991 年），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由于华约对东欧各国发展的制约、束缚而引起了一些国家人民的不满和反抗。

一、华沙条约的积极作用与苏东关系

华约国家通过华约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巩固东欧社会主义的成果，在国防、外交诸领域进行合作，协调苏东内部关系，提高东欧各国军事实力和军事地位。作为与北约相抗衡的军事政治集团，华约是维护欧洲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制约因素。

（一）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巩固东欧社会主义的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共同的敌人的消失，反法西斯同盟开始瓦解。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骤然上升。美国抛出了“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苏联以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制定“莫洛托夫计划”相回应。世界进入了建立在雅尔塔体系基础上的冷战时代。1949 年西方成立了以美国为首的集体军事政治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约的建立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直接回答，但从 1949 年北约出现到 1955 年

华约问世，其间相隔6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一个集体的军事政治组织。可见华约的建立更直接的原因是对把联邦德国纳入北约的反应。1954年2月，苏联在柏林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全欧条约草案，规定相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其参加者是全体欧洲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美国作为特例参加。苏这一建议得到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但为西方所否定^①。3月，苏甚至表示愿意同有兴趣的国家商讨苏参加北约的可能性，希望把北约变成一个吸收它国参加的、开放性的国际组织，并挑拨美与其盟国的关系，阻止联邦德国加入北约^②。同年10月，西方国家通过了巴黎协定，把西德纳入了北约和西欧联盟，允许西德组建一支50万人的武装力量，可以使用除了原子、化学和细菌武器以外的一切武器^③。苏东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苏警告说：“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和把一个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西德拉入军事联盟的计划，只会使欧洲局势复杂化。这些计划的实施必然会引起欧洲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如果爱好和平的欧洲各国人民迫不得已而采取保障他们的安全的新措施，那将是十分自然的。”^④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了措辞十分强硬的讲话：“我们很明白，巴黎协定一旦批准之后，西德就要走上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并且就会实际上为德国复仇主义分子所控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巴黎协定就是用来反对这些国家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真诚地爱好和平，然而他们也高度地警惕着，决心捍卫自己的社会主义成果……”^⑤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并建立军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集团最终形成。11~14日，苏、波、捷、民主德国、匈、罗、保、阿等8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脑在华沙举行会议，缔结了8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称华沙条约。这样，在欧洲形成了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的局面。可见，华约的成立是被动的、防御性的，是对北约及其吸收联邦德国的强烈反应，是直接为了保卫社会主

义阵营国家的安全，巩固社会主义的成果不受侵犯。

华约的有效范围只限于欧洲，不包括苏联的亚洲部分。华约的军事力量由东欧六国军队和苏联驻在欧洲部分的军队组成。华约的成立最初更多的是具有某种政治宣传意义，更有利于保卫东欧。在华约以前，苏联与所有东欧国家的政府（阿尔巴尼亚除外）均签有双边条约，这些条约为各国一旦受到攻击时接受苏军的援助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各国军队之间也还有某种协调关系。但没有一个包括整个地区的综合性条约。苏军驻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期限问题，受1947年苏联与这两个国家签订的和约的限制，其驻扎期限应以签订对奥地利和约三个月为限。华约的签订使苏军长驻这两个国家合法化^⑤，否则苏军早就应该撤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了。华约的成立还使苏联军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阿尔巴尼亚。由于该约旨在对抗联邦德国有可能重新侵略，因而确实符合东欧国家的利益。对波兰来说，该约是支持奥德—尼斯河边界线的一大后盾；对民主德国而言，是保障其独立和主权的坚强支柱；对东欧其它国家而言，苏军的存在为共产党政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⑥。东欧国家需要华沙条约，这突出地表现在波匈反对苏军撤出和1958~1961第二次柏林危机上。

1956年的波兰危机是对华沙条约的第一次考验。苏联最担心的就是波兰退出华约。因为这样就会卡断苏联与民主德国之间的咽喉。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在坚持波兰独立道路的同时，强调苏波友谊。当赫鲁晓夫气呼呼地不邀自来华沙，并以武力威胁波兰时，哥穆尔卡沉着地对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请求您下令苏军停止前进。您想一想，你们是否需要波兰人民的友谊？我作为一个波兰人和共产党员发誓，波兰需要俄罗斯人的友谊甚于俄罗斯人需要波兰人的友谊。难道我们不明白，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吗？我们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你们也不要使苏联军队进入华沙，因为那时事态就难以控制了。”哥穆尔卡的这一段讲话使赫鲁晓夫放下心来，苏军停

止了前进^⑧。同时，哥穆尔卡郑重声明：“我们对外政策不可动摇的准则，现在是，并且始终不渝地是我们同苏联结成的兄弟联盟和友好情谊，这是我们的安全和独立的决定性保证。”^⑨批评一部分人的反苏言论和情绪是“沙文主义”，“不开化的民族主义和夜郎自大”。为了表示相信兄弟国家，不给帝国主义以苏联控制东欧的口实，减少苏联驻东欧军队的庞大费用，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国际形势的缓和，赫鲁晓夫曾经向卡达尔提出过从匈牙利撤出苏军的问题，卡达尔回答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自己决定吧！我只能告诉您，我们这儿现在没有关于驻有你们国家的军队的谈话。没有任何消极情绪。匈牙利人只担心一点，那就是你们把拉科西放回来。”赫鲁晓夫还同哥穆尔卡进行了类似的谈话。对方坚决反对。赫鲁晓夫只打算在民主德国保留苏联军队^⑩。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是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的第一次直接对抗。对以苏联为首的华约而言，是要通过西柏林条约解决民主德国的主权问题，并把西方势力赶出西柏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针锋相对。形势一触即发，双方坦克相对。西柏林的空气异常紧张。1961年3月，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局势的复杂性，表示“决不在帝国主义侵略压力面前退缩”，会后，华约成员国开始加强战备。8月，华约莫斯科会议通过了封锁柏林边界的决定。13日，东德政府发表白皮书，为封锁边界辩护。该书中还包括华约的一项声明，要求东德在整个西柏林周围部署“可靠的警卫队并实施有效的管制”，认为这是一种制止“来源于西柏林的异端分子活动”的手段^⑪，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柏林墙的出现。柏林危机最后是和平解决的，这说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并不想为此而诉诸武力，不得不承认苏联的两个德国政策，不得不承认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军事力量的现实存在。华约的存在保障了东欧国家边界和领土的不受侵犯，保卫了东欧人民的和平劳动^⑫。为此，苏联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勃列日涅夫承认，如果不是不得不花费大量的开支在国防上，在巩固华沙条约体系上，

苏联人民会生活得更好些。仅为这些目的的正式开支就占苏联年预算的 23%，还不包括非正式拨款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⑬。

（二）协调华约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和内部关系

华约是冷战的产物，从一诞生时起就处在国际斗争舞台的中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军事政治组织，作为连结苏东的一条纽带，既协调其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声调、步调一致，同时也协调其内部关系。《华沙条约》明文规定：“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武装进攻，每一缔约国应……以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国家或几个国家给予援助。”^⑭政治协商委员会是华约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由各国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组成，研究、解决最重大的国际事务问题，协调相互立场，以及内部共同的重大的利益问题。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是协调华约活动的中心，通过它来实现对华约一切活动的共同领导，尤其是在迫切的国际问题上协商和制定共同的立场和倡议^⑮。1969年，成立国防部长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就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建议研究采取共同的措施，以及其它一切需要相互协商的问题。1976年又成立了外长委员会和联合秘书处，每年召开2次，讨论落实由政治协商委员会提出的倡议的具体步骤，促进华约对外政治活动的协调，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华约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联系^⑯。50年代末、60年代初，华约成员国多次召开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就与国际事件相联系的各种问题交换意见，制订对策。华约反复声明，它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某种战略意图，除非是防御性的……”^⑰在国际舞台上，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在联合国大会上，在中东问题上，在柏林问题上，在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在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在削减战略武器和裁军问题上，在赫尔辛基会议上，在中东欧和两德建立无核区问题

上，在反对西方对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问题上，苏东都保持同一个声音，同一个立场（罗马尼亚在个别问题上例外）。1968年苏联侵捷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予以谴责，扬言要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东欧国家支持苏联阻挠把捷克问题提交联合国的行动，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也拒绝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⑬。华约国家还帮助了亚非拉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如亚洲的越南、老挝，非洲的安哥拉，拉美的古巴，以及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的斗争。正如勃列日涅夫说的：“华沙条约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协调兄弟国家之间对外政策的主要中心。”^⑭以便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与西方阵营相抗衡。

与此同时，华约也协调其成员国的内部关系。东欧国家重大的外交内政决策通常需要在华沙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获得认可。《华沙条约》明文宣布缔约国各方“将本着友谊和合作的精神，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⑮。1976年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发表宣言，强调华约国家要在文化领域内加强相互合作，呼吁要加强文化创作团体和城市之间的接触，扩大艺术交流、旅游联系和公民之间的交往。1978年，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再一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使其合作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的需求，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思想、文化活动等极其广泛的内容。扩大经济建设的经验交流，增加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群众性社会团体之间的接触，扩大和加深经济关系的需求显著地加强了。会议声明华约国家之间在科学、文化、教育、信息、无线电和电视、人民的交往和旅游等方面成功地发展了双边或多边的合作，表示希望继续扩大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以便提高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1983年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继续强调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发展和加深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为和平和进步事业共同努力。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一致强调了加强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必要性^⑯。通过华约，还协调了各成

员国的防务政策和军队建设^②。在实践中，通过华沙条约用各种手段来协调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如苏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的关系，表现得比较明显^③。

（三）加速东欧各国军队的现代化，提高了东欧各国军队的战斗力和军事地位

东欧六国的军队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创建的。波、捷、匈、罗等国的军队是由大战时在苏联建立的正规军和国内游击队（罗包括起义的旧军队）合编而成的。保加利亚军队是以战时游击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也包括部分经过改造的旧军队）。民主德国军队则以原“驻营人民警察”为基础，于1956年改编而成。战后，由于罗、保、匈和民主德国都是轴心国，军队的发展受到了国际条约的限制，因此，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安全主要是由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来维护的。1949～1953年苏联按照自己的组织形式对东欧各国军队进行了改革，在人事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苏军官代表团接管了东欧军队的参谋工作，苏还给东欧各国军队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武器和装备。1953年，东欧军队的兵力已达150万左右，据估计有65～80个师，其中有一半训练和装备比较好，在战斗中能起一定的作用^④。但总的来说，东欧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水平，及其在苏联的战略意图中评价不高。从1955年华约成立到1960年柏林危机期间，华约在军事一体化方面有了一些进展，按苏联的标准统一了武器和各地区武器生产的规格，采取了苏联的组织形式和野战理论，大概地规定了各个成员国军队的军事任务。在裁军方面也有过一些合作，如1958年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批准部分裁减兵员和撤兵，还改善了东欧各国的联合防空办法^⑤。但是，苏联并没有作出重大努力使华约成为一个紧密的军事联盟，没有举行过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司令部基本上有名无实。这一时期，苏

联人更重视的是它的象征性的政治作用，而不是它的军事协作。1961年柏林危机以后，苏联对华约的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苏开始把东欧军事力量纳入自己总的战略轨道，提高东欧成员国的军事作用在苏联总的部署中的重要地位；扩大东欧军队的任务，使其在防空方面，进而在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地区战中共同起更积极的作用；并加速成员国的联合训练和重新装备。一方面，经常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提高作战能力和指挥能力；另一方面，推行军事“一体化”政策，主要包括武器装备一体化，军工生产一体化和军工规划一体化，提高东欧武装部队的现代化水平，注重武器的更新换代，如坦克，轰炸机等^⑤。苏联不仅要为东欧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还要转交生产这些武器的技术和文献材料，并同东欧一起共同进行科研和实验设计工作^⑥。在帮助东欧军队的现代化方面，苏联承担了主要责任^⑦。东欧的军官，包括大多数高级军官在内，都曾在苏联受过训练，其武器与苏军的武器是统一标准化的。“此外，苏联军事院校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等教学人员，被派到华约成员国去，军事院校在互派代表团。”^⑧华约遵循共同的一苏联的军事战略理论、军事建设和军事技术政策为共同的军事理论和原则，即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军队建设^⑨。东欧各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基本都在苏联受过教育，民主德国师以上的军官，匈牙利团以上的军官一般都在苏联军事院校受过训。各国的国防部长、副部长、总参谋长（罗马尼亚除外）多数也在苏联受过培训。自华约成立以来，苏联为东欧各国培训了数千名将军和军官，这批人是各国武装部队的骨干力量，起着重要的作用^⑩。东欧军队的战斗力和现代化水平提高了。联合军事演习使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演习的最重要科目就是部队进攻的高速度、大纵深、立体化。在“战斗情谊—80”的军事演习中，华约部队3天就向前推进了300公里；在“盾牌—76”演习中，华约部队在不到13分钟的时间里就在宽160米的奥德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北约曾担心地预言，如果华约闪击北

约，那么用不了几周的时间，华约的部队就会到达英吉利海峡^①。虽然苏联的武装力量在华约中占了绝对的优势，但华约的联合军事演习有时也由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的著名将军指挥。从1962年至1980年华约军事演习都是在演习地点所在国武装部队部长的指挥下进行的，东欧人的指挥权也并不限于比较高级的军事人员，作战部队一级的指挥权也并不是总操在苏联人手中^②。这说明东欧武装部队在华约中的军事地位和发言权有了提高。至1988年，华约总兵力为357.3万人，以苏式武器装备为主，全部实现了机械化^③。华约还组织了两支特殊部队：联合武装部队和一体化部队。这都有利于提高东欧各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

（四）华约是欧洲稳定与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华约作为欧洲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表现在：东欧国家内部的矛盾，以及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矛盾，由于要服从于两大敌对的军事政治集团的斗争而受到了抑制；华约强大的武装力量的现实存在对北约是一个抗衡力量，北约不敢轻举妄动，从而维护了欧洲力量对比的平衡，华约提出了一些关于维护欧洲和平与稳定的很好的倡议，推动了欧洲形势的缓和；华约对北约搞军备竞赛的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使北约不敢为所欲为。这方面可分为几个阶段^④。

从1955年华约建立到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华约的成立实际上是对西方成立北约军事集团和把联邦德国纳入北约的反应，因此它确实是防御性的、被动的集体军事政治同盟。在这一时期，华约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实力方面都与北约有很大的差距^⑤。华约反复声明，它不想取得军事优势，但也不允许别人取得军事优势^⑥。

1956年华约布拉格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提出创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取代欧洲的两大军事集团。1957年，波兰提出建

立中欧无核区的建议，得到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的支持。1958年华约莫斯科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提出在北约和华约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⑳，但没有得到北约的响应。1960年在华约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了苏联裁减武装部队的措施。1963年，华约通过决议支持苏、美、英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华约多次抨击北约国家在裁军问题上缺乏诚意，并企图使联邦德国掌握核武器，从而给欧洲和平与安全带来了威胁^㉑。从实际效果来看，华约是北约唯一的抗衡力量，北约不得不考虑到华约力量的现实存在。这一点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第二次柏林危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尽管匈牙利宣布中立，退出华约，并向联合国寻求保护，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除了口头抗议外，并未敢贸然出兵^㉒。1958~1960年第二次柏林危机，尽管苏美坦克甚至在柏林边界线上对峙了一整天，但柏林危机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㉓。这充分说明，在核战争年代，两大军事集团谁也不敢冒险发动一场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战争。北约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与华约必须以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从60年代中期到1975年召开赫尔辛基会议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华约的变化。华约在经济领域努力缩小差距，在不少军事领域甚至超过了北约。苏联利用这一良机一方面扩军备战，扩大华约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频频发动和平攻势，逼美国作出让步。1966年，华约布加勒斯特会议就欧安会问题发表《加强欧洲和平与安全宣言》。3年后，华约首脑会议又向欧洲各国发出呼吁，要求尽早举行欧安会。1970年苏与联邦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接着波兰也与联邦德国建交，联邦德国承认奥德—尼斯河边界线。1971年苏美英法签订西柏林条约，双方在这一敏感问题上达成了妥协。1972年两德基础条约签订，互相承认为主权国家。苏美还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多次谈判并达成协议。在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的推动下，欧安会

首脑会议终于于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与会各国元首、政府首脑签署《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其主要内容为：（1）不以武力改变战后边界（实际上等于从法律上承认了两德边界线和奥德—尼斯河边界线）；（2）建立加强相互信任的军事措施。具体规定：在距边界250公里以内，有25000人以上参加的军事演习，必须提前21天通知与会国家^④。文件还规定了人员和思想交流的问题。《最后文件》宣布欧安会的宗旨是“促进欧洲和平、安全、正义和合作”。该文件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毕竟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国际形势缓和的气氛。为了贯彻执行赫尔辛基会议的精神，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倡议同时解散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并同时停止华约的第9条和北约的第10条的作用，即不再接收新的国家进入两大政治军事集团^⑤。在这一阶段的1968年，曾经发生了华约五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但是，西方首先是美国没有强烈的反应，把它看成是苏联的“家务事”^⑥。在杜布切克执政的最初几个月，美国保持沉默，没有表示些许同情。美国的行动在最危急的关头也是比较谨慎的，甚至比1956匈牙利危机时期更谨慎。“美国持沉默政策，以各种方式表明自己与此事无关。”^⑦西方对“布拉格之春”事件的反应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署标志着北约承认了华约的势力范围。

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在西欧部署先进的火箭战略武器，也由于苏联方面的责任，引发了美苏之间激烈的军备竞赛（有人称之为“新的冷战”），对欧洲局势的稳定与和平带来了消极的影响^⑧。

1985至1991年华约解散为又一个新阶段。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新思维”，认为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在欧洲问题上提出“全欧大厦”的思想，放松了对东欧各国的干涉和控制，允许华约成员国在外交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戈高呼裁军、和平，把华约会议作为发动政治攻势的讲坛。1985年10月，华约最高级会议签署了《为消除核威胁和争

取欧洲与世界局势好转的宣言》，坚决支持苏联提出的旨在防止空间军备竞赛、结束地面军备竞赛以及把苏美军事力量冻结在现有水平上的各种建议^⑥。这次会议还把发展与西欧相互关系的内容写进了声明。1987年苏与美签订销毁“中导”的条约，受到华约国家普遍欢迎。同年通过的《关于华沙条约国家军事理论》的文件声明华约永远不对别国首先采取军事行动或首先使用核武器。为了表示诚意，苏撤除了部署在民主德国和捷克的核武器。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宣布，苏决定在1991年以前从民主德国、捷、匈三国撤出并解散6个坦克师，驻扎在这些国家的苏军将削减5万人，减少5000辆坦克。继苏之后，东欧华约成员国纷纷宣布裁军和削减军事开支^⑦。1989年华约通过了具有明显防御目的的军事学说，提出了“合理足够”原则。华约多次提出同时解散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组织，以政治手段解决安全问题。在“新思维”条件下，苏不仅把华沙条约看作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欧洲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是裁军、广泛的国际合作、生态和人权合作的有成效的工具。华约逐渐从以军事为主的军事政治组织向以政治为主的政治军事组织过渡^⑧。

二、华沙条约的问题与苏东关系

华沙条约固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在华约中，苏联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联通过从军事上控制华约而控制了东欧国家，并且对东欧国家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利用华约为自己谋取民族私利，从而引起了东欧国家的不满和反抗。

1969年成立的国防部长委员会是华约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由各国国防部长、华约联合司令部总司令、总参谋长等人构成，主要任务是协调华约国家的军事行动，研究共同的军事政策。苏联国防部长是主席。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是华约组织的军事指挥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和加强华约组织的国防能力，负责对华

约武装部队的领导，解决训练、装备和调动等问题。由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担任总司令并兼任联合武装部队军事委员会主席。各国国防部长或其他军事领导人任副总司令。联合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是联合武装部领导下的指挥机关和国防部长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其总参谋长由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担任，并同时兼任联合武装部队第一副总司令。华约联合秘书处秘书长也由苏联人担任。这样，国防部长委员会、联合司令部、总参谋部、秘书处和军事委员会等要害部门均由苏军将领把握，且其总部都设在莫斯科。除了正式的华约机构外，苏联国防部还派“代表”参加到每个华约成员国的武装部队中去。在战时，这些军官可以变成最高统帅部总部的“代表”，直接传达克里姆林宫的命令^④。华约部队经常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些演习基本都是按照苏联的军事思想和要求进行的。在华约东欧成员国发表的军事著作中，都无一例外地引用了苏联理论家或高级军官的话，而在苏联的军事著作中则从来找不到任何人从非苏联的著作中所引用的话^⑤。1962年，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公开提出，为了进行联合作战，“可由社会主义各国的兵团和部队组成战役军团。这些战役军团可由苏军最高统帅部指挥”^⑥。据西方学者的研究，苏联总参谋部甚至要决定以下问题：华约“每个师驻扎地点，捷克斯洛伐克人应生产多少坦克，波兰人应制造多少枪炮和飞机，匈牙利人应供应多少卡车和由哪一部队来接受”^⑦。另外，华约条文对其成员国的约束是很强的：（1）各成员国保证不参加其它对立的联盟；（2）没有规定退出条约的手续^⑧。

大量苏军驻扎在东欧（分驻德集群、北方集群〔波〕、中部集群〔捷〕和南方集群〔匈〕）。80年代初期，苏联在东欧驻军共30个师，其中民主德国19个师，捷克5个师，波兰2个师，匈牙利4个师^⑨。苏联是华约国家中唯一掌握着核武器（原子弹）的国家，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丰富的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因此，苏联在华约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华约实际上为苏

联所控制。华约从起初意图上的主要对外（在欧洲抗衡北约）发展为实际生活中的主要对内（维护苏联模式）。这就引起了东欧国家的不满和反抗。为了论述之便，本文把东欧国家分成几种类型分别加以论述。

（一）波兰、匈牙利

1956年波匈事件是华沙条约处理内部问题的第一次考验。波匈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民族性格中反抗性极强；有仇俄的历史传统。都同属于华约中战略地位比较重要的北翼国家^⑤。在1956年的事件中，它们都受到了华约（苏联）的威胁；之后，两国都与苏签订了双边条约。1956年12月苏波签订了关于暂驻波兰的苏联军队的法律地位的条约；1957年5月，苏匈签订了关于苏联军队暂驻匈牙利境内问题的协定。这两个条约或协定都明文规定苏军在它们驻地以外进行活动均需得到驻在国政府的同意^⑥。当赫鲁晓夫考虑到苏联不堪军费负荷之重，不给西方以攻击口实，而准备从波兰和匈牙利撤走苏军时，哥穆尔卡和卡达尔都表示不同意^⑦。他们都强调与苏联的友谊的重要。1968年，两国追随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东欧剧变就是这两国肇其始；它们积极推动华约的解体，是中欧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创始成员国，迫切要求并第一批加入北约。

不同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程度不同：波兰只是受到了苏联的武力威胁；而匈牙利则遭到了苏的武力镇压。后果不同：波兰加强了军队的民族性；而匈牙利军队则遭到了改组；1980年波兰又一次危机，华约重演了武力威胁的戏；而匈牙利卡达尔的“小步改革”却为苏联所容忍。

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虽然最后在波兰政府军的干涉下平息了，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情绪却越来越强烈了。为此，该年10月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一致推荐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关进监狱的哥穆尔卡参加中央委员会。由于此事没

威望。斯彼哈尔斯基等人制定并执行的军队改组计划和教育计划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过去，包含了民族自治的内容^⑤。但是，作为政治家的哥穆尔卡极为重视波苏关系，他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波兰官员和军队高级军官发表任何反苏言论。他曾将公开要求苏军撤出波兰的三名将军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⑥。这说明虽然表面看起来，华约在波兹南事件过程中的直接作用不大，但华约的威慑作用是时刻存在的。十多年以后，历史再一次重演。1980年以来，波兰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工人罢工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社会各阶层卷入广。党和政府多次改组，出现了团结工会。在波兰国内局势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苏联对波兰施加了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华约军事入侵的魔影一度笼罩在波兰的上空。1980年12月，苏联召开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着重讨论波兰局势，强调波兰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牢固的一环”，“可以坚定地指望得到华约缔约国的兄弟声援和支持”；“大家庭每个国家阶级利益的国际化是现今的客观规律”，“大家庭”有责任保卫它们的“社会主义成果”^⑦。苏联还“提请”波兰党和政府“注意反苏主义的加剧已经达到了危险的边缘”，坚决“要求结束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发生的蛮横无理的反苏行径”，否则就会给波苏关系“造成巨大的损害”。与此同时，华约联合武装总司令、苏联元帅库里科夫率队前往波兰活动。据雅鲁泽尔斯基回忆，1981年，他同库里科夫会面22次。他开玩笑说，同库里科夫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和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⑧。华约还加强了在波兰边境的军事演习和调动。据西方军事人员判断，苏已经从东西南三面并从海上形成了对波兰的军事包围，完成了从陆上和海上入侵波兰的准备^⑨。但1981年的波兰不同于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80年代的国际形势也不同于60年代。在苏联的支持下，雅鲁泽尔斯基实行军事管制，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稳定了波兰的局势，暂时克服了危机。军政当局不断强调：“加强波兰与苏联的同盟关系，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波

兰国家的不可动摇的立场。”^⑧苏联直接出兵干涉的危险性才算过去了。

匈牙利事件在时间上是与波兹南事件相衔接的。1956年10月23日在布达佩斯发生的声援波兰的学生示威游行中，提出了撤走驻匈苏军、政治生活民主化等要求。示威者同前来镇压的保安部队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第一次出动坦克和部队镇压示威群众，这不仅引起了布达佩斯全市的总罢工，在首都与匈牙利全境，到处都是匈牙利军队与武装的平民并肩战斗反击苏联的坦克，只有保安部队站在苏联军队一边^⑨。在季里扬军营，匈牙利部队在马莱泰上校的指挥下成功地抵挡了苏军的进攻。苏军进展甚微^⑩。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党和政府都进行了改组，由卡达尔出任党的总书记，纳吉出任总理。苏军随即撤出了匈牙利。10月28日，纳吉发表电视讲话，改变了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称之为群众性的人民民主运动，而不是叛乱，宣布解散军队和国家保安机关，开始同起义者谈判，并以军队和起义队伍为基础组建新的武装力量^⑪。11月1日，纳吉就苏军重新入境问题向苏驻匈大使提出抗议，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和奉行中立政策，并打算向联合国申诉。苏联不能容忍，逮捕了谈判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成员，并向布达佩斯发动了军事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大约有4000名匈牙利军民在事件中遇难。由于力量对比太悬殊，匈牙利的反抗在7-9天时间内就被镇压下去了。苏联方面的代价也不小。在战斗中牺牲了669名士兵，1450名受伤，还有51名失踪^⑫。纳吉政府被推翻。苏联扶植了卡达尔新政权。匈牙利事件酿成了全民族的悲剧。到1956年11月份，在匈牙利领土上的苏联军队已达6万人^⑬。

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其实早作好了出兵匈牙利的准备。他招来华沙条约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问他整顿好匈牙利的秩序需要多长时间？科涅夫回答说需要三天。赫说：“回去作好准备，随时听候命令！”然后征求了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

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的意见。它们都表示同意苏联对匈形势的分析（“反革命危险”）和处理意见（苏联出兵干预），唯哥穆尔卡认为苏联既不应出兵，也不应从匈撤军，而应等匈工人阶级自己起来推翻本国的反革命政府。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想以自己的军队参加同苏军的共同行动。但赫鲁晓夫拒绝了，因为仅驻匈牙利的苏联军队就够了，不需要其他人参加^⑭。赫鲁晓夫还不辞劳苦，于1956年11月2日飞往南斯拉夫与铁托会谈，商讨匈牙利局势。铁托也赞同苏联出兵匈牙利^⑮。华沙条约在事后被利用来为苏联使用武力作辩护的根据。在以后的近2年时间内，华约基本上没有进行什么活动。

匈牙利事件平息后，纳吉任命的国防部长马莱泰与他一起被处死。匈牙利军队遭到了清洗和改组。卡达尔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清洗与新政府敌对和政治上不可靠的军官。新政府发布《军官宣言》，要求签字的所有军官同纳吉分子进行斗争，承认苏联军事帮助的必要性，无条件地完成新政府的各项命令。有80%的军官签署了该宣言，不愿意签字的20%的军官被开除出军队。为此，在军队中成立了专门检查委员会，极大地促进了这项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揭露和开除在1956年事件中“表现不良”的军官。同时，政府把那些“表现得好的”将官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加强党对军队的影响，提高党在武装力量中的领导作用^⑯。匈军队的士气低落，数量也减少了^⑰。1957年5月，苏匈签订了关于苏联军队暂驻匈牙利境内问题的协定，苏联军队暂时进入匈牙利境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触犯匈牙利主权，不干涉匈牙利内政^⑱。在卡达尔执政期间，苏匈关系一直较好。1968年捷克事件，1980年波兰事件，匈牙利都站在华约和苏联的一边。1989年剧变以后，苏匈关系发生了变化。匈积极参加了推动华约解体的活动并首批加入了北约。

（二）捷克斯洛伐克

捷也是华约中的北翼国家，其战略地位对于华约和苏联来说很重要。1968年苏、波、民主德国、匈、保等华约五国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华约集体干涉其内部的一个盟国内政的最明显的表现，也是华约与其成员国矛盾最集中的爆发。其根源就在于新上台的杜布切克等人要搞捷克斯洛伐克特色的社会主义，很不符合苏联的口味，威胁到了苏联模式在捷的统治地位，从而威胁到苏联在捷的战略利益。苏先后在华沙搞了华约五党会谈，在切尔纳举行苏捷两党会谈，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六党会谈，对捷施加政治、外交和经济压力，发表最后通牒式的《华沙会议信件》和《布拉迪斯拉发声明》，谴责了捷共对在捷领土上的反华约活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宣称保卫社会主义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国际主义义务”⁷⁹。捷共没有屈服于威力。在波、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的积极支持下，苏联决定以武力改变捷的发展方向。

其实在苏出兵以前，捷苏之间在华约内部就存在着矛盾。在华约集团中，像其他东欧成员国一样，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没有独立性，关键部门都有苏联军官，它的装备和技术设施（如军事通讯联络、密码等等），苏军不仅熟悉，而且是由他们控制的⁸⁰。1968年初，捷国防部长普尔赫利克中将向来布拉格的华约总司令、苏联元帅雅库鲍夫斯基提出要求说：“希望也给我们发言权，重要职位要实行轮换制。”不久，他就被撤职了⁸¹。历史学家维·古纳尔谈了不久前才公布的若干事实。例如，苏联元帅阿·格列奇科和伊·雅库鲍夫斯基1968年4月25日要求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置于华沙条约组织军事指挥部的直接控制之下⁸²。5~6月，华约军队未经捷同意就在捷境内和捷边境多次举行军事演习⁸³。为准备华约侵捷，苏联大将C·什捷缅科被新任命为华约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⁸⁴。1968年8月，华约五国部队约23万人

(其中苏联 17 万，波兰 4 万，民主德国 1 万 2 千，匈牙利 1 万，保加利亚 5 千) 闪电式地入侵和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⑤。考虑到现实的力量对比和军备状况，捷党和政府号召人民放弃武装抵抗，而进行非武装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抵抗。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声明，表示仍然拥护杜布切克；捷国民议会提出抗议，谴责华约部队的入侵“违背了国际法、华沙条约的规章以及各国间权利平等的原则”。如果说 1956 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受到了“以卡达尔为首的匈工农革命政府的邀请”的话^⑥，那么苏军出兵捷克却未受到任何人的“邀请”^⑦，苏把杜布切克等人绑架到莫斯科进行“会谈”。在苏的高压下，发表了苏捷会谈公报，把苏军占领说成是“盟国军队”“暂时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捷原无苏军，这样一来，苏联开始在那里驻扎军队。以后双方又签订了《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条约》。与 1956 年苏波条约和 1957 年苏匈条约相比，该条约是苛刻的：这两个条约规定苏军在它们的驻地以外活动需经驻在国政府同意，而苏捷条约则无此项规定；对布拉格被占期间的任何损失，也不给予任何赔偿^⑧，还规定“苏军编制人员及其家属进入、留驻或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时，免受护照或签证检查”，苏军人员和一切军用物资，包括为苏军提供的商业、生活服务用的物资，“在通过捷国境时不征税、不受海关检查和国境检查”^⑨。这样实际上使苏军的占领合法化了。1968 年苏侵捷事件对捷人民军有直接影响，捷军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苏新扶植上台的胡萨克对军队进行了整顿，清洗了其中的“机会主义分子”^⑩，苏还曾要求削减捷部队人数的 1/3^⑪。

捷克人民从未放弃过反抗和斗争。1969 年 1 月，一个青年大学生扬·帕拉赫为了抗议苏军的占领，在布拉格纵火自焚。8 月，在苏军入侵一周年时，群众游行示威要求苏联撤军。捷人民称那些不请自来的苏军为“占领者”，以致苏甚至贴出文告禁止这个称呼^⑫。苏军也只好尽量避免同当地居民接触，以免引起公

愤。苏联出兵捷克引起了华约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坚决谴责了苏联的军事入侵行为，要求苏联撤军。阿还借此退出了华约。东欧剧变后，捷也积极参与了推动华约解散的活动，成为维谢格拉德集团的重要成员，积极要求并第一批加入了北约。

（三）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

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华沙条约组织的缔约国；同属于华约国家中的南翼国家，位于巴尔干半岛，战略地位不如北翼国家重要；又都是非斯拉夫民族；它们都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但均为典型的苏联模式国家；在华约中与苏联的关系不那么融洽，阿尔巴尼亚最后甚至退出了华约，罗马尼亚在华约内经常发出不和谐之音。还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点：那就是虽然苏联在华约内对阿和罗实行排斥或遏制政策，但都没有像对待北翼国家中的匈捷那样动用军事手段，甚至像对待波兰那样的武力威胁手段都没有。当然，两国的具体情况并非完全相同。

阿尔巴尼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原来没有苏联的驻军，华约成立后，阿的天然良港——发罗拉为苏联海军在中南欧提供了活动的基地。由于阿尔巴尼亚地小人少，与苏联又没有共同的边界，容易为苏联所忽视，又直接面对北约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所以，一方面它在国家安全方面非常需要得到帮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居于受人冷落的地位。在最初拟定华约成员国名单时，莫洛托夫没有把阿列入。他的理由是：“阿尔巴尼亚距我们太远，与我们连不上。我们没有共同的边界。它只是南斯拉夫的邻国，我们只有经过南斯拉夫才能与阿尔巴尼亚发生陆地上的联系。”而当时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已经破裂。“为什么我们要把阿尔巴尼亚弄进去？西方能够侵犯到它，它处于强大的敌人的软腹部，而我们不能给它以帮助。因此我认为不应该包括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反驳说，这不等于告诉西方国

家，阿尔巴尼亚你们可以拿去吗？后来在赫鲁晓夫的争取和说服下，才把阿尔巴尼亚列入了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名单^⑤。即便如此，在匈牙利事件中，赫鲁晓夫还是忽略了阿尔巴尼亚人，他征求了所有东欧华约成员国对出兵匈牙利的意见，唯独忘了征求阿尔巴尼亚人的看法^⑥。从1960年开始，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矛盾，影响到了苏阿的军事合作和阿在华约内的地位。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曾在华沙条约总参谋长会议上攻击过阿尔巴尼亚，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格列奇科元帅曾威胁要把阿开除出华沙条约^⑦。1961年赫鲁晓夫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谴责美国在希腊设置军事基地威胁苏联的盟国保加利亚，故意不提阿尔巴尼亚^⑧。由于两国关系的恶化，在发罗拉基地和潜水艇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⑨。苏联撕毁了根据华约承担的义务装备阿军队的双边协定，把发罗拉基地的12艘潜水艇中的8艘撤离阿的领海，开往苏联塞瓦斯托波尔“维修”^⑩。从1962年起，阿实际上被排斥在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和华约国防部长委员会会议之外，阿军也不再参加华约的联合军事演习，但从来没有正式开除过。1968年华约五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予以谴责：“华沙条约不再为社会主义与和平服务，不再为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服务，它丧失了它原有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并正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解除了自己对华沙条约的一切义务^⑪。赫鲁晓夫不愿因为阿而破坏好不容易有所缓和的国际局势，不愿因为阿而进一步降低苏联军队的名声，阿是小国，影响有限，苏此时已不认为它是富有吸引力的势力范围，且阿仍为典型的苏联模式的国家，所有这些因素使阿幸免了苏联的武力入侵。

罗马尼亚与苏联是邻国，历史上有比萨拉比亚领土之争，四周又处于斯拉夫民族的包围之中，民族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特别强烈。罗马尼亚原是法西斯轴心国，武装力量的发展受到了国际条约的限制。在1958年7月以前，罗境内有苏联驻军。罗在

华约成员国中最早提出要求撤走驻罗苏军。赫鲁晓夫吃惊地问：“为什么？那不是要被我们的敌人利用吗？”罗共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回答：“敌人在哪？我们四周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借道于社会主义国家，入侵是不可能的。”“那黑海呢？土耳其呢？北约可以经过土耳其入侵。”“要知道苏联就在旁边。”^⑩经过长期的考虑后，赫鲁晓夫认为应该从罗马尼亚撤走苏联军队。因为一则苏联在西部边境部署的军队是很多的；苏军从罗撤出后，如果一旦需要，仍然可以迅速地给罗马尼亚以军事帮助，同时又表明了苏联对罗马尼亚的信任^⑪。这样，1958年5月，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宣布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7月，苏军从罗马尼亚撤出。与其他东欧国家一味对苏联在解放它们国家中的决定性作用歌功颂德不同，罗党两任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和齐奥塞斯库高度评价了罗马尼亚人民和罗马尼亚军队在反对本国法西斯独裁者和外国纳粹侵略者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⑫。但他们两人有所不同。乔治乌·德治是华沙条约的缔造者之一，并在匈牙利事件中积极要求与苏一起出兵；而齐奥塞斯库更倾向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罗在华约内部，常有不和谐的表现。1966~1967年罗马尼亚提出两个建议，一是苏联使用核武器前应与盟国协商；二是最高司令职务不应由苏联人垄断，而应由非苏联的军官轮流担任^⑬。多年来，罗马尼亚军队只参加华约的参谋人员演习（即图书作业），不参加联合实兵演习。罗反对华约部队在罗境内举行军事演习，华约部队也从未在罗境内举行过联合实兵演习。罗还是华约国家中把义务兵役制期限从二年减到一年半的唯一的国家^⑭。罗公开要求取消军事集团。罗还暗示了与苏的领土问题（比萨拉比亚）。1974年，苏多次向罗提出，希望在罗境内的多布罗加地区开辟一条供苏联军队通过的军事走廊；并主张在华约中增加关于在紧急情况下华约部队可以穿过其成员国领土的条文，罗坚决拒绝了苏联的要求^⑮。1968年8月，罗大国民议会针对苏联以华约的名义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发表声明指出：

“华沙条约组织不能以任何理由，在任何情况下和以任何形式对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军事行动。”^⑧捷克事件后，罗加强它的正规部队和民兵以防御外敌入侵。1970年2月罗又重申：“（罗马尼亚）党、政府、全国最高司令部是我国武装力量的唯一的领导者。只有它们才能给我国军队下达命令。”^⑨多年来，苏联一直压各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但罗从1983年就决定冻结其国防开支，并主张华约国家单方面把军费开支削减10%~15%，呼吁美苏进行核裁军，谴责它们在西欧和东欧部署导弹的行径。尽管如此，罗从来没有打算退出华约，也没有参与推动华约解体的行动。相反，1975年和1985年罗两次要求延长华约期限。东欧剧变后罗要求加入北约。

罗在华约内与苏联有很多矛盾，苏虽对其进行了遏制，但并没有动用武力手段，而基本上是持容忍的态度。究其原因，一则是因为它们的矛盾仅限于国家间关系和对外政策领域，并不触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个根本问题，罗仍是典型的苏联模式国家；二则罗的战略地位不是太重要，三面被苏东国家挟持，一面与南斯拉夫接壤。三则罗与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关系都比较好，苏担心贸然入侵会使其步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的后尘。

（四）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

因这两国对华约和苏联的忠诚态度而划为一类。这两个国家既有明显的不同之点，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民主德国是德意志民族和文化的继承者之一，历史上是俄罗斯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保是斯拉夫民族，历史上文化上与俄罗斯关系亲近；民主德国是所谓的“北翼”国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保是“南翼”巴尔干国家，战略地位重要性不如前者；民主德国是在华约创立第二年才被批准加入华约的^⑩，但苏联在民主德国驻有在东欧国家中数量最多的军队，民主德国的国家人民军随时都受控于华约组织最高司令部^⑪。保是华约的创始国之一，但苏在保没有驻军，

只是在那里储存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

同时这两国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发展军事力量受到国际条约的限制^⑩；对华约和苏联比较“忠诚”、“可靠”，至少没有出现像华约和苏联与其他东欧国家那样的矛盾、冲突甚至直接武装对抗。1968年，民主德国和保两国推动和追随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保甚至1956年就表示愿随苏出兵匈牙利，只是赫鲁晓夫觉得没有必要才作罢^⑪。在1980年的波兰危机中，这两个国家又一次坚决地与苏联站在一起，反对团结工会，以华约的名义对波兰施加压力^⑫。1975年和1985年两国皆积极主张延长华约，在1989年东欧剧变中没有参加推动华约解散的行动。

苏联对两国也特别“钟爱”。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华约坚决支持民主德国政府修建柏林墙，为了保卫柏林墙，苏联坦克甚至不惜与美国坦克直接对峙。1967年初，民主德国说服苏联最后代表东欧拒绝了波恩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这年秋天，除了罗马尼亚外，所有东欧国家都与民主德国签订了双边互助条约，罗受到了孤立^⑬。1961年，当美国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在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边境进行军事演习时，赫鲁晓夫1961年9月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谴责美国在希腊设有基地，并且从那里威胁着苏联的盟国保加利亚^⑭。在华约的军事演习中，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特别是民主德国的将军多次参与了指挥。从70年代起，苏与民主德国发展波罗的海联合舰队和一体化空军；苏与保加利亚建立了黑海联合舰队，还于1974年在保加利亚开设了华约南欧方面军指挥所。1985年10月，在索非亚召开的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苏联根据各国的要求，把发展与西欧关系的内容写进了声明。

注 释：

①《和平与安全的联盟 纪念华约创立 30 周年》，（苏）《国际生活》1985 年第 5 期。

②③ 参见（苏）К·И·卡维洛夫：《华沙条约——和平的因素，社会主义之剑》，第 15、17 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6 年版。

④（苏）《真理报》1954 年 11 月 14 日。

⑤ 1955 年 2 月 8 日莫洛托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苏）《真理报》1955 年 2 月 9 日。

⑥（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雷切尔·沃尔：《国际事务概览 1955～1956 年》，第 6 项，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

⑦（美）罗宾·雷明顿：《华沙条约》，第 20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⑧《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 年第 4 期，第 76 页。

⑨ 波兰《人民论坛报》，1970 年 12 月 24 日。

⑩《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85～86 页。

⑪（英）D·瓦特编著：《国际事务概览 1961 年》，第 327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年版。

⑫⑬⑭⑮ К·И·萨维洛夫：《华沙条约——和平的因素，社会主义之剑》，第 41、22～24、38、65～66 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6 年版。

⑯《离开真理哪里也不去关于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新材料》，（俄）《肯塔弗尔》1993 年第 4 期，第 89 页。

⑰ 莫斯科《新时代》周刊第 21 期。

⑱（苏）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90 页。

⑲ 伊·伊·奥尔里克：《西方与 1968 年的布拉格：根据捷克外交部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6 年第 3 期，第 16 页。

⑳ 勃列日涅夫 1971 年 3 月 30 日在苏共二十四大上的讲话。

㉑ 莫斯科《新时代》周刊第 21 期，1955 年 5 月 21 日。

㉒《华沙条约——和平的因素，社会主义之剑》，第 42 页，莫斯科国

际关系出版社，1986年版；参见《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军队建设：1949～1980》，莫斯科，1984年版。

⑳ 参见罗宾·雷明顿：《华沙条约》，第226～2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㉑㉒㉓（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1945～1970》，第56、197～198、1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㉔ 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291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军队建设：1949～1980》，第178页，1984年版。参见苏联科学院：《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政治合作》，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㉕ B·Г·库里科夫：《社会主义的集体保卫》，第79页，莫斯科，1982年版。

㉖ M·B·扎哈罗夫：《苏联武装部队的十年》，第553页，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8年版。

㉗ 参见H·A·科里科夫：《为了和平与社会主义的联盟》，第54～64页，莫斯科，1975年版。

㉘ 《国际关系中和平与稳定的强大因素》，第139～140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0年版。

㉙ 王海、李植谷：《苏联军事战略概论》，第284～285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㉚（美）罗宾·雷明顿：《华沙条约》，第2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参见（美）哈里特·斯考特、威廉·斯考特：《苏联武装部队》，第213～2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㉛ 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699页，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

㉜ 这些阶段的划分可参见（苏）科·伊·萨维洛夫：《华沙条约——和平的因素，社会主义之剑》，第63～64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6年版。

㉝ 参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北约与华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㉞（苏）《华沙条约组织文件与材料 1955～1985》，第6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⑳ 《华沙条约成员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公报》，（苏）《真理报》1965年1月22日。

㉑ B·A·穆斯达夫：《苏联与匈牙利 1956年事件：新的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3年第1期，第17页。

㉒（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 1945~1970》，第127~1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第1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㉔ K·И·萨维洛夫：《华沙条约和平的因素，社会主义之剑》，第114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6年版。

㉕（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 1945~1970》，第4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㉖ И·瓦连达：《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俄）《近现代史》1993年第3期，第228页。

㉗ 《华沙条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苏）《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0年第3期，第105页。

㉘ 《戈尔巴乔夫与东欧》，《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7年第1期，第82页。

㉙ 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706页，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

㉚ 《苏联的对外政治活动和外交活动》（1985年4月~1989年10月），（苏）《国际生活》1989年第12期，第67页。

㉛（美）哈里特·斯考特、威廉·斯考特：《苏联的武装部队》，第2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㉜（波）米·切辛斯基：《华约组织中的波兰军队和波兰军官》，《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年第2期，第181页。

㉝ 《军事战略》，第7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版。

㉞（美）罗宾·雷明顿：《华沙条约》，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㉟㊱（美）罗宾·雷明顿：《华沙条约》，第200、1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㊲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

第 16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⑤⑤ 关于南北翼国家的划分，参见（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1945~1970》，第 40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⑤⑥ 《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85 页。

⑤⑦ 刘祖熙、刘邦义：《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第 84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

⑤⑧（锡兰）特加·古纳瓦达纳：《赫鲁晓夫主义》，第 254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年版。

⑤⑨⑩ 《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 年第 4 期，第 75 页~76 页。

⑤⑪ 《关于波兰目前局势》，第 167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版。

⑤⑫⑬（波）米·切辛斯基：《华约组织中的波兰军队和波兰军官》，《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 年第 2 期，第 175、176 页。

⑤⑭（苏）《真理报》，1980 年 12 月 11 日。

⑤⑮ В·И·沃罗科夫：《1980~1981 年波兰事件：来自老广场的观点》，（俄）《历史问题》1995 年第 10 期，第 118 页。

⑤⑯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第 17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⑤⑰（日）不破哲三：《斯大林与大国主义》，第 109 页，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⑤⑱⑲（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第 197、198 页，新华出版社，1983 年版。

⑤⑳㉑ B·A·穆斯达夫：《苏联与匈牙利 1956 年事件：新的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3 年第 1 期，第 13、19、18 页。

㉒ 《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76 页。

㉓ B·A·穆斯达夫：《苏联与匈牙利 1956 年事件：新的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3 年第 1 期，第 17 页。

㉔㉕㉖ П·А·日宁：《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军队建设：1949~1980》，第 95~96、97、94 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参见库利科夫：《华沙条约组织》，《苏联东欧译丛》1982 年第 1 辑，第 190~191 页。

㉗ 《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83 页。

㉘ 参见罗宾·雷明顿：《华沙条约》，第 120~121 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6年版；（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17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⑳（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17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㉑（日）《产经新闻》，1969年6月12日。

㉒《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教训》，（俄）《近现代史》1992年第6期，第213页。

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北约与华约》，第1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㉔（美）哈里特·斯考特、威廉·斯考特：《苏联的武装部队》，第2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㉕H·戈敦·斯基林：《被打断的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第713页；（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第149页。

㉖参见（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第560～564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杜布切克回忆录 1968～1969年》，《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3期。

㉗罗宾·雷明顿：《华沙条约》，第1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㉘张文武、赵乃斌、孙祖荫主编：《东欧概览》，第6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㉙П·А·日宁：《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建设：1949～1980》，第284～285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㉚㉛㉜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1945～1970》，第662、543、6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㉝㉞㉟《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3期，第82～83、88～89页。

㊱㊲㊳㊴罗宾·雷明顿：《华沙条约》，第36、48、49、58、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㊵特加·古纳瓦达纳：《赫鲁晓夫主义》，第32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

㊶㊷佩罗·兹拉塔尔：《霍查政治传记》，第253、281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⑬ 《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第 17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⑭⑮ 张文武等主编：《东欧概览》，第 66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⑯⑰ 《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军队建设：1945~1980》，第 130 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⑱ (美) C·布雷德利·沙尔夫：《民主德国的政治与变革》，第 191 页，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年版。

⑲ 《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76 页。

⑳ 参见(联邦德国)彼德·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第 5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

㉑ (美) 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1945~1970》，第 478~47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㉒ (锡兰) 特加·古纳瓦达：《赫鲁晓夫主义》，第 322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年版。

第五章 苏联政策与苏东关系

在苏东关系中，苏联是大国、强国，东欧是小国、弱国，苏联的东欧政策自然会在苏东关系中发挥直接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不过，对于苏联这样的世界大国来说，东欧政策毕竟只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虽然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苏联除了东欧政策外，还有对美政策、对华政策、西欧政策、中东政策、拉美政策，等等，共同构成其整个对外战略和政策。东欧政策也要服务于其全球战略和整个对外政策，并构成其中的一个部分，并受总的国际形势的影响，这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三个时期都能很明显地看出来。

而事实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内政与外交是不可分的，一般来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和发展，并服务与服从于内政。同时，外交有时也反作用于内政，外交有时与内政不一致。因此，苏联的国内政治、东欧国家的状况也必然要对苏的东欧政策产生影响。在苏东联盟存在的近半个世纪内，苏联对东欧的政策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总的来说，控制与放松是苏联对东欧的两种基本政策，而这两种政策在不同的时期或是交替使用，或是平行进行的。在斯大林时期实行控制政策，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实行控制与放松相间的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实行控制政策，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就是实行“新思维”下的放松政策。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由于时间太短，只是对以前政策的继承，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系统的东欧政策。至于戈尔巴乔夫时期，则无论是在苏

联的东欧政策上，还是在苏东关系史上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一、斯大林时期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 (1944~1953年)

苏联的东欧政策受其对外战略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从1944年8月红军进入东欧境内到1945年底，苏在推进反法西斯战争“解放”东欧的同时，也认为是推进其社会制度和苏联模式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斯大林倾向于在东欧建立“对苏友好的政府”，而一个非共党政权将对苏联持敌对立场^①。西方国家此时既无暇也无力东顾，无法对东欧社会进程施加有力的影响。东欧在原来仇俄仇苏反共的基础上，亲苏亲美的情绪均有所发展。但实际情况的发展与斯大林原来的设想大不相同。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西方已有可能和力量对东欧施加一定的影响，而东欧本身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也不能使共产党一定得势。人民民主制度既适合东欧国情、历史传统、各派政治力量对比，也能为西方所接受。斯大林施缓兵之计，“以空间换时间”。东欧当时缺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多党制可避免内战的说法不无道理。这一阶段，斯大林的观点不是很稳定，因而其东欧政策有时表现得摇摆。1947年9月以后，随着冷战的拉开，两极格局的出现，苏愈来愈不重视同西方的联盟，越来越看重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因素。而西方在东欧正好缺乏这一有效手段。斯大林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修筑东欧篱笆，把东欧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实行阵营对抗战略。而东欧这时的发言权是很有限的或基本没有。苏为东欧各国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提供了一定的援助，甚至作出了一定的牺牲。当然，东欧也付出了代价。

1944年8月至1945年底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苏联的设想是：彻底消灭德国法西斯，建立东欧“安全地带”和势力范围，把战争的胜利作为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机会。鉴于各国共产党力

量弱小，在具体操作上防止各国共产党被挤出各国政治舞台，同时努力赢得东欧人民的好感。

1944年8月，红军打出苏联国境进入东欧境内作战。当时红军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打败和消灭德国法西斯。东欧的解放大体分为几种不同的方式：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主要是依靠本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苏联红军在解放过程中只起了配合作用。苏南联军攻下贝尔格莱德后，苏军很快撤走；苏军根本未曾进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在战争过程中法西斯力量日益削弱的情况下，共产党团结全国各阶级阶层爱国力量举行起义，推翻了本国的法西斯反动政府，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获得解放，之后转入同盟国一边。其他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民主德国，主要是依靠苏联红军的“铁犁”把那里的法西斯势力铲除掉而获得解放的。

东欧很快就成为同盟国内部国际斗争的舞台。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苏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战争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西方立即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措施干预。在1943年前后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和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上，英国提出美英军队在巴尔干登陆和东南欧各国建立联邦的问题，其意图就是从军事和政治上挡住苏联向东欧的挺进。罗斯福也表示赞成。斯大林据理反对。他以尽快打败德国为由，要求英美力量尽快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不应为巴尔干而分散精力。他还说不能“背着有关国家人民决定他们的命运”^②。斯大林争取到了罗斯福的谅解，挫败了邱吉尔的计划。也许罗斯福并不是不知道把东欧让给苏联在政治上的危险，但他考虑到了还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否则美国还需多付出上百万条生命，战争可能拖到1947年才能结束^③。

在这以后，斯大林有意对邱吉尔作了一些让步。1944年10月，斯大林与邱吉尔达成了一个苏英两国在东南欧瓜分势力范围的秘密的百分比协定，即：

罗马尼亚 希腊 南斯拉夫 匈牙利 保加利亚

苏联	90%	10%	50%	50%	75%
英国	10%	90%	50%	50%	25% ^④ 。

通过该协定斯大林不仅要把 1921 年苏波战争期间失去的损失夺回，还要得到 1939 年苏德秘密条约规定的东西，而且要大大超过这些范围。

波兰问题是苏与西方争夺的关键之一。波兰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领土问题；二是政府组成问题。关于领土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斯大林终于把 1939 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协定划归苏联的那部分领土再拿过来。为了缓解波兰对东部边界问题可能产生的不满，斯大林提出把波德边界西移到奥德河和西尼斯河。关于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苏联同西方进行了坚决斗争。西方支持伦敦流亡政府，该政府奉行两个敌人（德、苏）的政策，而苏联支持共产党人占主导地位的卢布林政府。由于苏联占领了波兰全境，事实上掌握了该问题的主动权，最后按有利于苏联的方式解决。即卢布林政府吸收国内外的几名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对于听命于流亡政府的波兰国家军在华沙的起义，苏认为其目的是抢在苏军进入华沙前组成政府，使苏联面临既成事实。红军有意援救不力，听凭起义为法西斯所镇压^⑤。

与此同时，苏联忙于巩固自己在东欧的成就。于 1945 年 4 月与南斯拉夫、波兰以及新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45 年 8~9 月，苏联与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随后，对其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⑥。

在战争过程中，苏对西方就存有戒心。1945 年 1 月，斯大林就曾经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谈到：“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为资本主义已分裂成两个集团，一个是法西斯集团，另一个是民主集团。我们之所以能够与资本主义民主集团结成联盟，是因为它不能容忍希特勒的统治，因为这种残酷的统治会导

致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本身。我们现在是同资本主义的一个集团结盟反对另一个集团，将来会回过头来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个集团。”^⑦1945年4月斯大林与南斯拉夫领导人谈话时讲：“这次战争与以往的战争不同，谁解放的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⑧

攻占法西斯德国的老巢——柏林，不仅会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而且将会载入人类的史册。美国想得到这个荣誉，邱吉尔极力怂恿美国，否则由苏联拿下柏林，对于西方来说，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军事上说都是极严重的错误，会为将来造成极严重的困难。为抢先夺取柏林一事，斯大林专门召见了负责前线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命令他们无论如何要抢先攻占。斯大林还为两个方面军的进攻路线划了分界线，让朱可夫和科涅夫两人竞争^⑨。斯大林的划线有利于朱可夫，最后攻克柏林的荣誉为朱可夫所得。这里斯大林有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是为了制造出一个苏联的反法西斯伟大英雄，以突出苏联红军和苏军统帅的形象，以便战后与西方相抗衡。5月8日，举行了德国向英美盟国投降的仪式，苏方对此持有异议，第二天，即5月9日，再举行了德国向苏军投降的仪式。以后苏就一直以5月9日为反法西斯胜利日。

1945年8月，在谈到波茨坦会议关于保加利亚和巴尔干的决议时，莫洛托夫对季米特洛夫说：“这些决议基本上有利于我们。事实上承认了该地区是我们的势力范围。”^⑩随着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各国，一方面是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随着红军一起回来了，如匈牙利的拉科西，波兰的贝鲁特，捷克斯洛伐克的哥德瓦尔特，民主德国的威廉·皮克、乌布利希，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他们为各国发展共产党和夺取政权而斗争，拉科西称之为“切香肠战术”^⑪。另一方面，苏联的安全人员、顾问同时或随后参加了清除各国法西斯分子的工作。根据俄罗斯档案材料发表的波兰的公开出版物，1944年春在苏联组成的波兰军队中成立了

一个军事反间谍处，它直接受苏联反间谍局主管。它给苏方提供了直接干预东欧内部事务的机会。它可以把那些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但持反苏反共立场的政治竞争对手打成“反动派”和“法西斯分子”，并以暴力对付他们。苏联对于与流亡政府有联系的波兰地下组织进行镇压，引起西方不满。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声明：“他们为了夺取武器，侵犯我们的仓库。他们破坏我们的命令……”“如果他们继续侵犯我们，我们将把他们消灭……”^⑭1945年3月底，苏联军事当局逮捕了16名受苏方邀请来进行谈判的波兰地下军事和政治活动家^⑮。在新波兰的军队安全（暴力）机关中直接使用苏联人，如1944年12月，在波兰的安全机关中就有2500人，1945年秋天达2800名，他们多在实际负责的岗位上，其中大多数骨干是苏联内务部成员、候补党员和团员^⑯。1945年6月，波兰国家安全部部长报告说，在波兰的集中营中由于政治原因被关押的有15万人，其中被处以死刑的有2500~3000人^⑰。

在匈牙利，截至1945年3月，政府投入监狱的有1672名法西斯组织的积极分子和领导成员。4月，匈共领袖拉科西给季米特洛夫写信，反映了对苏联在布达佩斯清洗法西斯分子的不安。他说，苏指挥官在布达佩斯经常采取街头搜捕的形式，如果德国人不够，他们就把一些反法西斯战士，甚至匈共基层组织的领导成员投入集中营，原因就在于这些人有德意志民族的姓。因此，好几百名同志莫名其妙地失踪了^⑱。在保加利亚，1945年3月前，送上法庭的人达11600名，其中2850名被判死刑，得到执行的有2025名^⑲。

这一时期苏联还很注意赢得东欧人民的好感。历史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三国反苏情绪很重。据红军情报材料，在匈牙利，红军只在工业地区得到了支持，而在农村和地方，红军处于敌对的环境中，大部分匈牙利农民在情绪上敌视红军和苏联^⑳。至于在波兰，反俄、反苏情绪根深蒂固，更多的波兰人反

而培养了对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好感。

但是，苏联手中也握有获得东欧国家和人民好感的资源和条件。首先，苏联军队帮助打败法西斯德国，这是东欧诸国单靠自身的力量无能为力的。其次，苏联红军在东欧的现实存在，这一点是西方所没有的。第三，依靠苏联对付德国复仇的威胁，这是东欧诸国尤其是斯拉夫国家所需要的。第四，苏联还可以充当东欧国家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中间的协调人。另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当时不仅无力也无暇顾及东欧，而且希望苏联在东线减轻第二战场的压力^⑩。这就为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提供了机遇。

同时，鉴于东欧各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苏联领导也曾表示不把自己的意志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东欧。如苏 1944 年 4 月 30 日给负责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后方安全工作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下达了下列指示：“1. 不破坏罗马尼亚的国家制度；2. 地主的财产、庄园、各类工厂，不能消灭、剥夺或没收；3. 在我军所占领的地区禁止苏维埃化；4. 政党、宗教团体、社会组织，如果不持积极的敌对态度，就不要触动它们；对于敌对的因素，进行关押、逮捕或消灭，也要根据充足的材料，经军队或方面军的检查机关、军事法庭的批准；5. 对罗马尼亚地方政权机关的监督工作应通过专门的卫戍部队，要同它们保持紧密的联系。”^⑪

这一时期，苏方还要东欧国家赔偿、还债，以便补偿自己的损失，同时削弱东欧，便于控制。赔款的主要是原来的法西斯同盟国，如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以及战争期间在苏联组织武装力量的国家，如波兰。根据目前已有的材料，具体赔了多少现在不很清楚，但从一个侧面可见一斑，如匈共总书记拉科西于 1945 年 3 月写信给莫斯科说：“现在每天都有工人代表团来到我们这儿，这些工人数月以来都在积极地为红军工作，他们要求留下一些工厂的设备，以便使他们有可能继续工作。目前（苏

军)的拆卸有时采取了这种形式,以至于威胁到全部的恢复工作。”^②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社会民主党人)对苏联怀有敌意,这种敌意是由于某些社会阶层必须承担沉重的赔款义务而造成的。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对英美抱有希望。”^③

斯大林从战争中得到经验,即必须实行实力政策。战后面对与西方的争吵,他曾叫嚷道:“罗马教皇,罗马教皇是什么东西?他有几个师?”^④

正由于苏联在东欧的行动,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担忧和不满。但由于斯大林手中握有重牌,他的态度是强硬的。1945年秋,他曾对美驻苏大使阿维瑞尔·哈里门说:“我们决定(在东欧)单独干。”^⑤

1945年7~8月的波茨坦会议是二战中三次首脑会议中争吵得最厉害的一次。美国在德国的赔款问题,波兰的边界问题,以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府的承认与否问题上均反对苏联。苏美同盟开始破裂。9~10月,苏美英法中五国伦敦外长会议又因为苏美在东欧问题上立场相悖而不欢而散。至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由于双方妥协达成了一些协议。这说明,苏联的强硬政策已经愈来愈多地遭到美国的反对,苏联解决东欧问题想绕过美国是不太可能了。

1946年初~1947年9月是第二阶段。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东欧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苏联在东欧的行动引起了西方的强烈反对,苏联允许东欧走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同时,苏对东欧提供帮助,以使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⑥。

国际形势的变化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美国对苏政策的变化。1946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宣读了他写给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备忘录,再次批评了贝尔纳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独断专行,没有及时地向他请示、汇报,对苏联让步太多。他坚定地指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我们一定要拒绝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除非它们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已厌倦于笼

络苏联人。”^②他把这篇备忘录看作“是我们政策改变的转折点”^③。接着是邱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杜鲁门主义和第四点计划、马歇尔计划的出笼。而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在波、匈、捷，共产党力量比较弱小，社会民主党比共产党强大。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势力不大，但农民党力量雄厚。

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双方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下谈到了通向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1946年夏天，斯大林在会见哥德瓦尔特和英国工会代表团时论证了通过议会民主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对哥德瓦尔特说：“我们的道路短、快，付出了很多流血和牺牲。如果你们能绕过这些就绕过去吧！该付出的流血牺牲的代价，已由红军付出了。”^④他还对季米特洛夫说：“也许我们错了：我们曾认为苏维埃的形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事实表明，苏维埃的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斯大林认为，东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不再是孤立的了，它们的背后有强大的苏联作为支柱^⑤。

1947年中旬，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英国工党代表时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经验也不是唯一的。”^⑥有一次，波兰党的领袖哥穆尔卡曾当面问过斯大林对波兰组织集体农庄有什么看法？斯大林对这一问题感到惊讶。斯大林问道：在波兰搞集体农庄？要知道，波兰农民是伟大的个人主义者。斯大林继续说，我们在苏联建立集体农庄是在革命胜利10周年以后才开始的^⑦。1946年7月，斯大林对捷共中央总书记哥特瓦尔德说，在希特勒德国战败以后，统治阶级在许多国家声名狼藉，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和道路，如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有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而不需要经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⑧

苏联重要领导人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也在不同场合强调了东欧国家应走议会民主道路，表达了通向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的思想。

正因为如此，当时东欧各国出现了各种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提法，如哥穆尔卡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明确地指出了波苏三个根本的、明显的区别，即“1. 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在俄国是通过流血的革命道路实现的，而在我国是和平实现的。2. 苏联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在我国则没有这个阶段，并且可以避免这个阶段。3. 苏联的政权是由代表会议，即苏维埃来行使，它把立法和执行职能联结起来，苏维埃是社会主义政府的一种形式。我国立法和执行职能是分开的，国家政权建立在议会民主基础上”^⑤。1945年6月，德国共产党的一份正式文件认为：“把苏联的体制强加于德国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德意志民族的主要利益需要一条不同的德国道路。”^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946年强调“革命的逐步的和平的发展”和“通向社会主义的本国道路”。捷共领导哥特瓦尔德说：“我们的传统和需要不同于苏联。”^⑦1947年，保加利亚党领导人把人民民主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道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更是强调：“不应当把人民民主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团，因为南斯拉夫可以通过自己不同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社会目的。”^⑧纳吉·伊姆雷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匈牙利道路”。1946年2月，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说：“现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原则已跟1917~1918年沙皇俄国不同了……各个国家的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将不会走一样的刻板公式道路，不会完全按照苏联的样板，而是取决于各自的历史、民族、社会、文化和其它条件走自己的道路。”^⑨“对各国人民来说，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什么时候，用多长时间以及通过什么途径，这些问题都是具体的……在做好了必要的工作和准备的条件下，保加利亚完全可能有朝一日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

是通过人民民主和议会制度走向社会主义。”^⑳

因而，苏对东欧共产主义激进派表示担忧，并进行了压制。战后东欧一些共产主义者，甚至社会主义和农民政治运动，具有左派激进主义情绪。如在保加利亚，据苏联代表的情报，在工人中存在这样一种情绪，即“必须消灭经营各类工厂的主人”，为了使每一个工人成为共产主义者，“应该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㉑根据匈牙利的档案材料，匈也存在左派极端主义情绪，要求“不搞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应立即宣布苏维埃政权”。^㉒匈一个地方的冶金工人和矿工宣布，他们那里只有共产党是合法存在的，社会民主党不复存在。^㉓在波兰，在波兰工人党中出现了一种意见，即即使在波兰不能建立100%的无产阶级专政，也要做到50%。^㉔在波兰和匈牙利，苏联代表经常给共产主义激进派“泼冷水”，担心他们急于搞共产党一党专政，苏联模式，破坏多党合作，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孤立。苏对左派激进主义的压制也发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㉕

斯大林对保加利亚的态度也很能说明问题。1945年12月底，在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讨论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的和约草案期间，斯大林通过内部直通电话要求季米特洛夫在正在组建的祖国阵线政府中容纳一两名反对派部长。斯大林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保加利亚不要急于推进社会革命进程，而要根据大局的要求控制社会革命进程的发展。基于这些原因，斯大林坚持瓦西尔·科拉多夫不要急于回国，斯大林说：“他的归国会被作为苏维埃化的话柄……”^㉖

东欧各国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从性质上讲，既非资产阶级政党，也非无产阶级政党。它采取的政策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如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实行国有化。但这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没有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各国代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各个阶级、阶层的政党联合执政，共产党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不占绝对的优势。正因为如此，西方才

承认了东欧各国政权。

与此同时，尽管战后苏联的经济非常困难，但为了恢复战后东欧的国民经济，建立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苏联给予了很多帮助，作了很多牺牲。这些帮助有些是无偿的，有的是有偿的。如1946年，苏联本身粮食都无法自给，很多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在乌克兰到处都是饥荒，很多人饿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慷慨地以粮食帮助波兰，虽然波兰并不如苏联某些地方，特别是乌克兰更贫困。据赫鲁晓夫回忆说，波兰人还是在骂苏联，原因是苏联在供应他们小麦的同时还供应了他们黑麦，而波兰人是不习惯于吃黑麦的^④。1946年，苏联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把大量粮食卖给波兰^⑤。1945~1949年，苏联供应了波兰5825万吨石油和石油产品，200多万吨铁矿，17万吨棉花，以及大量的煤气、锰和磷灰石。1946~1948年，苏联供应波兰粮食1009100吨^⑥。根据1948年至1950年的条约的规定，苏联对波兰提供了22亿的投资贷款。据波兰经济学家计算，波兰在1945~1949年所得到的苏联贷款，等于美国根据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对西欧11个国家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所提供的机器和设备的价值^⑦。苏联也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了无偿的援助。据莫洛托夫回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从我们那儿拿粮食去喂牲口。而我们当时有人挨饿。”^⑧1947年4月，斯大林表示要给南斯拉夫以帮助，通过提供制铝厂设备和促进石油的开采和研制的方法。苏联提供南1.35亿美元的贷款。根据1947年6月签订的协议，苏帮助南建设工业企业，以贷款形式提供苏联的工业设备和材料，建设南的黑色和有色金属、石油、化学、森林和煤炭开采等工业企业，并给予技术帮助^⑨。可以说，这一阶段苏联与所有东欧国家加强了经济、政治往来，社会、文化联系，以赢得各国人民的心，支持各国共产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⑩

第三阶段：1947年9月以后，苏联加紧了对东欧的控制。

斯大林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加重了对东欧各国的压力，不承认，也不允许脱离“苏联经验”，向东欧推行苏联模式。苏联提出了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全面对抗的理论，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阵营对抗战略，把东欧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与西方抗衡的前沿阵地。

西方不能容忍苏联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扩大，故而挑起了冷战，企图遏制苏联。苏联也不服输，进行坚决回击。1947年9月，在苏联的主持下，成立了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提出了两个阵营的理论。之后，东欧各国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是推翻小资产阶级政党；二是清除右倾民族主义分子。

为了斗败小资产阶级政党，一是各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化。到底是因为斯大林改变了对社会民主党的看法，认为社会民主党是共产党政治上的盟友，还是出于政治策略考虑，为了打击主要的敌人而团结次要的对手，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为此，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选举中做了手脚，伪造选举结果。在选举中作弊，包括剥夺一些人的选举权，甚至直接在候选人的名单上进行“技术处理”。在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都存在这种情况。这是这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亲自承认的^⑤。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正式公布的伪造的选举结果并未表现出不接受，伪造的手段并不重要。二是在政治上把对手搞臭，“揭露反民主的阴谋”和“反国家的阴谋”。在揭露反对党的阴谋方面，拉科西于1947年春天承认，在揭露（对手）的反共和国阴谋之前，共产党的处境是困难的……“去年12月份以前我党处于防守状态，而现在，可以说，我们转入了进攻……揭露敌人的阴谋帮了我们的大忙，反对派现在处于防守状态了……”^⑥在罗马尼亚也“揭露了”反对派的“阴谋”。在保加利亚，势力强大的农民党的“阴谋”也被“揭露”了出来。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例外，因为那里缺乏“揭露阴谋”的社会政治环境。目前，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苏联方面参与了伪造选举结果和“揭露阴谋”的具

体活动，但是，俄罗斯方面解密的档案材料说明，苏方至少为这些活动提供了外部政治支持^⑤。

在政治上，苏联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对，与原来的法西斯盟国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订了和约，并为它们加入联合国而斗争^⑥。在思想理论上，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经验”，强调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反对“民族共产主义”和“特殊道路”。斯大林在批判南斯拉夫时指出：“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⑦1949年，苏联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走自己的道路”。这些文章说，“各人民民主国家，决不存在比苏联已经达到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新的道路和其他不同的道路”；在今天的条件下，“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等等。“波兰道路”受到了批判，其他各种道路的提法也销声匿迹了。

与此同时，苏联派了大批的“钦差大臣”到东欧各国，帮助各国共产党击败资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例如，派波裔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到波兰当国防部长；派维辛斯基去罗马尼亚警告罗国王：如果不这样，“罗马尼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可能不复存在了”^⑧；派伏洛希洛夫去匈牙利，逮捕小农党领袖；派佐林去捷克斯洛伐克，逼贝奈斯交权；在保加利亚，清洗了农民党的领导人。在此基础上，1947年9月，欧洲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在波兰召开，苏联代表日丹诺夫在会上作了纲领性报告，他说，世界已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一个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日丹诺夫批评了一些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和“民族主义”的表现，要求东欧国家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揭露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侵略意图，要求各国共产党制订一项共同的行动纲领和策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根据苏联代表的提议，成立了共产党

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情报局名义上是为了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交流情况和经验，加强联系，协调立场，实际上，苏联企图以它取代已于战争期间被解散的共产国际，其实是新的国际共运中心。哥穆尔卡表示反对，但孤立无援。但他还是坚决拒绝了把情报局所在地设在波兰的建议⁵⁵。

与此同时，在民主德国，开始大量使用原纳粹党旧人，以更加紧控制。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里，60年代以前充满了原来的纳粹党人。在1954年的一个党的报告中讲到，有25.8%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过去都有纳粹背景。有一个地区，每4个党员中就有一个过去的纳粹分子，另一个地区，每三个党员中就有一个过去的纳粹分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某些组织甚至超过85%的人有“灰色背景”。战后初期，民主德国有些工厂和地区的领导基本上都由过去的纳粹分子组成⁵⁶。

苏联控制东欧最明显的、最集中地表现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本来在战争过程中和战后的一些问题上，苏南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南斯拉夫的不满偶有流露，但没有揭开盖子。战后苏南冲突最初最主要地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南保友好互助条约；南保联邦的动议；南军准备进入阿尔巴尼亚事件；南对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的支持。1947年8月，南保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发展经贸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南斯拉夫免去了保加利亚所欠的、由巴黎和平会议所确定的2500万美元的赔款。保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称该约是无限期的。斯大林写信给铁托说，苏联政府认为，南保两国匆忙签订该约“是一个错误”，会给西方以借口来干涉希腊和土耳其的内政，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又说，此事事先没有同苏联商量，苏联不愿为此承担责任⁵⁷。由于南保是邻国，又都是斯拉夫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便于解决两国之间有争端的马其顿问题，两国领导人建立了南保联邦的想法。1948年1月，季米特洛夫在没有与苏联商量的情况下，对外界谈了对创立东欧和中南欧联邦远景的设想，说当条件成熟时，创

立一个巴尔干或多瑙河联邦或会议，其中还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①。1月下旬，有传闻说西方要从希腊向阿尔巴尼亚发动进攻，南遂准备向阿南部阿希边境派遣一个师的部队以保卫阿。斯大林认为南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南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②。1948年2月，苏与南、保领导人在莫斯科进行谈话（铁托没有参加），斯大林对两国领导人大发雷霆，以粗暴的口气指责南保领导人没有经苏联的同意就擅自行动，把苏联置于既成事实面前。斯大林还尖锐批评了包括所有东欧国家在内的联邦的思想，指责季米特洛夫是想“震惊世界”^③。奇怪的是，斯大林又指示立即以南保联邦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宣布阿尔巴尼亚将属于这个联邦。“这个问题已经成熟了。”^④原来，斯大林曾经有建立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的设想，领导人将是季米特洛夫。它包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在联邦中起领导作用^⑤。按斯大林的想法，这样一个联邦便于苏联统一“管理”。在希腊问题上，斯大林对南支持希腊共产党游击队很恼怒，他认为希腊共产党人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美英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不会允许别人切断它们与地中海的交通命脉的。南支持希腊共产党游击队会引起西方对苏联的强烈指责^⑥。然而，铁托反对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建立一个充当“特洛伊木马”的联邦^⑦。苏南关系进入了死胡同。苏联一方面实行经济压力，拖延签订贸易协定，另一方面运用情报局，批评南斯拉夫在政治上没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农村没有搞土地国有化和阶级斗争，对苏联的军事专家和文职人员态度不友好，有“反苏情绪”，狂妄自大，听不进兄弟国家的批评意见。苏共中央委员会还威胁南斯拉夫政府，如果南敢从肉体上消灭海爾布朗和茹科夫斯基等南共产党和政府内的亲苏派的话，那么苏共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是刑事杀人犯^⑧。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重申苏联的指控，批判南的“民族主义立场”，宣布开除南斯拉夫并号召南共撤换领导人。南共驳回了这些指责。1948年7月，

南共五大反批评情报局的决议是“不准确的、不正确的、不公正的”。铁托希望消除分歧，宣称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大会强调，南共是情报局成员，忠诚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和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原则，承认苏共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和在内外事务中遵循苏共经验的必要性。南将努力向苏共领导人说明其谴责的不正确^⑥。但斯大林反而变本加厉。1949年9月，苏宣布废除与南的友好条约，10月，苏企图阻挠南当选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11月，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共是刽子手和特务当权”的决议，号召南共党内的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健康力量”起来推翻铁托集团^⑦。斯大林还对人说：“我只要动一动我的小手，铁托就完蛋了。他要垮台了。”^⑧由于两国关系的恶化，1949年的贸易额只及1948年的1/8^⑨。

与此同时，在斯大林的总导演下，东欧各国掀起了清除“铁托主义分子”、“右倾民族主义分子”的狂潮，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为了巩固与东欧各国的政治联系，苏还于1948年与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友好互助条约。

在经济上，与马歇尔计划相抗衡，苏联与东欧各国签订了“莫洛托夫协定”，“把以前流向西欧和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其它地区的大宗贸易转向东欧”^⑩。苏联开始对马歇尔计划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它看到了从美国获得贷款恢复战后经济的可能性。苏曾认真地研究马歇尔计划，并积极参加了英法苏三国巴黎外长会议。1947年苏联发往苏驻华沙、布拉格和贝尔格莱德的大使的电报中说：“我们认为，友好联盟国家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在研究参与该计划经济措施方面表现出相应的主动性，表示出自己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在苏联的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对美国的不信任和警惕。如苏驻美大使H·洛维科夫对马歇尔计划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他认为该计划是为了使欧洲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服从于美国资本并创立反苏集团^⑪。1947年7月5日，

苏联驻欧洲各国的大使从莫斯科获得指示，要他们去访问相应国家的外长，并向他们申明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否定评价。其中强调：“苏联代表团认为马歇尔计划是企图干涉欧洲各国内政，以自己的纲领来压制它们，推销自己的劳动产品给它们制造困难。他们企图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依赖于美国的利益”^⑥。本来波匈捷对马歇尔计划是有兴趣的，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决定加入该计划。斯大林把戈德瓦尔特等人叫到莫斯科加以训斥。他后来对人说：“斯大林令人可怕地生气，因为捷克接受了参加马歇尔计划的邀请。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发怒。”^⑦捷这时也只能和苏联一道反对该计划。为了与马歇尔计划相抗衡，防止东欧国家的离心力，苏与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经贸协定，统称为“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苏联与东欧五国成立了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以图加强双方的经济往来，全面解决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其成立之初，经济活动并不多，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斯大林时期，其经济活动不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官僚协议的基础上，苏联随意规定贸易条件^⑧。经互会的成立，标志着世界上出现了两大对立的经济体系。1951年，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观点，这是苏东建立经济联盟的理论基础。

在军事上，苏联在德国苏占区和波兰都有驻军，苏联红军也没有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撤出。1948~1949年爆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苏联封锁了从西占区通往柏林的所有陆路和水路，企图把西方势力排挤出柏林。柏林危机最后虽然和平解决了，但它表明了苏联与西方对抗的欧洲政策，同时也说明了苏联对德国问题的政策：苏联从实力政策出发，对西方施加压力，阻止西方建立联邦德国并拉入自己的阵营；德国东部苏占区和整个柏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许西方染指^⑨。1948年，苏联与几个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条约，保证一旦德国或“与德国结盟的”其他

任何国家发动“侵略”时相互支援。这些国家中既包括几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与法西斯轴心国结盟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包括战时与苏联签订过互助协定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⑦。在1949年之前，东欧国家军队基本处于瓦解状况。同年，西方国家成立了北约军事政治集团。于是苏联也开始重振东欧武装力量。按照苏军的组织形式，苏对东欧各国军队进行了改组，大规模地清洗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和业务上不胜任的军官。在有的国家，还由苏军接管了军队的参谋工作和训练工作。苏还给了一些东欧国家苏式武器和装备。在斯大林时期，苏联还在东欧地区设立供苏联空军部队使用的飞机场和防空报警设备^⑧。特别是朝鲜战争开战以后，斯大林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临，苏联加强了东欧空军的现代化工作和把它们纳入苏联防空系统的工作。斯大林要求东欧各国增加军费开支，以及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装备。如匈牙利就不得不把军队武装完毕，并为苏联航空轰炸部队建设了很多大型的军事机场^⑨。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要东欧国家做好备战工作。

1949年，是西方和苏联各自加强自己在欧洲的实力和地位的一年。这年，苏东成立了经互会，以加强自己与东欧的经济联系，弥补以前经济联系的不足。而西方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平衡苏联在东欧的常规军事力量优势。此后，由于东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爆发，苏联和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东方。东欧问题逐渐淡化并固定下来。

二、赫鲁晓夫时期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 (1953~1964年)

作为苏联总的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内复杂多变的改革相联系，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东欧政策是矛盾的，呈现出放松与控制平行和相间的特点。一方面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搞改

革，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调整对外政策，包括苏联的东欧政策。与斯大林的全面的阵营对抗理论和战略不同，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理论和战略，推动国际形势缓和。因而与斯大林对东欧实行高压控制的政策不完全一样，赫鲁晓夫对东欧实行比较放松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只看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⑧，他的“缓和”只是为了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赢得时间，作为“和平过渡”的策略手段。赫鲁晓夫并没有突破斯大林关于两大阵营全面对抗的思想模式，在两大阵营谁战胜谁的斗争中，赫鲁晓夫更重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一致，对东欧毫不放手，对“异端的”或“越轨的”行为严惩不贷。

赫鲁晓夫对东欧政策的调整突出地表现在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正常化问题上。因为开除南斯拉夫是由斯大林亲自导演的、情报局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赫鲁晓夫想改善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的意图遭到了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等人的反对。于是赫鲁晓夫提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收集材料分析论证南斯拉夫到底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分析论证的结果，认为南斯拉夫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对南斯拉夫的谴责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苏决定恢复与南斯拉夫的接触^⑨。为此，苏联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举措，如苏联政府建议双方互换大使，建立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停止了反南斯拉夫宣传，停止出版南政治流亡者的刊物，解散其组织。1954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南共联盟，建议实现双方关系的完全正常化^⑩。1955年5~6月间，赫鲁晓夫正式访问了南斯拉夫，承认苏联在两国关系中“犯了严重错误”，使苏南两国关系恢复了正常化。经过“有时是暴风骤雨”般的讨论和争吵，双方最后签订了一个由南斯拉夫人起草的、反映南斯拉夫人意愿的著名的文件——《贝尔格莱德宣言》。该宣言的核心内容是强调各党、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宣

言明确指出，“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两国相互关系中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的平等地位”，“承认并发展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不以任何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或是意识形态性质的理由干涉他国内政”，“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政治上及经济上支配他人的企图”，“因为国内的政治结构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问题以及发展社会主义不同的具体形式问题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⑤。斯大林是通过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的，在赫鲁晓夫访南之后不久，经铁托一再要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也同各国党，首先是同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党举行了会谈。1956年4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宣布解散^⑥。这也是赫鲁晓夫调整苏的东欧政策的重大举措。第二年6月，南共联盟代表团访问苏联，苏南两党就两党关系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再一次肯定了《贝尔格莱德宣言》是处理两国关系的基础，进而强调，“国家不同，情况各异，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各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形式问题上，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任何倾向，都是不能容许的”^⑦，从而，正式承认并宣布了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的提法。

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推动和影响下，随着苏国内平反运动的展开，苏联领导人正式或非正式地向东欧各国党表示，战后斯大林时期各国党很多领导人的蒙难属于冤案，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东欧各国分别为在40年代下半期受冤屈而被处死和逮捕的拉伊克（匈）、科斯托夫（保）、波特拉什卡努（罗）、斯兰斯基（捷）等人平反^⑧。赫鲁晓夫不再轻易插手各国党的人事安排，也不再轻易对意见不同的各国领导人采取可能的组织手法，如被逮捕监禁的哥穆尔卡在1956年10月事件后当了波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也没有干预。1956年12月到1957年6月，苏联与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订了新的双边关系条约。通过这些条约，东欧各国获得了更多的平等权力。1958年，赫鲁晓夫把苏联军队从罗马尼亚撤出来了。赫鲁晓夫还打算从波

兰和匈牙利撤出苏军，因这两国的反对而作罢^⑧。从1962年开始，罗政府分批分期地释放政治犯，其中有不少过去被称为反苏的或敌视苏联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到1965年，共释放政治犯12750名^⑨。苏联这样做显然有其政治目的，以表示相信兄弟国家，不给西方帝国主义以攻击的口实，并推动欧洲和国际形势的缓和。

在经济方面，从1953年起，苏联逐步把斯大林时期与东欧国家合营的联合公司转让给东欧国家。这些公司合作的条件对于东欧来说是极不利的。赫鲁晓夫还放弃了一些东欧国家对苏联的战争赔款。在经互会的活动方面，赫鲁晓夫结束了斯大林的完全脱离自由市场的、政治因素起决定作用的“电话命令”的时期，经济因素开始起更大的作用。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给予东欧政府某些自主权，满足东欧国家的某些经济要求，允许它们同外部世界，主要是同西方有一定数量的经济往来^⑩。如1957~1961年，东欧国家向西方国家的贸易出口增加了56%，从西方国家的贸易进口增加了55%^⑪。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科技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力图提高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总体经济水平，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阵营，这是苏东经济联盟的活动宗旨。对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形式，赫鲁晓夫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兴趣和理解。他说：“南斯拉夫的形式有可取之处，它既然已经存在就没有必要去否定……尽管我们不公开宣布这一点。”^⑫

但是，赫鲁晓夫远没有摆脱阶级斗争和两个阵营对抗思想。他对东欧的让步和放松是有限度和分寸的。和平共处只是策略手段，阵营对抗才是本质内容。苏的东欧政策也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总的路线。一旦东欧有失控的危险，赫鲁晓夫总是毫不犹豫地予以干预，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手段。例如，1955年，作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反应，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与其分庭抗礼的军事政治集团——华沙条约组织。在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中，赫鲁晓夫担心波兰失控，先是不请自

来，强行要求参加波党会议。赫鲁晓夫一下飞机就气势汹汹地叫嚷：“为什么一切都打上反苏的旗号？为什么？”^④赫鲁晓夫最担心的就是波兰退出华沙条约，从而退出社会主义阵营，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威胁波兰：“我们为这个国家流了血，而有人却企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绝对办不到！”^⑤赫鲁晓夫还公开地说：“波兰对于苏联具有战略意义，它同德国还没有签订和约。在波兰有我们根据波茨坦条约驻扎的军队，他们保卫着经过波兰通往民主德国的交通线。”匈牙利事件，苏联不惜两度出兵，恢复了“正常”秩序。苏联称匈牙利事件为“反革命事件”，1958年处死了纳吉·伊姆雷，并以此警告东欧其他国家领导人。对于南斯拉夫拒绝参加华沙条约组织，赫鲁晓夫感到特别气愤^⑥。1958年，柏林危机发生，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通过决议支持民主德国修筑柏林墙，其目的就是迫使西方承认民主德国为主权国家，以巩固社会主义的势力范围。

赫鲁晓夫解散了情报局，一是因为情报局声名不佳，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同意解散；二是因为赫鲁晓夫找到了新的包括东欧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形式，这就是共产党国际会议，并以联合声明的形式来确立其领导地位和指挥各党一致行动。这些共产党国际会议大多是在苏联召开。“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词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才开始普遍采用的^⑦。《莫斯科宣言》总结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9条共同规律，强调这些规律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并明确指出了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带头人作用。^⑧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进一步指出，苏共“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先鋒队。苏共的经验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原则的意义”^⑨。对于南斯拉夫不参加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苏联并不欣赏。赫鲁晓夫认为南斯拉夫也应该象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南在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中间立场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的^⑩。1957年南派出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但拒绝在12个执政的共产党宣言上签字^⑪。赫鲁晓夫大为光火。赫鲁晓夫对铁托一直怀有戒心，认为在揭露斯大林的暴行后，铁托明显地在追求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⑫。赫鲁晓夫还担心铁托企图削弱苏共对东欧各国党的影响而扩大南共的影响^⑬。纳吉被杀事件使苏南关系再度恶化。1958年6月，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称铁托为“特洛伊木马”，并且声明1948年情报局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⑭。苏还反对南斯拉夫的新宪法，引起了南的强烈不满。

另外，赫鲁晓夫虽然口口声声说社会主义各国平等，却恶化了苏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关系。这方面既有经济、安全等国家利益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和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原因。赫鲁晓夫加强了经互会的作用。他说：“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不仅仅是一种各国社会政治的联盟，它也是一种世界经济体系。由此可见，实行协作不应当局限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狭小范围内，而应当根据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的规模，这就意味着要克服过去遗留下来的排外主义……”^⑮社会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和生产专门化，一方面固然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但另一方面引起了经济不发达国家的不满，以及它们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经济较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如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再加上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赫鲁晓夫盛气凌人的态度，苏与阿、罗的矛盾激化。在华沙条约内，苏对阿尔巴尼亚实行排斥和冷淡政策，对罗马尼亚实行遏制政策。从1962年起，阿尔巴尼亚不再参加经互会和华约的活动，事实上退出了社会主义阵营。罗马尼亚虽然没有退出阵营，但不参加华约的联合军事演习，在阵营内经常发出不和谐之音。在赫鲁晓夫下台前夕，即1964年的4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发表了《罗马尼亚工人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的声明》，即有名的《四月提纲》，

表达了要求中苏两党停止公开论战的强烈愿望，并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及其战略策略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本国独立自主立场、经互会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声明。声明强调“国家独立和主权、权利平等、互利、同志式的互助、互不干涉内政、尊重领土完整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原则”，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外关系的准则；声明指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老子’党和什么‘儿子’党，‘上级’党和‘下级’党”；任何国家的党“都不能把它的路线和意见强加给其它的党”^⑧。1961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对罗马尼亚的农业集体化进行了近乎粗鲁的直率的批评，使他与罗共领袖乔治乌·德治本来就不够融洽的关系更加冷淡。大约从此以后，乔治乌·德治总是力图避免与赫鲁晓夫见面，常常有意回避“大家庭”的双边和多边会议。

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 (1964~1982年)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全球战略和东欧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其全球战略是明确的：阵营对抗、势力争夺战略与国际缓和战略，或平行实施，或交叉进行。争夺是目的，缓和是手段。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东欧战略也是明确的：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保持“社会主义阵营”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合作，以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进行势力争夺。在苏联看来，东欧既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也是苏保持自己在国际共运中头号地位的砝码，同时也是世界革命的排头兵和突击队。

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影响，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东欧的政策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不稳定性，缺乏自始至终的一贯性。苏东关系的状态也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几个阶段。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

的东欧政策既有一定的继承性，同时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1964~1968年华约侵捷之前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对东欧的控制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苏忙于国内政策的调整和权力分配，理顺国内各种关系。勃列日涅夫一方面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进行了调整，恢复了斯大林模式的许多东西，同时又保留了赫鲁晓夫改革的一些成果。1965年，苏联还进行了旨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利润刺激的经济改革。同时，中苏冲突也对苏东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东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砝码加重了。由于罗共的努力，1966年10月莫斯科苏共等9国党政领导人会议未能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罗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一道，曾对苏共策划的反对中共的会议进行了抵制。1967年，罗不顾苏的反对，与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年后还实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对罗的访问。

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和波兰在阵营中的作用明显上升。乌布利希以老资格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他领导的民主德国党和政府坚持把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民主德国的主权和安全放在华沙条约的政策议程的优先地位，认为凡符合民主德国利益的就符合国际主义利益，因而也符合苏联的利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乌布利希主义。民主德国政府认为，联邦德国主动向其它东欧国家伸出和平的“橄榄枝”，是为了孤立民主德国，从而给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带来危险。为了满足民主德国政府的要求，苏联断然放弃了赫鲁晓夫于1964年夏提出的同联邦德国重新修好的倡议。苏联也担心拥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的联邦德国的和平渗透，因此不容许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联邦德国贸易代表团^⑩。苏联反对联邦德国大联合政府的搭桥外交，并使民主德国与波兰联合筑成一道集团的共同阵线，防止联邦德国在东欧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对罗马尼亚未经苏联同意与联邦德国建交持批评态度，进行孤立。苏发表声明要求联邦德国必须满足民主德国提出的建立“正常化”关系的最高条件，即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⑪。民主

德国和波兰作用上升的另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它们是镇压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最坚定的推动者和支持者。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害怕“布拉格之春”给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地位带来危险，他们推动犹豫不决的苏联对捷采取武力行动。乌布利希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了一定的上升，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应该给予捷共领导以“集体帮助”，如果形势要求的话，为了保障捷社会主义的成果，直到采取“极端措施”^⑩。哥穆尔卡担心捷克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他说：“我们不能失掉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如果我们失掉了捷克斯洛伐克，那就很难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紧接着捷以后，我们就会失去其他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因此，我们应该不惜使用武装干涉。可以动用华沙条约，其中包括波兰的军队。”^⑪民主德国和波兰的态度在推动苏联出兵捷克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发挥的作用与它们的地位可以说是很不相称的。

苏联对东欧控制的削弱还从华约国家在一些问题上发言权的扩大上看得出来。1966 年 5 月 27 日，华约在莫斯科举行国防部长会议，苏联在会上建议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常设中央理事会，由于一些东欧国家的反对而未成立^⑫。在对联邦德国关系问题的处理上，罗不顾苏联的批评，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捷也不顾苏的不满，积极发展与联邦德国的经贸接触和交往。

然而，勃列日涅夫对于东欧一些国家平反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冤假错案的工作并不是尽心支持和帮助。如 1968 年 4 月，捷共中央决定专设一个由各方专家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负责关于政治审讯案件的调查与平反工作。但苏联领导集团不是采取积极支持和帮助的态度，而把这方面所进行的每一个行动都看成是挑衅。该委员会没有能去查苏联的档案，也没有听到受苏共的委托、自己参与筹备和进行审讯的一些还活着的苏联领导人的证词，其实他们更能清楚地说明筹备和进行审讯的那些问题^⑬。

同时，正是在民主德国、波兰等的推动下，苏联等华约五国武力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结束了乌布利希主义的势头和苏联对东欧的“权力真空”状态。勃列日涅夫转而回过头来对东欧国家念“紧箍咒”。勃列日涅夫主义出笼了。苏东关系进入了第二个阶段：1968年苏入侵捷克到1974年，苏联加紧了对东欧的控制。

1968年4月，刚刚出任捷共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主持制订了《捷共行动纲领》，提出了新的改革设想：从根本上改变捷的经济机制，准备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把经济领域的改革扩大到政治领域，主张党政分开，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的活动独立自主，各党派之间确立伙伴关系，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及实行联邦制，等等。苏很担心捷会脱离“社会主义道路”。6月，捷克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二千字宣言》，苏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真理报》文章认为这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基础的攻击”^⑬。苏共中央政治局以冷战思维来看待这一问题，一致认为捷右派势力依靠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秘密的和公开的支持，准备进行反革命的政变。华约五国一致同意这一分析^⑭。1968年侵捷前夕，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时，勃列日涅夫还理直气壮地说：“你们那里有一些人企图向舆论界证明，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灌输自己的方法、形式、经验，干涉内政……历史学家们找不到任何一条关于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灌输自己的经验的证据。是你们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结构形式，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因此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谴责苏联的。”^⑮7月，华约五国发表了致捷共中央委员会的联名信，口口声声要捷共警惕“反革命的危险”。不过，这些都没有能说明苏联骨子里的真正动机。8月，苏联在镇压“布拉格之春”后，勃列日涅夫与被抓来苏联的杜布切克等人进行了谈话。这次他完全撇开了5月以来所说的同志式的声援，包括友谊的提法，取而代之的完全是现实的政策。他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苏联安全地带的组成部分，苏联是不能放弃它的。与“布拉格之春”有关，苏领导人不能容忍捷滑向独立的方向。当捷不愿屈从于各种形式的压力时，苏联就要以武力来改变其方向^⑩。考虑到现实的力量对比和军备状况，捷党和政府号召人民放弃武装抵抗，而进行非武装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抵抗。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声明，表示仍然拥护杜布切克；捷国民议会提出抗议，谴责华约部队的入侵“违背了国际法、华沙条约的规章以及各国间权利平等的原则”。苏强迫被绑架到莫斯科的杜布切克等人签字、画押，发表《苏捷会谈公报》，把苏军占领说成是“盟国军队”“暂时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以后双方又签订了《关于苏联军队驻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条件》。与1956年苏波条约和1957年苏匈条约相比，该条约是苛刻的：这两个条约规定苏军在它们的驻地以外活动需经驻在国政府同意，而苏捷条约则无此项规定；对布拉格被占期间的任何损失，也不给予任何赔偿^⑪，还规定“苏军编制人员及其家属进入、留驻或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时，免受护照或签证检查”，这一规定实际上使苏军的占领合法化了。华约还对捷克的军队进行了改组。一年后，苏扶持胡萨克取代杜布切克，全盘否定了“布拉格之春”。在苏联的压力下，捷共中央全会对1968年事件作了这样的评价：“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是国际主义的声援行动，这种行动既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国际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阶级利益。”^⑫

随即，作为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勃列日涅夫主义出台了。1968年9月26日《真理报》发表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国际主义义务》，公开指出：“每个共产党不但对本国人民负责，也要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负责。无论谁忘记了这一点，只强调共产党的独立，就有片面性，他就背离了他的国际主义义务……

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够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⑩。11月，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说：“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背离了这些普遍规律就可能离开社会主义本身。而当某一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当出现危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不仅仅是这一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⑪1971年3月，勃列日涅夫又弹起了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在谈到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时，他说：“生活经验再一次令人信服地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团结，是那些企图进攻和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破坏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并使之化为乌有的势力的道路上最可靠的障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向全世界清楚地表明：它们不会把自己的革命成果拱手让出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边界是牢不可破的和不可侵犯的。”^⑫勃的这些论调的实质是苏联“大国责任论”，东欧“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阵营“国际专政论”，即社会主义阵营有集体干涉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权力。苏联等华约五国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并且抛出这种“社会主义国家集体有权干涉一国内政”的论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坚决反对。

武力镇压“布拉格之春”说明了苏联又念起了对东欧的“紧箍咒”。1968年1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五大。勃列日涅夫为了报答哥穆尔卡在中东、捷克问题和中苏冲突中对苏联的支持，不辞劳苦，亲自前来参加代表大会。此时由于哥穆尔卡在国内从改革方针后退，放弃波兰道路；在外交上追随苏联亦步亦趋，其地位已岌岌可危。只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干预，他才勉强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1969年3月17日，由于苏联的影响，华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决定加强华约联合武装部队的机

构，成立国防部长委员会和由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以便加强华沙条约的军事联盟作用。

1969~1974年，是苏东关系的第二阶段。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出台标志着乌布利希主义即将结束。1971年5月，在苏联的支持下，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撤掉乌布利希的第一书记的职务，以昂纳克取而代之。原因是，60年代末，苏联积极讨论缓和问题，准备响应联邦德国小联合政府的新东方政策，与联邦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民主德国出于自身的特点，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乌布利希还企图阻碍这一进程。勃列日涅夫对他大为不满。勃曾自负地对昂纳克说：“难道不是苏联、不是苏共、不是苏联人民改变了这个世界？”^⑳在此前不久的1970年7月，勃列日涅夫私下指示昂纳克说：“现在你要把更多的事情集中到你的手中……我们早已有打算，让你在他（乌布利希）之后领导党……这个问题已经定了。”同时又警告他说：“我坦率地告诉你，换了你也一样，不能不顾及我们而进行领导……我们可有军队驻扎在你们那里。”^㉑尽管并非所有人同意昂纳克担任党的第一书记，但苏联支持他，勃列日涅夫亲自参加了民主德国统一工人党的十三大，保障了他的顺利上台^㉒。

与此同时，苏还对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施加了压力，防止它们越轨。因为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自1968年起陆续进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旨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和市场的作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苏担心匈国内“静悄悄的改革”有“偏离”苏联模式的危险。而罗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外交与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屡有不和谐之音，如与联邦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在捷克问题，中苏冲突问题，欧洲共产主义和中东战争等问题上与苏有不同看法。苏联施加压力产生了效果，如1971~1974年，苏罗两国关系不象以前那么紧张。1974年3月，匈牙利党中央全会把“匈经济改革之父”——涅尔什·雷热等改革派降了级，并着重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㉓。

这一阶段，苏东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同一个声音，同一个立场，以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进行斗争。60年代末，苏联完成了由对美国的战略劣势向战略优势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力图以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东欧为阵地，对西方大力推行缓和战略，展开“和平攻势”。1969年3月18日，《真理报》上发表了《华沙条约参加国致全体欧洲国家呼吁书》，其意是把欧洲作为战略重点，加紧与美国的“和平”争夺。在国际舞台上，苏东一起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扩大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中国终于于1971年成功地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⑳。1973年1月，北约与华约相互均衡裁减兵力的会议在维也纳开幕。与会者有7个华约国家和12个北约国家。华约国家中，苏、民主德国、波、捷是该会议正式成员，而保、匈、罗作为观察员参加。该会议的目的是“使中欧军事力量达成均势”^㉑。同时，东欧国家也不是事事无条件地听从苏联的。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也对苏东关系产生了影响：阿尔巴尼亚与中国交好，而罗马尼亚在中苏间保持中立。苏联曾提出把华沙条约运用到对华关系上来，企图使东欧成员国承担一旦中苏开战就给苏联以援助的义务，因东欧国家反应冷淡甚至反对而没有结果^㉒。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中也出现了矛盾，如1973年由于爆发了世界石油危机，苏联提高输出给东欧国家的石油价格，引起东欧国家不满。

1975~1979年，是苏东关系的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苏东关系比较平静。既不像第一阶段的“失控”状态，也不像第二阶段的“高压”状态。没有什么特色和突出的事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的东欧战略是巩固和保持苏东“牢不可破的友谊”，在意识形态上，在国际事务中保持高度的一致，以便在国际形势缓和和军事上对苏有利的发展势头下与美国展开全球势力争夺。东欧与苏联一样，是苏联展开全球争夺的根据地。

面对经济与技术的落后，苏东共同促进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于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并签署了最后文件。该文件承认战后的各国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两个德国的边界线和民主德国与波兰的国界线即奥德—尼斯河线，同时也等于承认了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这个会议对于苏联和东欧来说意义都是很大的。对于东欧来说，为其安全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对于苏联来说，则确认和巩固了其在欧洲东部地区的“势力范围”。东欧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此时基本上已固定下来了。苏东在思想上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保持同一声音，同一立场，统一行动。在思想上，勃列日涅夫认为“缓和并不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定期召开共产党、工人党书记会议，逐渐成为一种规则^⑩。在国际舞台上，苏联利用其军事实力赶上并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的有利之机，在遍及全球的势力争夺中经常需要东欧国家的支持和配合。这一阶段，东欧国家卷入欧洲以外事务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东欧一些国家，主要是华约北翼国家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出钱出人随苏联支持亚非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如越南，安哥拉，叙利亚，古巴，以扩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如民主德国就向亚非国家派遣了2225名军事顾问和专家，它每年还向2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5亿马克的军援和其它援助。这一阶段，波捷两国向第三世界分别提供了价值3亿2千万和1亿4千万美元的武器^⑪。70年代下半期，为了实行裁军、防止战争，推动国际形势的缓和，苏东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了合作。苏东在这一时期还发展了同经济发达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苏还利用东欧一些国家结成反华统一战线，以维护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主地位。

勃列日涅夫注意运用华约和经互会在联结社会主义阵营方面的作用。1976年5月《华沙条约》20周年期满时，缔约各国代

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重申“愿意在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础上同时解散华沙条约组织”，这表明《华沙条约》将自动延长。11月，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决定成立华约外交部长委员会和联合秘书处作为政治协商委员会的辅助机构^⑭。在同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花相当篇幅再次谈到了加强华沙条约和经互会作用的重要性。

苏东关系表面平静，既没有出现像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那样公开与苏闹翻的情况，也没有再出现敢于搞不合苏联口味的改革的第二个捷克斯洛伐克。苏东党、政府、地方各级党政组织和社会团体保持着亲密的经常性的互访和友好往来。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由于欧安会带来的缓和，东欧国家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科技联系增多，眼界打开了。西方国家通过经济科技往来和思想文化渗透，选择东欧一些国家如波兰，匈牙利为突破口，大搞和平演变，企图削弱东欧与苏联的联系。东欧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对苏联的依赖程度降低了，苏联模式的吸引力下降了。东欧国家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了。1975年底，波兰发生了修宪风波。一些知识分子反对在波兰新宪法草案中公开的“亲苏言词”，迫使当局作了让步。波持不同政见者的反苏言论使苏颇为恼火。1977年，捷克又发生了“七七宪章”事件，捷近三百名知名人士签署要求捷克政府恢复基本民权的呼吁书，发出“主权何在？”的呼声，表现了对苏联控制的不满^⑮。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国际形势骤然紧张。东欧国家没有与苏联一起出兵，在外交上的支持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如波兰只表示了有保留的支持^⑯，罗马尼亚作了含蓄的批评^⑰。苏东之间出现了缝隙，苏开始感觉到有必要加强意识形态控制。80年代初，历史提供了新的契机，苏东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0~1982年是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后两年。这一阶段由于阿富汗事件与波兰1980~1981年危机，国际形势恶化，美对苏实行强硬的遏制政策，苏美又进入“新的冷战”。苏联对东欧

国家又实行了“收紧政策”。其典型表现就是对波兰事件的处理态度。这年波兰发生工人大罢工，反对派——团结工会崛起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联领导人非常担心。1981年4月，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讲：“波兰的形势影响到了我国西部地区的一些州。其中白俄罗斯能清楚地收听、收看到波兰语的广播和电视。同时还要指出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包括格鲁吉亚，出现了自发的游行，有些好事之徒打算上街，就在不久前第比利斯出现了反苏的口号，等等……”受波兰罢工运动的影响，1981年，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工业城市，特别是在立陶宛爆发了群众性的罢工^⑤。勃列日涅夫曾给波党第一书记盖莱克打过直拨电话，说：“你那里有反革命，要掐住他们的嘴巴，我们将会援助你。”^⑥苏联领导人认为波兰的这次危机与以往不同，它要改变的是波兰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苏联一是通过宣传工具，二是通过党的关系，三是通过华沙条约对波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在苏联的压力下，波党先是以尤尼卡取代盖莱克，后以雅鲁泽尔斯基取代尤尼卡^⑦。11月份的《真理报》就把波兰事件和团结工会称为“反革命”。苏联塔斯社谴责团结工会及其一大是“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闹剧”^⑧。1981年6月，《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委员会致波兰共产党的公开信。公开信首先谴责了波党领导一再向反革命势力妥协、让步，说“波兰的形势不仅危险，而且濒于危机的边缘”，强调波兰对“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承担着“义务”。公开信公开支持波兰党内的亲苏派^⑨。勃列日涅夫还一再强调了华沙条约的作用，强调波兰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牢固的一环”，“可以坚定地指望得到华约缔约国的兄弟声援和支持”；“大家庭每个国家阶级利益的国际化是现今的客观规律”，“大家庭”有责任保卫它们的“社会主义成果”^⑩。勃列日涅夫表态说：“波兰共产党员在波兰所有真正爱国者的支持下，是能够给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他们也是波兰独立的敌人的阴谋以必要的回击的……至于苏联，那么可以说，

它过去是，将来仍然是社会主义波兰的忠实朋友和盟国。”^④在军事上，苏已经从东西南三面并从海上形成了对波兰的军事包围，完成了从陆上和海上入侵波兰的准备^④。驻波苏军也进入战时状态^④。勃列日涅夫逼雅鲁泽尔斯基说：再不采取行动就晚了^④，意思就是苏军就要采取行动了。“国际专政论”的阴影笼罩在波兰的头上。在国内外巨大的压力下，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党和政府断然实行军管措施，取缔团结工会。波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匈、民主德国、捷得到贷款，原料和设备，以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波军政当局不断强调：“加强波兰与苏联的同盟关系，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波兰国家的不可动摇的立场。”^④苏联直接出兵干涉的危险总算过去了。

由于国家利益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又都受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东欧政策和苏东关系，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全球战略与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的全球战略是一致的，即阵营对抗、势力争夺。对东欧的地区战略也是一致的，即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世界革命的排头兵。控制和放松是苏联的东欧政策共同的、基本的两手。

斯大林时期放松与控制是依次进行的，而赫鲁晓夫是同时进行的，勃列日涅夫则是交叉进行的。在控制方面，勃列日涅夫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的控制是建立在守势的基础上，而勃列日涅夫的控制是建立在攻势的基础上；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实行“批判的武器”，而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武器的批判”；斯大林通过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反对派或“民族派”而控制东欧，说明东欧社会阻力很大，而勃列日涅夫通过从内部操纵、任免东欧党政领导人来控制东欧，似乎更高一筹。斯大林号召推翻铁托，赫鲁晓夫号召打倒霍查，但都没有成功。而勃列日涅夫成功地以胡萨克取代杜布切克，以昂纳克取

代乌布利希，并安排英德拉制约胡萨克，安排斯多夫与昂纳克竞争。在 80 年代初的波兰危机期间，先以卡尼亚取代盖莱克，后又以雅鲁泽尔斯基取代卡尼亚。苏联最终操纵局势。而对于原先受苏联宠爱、后来完全失去本国人民支持的诺沃提尼和哥穆尔卡的下台不作干预。赫鲁晓夫对东欧作过一些让步，承认苏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勃列日涅夫从来不承认有错误，不作原则性让步。

勃列日涅夫时期加强了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作用。在斯大林时期苏联与东欧并不存在统一的军事政治组织，经互会的活动很少，赫鲁晓夫时期华沙条约也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1956 年苏一国出兵匈牙利，华约只是事后才成为为苏军行动辩护的理论根据。勃列日涅夫时期华约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利用华约威胁波兰。苏共从二十三大至二十六次，勃在每一次政治报告中都要花相当篇幅谈华沙条约和经互会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作用，强调华约和经互会在团结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注意从思想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防止其对苏东关系的挑拨离间。如 1968 年 11 月勃讲到：“在新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者越来越经常采用另一种更为阴险的策略……企图在它们（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注）之间制造纠纷，挑拨离间，鼓励和煽动民族主义感情和倾向，力图孤立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一个个分别掐住它们的脖子。”^④。在 1980 年波兰危机发生时，勃列日涅夫告诫盖莱克要注意近年来日益尖锐化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的矛盾^④。

对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这样“不听话”的国家，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把关系搞得很僵。而勃列日涅夫时期，除了因 1968 年入侵捷克一度遭到南的反对外，其余时间基本能与南和平相处。1965 年南斯拉夫参加了经互会机构的工作。勃上台伊始就主动努力争取恢复与阿尔巴尼亚的正常关系，曾两次试图同阿和好。第一次是通过波兰人邀请阿参加 1965 年 1 月华约国家政治

协商委员会会议，第二次是邀请阿参加同年3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但都被阿断然拒绝了^⑭。阿因1968年苏入侵捷克事件而退出华约。70年代到80年代初，勃虽没有在改善双方关系方面采取建设性和实际的步骤，但也没有再进一步恶化双方关系^⑮。

斯大林战后执政8年，开除南斯拉夫，在东欧各国清除“民族共产主义分子”，重视利用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与东欧缔结华沙条约，威胁波兰，出兵匈牙利，处死纳吉，与南斯拉夫再度交恶，大起大落；而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除了捷克和波兰事件外，苏东相对比较平静、团结。6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长，尤其是70年代，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重大问题没有苏联、没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参与是解决不了的。勃列日涅夫继承了赫鲁晓夫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大会的形式，来确立苏联党和国家的领袖地位。

勃列日涅夫善于实行区别对待政策。如一方面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另一方面又容忍了匈牙利的改革，对“不听话的”罗马尼亚实行遏制政策，对民族反抗性很强的波兰进行警告和威胁。一方面撤换杜布切克和乌布利希，一方面对诺沃提尼和哥穆尔卡的下台最终不加干预。

四、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 (1982~1984年)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的时间都比较短，其东欧政策基本上是对以前政策的继承和调整，但两者又不尽相同。

安德罗波夫从总体上继承了勃列日涅夫的东欧政策，并没有放松思想控制。他说：“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仍将是我们党关

心的头等大事。我们的力量在于团结，团结也是在严峻的考验中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④1983年4、5月间，苏联就罗马尼亚和波兰出版的小说和报刊上的一系列文章，对罗、波进行了激烈的抨击。4月15日，苏《新时代》发表文章，指责罗《现代》周刊1982年登载的罗经济学家瓦西里·约查的文章，说该文把世界分成穷国和富国是“以民族标准取代阶级标准”的一种“反动概念”，是“把帝国主义国家固有的特性、扩张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意图硬加到社会主义国家头上”。5月4日，苏《文学报》又发表文章，指责罗共中央执委杜·波佩斯库所著三卷本小说《拳与掌》“丑化苏军解放者的伟大形象”，“在污蔑”苏联方面“不比资产阶级作家逊色”。其目的就只有一个：“责问历史，向历史挥舞拳头。”罗刊反驳苏刊的“别有用心的歪曲”，“弄虚作假和断章取义”以及盛气凌人地教训别人、乱扣帽子等等恶劣作法。5月6日，苏《新时代》又发表文章，指责波兰《政治》周刊去年登载的大量文章是在宣扬“世界观方面的多元论”，并隐晦地攻击波党执行的扩大民主，对待教会和团结工会的政策和农业政策。波《政治》周刊只对此作了极其温和的解释。波舆论界则认为这是“对波兰内政的干涉”，也就是反对波党奉行的“革新路线：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根据波兰的具体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有人还说，苏文章“打在《政治》身上，痛在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心上”。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反映了苏不愿放弃对罗马尼亚、波兰等国的思想控制的意图^⑤。

同时，安德罗波夫对苏东关系作了局部的调整。与以前相比，苏联的东欧政策变得相对宽容一些，允许东欧国家进行一些适合本国需要的改革，安德罗波夫甚至还表示“苏联应当更好地利用友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在1983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安德罗波夫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是自然的……”^⑥在庆祝苏联成立6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包括了两个主要

的意思：一是承认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是不同的；二是暗示苏联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犯过错误。在《真理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还承认东欧国家在计划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经验，说这些经验对苏联有“教益”，并表示要“研究”和“学习”这些经验^⑭。苏还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匈牙利、民主德国搞起了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波兰问题使苏头痛，不管不行，但也没有使出像勃列日涅夫对待捷克改革的那种手段^⑮。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只开过一次。至于契尔年科，他缺乏安德罗波夫的革新精神，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上台伊始，他就公开表示要继续奉行安德罗波夫的“原则路线”，还说“继承性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事情”^⑯。在国际关系方面，他表示“我们将致力于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我们全力发展和加深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团结和合作，当然也包括经济这样一个重要领域的合作”，“我们可以告诉兄弟国家：苏联今后仍将是你们的可靠的朋友和忠实的盟邦”^⑰。1984年，由于美国在西欧布署中程核力量，苏联采取了对抗态势，在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部署了 SS-21 和 SS-22 核导弹，迫使昂纳克取消了他已宣布过的对联邦德国的访问^⑱。这说明，安德罗波夫相对接近赫鲁晓夫，而契尔年科更多地是继承了勃列日涅夫的东欧政策。

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 (1985~1991年)

从历史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1991）无论是在战后苏东关系史上，还是在苏联的东欧政策问题上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作为苏联整个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改变了苏联传统的东欧政策，东欧发生了剧变，并对苏联产生了反作用，苏东同盟瓦解。不过，戈尔巴

乔夫时期苏联的东欧政策既不是孤立的，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后来的那种样子，而是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

（一）传统政策的最后一抹余辉（1985~1987年初）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对苏联的传统东欧政策是继承的，对苏东同盟关系也是重视的。1985年6月，《真理报》发表名为《实践中的国际主义》的文章，坚定地指出经互会国家的利益必须与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利益”“正确地结合在一起”。文章认为，共产党人必须“时时处处”忠实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几天后，该报又发表了调子一样的另一篇文章，具体地谴责了一些国家的错误行为，同时又不点任何国家的名，这些错误有：不适当地强调民族特点；对社会主义共同的基本原则缺乏尊重；恐俄仇俄和反苏主义；不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⑬。1985年4月，尽管罗马尼亚等国有保留意见，但华沙条约国家在华沙签署了延长该约20年又自动延期10年的文件，“以求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与合作”。对于罗马尼亚1985年5月发出的削减华约组织防务开支的计划，苏表现出不高兴。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结束与美国总统的最高级会议后，于21日在布拉格作了停留，向华约各成员国通报会议情况，以显示在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形势面前，各盟国的“共同一致性”和“阶级基础上的团结”^⑭。这样一来，戈开创了一年连开4次华约最高级会议的先例^⑮。1986年2月，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戈谈到，苏共要为发展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泛联系而努力，同所有共产党，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所有国家建立同志式的交换意见的关系。二十七大通过的章程明确指出：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坚决站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立场上，积极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合作和团结的巩固^⑯。4月，在德国统一工人党十一大上，戈尔巴乔夫讲：“我们从来没

有把苏联的前途与民主德国及其他兄弟国家紧密的相互作用分割开来，这不仅是因为国际主义的观念要求我们这样做，而且离开这种紧密的联系，时代所提出来的复杂的任务就不能得到解决。”^⑭戈在苏联外交部的讲话中依然坚持，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应居于优先的地位；“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没有华沙条约就很难想像整个世界政治”^⑮。表示苏联“要始终不渝地坚决支持社会主义阵营国家”^⑯。“新思维”外交的干将、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也要求扩大、完善和加强大家庭的同盟关系，认为在改革和革新的阶段，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社会主义大家庭是我们巨大的、无价的财富，这能使和平更可靠、更安全，更能保证实现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总方针^⑰。苏联对盟国的控制并没有完全放松。如民主德国很想改善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在契尔年科去世那天，昂纳克对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国情咨文表示赞赏，而这篇演讲不久前还受过莫斯科的批评。在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期间，昂纳克与科尔进行了会谈，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希望东西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并发展两国“正常友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认为昂纳克的步子太快了。最后苏逼使民主德国与自己一起搞了一个措辞强硬、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联合声明，表明游戏的规则是由莫斯科来决定的^⑱。戈尔巴乔夫对匈牙利卡达尔改革进程的接受是有保留的，戈虽然接受了匈的改革，但回避在公开场合予以明确的和完全的支持；匈牙利人被不断地提醒：要把国内的事态发展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同西方打交道要谨慎小心，要遵守“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尽管苏联暗示了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运用匈牙利经验，但排除了在苏联和其他盟国进行类似于匈牙利改革的可能性；苏要求匈继续参与整个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和支持集团的外交政策倡议，尤其是影响苏联战略利益的外交主动行动^⑲。罗曼诺夫代表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在匈社会主义工人党十三大上的讲话，典型地代表了苏联对匈牙利改革的态度。他说：“可靠地捍卫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唯一途径，就是巩固我们整个大家庭，发扬我们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传统。”^⑧ 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讲话中还维护 1939 年的苏德条约，在纲领性讲话和华约文件中不提民族自决权；在波兰之行的讲话中只字不提卡廷事件，对 1968 年侵捷事件保持缄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布拉格逗留期间还为侵捷事件辩护^⑨。一方面尊重“国际主义”，一方面又强调“爱国主义”，一方面表示要消灭历史的“空白点”，一方面又故意回避某些问题。这说明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是矛盾的，对传统的东欧政策既有继承，又有改变。表现为较多地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东欧政策。

（二）“新思维”与苏东关系

1. “新思维”理论的提出（1987 年）

“新思维”的代表人物是戈尔巴乔夫。1987 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是其代表作。其实，新思维还应包括戈尔巴乔夫及其集团成员在各种场合所作的报告、谈话，及在各种正式出版物中发表的文章。新思维是苏联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直接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服务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因而倍受世界各国的注意。

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苏联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内部，科学技术进步缓慢，国民经济的发展陷入长期停滞状态，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外部，与西方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美国“星球大战计划”使苏联面临被拖垮的危险。苏联原来的内外政策难以为继，苏联社会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戈提出了“加速社会发展”的战略。外交是内政的向外延伸，服从并服务于内政。为国内“加速战略”服务，戈等苏联领导人提出了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新思维”一词是戈尔巴乔夫 1986 年 1 月在一项声明中首先使用的，随后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中作了详细说明。“新思维”

立即成为苏东国家政治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时髦词汇，并传遍了全世界。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生存高于一切”^⑩。因为在核战争情况下，核武器能把人类彻底毁灭好多次；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只能是一起毁灭。人类的安全需要人类的共同合作和努力，因此，在战争和革命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以人类的生存价值观为基础，提出人类的利益大于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因而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应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解散军事政治集团，提倡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在军备上实行“合理足够”的原则。戈的这种和平共处战略与斯大林的阵营对抗战略是截然对立的，与赫鲁晓夫的“和平渗透”战略也大不相同。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原则看成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策略手段，它被置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利益的范围之内^⑪。而戈尔巴乔夫把和平共处作为“国际关系的最高的普遍原则”^⑫，“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这是一种国际秩序”，是核时代“全人类存在的条件”^⑬。“和平共处”被视为一种国际关系的秩序目标。

在欧洲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共同的欧洲大厦”的概念，指出了实行全欧政策和全欧合作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同时指出了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戈认为欧洲比其他各大洲相互依赖程度更高，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更迫切，因此，欧洲各国应该结束因对抗而相互隔离的局面，把全人类的利益，欧洲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共同建立一个文明的新欧洲。表示“不再通过苏美关系来看待欧洲”^⑭。

苏联新旧思维的区别在于，旧的思维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世界”只看到同一性，否定对立和斗争；对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又只强调对抗性，否认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新思维”的观点是，对内承认多样性，正视矛盾和冲突；对外强调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初始认识中包括了一些合理的东西，放弃过时的“总危机”理论，否定军备竞赛，承认和平共处和经济技术联系的重要性，不把意识形态分歧带到国际关系中来。这些对于改变苏联传统的对外政策目标，推动国际形势的缓和，结束冷战，改变战后的雅尔塔体制，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新思维本身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和不完善。首先，当今世界，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集团利益等等是客观的现实存在，否认其存在而只谈全人类的利益只能是空想；其次，地球上的核武器掌握在几个核大国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手中，核战争的威胁主要来自超级大国的争夺。因此，主张“全人类价值观”必然要使两个超级大国走向调和，使新思维许多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接近；第三，一方面提出新思维，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并没有彻底放弃社会主义“大家庭”思想，这本身就构成了一对矛盾。在军备竞赛，地区争夺等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在东欧问题上，苏东以铁板一块的同盟形式与西方抗衡已不再必要，东欧对苏联的战略重要性大大下降了。苏联的放手政策导致了东欧剧变，倒向西方。“新思维”走入了死胡同，最后销声匿迹，与西方价值观完全认同。

2. “新思维”与苏东关系

新思维意味着苏联改变了传统的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给苏东关系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具体包括：政治思想理论方面、历史问题方面、改革问题方面、外交问题方面，等等。

在政治思想理论方面，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中专门谈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主张在政治上“一定要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整个政治关系体系……每一个党有自主性，它有权自立地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对自己的人民负责——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⑮。至于经济关系，应“建立在始终不渝地遵守互利和互助的原则基础上”^⑯。戈还在《苏联外交通报》上发表文章，在强调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居于优先地位的同时，提出注意把这种关系建立在尊重它们的经验和尊严，理解民族特点，相信它们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能力的基础上。要克服外交人员中存在的偏见，骄傲自满和因循守旧的作风。不要认为我们可以教导所有的人，谁也没有给我们这种权力。相反，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应该谦虚^⑭。“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⑮。苏注意尊重盟国，几次苏美首脑会晤，事先经同盟国商量，事后向盟国通报情况。谢瓦尔德纳泽在指出“要扩大、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反思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共同商定的相互关系准则在过去远未经常得到实施。集体原则遵守不够，形式主义、讲排场、对发展的特点考虑不周，不善于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等都给共同的事业带来了损失”^⑯。戈的新思维还影响到了政论界。苏联一家颇有影响的刊物发表文章，发挥了戈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间不恪守和平共处原则，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在理论上，不再把社会主义国际关系准则同资产阶级的民主准则截然分开，而认为应以新的现实内容充实后者，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⑰。

在历史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表示要填补苏东关系上的“空白点”。在他看来，这些“空白点”不解决，不利于“新思维”的推行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改善。苏波关系史中这种“空白点”比较多。1987年，苏波共同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共同研究和解决两国、两党间的历史“空白点”问题，比如1920年苏波战争，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解散，特别是1939年苏德划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和1940年的“卡廷森林事件”，等等。苏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苏联方面或反思，或平反，或检讨。1986年，在阿尔巴尼亚建党45周年之际，苏联报刊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在对阿关系上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并宣称使苏阿

关系恶化的某些原因现已不存在，重申愿与阿国家关系正常化，并允诺向阿提供援助。1988年，戈尔巴乔夫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明确表示双方关系要建立在《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改变了以往回避这两个文件的态度^⑭。从1989年8月开始，苏联报纸接连发表文章谴责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行径。12月4日，当年参加入侵行动的华约五国在苏联一起宣布1968年它们“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对主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干涉行为，应当受到谴责”^⑮。同一天，苏联政府发表声明：“1968年5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没有理由的，从现在众所周知的全部事实来看，关于出兵的决定是错误的”^⑯。在捷克发生动乱前，苏联不但不支持捷共对1968年事件不予平反的立场，相反要求捷共尽早解决这一问题。关于匈牙利问题，在匈共反对派提出对1956年事件进行平反时，苏联带头表态予以肯定。

在改革问题上，苏领导积极倡导和敦促东欧各国尽快改革。一方面，苏联视东欧为“新思维”改革的试验场；另一方面，苏领导人希望通过东欧的改革成功反过来促进苏联本身的改革，减少国内改革的阻力。苏领导人把自己的新思维改革的立场和对形势的估价多次通告给东欧盟国。从1986—1989年在双边和多边会晤中多次谈到过革新的必要性，“公开性”、“民主化”停滞不前的危害性。东欧各国对此反应不一，有的同意，如波兰，捷克；有的表面同意，实际不同意，如保加利亚；有的进行了一般的抵制，如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有的根本不同意，如罗马尼亚^⑰。戈尔巴乔夫对带头搞改革的波匈褒扬有加，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学习它们的“改革经验”。民主德国对戈尔巴乔夫“根本改革”的热情有限，民主德国报刊对“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报道是谨慎和有限的，强调的是“继续执行”过去成功的政策和“进一步开展集约化”。昂纳克在德党十一大的报告中一句也未引用戈尔巴乔夫的话^⑱。昂纳克让在民主德国党的机关报上全文照

发了尼娜·安德列耶娃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为斯大林辩护的公开信，而苏联拍摄的揭露斯大林的电影却不准在民主德国上映^⑧。1987年6月初，一群年轻人在柏林苏联大使馆门前集会两个多小时，高喊“给我们一个戈尔巴乔夫”，被警察和国家安全人员驱逐^⑨。1987年，民主德国查禁了苏联的杂志《同路人》^⑩。1989年起，民主德国停止了向苏联派遣大学生学习社会科学^⑪。齐奥塞斯库认为罗马尼亚已经超越了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阶段，并且已进入了完善阶段，戈一点也不了解罗马尼亚，因此罗没有必要倒退^⑫。苏联对它们施加了压力。1989年苏领导人出访民主德国期间，除大谈他的“政治新思维”，宣传苏联的“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自由外，还告诫昂纳克说，“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列火车”^⑬。还说，谁不正视现实，就必将受到现实的惩罚。在罗马尼亚局势动荡前，苏领导人曾传信齐奥塞斯库，要求罗开始“改革”进程。对保加利亚，苏传信给日夫科夫说，“落伍者终将被生活所淘汰”，暗示他若不改革，就得上台。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说：“哪个地方落后于成熟的变革，哪个地方就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⑭这既是对东欧各国改革的敦促，也是对抗拒改革的东欧国家的警告。

在东欧国家的外交问题上。过去由于东欧既是苏对抗西方的主要依靠力量，又是西方和平渗透的主要对象，所以一直是苏联控制最严的领域。新思维对东欧国家外交活动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联鼓励东欧国家更多地同西方对话和合作。如1986年5月底，苏联表示支持匈、捷、保、罗和民主德国等与欧洲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1987年9月，昂纳克终于如愿以偿，出访联邦德国。此举大大地缓和了两国之间的关系。1986年，到联邦德国参观游览的民主德国人数达50万，次年更是达100万。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与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签署的《意识形态争论和共同安全》文件宣称：两种社会制度必须相互学习，和平共

处。社会制度之争只能在以和平竞赛的形式和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进行，意识形态之争必须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情况下进行^⑧。此文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1987年，雅鲁泽尔斯基出访意大利，美国副总统布什访问波兰，全面恢复了两国外交关系，波兰摆脱了自1981年实行军管以来的外交孤立局面。继美国官员访波后，其它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接踵而至。1988年初，昂纳克又访问了法国。匈牙利带着很强的经济目的发展同西方的关系，卡达尔亲自造访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在东西方关系进一步缓和的形势下，1988年6月，经互会和欧共体——欧洲两大国际经济组织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苏联在不断表示愿与中国改善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同时，还允许东欧国家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先行一步。东欧一些国家，如匈、波、民主德国、捷、保等国先后实现了对华关系各种级别的访问，双方关系日趋活跃。

（三）从“西纳特拉主义”到苏东同盟的瓦解

1. 从东欧“连锁”激变到苏联的失控

1989~1990年东欧发生了“雪崩式”的激变。各国共产党或被动失去政权，或主动改变性质。在波、匈和捷，共产党反对派夺取了政权。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不久也丢掉了江山。罗马尼亚发生流血的政变。南斯拉夫后来陷入了内战。东欧的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突如其来，令世人始料未及，眼花缭乱。

在局势明显地不利于苏联的情况下，在苏联行将失去自己最后一块势力范围——东欧的情况下，苏对外政策的新政治思维已经走入死胡同。1990年底实行“新思维”外交的主将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就是其明显的标志。但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回到传统的政策上来。苏联这一阶段实行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西纳特拉主义的政策。

西纳特拉是美国著名的歌星，其演唱的歌曲主要宣扬“我行

我素”，“听其自然”。按照苏联外交部发言人格拉西莫夫的说法，苏联对于东欧剧变采取的是一种西纳特拉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苏联对东欧形势的发展变化“听其自然”，让东欧各国“我行我素”，悉听尊便。具体说来，就是尊重主权，不干涉，承认选择自由等三原则。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由美国等西方势力支持的反对派一团结工会争夺政权的激烈较量中，苏联以“不干涉波兰内政”为由作壁上观，没有给予波党以任何支持和帮助。而当团结工会建立了战后东欧历史上第一个非共产党人执政的政府时，苏联表示了祝贺^⑩。捷克公民论坛领导人哈维尔就任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克伦茨取代昂纳克就任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苏联均表示祝贺。在匈牙利，戈尔巴乔夫不同意卡达尔的领导，并且在动摇他的领导^⑪。在罗马尼亚，戈尔巴乔夫不喜欢齐奥塞斯库，并且策划推翻他的统治^⑫。因此，匈罗的突变也没有使戈尔巴乔夫觉得怎么遗憾。1990年12月，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会上论述了他的东欧政策。他在政治报告中说：“有人甚至责怪我们，说我们‘不战而退’，结果是出主意让我们采用以前我们采用过的和我们坚决不再使用，现在坚决予以谴责的方法。”^⑬谈到东欧朝何处去的问题时，戈认为“这是这些国家人民自己作出选择的问题。而我们过去和将来都严格遵循自由选择原则，这一原则成了进步的绝对要求和整个现代文明自我保存的条件”^⑭。苏联官方和学术界对东欧剧变的评价，一般都认为是“革命”、“起义”、“和平的人民革命”、“天鹅绒革命”、“民主的革命”、“反极权主义的革命”^⑮。1991年，苏军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撤走。经与波兰谈判，苏还表示在1992年底以前把军队从波兰全部撤走。

但是，“新思维”中并没有表示要完全放弃与东欧结盟的思想。戈曾强调要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放在居于优先地位^⑯。1989年东欧剧变使戈的让革新后的共产党在东欧继续执

政的设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型的苏东关系的设想，统统落空。新思维外交走入了死胡同，无法实施下去了。自此以后，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闭口不谈“新思维”了。在西方势力不断在东欧扩大的情势下，在苏东同盟行将瓦解的情况下，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又迫使戈采取了某种同新思维不相容的、恢复传统政策的态度，不愿对东欧完全失控，不愿完全失去对东欧的影响，不断地强调东欧对苏联的战略价值。如指出东欧不仅是苏联的盟国，也是苏联的朋友，苏联的邻居。苏联要努力确保东欧各国的稳定和整个欧洲的稳定，确保现有一切边界的不可破坏性。苏联保证反对外来干涉，决不让民主德国受到欺负。1991年初，苏联拿出了一份对东欧政策的决议书，检讨了最近几年来苏的东欧政策没有明确的战略构想，缺乏清晰的明确的战略目标，以至于苏的损失太大，西方势力得分太多。这实际上是对“新思维”的否定和批评。决议指出，要让东欧国家执行对苏友好政策，不要成为反苏主义策源地，不允许从东欧产生针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要保住苏联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阻止东欧国家加入类似北约这种军事政治集团^⑧。但此时，东欧倒向西方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苏联内部各种矛盾激化，危机频仍，濒临解体的危险，自顾不暇。苏联大势已去，其领导人的这些要求此时能有多少份量呢？苏联同意两德统一，但希望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但就是这个目的都不能达到，统一后的德国最终加入了与华约对立的西方军事政治集团——北约。显然，苏联对东欧已经失控。

2. 东欧对苏联的反弹效应

正如飞去来器原理：东欧的改革最先是由苏联启动的，但东欧形势的发展反过来又对苏联产生了影响。1989年的东欧剧变对苏联的反弹效应是很大的。

东欧剧变，共产党下台，反对派得势，鼓舞了苏联国内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他们的力量迅猛壮大起来。同时，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信任情绪增加了。很多党员

灰心丧气，组织涣散，成千上万的党员退党。苏共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苏共一开始还坚持一党制，东欧剧变以后，在迅猛壮大的反对势力的强大压力下，苏共二十大也宣布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联盟危机交织并发，联盟大厦摇摇欲坠。

东欧成功地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产生了“示范效应”，使苏联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也受到了鼓舞。民族主义成为决定苏联命运的最直接的因素，如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显然受到了东欧的影响。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问题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两难处境”或“悖论”：镇压，这与“新思维”、“民主化”不符，无异于承认改革失败，且会受到西方的反对，如在拉脱维亚问题上就是如此^②；不管吧，苏联的分裂不可避免，而且会危及自身的统治地位。这种尴尬的处境最终导致了苏联中央政权的失控和苏联国家的解体。显然，东欧剧变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大受损害。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先兆；东欧脱离苏联集团是苏联本身瓦解的序幕。两者不呈因果关系，但后者加速了前者的进程。

3. 苏东联盟的崩溃

东欧各国与苏联是相互联系的，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反对派频频夺权，实行政治多元化和经济私有化，意味着苏东政治同盟的崩溃。长期以来受到苏联压制的东欧国家民族主义迅速高涨，形成了狂热。全盘否定苏东关系的历史，例如波兰就称苏波同盟时期为“苏占时期”，称苏军为“殖民者”。波、匈、捷等中欧国家要求加入北约和欧共体，以求迅速摆脱苏联及其威胁。由于各种原因在遭到拒绝后，它们于1991年2月成立了维谢格拉德集团，旨在加强相互合作，对抗苏联的威胁^③。在政治同盟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军事、经济等同盟关系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苏东同盟关系的崩溃逐渐波及到军事、经济、社会诸领域。在匈、捷、波等国的压

力下，华沙条约组织于1991年3月宣布解散，6月，经互会也被解散。这样，联系苏东联盟的两条纽带都被剪断了。7月，苏联军队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苏联势力撤出东欧，东欧出现了“安全真空”。一些东欧国家对苏联或疏远，如捷、保；或反目，如波、民主德国、匈牙利。波称苏军为“占领军”，匈称苏军从匈撤走的6月30日为“自由独立日”。东欧一些国家（波、匈、捷等）军事上要求加入北约，经济上要求加入欧洲联盟，即全面倒向西方。东欧剧变对于苏联解体是一个促进因素。正如洋葱头，最外面的一层烂掉了，必然渗透到里面一层，直至整个葱头彻底烂掉。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狂热的反苏、反俄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过来又引起了俄罗斯的担忧，俄极力反对北约东扩。

东欧剧变的影响还具有世界性，它标志着战后形成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了，苏东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雅尔塔体系崩溃了，国际冷战格局结束了。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注 释：

①③④ 《苏联与东欧1991》，第41页，华盛顿，1991年版。

② 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第5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 楷罗琳·肯尼迪-派珀：《斯大林的冷战》，第46页，曼彻斯特，1995年版。

⑤ 费·丘耶尔：《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67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⑥⑩ 马·马·拉林斯基：《柏林危机 1948~1949 根据俄罗斯档案最新材料》，（俄）《近现代史》1995年第3期，第17页。

⑦ 白建才主编：《美苏冷战史》，第2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⑧ 格·马拉施科：《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 11～14 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⑨ O·A·尔列舍夫斯基：《攻克柏林·新材料》，（俄）《近现代史》1995 年第 4 期，第 159 页。

⑩ MICHAEL G. ROSKIN: THE REBIRTH OF EASTERN EUROPE, 1991 年，第 67 页。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冷战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 1945～1985 新透视》，第 83 页，84 页，82 页，84 页，90 页，94 页，96 页，96～99 页，93 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 年版。

⑳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ф.17, оп.8, д.782, 第 132 页。

㉑《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ф.074, оп.35, д.8, п.125, 第 107 页；Ф.452, оп.2, д.156, п.37, 第 112 页。

㉒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ф.17, оп.128, д.914, 第 205 页。

㉓ A·A·雅姿科娃：《苏联和美国政策中的东欧 1944～1945》，（俄）《近现代史》1991 年第 3 期，第 70 页。

㉔《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边防军 1942～1945》，第 513 页，莫斯科，1976 年版。

㉕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ф.17, оп.128, д.37, 第 15 页。

㉖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ф.17, оп.6128, д.782, 第 52～53 页。

㉗ M·M·拉林斯基：《柏林危机 1948～1949 根据俄罗斯的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5 年第 3 期，第 16 页。

㉘《苏联与东欧 1991》，第 41 页，华盛顿，1991 年版。

㉙“人民民主”这个术语来源于 1931～1939 年的西班牙革命。其内容是指一个新型的议会民主制共和国，一个特殊的国家，政权属于反法西斯联盟，其中包括进入人民阵线的左派资产阶级。这个人民阵线在社会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参见 T·B·沃洛根基那、马拉施科、洛斯科娃：《人民民主：神话还是现实？》，第 3 页，莫斯科，1993 年版）。在新的形势下，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上搞多党制，经济上搞混合经济。它被认为没有达到苏维埃

民主的水平，“苏维埃民主”是“高级形式的人民民主”（参见 T·B·沃洛根基那、马拉施科、洛斯科娃：《人民民主：神话还是现实？》，第 308 页，莫斯科，1993 年版）。

②⑥ A·A·雅姿科娃：《苏联和美国政策中的东欧 1944~1945》，（俄）《近现代史》1991 年第 3 期，第 74 页。

②⑦《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 471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 年版。

②⑧（保）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 107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②⑨（苏）《苏联历史》1991 年第 1 期，第 18 页。

②⑩（波）扬·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第 52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

②⑪⑫ 诺·科沃梅契克、阿·科塞斯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 1948~1960》，第 110 页，108~109 页，华沙，1977 年版。

②⑬ 波兰《新路》月刊 1947 年第 1 期。

②⑭（美）布雷德利·沙尔夫：《民主德国的政治与变革》，第 9 页，春秋出版社，1988 年版。

②⑮《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会上论苏东关系》，《今日苏联东欧》1990 年第 5 期，第 3 页。

②⑯《季米特洛夫全集》第 12 卷，第 63 页。

②⑰（保）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 101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②⑱ 伊斯索夫·姆：《保加利亚的工人阶级 1944~1947 年》，第 139~140 页，索菲亚党的出版社，1983 年版。

②⑲《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Ф.007，оп.27，д.11，п.121，第 12 页。

②⑳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82，第 46 页。

㉑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99，第 8 页。

㉒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Ф 0125，оп.34，д.11，п.130，第 38 页；Ф.074，оп.34，д.10，п.115，第 13~14 页。

㉓（保）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 106 页，人民出版

社，1991年版。

⑮《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3期，第78页。

⑯B·C·马尔萨达洛娃《苏联与波兰的关系 1945~1949》，第86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⑰《苏联与波兰——国际主义联系·历史与现实》，第253页，莫斯科，1978年版。

⑱路德威克·波耳：《友好和互助的关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中文版1960年第6期，第68页。

⑲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第106页，1992年版。

⑳（俄）《近现代史》1988年第4期，第31页。

㉑参见《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 1944~1949》，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㉒（苏）Л·Н·涅仁斯基：《社会主义阵营的起源》，第152~166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7年版。

㉓江流、徐葵：《苏联剧变研究》，第193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㉔（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第29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㉕扬·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沉浮录——三次转折之一》，第9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刘祖熙：《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第3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㉖尤·斯·洛沃巴什：《东欧前主人政治肖像》，第10~11页，莫斯科，1994年版。

㉗㉘㉙㉚尤·斯·格列科：《斯大林—铁托》，第325~326、333页、402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

㉛（苏）《近现代史》1988年第4期，第33页。

㉜《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3期，第87页。

㉝（南）热德拉斯：《极权主义的嘴脸》，莫斯科，1992年版，第130页。

㉞（俄）《近现代史》1988年第4期，第34页。

㉟《苏南1948年秘密通信》，（俄）《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第

156 页。

⑯(俄)《近现代史》1988年第4期,第38页。

⑰⑱⑲⑳ 参见(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 1939—1973 文件与评注》,第414~420、470、464~465、47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㉑(苏)《近现代史》1988年第4期,第38页。

㉒《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年》,第140页。

㉓㉔ 马·马·拉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3年第2期,第12、16页。

㉕ 见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36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㉖ 详见马·马·拉林斯基:《柏林危机 1948~1949 根据俄罗斯最新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5年第3期。

㉗㉘(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 1945~1970》,第28、44、55~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㉙《一个流亡者的历史 马加斯·拉科西在苏联 1956~1971》,(俄)《肯塔弗尔》1993年第6期,第79页。

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424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㉛《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3期,第81页。

㉜(南)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 1956~1958》,第35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㉝ 伊日·贝利康:《禁止公布的文件》,第16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㉞《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3期。

㉟ 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411页,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

㊱(美)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36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㊲ J·坎贝尔:《美国对共产主义东欧的政策:今后的选择》,英文版,第47页。

㊳《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188~18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1988年版，费·布尔拉茨基：《领袖与谋士》，第119页，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⑨《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4期，第74页。

⑩刘祖熙：《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第7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⑪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第118页，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⑫（美）J·布朗：《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第130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⑬参见《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1957年11月》，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⑮（南）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170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⑯（美）凯尔迪什：《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第3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⑰《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5期，第85页。

⑱《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3期，第85页。

⑲（美）拉尼森·拉西诺：《南斯拉夫的实践：1948～1974》，第12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⑳赫鲁晓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重大问题》，（苏）《共产党人》第12期，1962年8月，第9页。

㉑（罗）《火花报》，1964年4月26日；转引自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 第一分册》，第632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㉒（联邦德国）艾伯哈特·舒尔茨：《从历史角度看苏联东欧集团的内部关系》，《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年第3期，第114页。

㉓（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 1945～1970》，第434、4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㉔㉕㉖《离开真理哪里也不去 关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新材料》，（俄）《肯塔费尔》1993年第4期，第78～79、80、86页。

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第214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⑩ 参见(捷)贝利康:《禁止公开的文件》,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 ⑪ (苏)《真理报》1968年7月11日。
- ⑫ (俄)P·比霍亚:《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5年第1期,第42页。
- ⑬ 参见《杜布切克回忆 1968~1969年 续完》,《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63页。
- ⑭ (美)罗宾·雷明顿:《华沙条约》,第1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 ⑮ 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 第一分册》,第17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⑯ (苏)谢·科瓦廖夫:《真理报》,1968年9月26日。
- ⑰ 《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4集,第1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 ⑱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7页,三联书店,1976年版。
- ⑲⑳㉑ 周懋庸编著:《从红色“帝后”到天涯孤侣》,第58、17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 ㉒ A·B·巴达波夫:《80年代民主德国的危机和德国的统一》,(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5期,第135页。
- ㉓㉔ 参见(美)J·布朗:《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第72、30、4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 ㉕ 参见《70年代的苏联与兄弟社会主义国家》,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K·И·萨维洛夫:《华沙条约——和平的因素,社会主义之剑》,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6年版。
- ㉖ (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第352~35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 ㉗ 苏联科学院历史所:《70年代的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第240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 ㉘ 《1972~1979年世界军事开支与武器转让》,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美国政府印刷局,1982年版。
- ㉙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第2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⑬ 参见洪长泰：《东欧和苏联之间》，七十年代出版社，1979年版；B·И·沃罗科夫：《1980～1981年波兰事件：来自老广场的观点》，（俄）《历史问题》1995年第10期，第97页，等等。

⑭ 盖莱克：《中断的十年——盖莱克答记者问》，第112～11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⑮ 黄宗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第338页，台湾幼狮出版公司，1984年版。

⑯ （俄）B·И·沃罗科夫：《1980～1981年波兰事件：来自老广场的观点》，（俄）《历史问题》1995年第10期，第109页。

⑰ （波）雅努什·罗利茨基：《中断的十年——盖莱克答记者问》，第22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⑱ 参见（俄）B·И·沃罗科夫：《1980～1981年波兰事件：来自老广场的观点》，（俄）《历史问题》1995年第10期。

⑲ 刘祖熙：《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第16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⑳ （日）不破哲三：《斯大林与大国主义》，第106～10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㉑ （苏）《真理报》1980年12月11日。

㉒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81年4月8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7集，第195页。

㉓ 《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第1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㉔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战后国际关系论丛》，第248～249页，1984年版。

㉕ （俄）B·И·沃罗科夫：《1980～1981年波兰事件：来自老广场的观点》，（俄）《历史问题》1995年第10期。

㉖ （日）不破哲三：《斯大林与大国主义》，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㉗ 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4集，第1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㉘ （俄）B·И·沃罗科夫：《1980～1981年波兰事件：来自老广场的观点》，（俄）《历史问题》1995年第10期，第95页。

⑭ 佩罗·兹拉塔尔：《霍查政治传记》，第 270 页，东方出版社，1993 年版。

⑮ A·列舍特里科夫、H·斯米尔诺娃：《苏阿冲突》，（苏）《共产党人》1990 年第 9 期。

⑯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第 256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

⑰ 《共运资料选译》1983 年第 9 期，第 1~13 页。

⑱ 《社会主义阵营和东西方 80 年代的关系问题》，第 33 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7 年版。

⑲ 《安德罗波夫上台半年来的苏联对外政策》，《苏联东欧问题》1983 年第 4 期，第 40 页。

⑳ 若·麦德维杰夫：《掌权的安德罗波夫》，法国，1983 年版。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5 年第 4 期，第 95~97 页。

㉑ 《在苏共中央二月非常全会上的讲话》（1984 年 2 月 13 日）；《契尔年科言论选集》，第 460 页。

㉒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契尔年科的讲话。《苏共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材料 1984 年 2 月 13 日》，第 18 页，莫斯科，1984 年版。

㉓（美）弗拉基米尔·库辛：《戈尔巴乔夫与东欧》，《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7 年第 1 期，第 88 页。

㉔（苏）弗拉基米罗夫：《实践中的国际主义》，《真理报》1985 年 6 月 21 日。

㉕ 《80 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东西方关系》，第 38 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7 年版。

㉖（美）弗拉基米尔·库辛：《戈尔巴乔夫与东欧》，《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7 年第 1 期，第 85 页。

㉗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国际主义经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第 38 页，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7 年版。

㉘ 参见《社会主义阵营与赫尔辛基进程》，莫斯科，1988 年版。

㉙ 《社会主义阵营的起源》，（苏）《苏共党史问题》1986 年第 10 期，第 68 页；《真理报》1986 年 11 月 9 日。

㉚⑳㉛⑳⑳㉜ 参见（苏）《苏联外交通报》1987 年第 1 期。

㉝⑳⑳㉞（美）弗拉基米尔·库辛：《戈尔巴乔夫与东欧》，《苏联东欧问

题译丛》1987年第1期，第88、87、86页。

⑩ 原载联邦德国《东欧》杂志1989年第4期，转引自《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9年第6期，第97页。

⑪⑫⑬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84、210、211~212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⑭ 《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424页。

⑮ 《戈尔巴乔夫言论集》，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⑯ 《苏联共产党纲领》，第20页，新修订本。

⑰ 谢瓦尔德纳泽：《苏联外交反思》，第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⑱ 张月明、姜琦：《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上论苏东关系》，《今日苏联东欧》1990年第5期。

⑲ (苏)阿·鲍文：《和平共处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苏)《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88年第7期，第162页。

⑳ (俄)尤·斯·格列科：《斯大林—铁托》，第421~422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

㉑ 《离开真理哪里也不去——关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新材料》，(俄)《肯塔弗尔》1993年第4期，第78页。

㉒ 包文英：《苏捷关系：从入侵到撤军》，《今日苏联东欧》1990年第4期，第55~56页。

㉓ 参见(美)亚历山大·谢克、罗杰·卡内特：《东欧剧变：政治改革的社会基础》，《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1年第1期。

㉔ (美)E·考茨基：《戈尔巴乔夫与民主德国》，《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7年第3期，第118~119页。

㉕⑹⑺ A·B·巴达波夫：《80年代民主德国的危机和德国的统一》，(苏)《近现代史》1991年第5期，第140、141页。

㉘ (法)卡特琳·迪朗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第16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㉙ 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第11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㉚⑻⑼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㉛ 赵乃斌、朱晓中：《来自莫斯科的改革之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东欧》，第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⑮ 参见刘祖熙：《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⑯ 阚思静：《卡达尔执政失败原因析》，《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2页。

⑰ 伊利埃斯库：《改革与革命》，《东欧中亚译丛》1994年第3期。

⑱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的政治报告》。

⑲ 参见B·穆萨托夫：《东欧的变化和我国的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4期；尤里·克良泽夫：《东欧的民主革命：原因与后果》，（苏）《共产党人》1990年第14期。

⑳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东欧局势的发展和苏联在该地区的政策的决议》，（苏）《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3期。

㉑ 《1991年苏联东欧大事记》，《东欧中亚译丛》1992年增刊，第2页。

㉒（美）鲁道夫·特凯什：《从维谢格拉德到克拉科夫：中欧的合作、竞争与共存》，《东欧中亚问题译丛》1992年第3期。

第六章 西方的苏东战略与苏东关系

苏东关系既是国际形势的产物，又是国际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形势的紧张和缓和都会影响到苏东关系。反过来，苏东关系也对国际形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把苏东关系放到战后雅尔塔体系和总体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去考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由于在国际冷战格局下，美苏两极对于世界形势的决定作用，因而本章着重考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苏东战略对于苏东关系的影响。军事遏制战略与和平演变战略是西方国家对付苏东国家基本的两手，它们或平行运作，或交叉实施，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为了论述之方便，本章分两节专题论述。

一、西方的军事遏制战略对苏东关系的影响

军事遏制是指西方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威慑力来压制苏东集团，企图压对方崩溃；或以激烈的军备竞赛把对方拖垮。在两大阵营存在期间，西方的军事遏制政策是从来就存在的。40年代下半期，其重点在欧洲。杜鲁门主义，第四点计划，两个德国的分裂，是美国主动采取攻势；第一次柏林危机，是苏美双方在欧洲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美国决心遏制苏联的势力，不让它西移一步，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0~60年代，美国遏制的重点向亚洲有所转移。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在西方看来就是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世界的遏

制，以防止在东南亚出现倒向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70年代以来，尼克松结束了越南战争，变“两个半战争”为“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把力量集中在欧洲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相抗衡。80年代初，美国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这是一个高科技的军事计划，该计划的完成能使美国有效地防御苏联的核武器袭击，而美国的核武器却能打到苏联本土。完成该计划预计需花费二千多亿美元之巨。“星球大战计划”给苏东带来很大的威慑。不过，军事遏制从来就没有发展到公然的武力入侵和美苏之间的直接战争（热战），而是冷战时期的对抗手段。

西方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军事遏制政策有相同的一面：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威慑来遏制它们，以图压垮它们。因为苏东集团是一个与西方对立的政治、军事、经济集团，有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不同于西方；东欧各国建立苏联模式，统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和东欧各国都属于所谓的“铁幕世界”、“赤色帝国”，并有向外“扩张极权主义”的危险。但西方对苏东军事遏制手段的具体策略不同。西方也认识到了苏东不是铁板一块，其国情、传统、地位和需求均不相同^①。没有苏联，就没有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便有，也不足为患；没有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将依然存在，并对西方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构成挑战。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就是以一国社会主义的形式存在的。对西方来说，在东方只存在一个必须对付的对手：苏联。其它华约国家对于西方来说都无关紧要，它们只是在西方的对苏政策范围内才有意义^②。例如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先后退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不受苏联保护了，也没有发生西方趁机把它们吃掉的情况。1982年，在制裁波兰的同时，以波兰问题为借口，美国对苏联实行了经济制裁。美有意中止提供在西伯利亚修建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和在萨哈林岛与外国合作开发能源计划所需的大部分技术，苏为此损失了150~200亿美元；美国还通过操纵沙特

阿拉伯，使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又使作为石油输出国的苏联损失达数百亿美元^③，这也充分说明在苏东集团中西方是以苏联为主要对手的。

在苏东集团中，苏联是核心。西方对苏遏制战略主要分以下几个阶段：地区性遏制战略（1946～1954年）、大规模报复战略（1954～1967年）、灵活反应战略（1967～1982年）、新战略等。1946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一份分析美苏关系的内部文件中指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它目前所控制的地区”。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杜鲁门于1947年3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后来叫做“杜鲁门主义”的谕文，称世界已分成两大营垒，其严重形势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美国要“创设种种条件”支持“各国自由人民”，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支援希腊、土耳其政府，以避免其陷入“极权主义的魔爪”^④。1947年6月的马歇尔计划，其目的是从经济上复兴欧洲，控制欧洲，以孤立和封锁苏联。事实上从一开始起，美国根本就不打算让苏联东欧国家参加这个计划^⑤。1949年1月，杜鲁门提出了美国对外关系的第四点行为原则，即技术援助不发达地区，因为共产主义就是“在贫困和不满的土壤里蔓延滋长的”。这就是说，美宣布向全球的共产主义开战。4月，北大西洋公约在华盛顿签署，这样一个由西方主要国家参加的遏制苏联的工具在冷战中诞生了。美国政府在致其驻西欧代表的电文中明确称发展西欧的军事力量目的在于“遏制苏联”^⑥。北约名为北大西洋区域的国家联盟，实际上，其成员国重点选择北起挪威、南至土耳其实际包围苏联的西欧国家。遏制战略所设想的战争将以欧洲为主要战场，海、陆、空三种力量并用。在1949年之前，美国垄断着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杀伤武器——原子弹，并以此对苏进行威胁。第二次柏林危机（1948～1949年），朝鲜战争（1950～1953年），鼓励和支持南斯拉夫脱离苏联阵营，都是西方对苏遏制政

策的表现。从1954年起,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的军事战略发生了从常规战略向核战略的变化,奉行大规模核报复战略,又称为“剑与盾战略”。即以核武器为“剑”,作为克敌制胜的主要手段,在战争中摧毁敌国的工业和经济资源、军事目标、城市人口,支持地面部队作战,以常规武器为“盾”,在战争中阻滞敌人的进攻。因为这一时期美国在热核武器方面占有绝对优势。1954~1955年北约在欧洲举行了多次以核武器为主题的联合军事演习。1957年北约首脑会议决定在欧洲储存核弹头。在这一时期,1956年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还发生了第二次柏林危机(1958~1961年),联邦德国被纳入了北约,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难题,该战略实际没有使欧洲的防务得到加强,特别是由于苏联核武器的发展,使该战略的威慑作用大为削弱。美国不得不改弦易辙。从1967年起,北约开始实行灵活反应战略。该战略要求北约有比例得当的常规力量、战术核力量和战略核力量,即所谓“三位一体”的军事力量。根据冲突的性质和规模,灵活运用一种或多种力量作出反应,或者进行逐步升级的战争。与大规模报复战略相比较,其内容与性质有重大的差别。灵活反应战略以常规武器为“剑”,以核武器为“盾”,即在核盾牌下,主要依靠常规力量来抵御敌人。这一阶段在苏联阵营内发生了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79年还发生了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灵活反应战略在实践中也日益暴露出弊端。80年代初,新一轮冷战开始。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给苏东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1983年,《华盛顿季刊》发表了一篇名为《欧洲的核防务》的文章,介绍了一种新的北约战略构想,其观点引起了欧美各国的广泛注意。这种新战略以常规武器为主,以核武器为辅,“更多地依赖常规力量”,“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⑦。

西方对东欧的战略与对苏联的战略不能截然分开。对苏战略有些同时也是对东欧的。但由于东欧的地位毕竟与苏联不同,且

处于联接东西方的中间地带，所以西方国家的东欧战略有其自身的特点。大致说来，西方的东欧战略经历了推回战略—解放战略—渐进战略（搭桥战略）—区别战略等几个阶段。冷战开始后，美最先对东欧实行“推回”政策，即遏制共产主义“扩张”，把苏联的势力“推回”（“压回”）出东欧。其具体表现就是杜鲁门主义和第四点计划，分裂德国和成立北约集团。但是，“推回”战略并没有能阻止住东欧由多党联合到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演变，苏东关系更加紧密。美对自己的东欧政策作了检讨后，转而采取在外部对东欧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它崩溃，从而瓦解苏东集团的“解放”政策或激变战略。1952年8月，当时的美国外交顾问、后来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在一次会议上概括了“解放”政策的主要内容：“首先，……美国决不同苏联作买卖来承认它的征服和让它永久保有被它奴役的各国人民……要让波兰人、捷克人和其他的民族知道它们有着美国政府的道义支持。”其次，他认为抵抗运动将在爱国人士中间出现，这些爱国人士可以从自由欧洲委员会那里通过空投或其他联络办法获得接济，并且结集起来^⑧。在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中，美国除了谴责苏联对德国人的镇压外，还用向东柏林人空运食品包裹来代替“解放”他们^⑨。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美国除了谴责外，还帮助组织匈牙利侨民队伍，把他们武装起来并遣送到匈牙利境内准备作战^⑩。但是，“解放”政策并不意味着武力解放，也不具备实际操作性。早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的1953年底，美国政府就正式确认了东欧不存在足以推翻现政权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当时制订并经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74号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的政策之决策建议书》中写道：“尽管每个卫星国民众普遍反对共产主义，但已知的能进行武装抵抗的地下集团仅仅作为零星的残余在很少几个地区生存下来，而且现在一般都无声无息……虽然反对苏联统治的民族主义是苏联势力范围内部、甚至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内部的破坏性力量，但

目前情况下，许多卫星国内出现铁托类型的非苏政权看来是不大可能的……”^⑩

于是，美对其东欧政策进行了重新估价，又转而采取一种新的遏制政策——搭桥战略。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有：苏东关系的既成事实使美国及其盟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在东欧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后，美在总的策略上应依赖于西方世界持久的经济繁荣和进步，及对自己政治文化价值的坚定信念来促进东欧制度的逐渐演变。“演变而非革命”，不再企图以武力把苏联赶出东欧。与此同时，在军事上扩大美与盟国的联盟，保持美摧毁苏在东欧的军事力量的手段和能力，加强威慑力量的效果。在宣传上，只鼓励去做那些可以做到的事情，避免激起东欧各民族去进行毫无希望的起义^⑪。1959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被奴役的国家的决议》，正式肯定了对东欧的新遏制政策。但是1968年华约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突出了这种政策的局限性。美国除了口头谴责外无所作为。这以后，美国对东欧各国实行区别对待政策。1983年美国副总统布什说：“我们的政策是区别对待的政策。这就是说，我们要掂量一下，东欧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自主外交政策，而不是依赖莫斯科的指示，以及在对内政策上把自由化推进得多么远……美国将同那些表现较多的公开性和独立性的国家建立比较亲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⑫如鼓励波兰、匈牙利的“自由化”，鼓励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的关系则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上。这一阶段，美国对1981年在苏联支持下进行军管的波兰实行了谴责和制裁，支持团结工会^⑬。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遏制政策，其实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军事遏制政策对于苏东关系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西方的军事遏制、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使苏东在共同的外力压力下增强了集团意识，生死相关、唇亡齿寒使他们在两大阵营谁战胜谁的斗争中更加团结，而把相互之间的矛盾放到

次要地位。在1943~1948年期间，苏联先后与捷、波、罗、匈等国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华约成立前苏联与这些东欧国家的军事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的。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很明显是遏制苏联的军事政治集团，是美对苏实行冷战的工具。更有甚者，北约不顾苏东国家的强烈反对，在1955年把联邦德国也纳入了北约。这是导致华沙条约成立的导火线。波、捷、匈、苏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心有余悸，因为联邦德国并没有承认东西德边界线和奥德—尼斯河边界线，从而对相邻国家边界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考虑到苏联的军费负担太重，以及避免给西方以攻击之口实，曾打算从匈牙利和波兰撤出苏联军队，只打算在民主德国保留苏军，卡达尔和哥穆尔卡都表示反对^⑤。1959年，哥穆尔卡在华沙会见尼克松回答波兰要得到美国的援助必须以摆脱苏联为条件时断然说：“我国的对外政策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把我国自身的安全并因此保持同我们的东方邻国—苏联的友好睦邻关系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是事关我们独立生存的问题，事关是否破坏我国的边界的问题，而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高于一切的。”^⑥罗马尼亚尽管常在华约内唱反调，甚至请求苏联军队1958年从罗撤出，但罗从来没有退出华约，也没有退出华约的打算。即便要求撤出苏军，那也是因为罗“四周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在旁边”。苏联后来在靠近罗马尼亚的摩尔达维亚和伊兹达伊尔省驻有大量军队，准备如果一旦需要，可以迅速地给罗马尼亚以援助^⑦。在1958~1961年柏林危机中华约国家表现得非常团结。西方的军事遏制政策还促进了苏东军队的现代化。正是在两大集团之间激烈的军备竞赛中，苏联掌握了原子弹和氢弹。从战后到60年代，美国保持战略核力量优势。但到70年代初，苏联战略核力量已赶上美国，双方都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苏联在宇航军事科技领域捷报频传，如1957年苏成功地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

随后又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导弹和火箭。1961年苏联宇航员成功地实现了环球飞行。苏联在科技重要领域里的成就引起了西方和美国朝野的惊慌，给全世界这么一种印象，似乎军事优势已经转移到苏联那一边去了^⑮。为了提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以与北约相抗衡，苏联帮助东欧国家的军队建设，培训军官，提供军事技术、军官和武器，经常进行联合军事演习，重新装备华沙条约部队，使其现代化，提高华约东欧成员国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地位^⑯。

另一方面，西方的军事遏制也给苏东关系钉进了楔子。在两大阵营对抗和西方实行军事遏制、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苏联难免神经紧张，不得不加紧对东欧的控制，尤其担心东欧失控，甚至“反叛”，倒向西方，从而引起了苏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在“反苏”、“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旗号下，1948年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1968年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56年、1970年、1980年，苏联三次企图干涉波兰内政。所有这些都东欧国家人民心目中播下了对苏联不信任的种子，激起了东欧人民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苏联是“大家庭”的首领，为了与西方进行军备竞赛，经常压东欧盟国增加军费开支，从而加重了东欧的经济负担，影响了其国民经济的发展，引起了新的矛盾。据拉科西回忆，莫斯科在制订政策时是不怎么考虑各国具体的历史特点的。斯大林夸大了战争危险，特别是朝鲜战争开始以后。1951年苏联与其他民主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临，要求各国增加军费开支，以及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装备。这就破坏了匈牙利国民经济的基础，因为匈为此不得不把匈牙利军队武装完毕，并为苏联航空轰炸部队建设很多大的军事机场^⑰。尽管多年来苏联一直压各华约缔约国增加军费开支，但罗马尼亚在1983年决定冻结其国防开支，并主张华约国家单方面将国防开支每年削减10%~15%。罗呼吁美苏进行核裁军，谴责美苏在西欧和

东欧部署导弹^②。同时，为了维护联盟以与西方阵营对抗，为了提高东欧的军事经济力量，苏联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波兰经济学家计算，波兰在1945~1949年所得到的苏联贷款等于美国根据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对西欧11个国家（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所提供的机器和设备价值^③。赫鲁晓夫曾因苏联驻东欧军队开支过大而打算把苏军撤出来^④。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不得不花费大量的开支在国防上，在巩固华沙条约体系上，苏联人民会生活得更好些。仅为这些目的正式开支就占苏联年预算的23%，还不包括非正式拨款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⑤。至80年代下半期以来，苏联经济实际上已支撑不起整个东欧大厦。

军事遏制政策在两大阵营存在期间从来就没有被放弃过，它贯穿了整个冷战过程。西方世界认为，“共产党赢得的任何影响就是美国及其盟国和朋友失去影响”^⑥，因此西方始终把遏制作为对苏东的一种基本政策，把缓和作为一种策略，缓和是遏制的另一种名称。例如欧安会曾经承认战后的欧洲边界线不可更改，但1981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却谈到：“美国在东欧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承认过欧洲有分裂是合法的。雅尔塔协议并没有就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达成协议。”^⑦但西方也从来没有认真打算以武力去推翻苏东政权^⑧，甚至竭力避免与苏联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如两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等，都是如此。当南斯拉夫脱离苏联阵营、不受苏联保护以后，南斯拉夫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但西方也并没有入侵南斯拉夫，相反对它进行了支持。苏联是美国的邻国，隔白令海峡与美国的阿拉斯加相望，美最初在东线也对苏保持高度警惕。1949年，风闻“苏联军队在阿拉斯加登陆”，美国国防部长就跳楼自杀了^⑨。西方之所以后来没有在阿拉斯加派驻重兵，是因为苏联既没有像在东欧地区那样在东线派驻重兵，也根本没有向那里发展的打算。这说明，西方战略的矛头是以苏联为

中心的，也说明西方最担心的是苏联势力向欧洲扩张，维护的是战后的雅尔塔体制不受侵犯。但是，通过军事遏制的办法西方无法把苏联和苏东集团遏制住，并且常常使自己陷入被动。

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对苏东关系的影响

所谓和平演变，就是在以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实力方面占优势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展开思想战和心理战，谋求使社会主义内部发生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平演变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的整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动用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外交支持等种种手段，甚至利用宗教、文化，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同时支持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挑拨它们与苏联的关系，鼓励它们脱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又打起了所谓“人权”的旗号；至80年代末，美国更是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把和平演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西方对苏东的“和平演变”是苏东同盟瓦解的重要原因。

（一）以各种手段支持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离间苏东关系

挑拨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离间它们，使东欧摆脱苏联的控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实行和平演变的重要目的之一。1965年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布热津斯基出版了《消除分裂的办法》一书，为“自由世界”出谋划策：“东欧国家凡对外增加摆脱苏联控制的机会者，应获得奖赏；对内使国内制度大大自由化者，应获得奖赏；同样地，出现相反的趋势时，美应准备好停止其援助，撤销特殊优惠如最惠国条款，并且毫不犹豫地指明促使美国这样做的政治动机。”^②美国及其盟国积极运用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无论是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对话，还是与其经济

贸易关系，美国及其盟国都把它看成是一种政治作用，以阻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里的协调行动，破坏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友谊。^⑩

1. 支持脱离苏联阵营——给南斯拉夫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

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早在苏南冲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由于南斯拉夫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苏南经贸关系完全中断，南陷于困境之中。1949年9月，美国给南斯拉夫第一批贷款为两千万美元。1950年1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信给美国国会支持“南斯拉夫紧急救济法案”，杜鲁门重申了冷战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南斯拉夫的基本理论。他说：“南斯拉夫的继续独立对美国的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国家正在反抗苏联帝国主义的野蛮威胁，不让苏联势力染指欧洲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地带。我们能够帮助这样一个国家保持独立，显然是符合我国利益的。”^⑪美国一般的社会舆论也把铁托所处的地位看成是“一种战略地位”，“在民主国家战略的防线上，南斯拉夫是一个战略据点”^⑫。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艾伦明明白白地转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观点，即美国反对侵略南斯拉夫，如同反对侵略任何别的国家^⑬。1951年春，美、英、法一起制订了一个三方援助南斯拉夫的方案，以弥补南下一年度的预算赤字。至1955年，美国给南的经济援助总额达5.9850亿美元，军事援助共5.8850亿美元。只有经援中的5500万美元需要偿还^⑭。这一时期，南斯拉夫成为接受西方国家贷款和经援最多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到了1956年，由于赫鲁晓夫主动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苏南关系开始好转的时候，美国却威胁要停止对南的经济援助，尽管南因为本国资金储备、出口和农业生产都不充足很需要经援；与此同时，美对南的军事援助也减少到了小量的、常规的装备的程度，并变成长期交付。美坚决不给南以喷气式飞机和其他重型武器^⑮。在1958年南斯拉夫重新与苏联发生争吵后，

美国对南又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60~1964年,总额达5.1100亿美元^③。南接受美的援助,遭到了苏联的抨击和讽刺。赫鲁晓夫就曾嘲笑铁托说:“有些政治家是依靠别人的恩赐过日子的,”“在美国的小麦的基础上是建立不起社会主义的。”^④在1968年南斯拉夫谴责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苏南关系再度恶化。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加快了与南进行贸易和信贷活动。欧共体这时作为南斯拉夫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还与南签订了一项商业协定。南还制订了向世界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新方针^⑤。美国也增加了同南的贸易,南斯拉夫与美国的贸易额在1971年仅有10900万美元,而在1974年增加了两倍,达到31600万美元。同期,南斯拉夫从美国的进口额也几乎增加了一倍,从19700万美元增加到35400万美元。1975年初,签订了一项由美国克劳福德—拉塞尔公司在潘切沃建设石油化工联合企业部分工程的协议。萨格勒布伊纳石油公司和道化学公司签订了关于共同建设和经营石油化工联合公司的初步协议。这将是最大的一个联合项目和外国在南斯拉夫的最大一笔投资,到1982年将投资54000万美元。生产将采用美国工艺技术,由双方共同经营,而美国公司将占49%^⑥。很明显,西方支持南斯拉夫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离开苏联阵营,使其内部“实行某种变革”,并对其他东欧国家树立一个榜样,以期产生连锁效应。美国的这种用心在“国际人权联盟”执行主席费·盖尔的一篇文章中讲得很清楚。他在1984年声称,如果南斯拉夫要想得到美国的财政援助,就要对“一些基本政治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如果南斯拉夫“实行某种变革”,“就可以多得到一些西方的支援”;“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真正的改革就会推迟”^⑦。

2. 支持东欧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制造乱子,挑拨苏东关系,削弱苏联

西方国家依据东欧国家的不同特点,激化其国家民族主义情绪。西方口口声声说东欧是苏联的“卫星国”、“附庸国”,攻击

苏联的“扩张主义”和“赤色帝国主义”。对于东欧单一民族国家，如战后的波兰，匈牙利，就采取刺激它们业已成为过去、但尚未完全消失的反俄情绪；对于多民族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则打起“民族自决”的旗号，支持和鼓励其内部的分离主义倾向。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则竭力恢复其对大德意志沙文主义历史传统的记忆，唆使他们恢复德意志帝国。尽管方法和手段各不相同，但目的只有一个——在苏东之间挑拨离间，制造乱子，使苏联首尾难顾，从而限制了苏联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达到削弱苏联的目的^①。

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不几天，社会主义阵营内最早发生的事件是1953年6月13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比尔森事件。比尔森地区地理上靠近西方国家，历史文化接近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由美国军队解放的，美国在这儿的的影响比较大。这里的人民比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更西方化。这个因素显然在该事件中起了作用^②。6月17日，在民主德国发生了东柏林事件。骚乱的群众提出“俄国佬滚出去！”的口号，砸毁了斯大林的塑像。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民族优越感很强的民族，尤其是在俄罗斯人面前。事事照搬苏联模式伤害了其民族自尊心。苏联索取战争赔款，拆迁其工厂设备使民主德国人反感。美占区电台6月15日晚上广播了东柏林建筑工地上有骚动发生，次日晚上又广播了要求东柏林市民6月17日上午7时整在斯特劳斯广场集合的号召，还广播了罢工的目的地和要求^③。据后来披露出来的材料，在此期间，美国向民主德国派出了大量特务和情报人员，组织民主德国公民逃往联邦德国，制造邮局混乱，混入罢工队伍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美国特务情报机关还与民主德国境内各种反共、反政府组织有联系^④。

波兰是一个有很多侨民的民族国家，目前在西方的波兰侨民达1000万，其中有700万在美国。美与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对波的影响是久远而又深刻的。美的“自由欧洲”电台

就设在波兰的近邻——联邦德国附近，它是波兰尤其是其青年接受西方影响的主要渠道。当1956年波兹南事件发生时，当时正在该城举行国际博览会。在该事件中，前来参加国际博览会的许多外国人，其中包括大批记者，纷纷与游行群众交谈，拍摄集会场面，有的还直接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对事件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④。在同年稍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中，纳吉政府曾经宣布匈牙利中立，退出华沙条约，向联合国要求保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新的匈牙利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并准备提供经济援助^④。他代表美国政府对苏的镇压行动表示强烈的抗议。他在1956年11月11日致布尔加宁的信中说：“难以容忍你们对联合国道德和宗旨的践踏，以及苏联军队所进行的反匈牙利人民的暴行。”^④在以后的三年间的历次联合国大会中，美国和西欧各国一直赞成并支持谴责苏联出兵匈牙利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要求派联合国观察员去匈牙利，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重申对中东欧最终会获得“自由”的信念。美国中央情报局让它设在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广播关于共产党新领导的谎言，煽动匈牙利进行新的暴力行动，而且还含糊其词地许诺美国军队将要进行援助（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援助计划）^④。1957年夏季开始，为了鼓励波兰在逐步的改革中表现出来的离开苏联传统模式的倾向，美国不断给予波兰贷款，并提供无偿援助和贸易最惠国待遇。经美国国务院同意，美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57年开始邀请波兰学者和研究生去美各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学习。1957~1959年，由美很多基金会赞助，从美各大学选出约300名美国学者前往波兰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1960年2月，美波缔结了文化交流协定。这年，阿尔巴尼亚与苏交恶后，美多次企图缓和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1968年，当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美国仅限于口头上的抗议和对捷克的同情^④。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匈捷两件事上没有太多的实际行动，一则由于西方对东欧主要实行和平演变战略，认为这是苏联势力范

围内的事，并不认真打算以武力去改变现状；二则西方国家受到了其他事件的牵制，如匈牙利事件时，英、法正陷入了苏伊士运河战争，美国不支持它们，内部分歧削弱了一致对外的力量。当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危险的局势时，英、法外交官对苏联的大使说：“我们很理解你们在波兰和匈牙利遇到的麻烦，我们与埃及之间也出现了困难。让我们谈开吧！你们以自己的办法去解决困难，也请不要干涉我们！”^④捷克事发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而不能自拔。在杜布切克执政的最初几个月，美国保持沉默，没有表示些许同情^⑤。美国的行动在最危急的关头也是比较谨慎的，甚至比1956年匈牙利危机时期更谨慎。“美国持沉默态度，以各种方式表明自己与此事无关”^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1968年7月22日谈到捷克事件时说：“美国人不想卷入冲突……因此，我们特别感到令人惊奇的是，苏联企图使我们卷入该事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卷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因为这是捷克人自己的事情，此外，这是捷克人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的事情。”^⑦一位俄罗斯学者认为：“假如美国不宣布自己的不干预政策，那么侵略就不可能发生。”^⑧这话有些绝对。但美国的这种态度确实有利于苏对捷采取军事行动，客观上给苏联提供了一个机会。

3. 支持苏联集团内部的独立自主倾向——罗马尼亚

在苏东集团中，罗马尼亚经常发出不和谐之音。罗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受别国控制。罗既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国，同时与西方国家，如美国、法国、欧共体的关系比较友好，有较多的经贸往来。美国也乐于利用这一点，鼓励罗在苏东集团内闹独立，以分裂、瓦解苏东阵营，削弱苏联。早在1960年美国就开始改善与罗的关系，双方签订了关于财产赔偿问题的协议。1964年，双方又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决定扩大贸易、文化交流。1968年，法国总统戴高乐访问罗马尼亚，其在北约内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精神受到了罗的尊重，同时也是对罗的支持和鼓舞。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对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

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东欧国家。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在布加勒斯特建图书馆，设银行办事处。其实，美国的真实目标是针对苏联的，它只是想利用罗马尼亚作掩饰而已。尼克松曾这样对他的顾问基辛格说：“亨利，我看，只要我们不间断地去东欧国家访问，我们的莫斯科朋友就会感到如坐针毡。”^⑤1975年，福特总统和国务卿罗杰斯以及后来的基辛格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从1978年起，两国还签订了长期经济、工业和技术协作协定。1982~1983年，美国务卿黑格和副总统乔治·布什先后访罗。

1975年，美国宣布给罗马尼亚以最惠国待遇，以“鼓励罗马尼亚对莫斯科的独立性”，“扩大苏联集团内部的裂痕”。但是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不是白给的，而是附有条件的，每年都要审查一次有无可能延长的问题。头几年审查延长时比较顺利。进入80年代后，美国指责罗“侵犯人权”，利用最惠国待遇压罗在政治上作出让步。1983年，美国曾经宣布取消过一次给罗的最惠国待遇。苏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推行“新思维”外交路线，西方认为苏对进行地缘政治斗争的兴趣大大减少了，罗马尼亚的“独立性”的利用价值已变得无关紧要；而齐奥塞斯库反对“新思维”。1988年2月，美国竟以罗“不搞改革”和“违反人权”为借口，宣布自该年7月始终止给罗以最惠国待遇。同年6月，《纽约时报》一篇报道说：“美国告诉北约盟国，它们不应向东欧提供信贷及其他财政援助，除非东欧国家首先进行政治改革，以民主政治代替极权主义统治。”^⑥报道披露了美停止给罗最惠国待遇的真实意图。1989年12月，美国承认了罗马尼亚新的临时政府。美国对罗马尼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从80年代中期以前的“扶”到80年代中期以后的“压”，目的是一致的：鼓励罗马尼亚摆脱苏联集团，放弃社会主义制度。

4. 从哈尔斯坦主义到新东方政策——迂回的和平的解决德国问题的道路

1949年两个德国分别成立后，联邦德国一直拒绝承认民主德国政府，或在官方基础上与之交往。联邦德国认为，只有它才有权力和义务充当所有德国人、包括居住在民主德国的人民的“唯一代表”。为了在外交上孤立民主德国，1955年，联邦德国外长哈尔斯坦提出了联邦德国政权的民主德国政策，即除了苏联之外，联邦共和国拒不承认或终止承认那些承认民主德国政权的政府（其中就包括了东欧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即有名的哈尔斯坦主义。波恩政府拒绝承认奥德—尼斯河线为德波之间的边界线^⑦。同年，两个德国分别加入了北约和华约。1958年爆发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和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使德国的分裂更为明显。西方国家坚持先在民主德国自由选举，再建立一个亲西方的统一的德国，而苏联开始赞成维持中欧的现状，即通过寻求奉行两个德国的政策和谋求得到西方对民主德国的承认，来使欧洲的分裂固定化。德国统一的问题陷入了僵局。不过，在美国的扶持下，联邦德国逐渐取得了国家主权，经济也复兴和发展起来。1969年，维利·勃兰特政府上台后，以坦率的和现实的态度检讨和反思了联邦德国传统的民主德国政策，放弃了阿登纳已经过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要想达成东西方之间的根本和解，必须先解决德国问题；勃兰特实行的是相反的原则，即只有在这种根本和解的基础上，才可能缩小东西德国之间的分裂^⑧。这事实上就等于承认了哈尔斯坦主义的失败。新政府转而实行比较灵活的新东方政策，即推行同苏联和东欧各国，包括民主德国的“缓和和关系正常化”。新东方政策最初在西方同盟国中引起了一些猜疑和不安，波恩坚定地强调它对西方联盟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且坚持将柏林问题的圆满解决作为联邦德国与东方实行任何和解的先决条件，这就保证了西方大国象征性地和实际地参与了波恩的新东方政策^⑨。勃兰特认为要改善同东欧国家特别是民主德国的关系是不能绕过苏联的，因此首先谋求与苏联缓和关系。经过长时间谈判，1970年8月，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了条约。同年11月，

联邦德国又与波兰签署了内容类似的“华沙条约”。勃兰特政府保证战后欧洲边界不可侵犯，包括两个德国的边界，承认奥德—尼斯河是波兰的西部边界线。1972年12月，两个德国又签署了《基础条约》，规定两德“在平等权力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睦邻关系”，“以和平手段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保证两国的现有边界“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可侵犯”。《基础条约》还决定在双方首都“互设常驻代表机构”，“发展和促进在经济、科学技术、交通、法律、邮电、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和“处理人道方面的问题”，等等。但联邦德国坚持不在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不以民主德国为“外国”^⑥。至1973年年底，联邦德国又分别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条约，建立外交关系，全面实现同苏联、东欧国家尤其是民主德国的关系正常化。

两德《基础条约》签订以后，它们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两德人员之间的接触和来往不断地扩大。联邦德国和西柏林到民主德国探亲和旅游者，从1970年的250万人次，到80年代以来每年达800多万人次；同一时期，民主德国到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探亲者，从每年几十万人次到一百多万人次。1983年以来，民主德国放宽了对两国人民来往的一些限制，其中包括民主德国人民移居联邦德国的限制。与此同时，两德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在贸易方面，两国贸易总额从1970年的44亿联邦德国马克到1983年的152亿联邦德国马克；1983年6月，联邦德国给民主德国10亿马克的非贸易贷款，帮助它解决外汇困难。次年，联邦德国又给民主德国9亿5千万马克贷款。两个德国的内部贸易还采取了特殊的结算方法，使民主德国不需要以硬通货支付从联邦德国进口的货物。另外，欧共体也把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贸易视为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贸易，在统计上不算国际贸易，在海关手续上免除民主德国的关税；民主德国实际上享有共同体成员国的待遇，被视为共同体的非正式成员国^⑦。

两个德国还通过各级官员、政治家和议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意识形态上宣扬德国的“爱国主义”^②。

勃兰特说：“我们的东方政策实际上有三种目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东欧各国关系正常化，暂时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③新东方政策的实质，是联邦德国在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占明显优势的前提下，承认战后欧洲现状，同时试图改变欧洲内部的各种关系，尤其是改善和发展同民主德国的关系，以求有朝一日，“求得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与阿登纳的僵硬的孤立和压制民主德国的政策相比，勃兰特实行的是一种比较灵活的、迂回的、和平的统一德国的政策。正如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的，新东方政策的法律条款“不如其政治的、心理的和道义的部分那样重要”^④。新东方政策给苏东国家打开了一个认识西方世界的窗口，两相比较，西方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对东欧国家自然会产生某种吸引力，苏东联盟的凝聚力下降。因而，新东方政策在政治上对东欧国家起到了麻痹作用，在外交上对苏东关系实际上起到了离间作用。

（二）意识形态——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领域

虽然军事遏制与和平演变是平行的两手，但是随着军事遏制的效果日益见差，和平演变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西方把意识形态的斗争摆在首要地位，主要围绕着宣传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和“私有制”、“市场经济”三个基本问题展开，攻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美国总统里根继承了历届前任的和平演变思想，公开声称“在现今世界上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自由民主事业在向前挺进途中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⑤。美国利用一切大众传播工具，建立并使用一支“巨大的非军事力量”，决心同社会主义国家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战争。里根骂苏联是“邪恶的帝国”。美国在西欧设立了两家专

专门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广播的大型电台。其中，自由欧洲电台专门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广播，自由电台专门对苏联广播。自由欧洲电台每天以6种东欧国家的语言，即保加利亚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进行播音。其中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每天的播音时间为21小时45分钟，波兰语每天播音时间为19小时45分钟，匈牙利语为19小时15分钟，罗马尼亚语为13小时45分钟，保加利亚语为9小时。自由电台则每天以俄语和其他11种苏联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播音^⑥。“民族自决”是其重要内容。“美国之音”曾被里根称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点火的力量”，其副台长尼古拉德斯1981年9月21日的一段自白的话倒是十分精彩：“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进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进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互相猜疑。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复萌。”^⑦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新的一场科技革命的来临，西方拉大了与苏东在经济科技方面的距离，便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加紧了对苏东的和平演变。

1973~1975年，经过两年多、三个阶段的外长会议、专家会议、首脑会议的艰苦谈判，共召开了337次会议，才最后于1975年8月达成欧安会最后文件^⑧。欧安会最后文件实际上是以苏、美为代表的各方最终妥协的产物。一方面承认了苏联最关心的现有边界不可变更原则，同时照顾到西方的要求，认为可依据国际法以和平手段加以改变；另一方面，美国及其西欧盟国提出了“关于东西方人员交往，新闻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问题”，这也是它们参加欧安会的主要目的。在“人道主义和其他的合作方面”，规定与会国人员、组织和机构之间的“自由交往”，其中包括“家庭团聚”、“旅行”、“青年人之间的会晤”和“不同国籍的婚姻”，等等；“改善新闻记者的工作条件”，促进“新闻的传播、取得和交换”，促进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和合作”。还规定发

展与会国之间的“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欧安会要达到使东欧和西欧之间进行比较自由的交往。”^⑥1975年12月，美国国务院顾问索南费尔特发表讲话，主张美国在对待东欧国家的政策问题上，一方面承认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以此来换取苏联不再向西欧扩张和避免引起美苏战争；另一方面还主张东欧“实现较大程度的自治权”，而美国“必须对东欧显而易见的愿望作出响应”^⑦。换句话说，西方要苏联打开“铁幕”，让东欧人民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并且让东西欧人民之间自由交往，以渗透东欧，挖苏联的墙脚。特别是，在国际会议上，人权问题第一次以非常显要的地位提出来了，这就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自己的科技与经济优势实行和平演变打开了大门。人权问题的提出是西方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从法学上来讲，所谓人权，就是单个或集体的人，作为人类社会成员生存的权力，以及为了维持这种生存而必须享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自由。主权和人权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际政治中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人权有一些国际公认的原则，如每一个人的存在权、发展权、受教育权；但人权也要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与具体的国情、民情相联系。在战后，人权概念进入了国际文件，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只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领导”，不屑于谈“人权”就可以对付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60年代至70年代中，美国因侵越战争及国内“水门事件”，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人权遂被置于相对次要地位。欧安会成立以来，西方利用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对比有利于西方的情势，在人权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便大谈特谈人权。1975年，美国国务院正式成立了“人权事务司”，宣称“人权问题”已成为“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问题”。1977年卡特就任总统后，正式打出了“人权外交”的旗号。美国打“人权牌”，是把它作为打击苏

东社会主义国家、挑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种“精神武器”。1980~1981年，波兰发生了战后的第三次危机。在苏联的支持下，波兰政府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取缔受到西方支持的团结工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波兰政府“违反人权”为由，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根据后来披露出来的材料，在波兰1981年危机中，美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1981年波兰当局戒严令发布以后，美国的劳联—产联通过设在布鲁塞尔的、相当于团结工会大使馆的办事处向团结工会提供了其急需的一切援助；这些资金对向团结工会提供许多物品和办理各种事项起了担保作用。团结工会得到了许多印刷机、计算机、油印机和无线电广播设备等等^①。西方还支持苏东国家，如苏、波、匈、捷和罗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

（三）与天主教势力联手推倒苏东大厦

天主教在苏东剧变中的作用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苏东外部的天主教势力，主要是世界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另一个是东欧特别是中欧国家本身内部的天主教势力。它们对苏东国家的政策目标有两个：一是推翻苏东社会主义制度，二是瓦解苏东同盟。由于苏东阵营是建立在政治同盟的基础上的，因此，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两点中的重点。

天主教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敌对首先是基于理论上的对立。天主教是信奉唯心主义的有神论，而马克思主义是信奉唯物主义的无神论；马克思主义重视阶级分析方法，而天主教则标榜平等、博爱。西方天主教认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口口声声声称“自由”，但社会主义文化服从于政治的需要，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社会主义“自由的条件”比资本主义还要差。梵蒂冈不惜一切代价诽谤现实社会主义，并煽起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化的不信任，号召“保卫欧洲基督教文明，反对共产主义侵略”^②。其次，在实践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特别是中欧（波兰、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等国家的天主教很活跃, 是西方天主教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 天主教作为唯心主义有神论, 其发展在苏东国家受到了限制, 许多天主教徒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天主教堂被拆毁。但是, 梵蒂冈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公开对抗并没有达到阻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扩大的目的。60年代上半期,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决定“适应形势的发展”, 进行教会改革, 与思想上的敌人——马克思主义, 政治上的敌人——社会主义苏联、东欧进行对话, 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展开一场新的较量。梵蒂冈在教会领域中实行的“新东方政策”, 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的和平演变。为此, 专门成立了教皇直接领导下的文化委员会, 旨在进行文化扩张。梵二会议的对话精神与西方国家对苏东的和平演变策略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1978年, 一位波兰人当选为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是450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皇, 体现了梵蒂冈对东欧的重视, 克服了教会与西欧过于密切的关系。约翰·保罗二世特别强调“基督教欧洲的统一”, 认为“离开东欧的历史、文化、传统, 西欧就会失去很多价值, 它们是由多样化的、有互补特点的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③, 是“欧洲的两叶肺”。应该通过同时发展宗教和文化来实现所有欧洲民族的相互接近和一体化。在这里, 教皇特别突出了波兰在其中的作用, 认为波兰有着独一无二的自我保护的经验。教皇还多次到东欧访问、传教, 扩大影响。

另外, 东欧, 特别是波、匈、捷三国, 天主教徒人数占总人口大半以上。它们不仅与罗马教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接受教廷委派的神职人员, 并且和各种国际性天主教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东欧各国天主教会是天主教世界的组成部分, 在它们抗议政府的宗教政策时经常得到西方教会的声援^④。各国天主教, 尤其是实力比较强大的中欧诸国的天主教, 奉行“小步政策”, 意即通过与政府谈判及抗争, 使教会的地位逐步得到改善。在这一点上, 西方学者认为, 波兰天主教做得比较成功, 它既善于斗争,

又善于妥协。波兰天主教徒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第一批持不同政见者。天主教反对派还往往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持不同政见者结合起来。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联系紧密，是一对共生物。西方学者认为，波兰天主教成功地阻止了波兰工业无产阶级的“世俗化”（即无神论化——作者注），在波兰的“解放”中起了重要作用^⑦。

80年代，教皇与美国结成了反苏、反社会主义的“神圣同盟”。布热津斯基说：“为了使地下活动维持下去，动用了许多物资和组织系统，因此团结工会才没有被压垮。”教皇的一位亲密助手说：“如果你研究团结工会的做法，就能发现他们干得很聪明，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做过头，因为它们得到教会的指导。”^⑧教皇在回忆他在苏联帝国解体中所起的作用时只是说：“这棵树已经腐朽。我用力摇动了它一下，腐烂的苹果就落了下来。”从1978年卡罗尔·沃伊蒂瓦当选为456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皇的那一刻起，华盛顿就把梵蒂冈看作是某种精神超级大国和冷战最后几年的主要盟国。在里根执政时期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凯西经常出访梵蒂冈，向教皇出示通过间谍卫星拍摄的照片，在苏联集团进行电子窃听的报告，甚至还有白宫高级会谈记录。教皇则向凯西通报他的神职人员关于东欧集团政治活动的报告。他还提供有关波兰共产党政府内部的想法，以及它是否有可能采取行动镇压团结工会的具体情报。

（四）和平演变战略的系统理论——“超越遏制战略”的出笼

1989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发表了讲话，提出了对苏联东欧的“超越遏制”战略。超越遏制战略不是一时的即兴之作，而是美国非常慎重的战略抉择。超越遏制战略是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的全面反响。其实质就是和平演变，旨在改变苏东的社会制度。

超越遏制战略是在西方对东方、美国对苏联在综合国力、经

济发展和军备竞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提出来的。经济方面，自1982年10月经济复苏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处于发展阶段，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3%~4%左右；到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已接近苏联的2倍。军事上，美国已扭转了80年代初期的对苏劣势，逐步转向相对优势。在包括导弹、飞机、坦克、潜艇、通信和电子等31个武器装备项目中，美方占优势的有15项，美苏持平的占10项，苏占优势的只有6项^⑦。而此时华约各国内部困难重重。戈尔巴乔夫提出外交“新思维”，其核心内容就是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淡化意识形态因素，摒弃集团意识，提倡和平共处。尽管美国及西方一些国家政治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由来已久，但是，直到现在，美国才认为通过和平演变一举战胜苏东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超越遏制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现在的目标远不仅仅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我们所谋求的是苏联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的目标是欢迎苏联回到世界秩序中来。”^⑧对于东欧问题，要求苏“遵守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承担的保证支持东欧和中欧各国自决的义务。这就要求明确地摒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有朝一日应当能够从莫斯科径直驱车去慕尼黑，沿途看不到一座岗楼或一处铁蒺藜。简言之，就是拆除铁幕”^⑨。使苏联回到国际社会中来，实际上就意味着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苏东联盟自然也就瓦解，这是超越遏制战略的最高目标；“摒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拆除铁幕”，意味着推翻战后的雅尔塔体制，把东欧和平演变过去，以达到彻底孤立苏联的目的。这是超越遏制战略的最低目标。

与以前的遏制政策相比，超越遏制战略有自身的特点：在斗争手法上，从过去的强调大军压境、层层武力包围，配以外交孤立、经济封锁，转变为以政治、经济、外交、意识形态等非军事手段为主的全面竞争；在斗争空间上，由以外围角逐为主（东欧）到直捣苏联心脏；以往同苏联的争夺一般是苏联势力范围的

周边地区或外围地区，如中欧、远东、第三世界，等等。超越遏制战略强调“要把斗争推进到铁幕里面去，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和苏联国内与苏联进行斗争”。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起“融合”的攻势，另一方面要更加“大胆地影响苏联的变革进程”。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其一是官民结合，影响苏东的内部演变，不仅要靠政府正面工作，还要辅以民间交流，同时软硬兼施，诱压兼济。美国把苏联是否让东欧“自决”作为美国是否支持苏联改革的一个筹码，压苏联对东欧国家放手，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的讲话中，美国总统布什表示“苏联说它在谋求同全世界和解，并且批评了自己的战后政策，对这些言辞，我们只能表示赞许”，“西方的政策应当鼓励苏联朝着一个开放社会的方向演进”，要求苏联“实现持久的政治多元化，尊重人权”，以实现“真正是一个世界各国组成的大家庭”^④。否则的话，美国不但不会支持苏联的改革，反而会回到军事遏制的老路上去。布什早在他还是当美国副总统时的1983年就在解释欧安会最后文件时说过：“有人认为，欧洲分裂的现状好像为赫尔辛基会议所承认，我们不承认这种解释。”^⑤

东欧是联系西方与苏联的缓冲地带，因此西方以东欧国家作为和平演变的突破口。在东欧国家中，西方又以波兰和匈牙利为和平演变的重点，以图产生示范效应。早在1982年6月，美国总统里根和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梵蒂冈会晤，秘密达成了支持波兰团结工会，将波从苏联控制下拉出来并最终搞垮“共产党帝国”的计划^⑥。1988年2月，英国《独立报》发表布热津斯基《苏联帝国的裂口》，说东欧“正在骚动”，“共产主义在波兰已经基本上丧失了信誉”，在匈牙利，“共产党的一党统治也许不得不再被视为一种过渡阶段”，断言东欧5个社会主义国家“爆发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⑦。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88年接连发表《必须使东欧获得自由》、《1999：不战而胜》等著作，全面地阐述了美国“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和策略手段。尼克松预言，东欧“在

90年代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政治大动荡”，美国“应该施加压力，促使东欧和平演变”。对波、匈两国1989年的巨变，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大力支持和援助。1989年7月间，布什总统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他直言此次出访的动机是：“我们的任务是很明确的：修补旧的裂痕，实现几十年的梦想；出现一个安全、繁荣、和平与自由的新欧洲。”^④团结工会在波执政和波共垮台后，美明确地向苏表示，美决不允许“勃列日涅夫主义”复活。1989年12月，美苏首脑在马耳他会晤达成一项重要妥协，美要求苏联支持东欧“自决”，戈尔巴乔夫重申了苏不干涉东欧事态的承诺。布什则应允了发展美苏经济关系的多项计划。布什还宣称，他参加马耳他会晤的目的是使90年代成为东欧“民主的10年”。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先后给了波、匈数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支持两国新政府并缓解外债压力。在东欧其他国家（如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1989~1990年的巨变中，美国等西方势力也不失时机地进行了插手。东欧在80年代末的苏、美“缓和”中起到了特殊的桥梁作用。

三、西方苏东战略的得失

西方对苏东的军事遏制与和平演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两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军事遏制是武的、硬的、强暴的手段，那么和平演变就是文的、软的、“文明”的策略。其最终目的是共同的：推翻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军事遏制是和平演变的基础，和平演变是军事遏制向高一层次的延伸。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或双管齐下，或交叉进行，例如“星球大战计划”既起到了军事遏制的作用，也起到了心理战、神经战的作用。西方的苏东战略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是有区别的：军事遏制更多地是针对苏联的，对东欧更多地是实行和平演变。

军事遏制是从来就存在的。在欧洲和亚洲，直接的如杜鲁门

主义，第四点计划，两个德国的分裂，三次柏林危机，北约军事集团的成立；间接的如 50 年代朝鲜战争，60 年代越南战争。对敌方阵营保持一定的军事压力或许是有效的。正如布什认为，“遏制起了作用”^⑤。遏制政策摧毁了苏联社会的基础，拖垮了苏联的经济。但笔者认为，在破坏苏东关系方面，西方的军事遏制战略的成功是有限的。因为它只增强了苏东联盟存在的理由，在两大阵营“谁战胜谁”的斗争中加强了苏东的集团意识，巩固了苏东联盟的团结。事实上在苏东联盟存在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一个东欧国家因为害怕西方的军事威胁而脱离苏联阵营回到西方的怀抱。包括脱离了苏联阵营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事实上，西方无法通过军事遏制摧毁苏东集团。1958 年 8 月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发表演讲承认：“现在没有必要侈谈大规模报复，这只能使赤色集团巩固起来，我们现在必须找出分裂它的办法。”^⑥1965 年铁托在苏联说，尽管过去曾经存在过误会，但没有一个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会怀疑，“如果出现困难时刻”，他的国家将坚定地站在苏联人民一边^⑦。亨利·基辛格博士也认为，遏制政策公开放弃了谈判机会，因而在美国相对实力最强的时期（如美国独家掌握原子弹期间）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对手，是一种被动的外交政策^⑧。

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在 70 年代中期以前实际成效是不大的，那时社会主义处于上升势头，苏联总体实力虽然不如美国，但处于攻势。没有任何一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倒向西方。相反，西方的和平演变和对苏东关系的挑拨离间，有时引起苏东国家的警觉，增强了苏东集团意识。如雅鲁泽尔斯基说：“波兰问题又时兴起来，受到了充满敌意的关注。从外部煽动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和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指望削弱我们联盟的可靠性，离间波兰同其邻国的关系，使波兰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特洛伊木马’。”^⑨。哥穆尔卡在 1956 年事件后也曾有过类似的讲话。勃列日涅夫也看到了：“在新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者越来越经常地采

用另一种更为阴险的策略。他们寻找社会主义阵线上的薄弱环节，采取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性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竭力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企图在它们之间制造纠纷，挑拨离间，鼓动和煽动民族主义感情和倾向，力图孤立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一个个分别掐住它们的脖子。总而言之，帝国主义企图破坏的正是社会主义这个世界体系的巩固性。”^①直到 70 年代中期，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西方在经济、科技乃至军事等领域占了明显的优势，苏东阵营处于劣势，力量均衡被打破了。作为苏联“新思维”外交思想的全面反响，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逐渐形成系统的理论——超越遏制战略，并且在东欧寻找到了突破口，向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了全面的攻势，发挥了比较明显的作用。当然，根据唯物辩证法，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和平演变在过去成效不大，不完全是因为苏联处于攻势，后来之所以起作用，也不仅仅是因为苏联综合国力下降，客观地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导向上的失误为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契机。

注 释

① 洪长泰：《东欧和苏联之间》，第 114 页，七十年代出版社，1979 年版。

②（联邦德国）彼德·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第 139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

③（美）施韦策：《谁摧毁了“邪恶的帝国”？》，美国《国际评论》1994 年第 10 期。

④ 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件 1945～1973 第二卷 东欧与苏联》，第 304～313 页，纽约，1973 年版。

⑤ M·M·拉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3 年第 2 期，第 11 页。

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1948 年 第 3 卷 西欧》，第 303 页，华盛

顿，1974年版。

⑦ 陈佩尧：《北约战略与态势》，第2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⑧ (美)《纽约时报》1952年8月28日。

⑨ (美) J·斯卡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96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⑩ 罗·亚·麦德维杰夫、若·亚·麦德维杰夫：《政治日记·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⑪ 《美国外交事务 1952~1954年》，第8卷，第112~114页。

⑫ J·坎贝尔：《美国对共产主义东欧的政策：今后的选择》，第88页，明尼阿波利斯，1965年版。

⑬⑭ (苏) 贝·雷赫洛夫斯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帝国主义的区别对待政策》，(苏)《国际生活》1987年第8期，第29~30页。

⑮ 关于美国的东欧政策参见钟成摘译：《美国对东欧政策的演变及今后的建议》，《今日苏联东欧》1990年第4期。

⑯ 《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5期，第85页。

⑰ 《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3期，第88~89页。

⑱⑲⑳ (美) 凯尔迪什：《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第386、330、3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㉑ 参见(美) 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1945~1970》，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㉒ 《一个流亡者的历史马加斯·拉科西在苏联(1956~1971)》，(俄)《肯塔费尔》1993年第6期，第79页。

㉓ 张文武、赵乃斌等主编：《东欧概览》，第6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㉔ 路德威克·波耳：《友好和互助的关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0年第6期，第68页，中文版。

㉕ 《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5期。

㉖ 《离开真理哪里也不去 关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新材料》，(俄)《肯塔费尔》1993年第4期，第89页。

㉗ (美) 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418

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②⑥《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帝国主义的区别对待政策》，（俄）《国际生活》1987年第8期，第22~23页。

②⑦参见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②⑧三豆村、曹志为：《毛泽东两次苏联之行》，第1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⑨ 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23~2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③⑩《8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东西方关系问题》，第109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50年11月24日。

③⑫《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 上卷》，第184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③⑬⑭⑮⑯（美）丹尼森·拉西诺：《南斯拉夫的实验 1948~1974》，第60、62、149、33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③⑰（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 1939~1973 文件与评注》，第50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⑱南斯拉夫《信使报》1975年5月8日；转引自《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经互会》，第308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③⑲ 费·盖尔：《美国应对贝尔格莱德施加压力》，美国《纽约时报》1984年2月1日。

③⑳参见：Б·雷赫洛夫斯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帝国主义的区别对待政策》，（苏）《国际生活》1987年第8期，第226页。

④①（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第149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④② 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第22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④③（联邦德国）《明镜周刊》1958年7月2日。

④④参见刘邦义：《波兰“波兹南”事件初探》，《苏联历史问题》1990年第3~4期。

④⑤ E·A·穆斯达夫：《苏联与匈牙利 1956年事件新的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3年第1期，第17页。

④⑧ 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第 134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④⑨ (美) 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第 164～165 页，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

⑤⑩ 《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84 页。

⑤⑪ (俄) И·瓦连达：《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俄)《近现代史》1993 年第 3 期，第 169 页。

⑤⑫ И·瓦连达：《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俄)《近现代史》1993 年第 3 期，第 171、228 页。

⑤⑬ P·比霍亚：《捷克斯洛伐克 1968 年事件 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5 年第 1 期，第 36 页。

⑤⑭ (法) 卡特琳·迪朗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第 123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版。

⑤⑮ 《美国敦促盟国利用向东欧集团提供贷款作为施加影响的手段》，《纽约时报》1988 年 6 月 9 日。

⑤⑯⑰⑱⑲ (美) W·汉里德、G·奥顿：《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第 71～72、90、92 页，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

⑤⑳ 参见刘志功、何春超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手册》，第 366、360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⑤㉑ 参见祝逸清：《关于共同体与经互会之间的关系》，《国际问题研究》1987 年第 1 期。

⑤㉒ 参见维利·勃兰特：“德国的爱国主义”，《盘根错节的欧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

⑤㉓ 美国国际交流署伦敦 1982 年 6 月 8 日电。

⑤㉔⑤ 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第 79、82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⑤㉕ 参见 A·A·拉罗奇里茨基：《社会主义阵营与赫尔辛基过程》，第 60 页，莫斯科，1988 年版。尤·维·杜柏林：《通往赫尔辛基的曲折道路 1975 年》，(俄)《近现代史》1994 年第 4～5 期。

⑤㉖⑤ 刘志功、何春超：《战后国际关系史手册》，第 429、399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⑤㉗ 《华盛顿邮报》1989 年 8 月 27 日。

⑦⑧ P·T·拉施科娃：《梵蒂冈与现代文化》，第 271、355、357 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9 年版。

⑨ 傅乐安：《当代天主教》，第 169 页，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

⑩ A·柳克斯：《社会主义波兰的天主教和政权（1945~1989）》，（俄）《近现代史》1996 年第 3 期，第 222~223 页。

⑪ 英国每日电讯报，1996 年 9 月 14 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请教皇帮助颠覆苏联（作者：史蒂芬·罗宾逊）。

⑫ 赵桂林、韩金坡：《布什的“超越遏制”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 年第 4 期，第 43 页。

⑬⑭⑮《纽约时报》1989 年 5 月 13 日。

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与帝国主义的区别对待政策》，（俄）《国际生活》1987 年第 8 期，第 22~23 页。

⑰（美）卡尔·伯恩施坦：《时代》1992 年 2 月 24 日。

⑱ 辛夷、樊佳：《东欧风云》，第 231 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 年版。

⑲ 郝润昌：《论美国对苏的和平演变（超越遏制）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 年第 1 期，第 4 页。

⑳ 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 12 页，中国当代出版社，1992 年版。

㉑《苏联新闻》1965 年 6 月 25 日。

㉒ 亨利·基辛格：《遏制政策反思》，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交流》1995 年第 1 期。

㉓《雅鲁泽尔斯基选集（1981~1987）》，第 12 页，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㉔ 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4 集，第 181~18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

第七章 苏东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因素

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虽不如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政策那么直接而明显，但它却是一种深层、恒常起作用的力量或因素。过去在冷战时期，由于被政治、军事等“硬要素”所掩盖，文化这个“软要素”的作用受到了忽视。随着冷战的结束，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上升，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在国际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不再起主要作用，文明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或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文明的界线就是未来的战线^①。亨的观点虽然不无偏颇，却也道出了一定的道理。一般来说，同一血缘的民族国家即亨廷顿所谓的亲缘国家族群（KIN—COUNTRYSYNDROME），民族、宗教、文化、价值观同质或相近，甚至有共同的历史、血缘、文化渊源，相对容易交流和传播，产生认同感和凝聚力，建立较持久的亲善关系。如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美国与英国、加拿大。没有血缘关系的民族国家，文化不同，宗教相异，很难有共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在相互认同和沟通方面显然要困难得多，要单靠暂时共同利益的维系建立持久的同盟友好关系是比较困难的。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真理。由于阶级、阶层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不同，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相同血缘、相近文化的民族国家也有不和甚至刀戈相见的，如两伊战争；不同血缘、文化

迥异的民族国家也有和平共处、亲密友好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现状是各种因素和利益综合、互动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一个非常矛盾、复杂的复合体，绝非单纯划一的。文化相同并不一定导致国家间结盟，文化相异也并不一定导致国家间交恶。总之，文化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在文化方面的集中表现，是客观存在着的社会政治历史现象。

为了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开展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工作，笔者觉得有必要提出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这一概念并应用于当代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政治文化是直接或可能直接地与国际政治相关的、广义的文化，它既包括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或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法律体系等范畴，还包括民族属性（血缘）、社会心理、国民性格、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人际关系、风俗习惯，甚至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地缘、语言文字、思维方式、文明类型等范畴。它们作为要素，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对国际政治发生影响。一国内部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社会体制在某些情况下与对外政策有关。政治文化是多角度、多层次、多结构、多侧面的，其内涵与外延的伸缩性很大。当然，在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时代，政治文化属于文化范畴，但不能把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都看成是政治文化，以致于草木皆兵，闭关锁国。

在国际政治中，政治文化诸要素既不是同时起作用，也不是平均起作用，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一种情况下以这种因素为主，在另一种情况下以另一种因素为主。如在1958年柏林危机这个问题上，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因素为主，其他因素相形逊色；而在德国统一这个问题上，则以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因素为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退居次要地位。国际政治中政治文化诸因素的作用也是分层次的，民族、宗教、社会心理、国民性格的作用要比意识形态、社会制度

更有生命力。深层的心理结构要比物化的政治文化更恒久。

作为一个多层次、多要素、多矢量的综合体，政治文化的不同要素或矢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显学”的顺序是不同的。如法国大革命前的王朝国家（君主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民族国家、冷战结束前的政治（国家）意识形态等就先后充当了这种角色。当政治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等实际利益相一致或吻合时，政治文化的作用就表现为直接的、明显的、甚至决定性的。如上面所讲的柏林危机，看起来似乎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背后还有政治、军事利益在起作用。当政治文化与实际利益不一致时，往往是实际利益占据上风，但政治文化及其作用仍然是潜在的，如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内部发生战争，伊拉克导弹袭击以色列，企图分化、瓦解反伊统一战线。以色列吃“哑巴亏”而不敢还击，怕的就是激起阿拉伯国家的愤怒，导致反伊统一战线的破裂。冷战后，政治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对于国际政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国际政治的状况是由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政治文化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并且往往是隐藏在背后的，其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决定性的。在政治文化的同异与国际政治的好坏之间，政治文化既不是国际政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首要条件。政治文化只为国际政治活动提供背景材料和活动舞台。

文化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苏联和东欧各国各自政治文化是非常丰富的。文化，尤其是民族深层文化会对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外交行为产生影响，有时是很大的影响。苏东文化既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不少明显的不同点。这对于我们理解战后苏东关系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由于民族亲缘和地缘政治的原因，苏东历史和政治文化有很多共性。与西欧相比，苏东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宗教、

民族国家形成、民族问题诸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苏联与东欧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处于欧洲的边缘地带。建立在罗马帝国分裂基础上的基督教的分裂使东欧相对于西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单元，在俄罗斯和巴尔干，希腊拜占庭东正教占了主导地位。13~15世纪俄罗斯为蒙古人所统治，蒙古的势力还波及了波、匈、罗等东欧国家。由于地处欧洲的边缘地带，东欧地区受文艺复兴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较小，俄罗斯所受到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在文艺复兴时期，整个东欧和俄罗斯都没有出现过具有重大意义和重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思想家^②。在经济上，中世纪以前农村公社这种所有制形式广泛地存在于苏东地区。16~17世纪，根据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的见解，欧洲大陆一分为二：一方是富有活力的、工业化的西北欧，另一方是农业的、依附性的东南欧^③。17~18世纪当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时候，俄罗斯和东欧地区出现了农奴制的“再版”，为西方提供农产品原料，因而形成了大致类似的经济结构。与西欧相比，苏东无论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还是资本主义发展都比较晚，并且要补发展资本主义的课，各国于19世纪中后期不得不进行农奴制改革。俄罗斯与东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形成，普遍晚于西欧国家；民族问题总的来说也比西欧尖锐、复杂。等等。

苏东政治文化的共性之一表现为斯拉夫文化，它们都源同一种族——斯拉夫民族。根据波兰和一部分苏联历史学家的意见，乌尔茨文化（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400年）是古代斯拉夫人的摇篮。乌尔茨文化由最先发现于波兰西部的乌尔茨的墓葬而得名。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西起奥得河，东到第聂伯河的古斯拉夫人共同体。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斯拉夫人明显地分为两大政治集团。居住在第聂伯河中游的属于东斯拉夫人；居住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流域的属于西斯拉夫人。公元4到6世纪，斯拉夫人参加了欧洲民族大迁徙。一部分西斯拉夫人来

到了巴尔干半岛，一部分东斯拉夫人也来到了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这样就出现了第三支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在南方斯拉夫人中，保加利亚人是由东方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融合而来，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主要由西部斯拉夫人演变而来。原来的西斯拉夫人又分成西南支和西北支，前者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祖先，后者是波兰人的祖先。东斯拉夫人成为后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人的祖先。这些民族、血缘、相同、相近的地域，9~10世纪，它们普遍建立了早期封建国家，分别按拉丁仪式和拜占庭仪式接受了基督教，产生了早期的斯拉夫语言。由基里尔兄弟创造的古斯拉夫文字，使斯拉夫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斯拉夫人在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建筑风格诸多方面有相同之处。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是斯拉夫诸民族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经历严重的危机以后，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封建农奴制度在19世纪中叶以后先后被废除。这也是各族人民反对封建压迫、争取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期。民族解放运动哺育了民族文化。斯拉夫文化经历了从古典主义经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转变。这是斯拉夫诸民族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文化繁荣时期。同时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是斯拉夫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④。

正是在反对日耳曼人的斗争中，被压迫的斯拉夫学者力图从斯拉夫历史和文化中寻找政治联合的道路，这就是泛斯拉夫主义。波兹南人民就这么说，不要忘记，我们首先是斯拉夫人，其次是波兰人，再次是波兹南人^⑤。沙皇俄国打起了这面旗帜，声称俄罗斯是特殊的民族，负有特殊的使命，是斯拉夫人中唯一“有政治能力的”、“强有力的部分”，“独立的”、“强大的国家”；俄罗斯是斯拉夫人的领袖，“保卫斯拉夫人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绝不可能撇开俄罗斯的”^⑥。沙皇俄国正是利用这面旗帜长期与南方的土耳其、西面的德意志在东南欧进行争夺。在18世

纪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共同斗争中，很多南斯拉夫的移民参加了俄罗斯军队，并在俄军中当了军官、将军，跻身为贵族阶层，在俄罗斯和巴尔干国家，特别是南斯拉夫的政治和文化历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⑦。沙皇俄国在统治波兰时期，还推行俄罗斯化的政策，规定政府机关里使用俄语，在学校里用俄语讲授，企图消灭波兰人民的民族性^⑧。泛斯拉夫主义思潮风行一时。因此，从血缘关系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苏联与东欧斯拉夫国家的关系是东斯拉夫人与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的关系。

俄国与一些东欧国家政治文化的共性之二表现在：在宗教上，它们都经历了从多神教到基督教再到东正教的过程，受希腊拜占庭东正教的影响比较大。俄国、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斯拉夫人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过程。原先各民族都信奉多神教。在公元9~10世纪，各国先后接受了基督教，即西方文化。988年，罗斯接受了正宗的基督教，基辅公国以基督教社会的一个完全平等的成员进入东欧的天主教国家的大家庭。当时，基辅公国与天主教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接触频繁，共商国际问题和东欧的各种事务。此外，罗斯还用皇室联姻的办法加强与天主教国家的关系，例如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把妹妹嫁给波兰国王，把一个女儿嫁给波兰的卡西米尔一世，一个女儿嫁给捷克的国王，他的儿子则娶了波兰的公主^⑨。同时，西斯拉夫文化、南斯拉夫文化，因为是同一民族分化而来，文化上有血缘关系。同时，罗马文化和拜占庭文化都对它们有影响^⑩。1054年东西基督教会分裂后，斯拉夫人按宗教分裂为两大集团，其中，罗斯人（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属于东正教集团，使用基里尔字母。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文字字母，必然有助于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甚至建筑风格。俄罗斯自诩为东正教的首领、家长，莫斯科为继罗马、拜占庭以后的“第三罗马”，而第一罗马（意大利罗马）已不存在，第二罗马（君士

坦丁堡)业已没落,只有第三罗马(莫斯科)将永放光芒,而第四罗马不会出现。在俄罗斯看来,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的战争不仅是物质手段的争斗,更重要的是思想战,灵魂战,是争夺种族精神统治权的斗争,是东方与西方基督教的冲突和交流^①。俄罗斯救世主义喧嚣一时。

俄罗斯与保加利亚的历史文化联系,俄罗斯文化对保加利亚的影响,促进了保加利亚民族意识的增长,及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并在很多方面鼓舞了保加利亚人争取自身民族利益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的保加利亚移民起了关键作用。俄国学者尤·伊·维涅里拉写的《从古至今的保加利亚人》,回忆了保加利亚光荣的过去,叙述了保加利亚发生的变化,激起了保加利亚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保加利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②。保加利亚著名教育家阿普尼洛夫等人坚定地认为,保加利亚人只有到俄罗斯,到俄罗斯的教育机构受教育才是必要的,有益的,对保加利亚有利的,这是一切保加利亚的爱国者应当做的。他们为此还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同其他主张(如主张到罗马尼亚、希腊受教育)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他们的大声疾呼,保加利亚人应到俄罗斯接受教育的主张在保加利亚社会占了上风^③。同时,俄罗斯与塞尔维亚的社会文化关系也很密切^④。马克思就曾说过,“他们(指俄罗斯人)与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十分之九的居民同一信仰,他们的语言几乎就是700万土耳其的被压迫者的语言”^⑤,“血缘亲族和宗教共同体还可以使俄罗斯人与南斯拉夫之间形成很多联系”^⑥。19世纪初俄罗斯与波兰之间也不仅仅限于经济和政治联系,更不仅仅限于军事冲突。面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波兰日益加紧的日耳曼化的危险,波兰社会出现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即斯拉夫世界联合起来,接受俄罗斯的保护,以俄罗斯国家为支柱。泛斯拉夫主义思想最先是由西斯拉夫人提出来的。波兰泛斯拉夫主义者同教育界有紧密的联系,他们促进了波兰同俄罗斯文化联系的巩固和发展^⑦。18世纪初,俄出钱出书帮助

门的内哥罗（黑山）恢复被土耳其破坏的东正教^⑩。1877~1878年俄土战争以后，俄罗斯向塞尔维亚派遣了大批著名的斯拉夫学者，鼓励他们从事塞尔维亚的历史与文化方面的学术研究，普及塞俄“同一血缘、同一种族”的思想和在塞尔维亚推广俄语^⑪。

苏东政治文化的共性之三即社会主义类型的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东地区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阵营。马列主义指导思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相互关系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文学创作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宗教信仰上的无神论，构成了其共同的文化内容。社会主义类型的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新型的政治文化。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时期，苏联很注意与东欧各国的文化交流，培养共同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学者称之为苏维埃文化），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例如同波兰的文化关系，最初（40年代末）是一些简单的相互了解，如搞电影周，文化周，文化展览，介绍对方的文学作品。5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更多、更频繁。1944~1975年，波兰翻译、出版了1.1万本苏联各类书籍，总印数达1.76亿份，其中有3789本是俄罗斯和苏联艺术作品，总印数达9277.5万份。1944~1973年总共出版了托尔斯泰的作品73部，高尔基的作品117部，契柯夫的作品69部，肖洛霍夫的作品40部，盖达尔的作品56部^⑫。到70年代以后更进一步，发展到共同拍电影，共同出版科学著作和社科著作^⑬。与保加利亚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合作大体如此^⑭。社会主义文化强调党性、阶级性、政治性、人民性，相对忽视了人性，民族性，多样性。实际上使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变成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尽管在社会主义阵营条件下，苏维埃文化发展了近半个世纪，各国为推进苏维埃化也做了很多工作，如捷克斯洛伐克改变原来受西方的传统影响的教育制度，代之以苏联的影响。在小学里，唯一开设的现代语言课就是俄语。公民课还要学习苏联的国家制度。捷甚至采用苏联的学位制，例如用科学院院士代替捷传统的博士学位。在捷

知识分子中，甚至还存在着一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派^⑳。匈牙利在文化方面全盘照搬苏联模式^㉑。在民主德国，学习苏共党史成为全部党内教育的基础^㉒。在罗马尼亚，罗共完全控制了意识形态，人文科学和艺术的研究。民主德国党公开要求“要打开苏联文学和艺术的宝藏，它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并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民主德国出版了俄罗斯作家和20~30年代苏联文学的大量作品。与此同时，苏联对民主德国作家和艺术家作品的兴趣也大增。1974~1976年，苏联出版了78部民主德国作家的作品，印数超过了500万本；1979~1981年，又出版了102部民主德国作家的作品，总共达750万本。两国还举办了文化、文学、艺术、电影、戏剧、音乐周等活动，在学校、师范、少先队、共青团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紧密的联系，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学生^㉓。

与此同时，苏东政治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从民族起源和民族属性来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不是斯拉夫民族。德意志无论从民族属性、国民性格、历史传统、文明类型、社会心理各方面都与俄罗斯迥然不同。它在欧洲特别是在东欧争夺势力和影响方面是俄罗斯的主要对手。俄德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形成了竞争的格局，历史上只是在对抗英法等西方国家、打破西方国家的包围时才进行合作（如本世纪20~30年代苏俄签订拉巴洛条约和互不侵犯条约）。民主德国就是德意志民族和文化传统的两个继承国之一。罗马尼亚人是古达契亚人与罗马军团和罗马移民的后代。当时罗马帝国大规模地组织罗马人向该地区移民，以促进殖民化，这些移民“来自整个罗马世界”^㉔。而根据语言学家研究的成果，今天已肯定匈牙利属于芬—乌戈尔语系。与匈牙利人最接近的民族是今日分散居住在数千公里之遥的亚洲鄂毕河流域的人数不多的伏古尔族和奥斯佳族。同系的其他旁支分布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和北欧（芬族和拉普族）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爱沙尼亚族）。现在比较普

遍的看法是，匈牙利民族最早起源于伏尔加河曲，在卡玛河和别拉雅河与乌拉尔山脉环抱的地带^⑳。阿尔巴尼亚的学者根据考古学、人种学和历史学的文献认为，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是古伊里利亚人^㉑。所以匈牙利民族和阿尔巴尼亚民族的起源和民族属性与斯拉夫民族没有共同之处。

其次，从宗教信仰而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属于天主教会集团，使用拉丁字母，属于拉丁文化圈。天主教与东正教在教义精神、祈祷仪式、政教关系、社会影响、风俗习惯等很多方面大相径庭。俄国文化与中欧文化各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中欧国家天主教积极干预政治，影响一直很大，如 30 年战争就打着宗教的旗帜。1945 年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后，天主教在波兰仍有很大影响。而俄国东正教虽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主张政教分离，教会从来就处于国家世俗政权的控制之下，没有像中欧那么大的影响。俄罗斯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权和谐统一，教会不是抵制世俗制度，而是在曲尽所能，以求适应这种制度，沙皇与东正教的关系“就像骑士和马的关系那样和谐”^㉒。宗教成为“国家宗教”，这既是东正教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能从俄罗斯文学和民族意识的历史中表现出来。十月革命后，由于共产主义无神论和宗教虚无主义的影响和冲击，教士、神甫、僧侣受批判，修道院、寺庙被捣毁，宗教势力受到了很大压抑。

从文化渊源看，西方文化主要源于古罗马拉丁天主教文化。俄罗斯受三种外来的文化影响比较大：拜占庭文化，东方文化（如鞑靼文化），西方文化。拜占庭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复合体，受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影响很大。俄罗斯从它那里接受了东正教。鞑靼文化是一种纯粹的东方专制主义文化。俄罗斯处于欧洲的边缘，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余波的影响，但比起中欧国家来说，俄罗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要小一些，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欧国家（波、匈、捷）也受到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波、匈甚至

遭到了鞑鞑人的侵扰，但比起俄罗斯来说，它们受影响的程度要小得多。中欧主要受罗马拉丁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匈牙利、捷克就长期处于天主教的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波兰与基督教的德国关系不好，但是密切。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几乎在波及西欧各国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波及到了波兰、捷克、匈牙利诸国。波兰在16世纪就产生了哥白尼那样的科学巨人，而在波、匈、捷都产生了一批人文主义思想家和作家。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也波及到了波、匈、捷等国，它们在思想文化上与西欧早有联系。而这两大发源于西欧的思想文化运动在穿越波、匈、捷以后，犹如强弩之末，对俄罗斯影响甚微。波、捷、斯、匈的西化倾向尤其明显，而且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主要朝着西方的，从来就没有摆脱与西方的共性和被西方所吸引，个人自由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⑤。罗马尼亚文化也属于拉丁文化，自认为比斯拉夫文化优越。巴尔干半岛国家—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也比较晚，但它位于欧亚两大洲的枢纽，处于东西两种文明、三大教派（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两大阵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交汇地带，因而具有自己文化上的独特性。而俄罗斯文化则不然。蒙古二百多年的统治使俄罗斯更东方化了。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加强了。彼得大帝曾经想把俄国推向欧化，但这只是生活习俗层次上的（剪掉长胡子，穿西欧服饰，等等），且欧化的目的不是使俄国“融入”欧洲走向资本主义，而是在国际上加强地主商人国家的物质手段，在国内强化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19世纪的农奴制改革只是制度层次的面向西方，是沙皇政府在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和革命形势的压力下的不得已之举。19世纪先后出现了影响甚大的斯拉夫派和民粹派，强调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俄罗斯民族文化特点，反对西方文化和西方道路。十月革命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由于帝国主义武装威胁、经济封锁、外交孤立，苏联基

本上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战后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个阵营”和“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因此从本质上讲，俄国文化是封闭的，是与罗马拉丁文化、西方文化不同的东正教文化。村社是俄国社会的基础，俄国文化是村社文化，强调平均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在文学方面，俄国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有相当的市场。而东欧文化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宣传民主、自由、个性，爱国主义、民族性的形式。世界上很少有几个地方像东欧那样，诗人、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如此关心政治和社会活动，如此革命，如此爱国并有独立思想。如匈牙利的李斯特、巴托克和柯达伊，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波兰的肖邦和巴德莱夫斯基，他们都是非常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他们的音乐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是他们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独立和自由的渴望。匈牙利的裴多菲，波兰的亚当·密茨凯维奇的诗凝聚着浓重的爱国主义感情^⑤。这两种文化的性质是不相容的，根本对立的。

罗马尼亚在“来自整个罗马世界”的移民和军人的影响下，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罗马化，达契亚人掌握了征服者的文化、习俗、信仰和语言。在掌握了罗马的物质文化以后，进而逐步采用了罗马的信仰、习俗、姓名和拉丁语^⑥。巴尔干半岛的土耳其化（伊斯兰化），波兰西部和匈牙利的日耳曼化，沙皇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化，都在东欧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匈牙利长期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大。

从地缘上讲，如果把俄罗斯看成欧洲的一部分，那么，由于中欧处于欧洲的中心和边缘相间地带，而南欧位于欧亚两大洲的交界地带，因此，东南欧的文化各有自身的特色。由于俄国处于欧亚交界，受到东西文明的影响，如果把俄罗斯看成是欧洲的“亚细亚”部分，或亚洲的基督教部分，那么，中欧无疑是属于

欧洲文明圈，“东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问题”^④。正因如此，俄罗斯与欧洲、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问题对于俄罗斯和欧洲来说一直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正如一位研究欧洲宗教与文化关系的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基督教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核心和根源，没有第一批基督教思想家和神学家的努力就不可能有斯拉夫文化的发展^⑤。

再次，社会主义阵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政治色彩的文化也只停留在表面上，并没有发展成为深层意义的文化，即民族的心理和性格，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没有沉淀为民族的特质，进入民族的血液或骨髓。苏联在某些程度上继承了沙皇俄国的文化传统，对东欧实行“苏维埃化”实际上是苏联化，即进行文化控制。但是，东欧文化形式上是社会主义的，内容上或骨子里还是民族主义的，传统的东西，苏联也是如此。这两种文化根本没有成为一种新型的、融各种民族文化于一体的“国际文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没有深入骨髓。它既不能从根本上改造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也缺乏融各种文化于一个有机体的有效机制。俄罗斯共产主义思想起源于西方。俄国共产主义者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建立了一个与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完全对立的社会制度。但是，在文化上，苏联政治文化是俄罗斯文化的不自觉的继承者^⑥。其中既包括对内的不宽容，不尊重法律，也包括对外的俄罗斯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向东欧推行苏联模式，搞苏联化，受到了东欧国家的反感和抵制。斯大林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曾经说过，向东欧国家推行苏联模式，无异于在牛的脖子上套了一副马鞍。波兰有800~1000万居住在西方的侨民，他们与国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文化以各种方式影响了波兰。波兰又是个天主教国家，国内绝大部分公民信仰天主教。在西方生活过二十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波兰党的第一书记盖莱克，不顾勃列日涅夫的警告，允许波兰籍教皇回国访问。教皇

表面上没有攻击波党和政府，实际上他代表了一种西方的文化和思想，因而极大地提高了波兰天主教的声望，损害了波统一工人党的威信，这也是波兰反对派势力得以大增的一个原因^②。罗马尼亚在教育制度和学术研究方面，在现代政治和文化活动的所有方面，都贯穿和强调民族主义精神。在中小学设置的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课，突出民族主义精神。为符合走民族特色道路的需要来阐述现代史。为了证明当代罗马尼亚人与古代罗马人在种族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对考古学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③。四十多年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甚至都未能从根本上转变传统上与俄罗斯人关系比较好的保加利亚人的思想。根据日夫科夫倒台后进行的首次民意调查，有半数以上的保加利亚人是教徒，即有神论者。此外，保加利亚人保持了平均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奇特结合，而这种结合正是1944年以前主要由私有小农组成的这个国家的特点^④。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欧各国对斯大林的批判，反响最大的是意识形态领域。苏联文学、戏剧、电影在着力刻画卫国战争初期红军的溃败，蒙冤受害者的悲剧，昔日农村的饥鸿遍野，权奸当道，道德败坏的同时，在艺术上，对苏联的文艺价值也在进行评价。波兰文学家托普埃里茨评论说，“整个苏联文学停滞的罪魁祸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它“是毁灭艺术的工具”，“是个人迷信的产物”。斯洛尼姆斯基进而说道：“主要的不是个人迷信，而是个人。不是个人，而是使这种个人的破坏行为成为可能的制度。”^⑤所以，当戈尔巴乔夫打开西向的大门，甚至全盘西化的时候，东欧自然很容易、很快地向西方倾斜，回到自身的“母体文化”。

由于苏东文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战后形成的国际冷战格局，苏联红军的客观存在，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活动，苏东国家存在着安全上和利益上的一致，苏东结成联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但由于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及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苏东要长期维持这种同盟关系是缺乏基础的，不太可能的。即便勉强

维持也是非常困难的。对 1989 年东欧的激变，有俄国学者就认为东欧是回到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之根上来了^④；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俄罗斯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表现^⑤。

另外，从历史传统来说，俄罗斯既具有专制主义传统，也具有民主、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传统（以历史上缙绅会议、国务会议、谓彻、杜马、哥萨克，自由主义，村社民主，地方自治，无政府主义，苏维埃等为代表），但以专制传统为主（以历史上沙皇特辖军、特务组织第三厅、书报检查制度、契卡、克格勃、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等为代表）。中欧国家既有民主、自由主义传统（波兰的贵族民主制、自由选王制，议会民主制，等等），也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传统（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实行的军事独裁制），在一定的阶段上，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体制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⑥，但东欧仍以民主传统为主。俄国专制主义的基础是农村公社，在村社里，农民是相对平等的，民主的，忠于村社的，对村社的忠诚的外在表现就是集体主义，忠于国家和沙皇。俄国的军队多由村社农民构成，他们这种村社精神表现在战争中就是俄国士兵忠君爱国，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俄国就是靠这种精神多次拯救了自己的祖国。斯大林曾经称赞苏联军队的英勇精神堪称天下第一，而德国军队只能算第二，波兰人第三。斯大林还说，波兰人过于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因此是不适合搞社会主义的。

俄罗斯既有大国沙文主义传统，也有爱国主义传统。前者尤其表现在争夺波罗的海和黑海出海口，以及侵略东南欧；后者则表现在抗击波兰、瑞典入侵，以及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吞并世界的野心。不过，俄罗斯虽然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迟到的巨人，其民族主义的表现很快就为它自己赢得了“北极熊”的美誉。也就是说，它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著称于世的。中欧国家历史上也曾强大过，波兰历史上曾经攻下过莫斯科，毕苏茨基曾发动过对苏战争。“大波兰”、“大匈牙利”也不是没有历史传统的。但是，

由于中欧国家毕竟国力弱小，是受周边大国侵略、凌辱的对象，因此，在历史上往往以爱国主义为其主旋律。

从民族性格来讲，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俄罗斯负有特殊的使命，俄罗斯要走特殊的道路，俄罗斯有自己特殊的行为方式。俄罗斯是唯一的、独立的、强大的斯拉夫国家。俄罗斯由于地处欧亚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因此俄罗斯有天然的优势，能提出和解决西方国家不能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俄罗斯人公正无私，富于牺牲精神，有人类的同情心和全人类救世主义意识。因此俄罗斯人骨子里是很自大自傲的。同时，又由于东正教的势力不如天主教，处于防御和保守态势，不能与天主教平起平坐^④。斯拉夫世界的力量不如拉丁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力量，俄罗斯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是一个迟到的巨人，因此特别珍惜机会，急于迎头赶上西方国家。但俄罗斯的自尊又使它不愿屈人之下，因此有时显得狂躁、压抑、孤独、屈辱，甚至自卑。因此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是矛盾的、不稳定的，难怪有人把它称为“一个不能理喻的国家”^⑤。与此同时，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和救世主义意识也是很重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比俄罗斯优越。在波兰人看来，俄罗斯文化是另一种文化类型，是低级的和半开化的。由于这是在斯拉夫内部的东方与西方文化之争，因此矛盾显得特别尖锐^⑥。在波兰，反俄成为爱国主义的试金石。在上个世纪初，即使受到沙皇恩宠的东波兰的地主也宣称，“波兰国家不复存在了，但我们还要作为波兰人在波兰生活”，在19世纪任何同俄罗斯妥协的政策都被视为对民族利益的背叛^⑦。在俄罗斯统治者看来，“波兰是不安分和不屈服的同义语”，是扎进俄罗斯帝国身上的一根“刺”^⑧。1863年波兰发生反俄起义后，许多俄罗斯人断言，由于波兰是个不可救药的反叛成性的民族，如不根除其文化，俄国将永无宁静之日^⑨。对俄罗斯有民族仇视心理的除了波兰外，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只有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由于文化

的、种族的和历史的原因对俄罗斯保留着某种好感。波兰在仇俄的同时也仇视德国。俄罗斯有学者把俄罗斯和基督教欧洲这两种模式的文化分别概括为“自发的世界主义”文化和“自发的个人主义”文化^④。泛斯拉夫主义与泛日耳曼主义、俄罗斯救世主义与日耳曼救世主义必然在东欧形成竞争和冲突。

另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享有政治优越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和世界革命的中心，但在经济技术上不如民主德国、捷克、匈牙利。这些中欧国家在经济技术上比较先进，生活水平比苏联高，但在政治上要依附于苏联，唯苏联马首是瞻，搞苏联模式、苏联化，这种关系也是不平衡的。

从第三罗马到第三国际、从东正教的领袖到世界革命的中心，从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救世主义到世界革命、国际主义，从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大宗教的分裂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从“东正教大家庭”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从神圣罗马、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历史具有某种继承性，并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已经证明，第三罗马、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救世主义一方面有其社会市场，另一方面又最终未能实现，这对于我们理解战后苏东关系的演变是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呢？

注 释

①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外交季刊》第72卷，第3期。

②（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中译本，第23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③（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 上册 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49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④ 刘祖熙主编：《斯拉夫文化》，第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波）斯坦尼斯瓦夫·阿尔港尔德、马里安·瑞霍夫斯基：《波兰简

史》，第281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⑥《俄罗斯与欧洲》，第104页，莫斯科，1992年版。

⑦C·齐赫文斯基主编：《俄罗斯外交史》，第10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⑧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东欧文学史〈下〉》，第443页，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⑨任光宣：《俄国文学与宗教》，第9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

⑩维·雅·别德鲁亨：《关于斯拉夫民族起源的讨论》，（俄）《斯拉夫学》1993年第2期。

⑪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第17页，莫斯科，1918年版。

⑫⑬《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关系史》，第129、142~144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版。

⑭参见《19世纪70~80年代俄罗斯与塞尔维亚的社会联系》，莫斯科，1989年版。

⑮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第九卷，俄文版，第387~388、396页。

⑰伊·阿·赫列洛娃《俄罗斯与波兰人民革命联系史纲 1815~1917》，第30~31页，莫斯科，1976年版。

⑱《苏联与南斯拉夫人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联系》，第158页，苏联社科院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版。

⑲С·И·丹谦科：《19世纪70~80年代俄罗斯与塞尔维亚的社会联系》，第193~194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⑳㉑苏共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波兰工人党社会科学高级党校：《苏联与波兰·国际主义联系历史与现实》，288~289、290页，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8年版。

㉒参见《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在实践中》，莫斯科，索菲亚，1974年版；苏共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经验交流所：《社会主义阵营国际主义经验：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7年版。

㉓㉔㉕㉖（美）斯蒂芬·费希尔—盖拉蒂：《东欧各国共产党》，139、149、328、163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㉗《国际主义的合作苏联共产党与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与现状》，第298~300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⑳ (罗) 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等主编：《罗马尼亚通史简编》，第 110 页，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

㉑ (匈) 温盖尔·马加什、萨博尔奇著，阚思静等译：《匈牙利史》，第 1~2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㉒ (阿) 克·弗拉舍里著：《阿尔巴尼亚史纲》，第 14 页，三联书店，1972 年版

㉓ 休·塞顿·沃特森：《民族与国家》，第 82 页，伦敦，1977 年版；参见《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传统与现代》，第 123 页，莫斯科，1994 年版；(俄) B·O·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各阶层史》，第 44 页，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

㉔ (联邦德国) 彼德·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134 页，1984 年版；参见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一辑，第 14 页，中国当代出版社 1992 年版。

㉕ 参见(美) 约翰·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第 231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㉖ (罗) 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等主编：《罗马尼亚通史简编》，第 111 页，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

㉗ (英) 肯勒斯·麦诺特：《东欧与苏联：自由的机遇》，第 16 页，伦敦，1991 年版。

㉘ P·T·拉施科娃：《梵蒂冈与现代文化》，第 302 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9 年版。

㉙ 阿·巴塔洛夫：《苏联的政治文化》，(俄)《社会科学与现代》1995 年第 3 期。

㉚ (俄)《国外社会科学》历史卷，1991 年第 6 期，第 63 页。

㉛ (保) 普拉门·特兹维科特夫：《保加利亚的过渡：从历史到今天》，(美)《共产主义剖析》杂志 1992 年 5~6 月号；转引自《东欧中亚译丛》1993 年第 1 期，第 26 页。

㉜《争取恢复公民自由》，《波兰文化观察》周刊，1956 年 4 月 5 日；李必莹：《改革中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第 68 页，广西科技出版社，1989 年版。

㉝ (俄)《斯拉夫学》1994 年第 6 期，第 59 页。

㉞ 列奥里特·柳克斯：《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第 55 页，莫斯科，

1993年版。

⑬《苏联历史》91年第1期，第14页；A·米涅尔：《中欧的独裁和极权主义经验》，（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6年第7期。

⑭（俄）杜拉也夫：《俄罗斯与欧洲》，莫斯科，1992年版；参见别尔嘉也夫：《俄罗斯的命运》，第2页，莫斯科，1990年版。

⑮参见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莫斯科，1990年版；斯坦芬·卡特：伦敦1990年版《俄罗斯民族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列奥里特·柳克斯：《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莫斯科，1993年版；尤·伊格里茨基等主编：《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传统的和现代的概念》，莫斯科，1994年版。

⑯参见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俄罗斯和波兰的精神”一节，莫斯科，1990年版。

⑰（俄）列奥里特·柳克斯：《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第49、55页，莫斯科，1993年版。

⑱（美）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1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⑳《俄罗斯与欧洲》，第373页，莫斯科1992年版

第八章 苏东交恶中的东欧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苏东关系的失败也是苏东双方各种因素互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对苏东关系的交恶，东欧方面也有原因。不可否认的是，东欧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列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以国际主义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东欧不仅与苏联一样被视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而且是突击队、排头兵。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在实践中东欧国家自觉地维护苏联和苏共的威信，把苏联的胜利看成也是自己的胜利。在对苏联的关系中，国际主义的因素和成分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东欧的民族性格，国家民族主义，执政党的错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性与思想等几方面的内容对于苏东关系也产生作用，而且这些作用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本章着重探讨东欧方面的这些因素对苏东关系造成的负面性影响。

国民性即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在其生物的、地理的条件下由文化因素养成的、大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出现的心态和人格特征，是指既包括广大人民群众，也包括上层领导集团所共同具有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特质，具有全民性、普同性和排外性的特点^①。国民性有时能够反映到国际关系中来。抽象地谈论国民性的优劣好坏是不科学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而国家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与国家利益相吻合的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是其主要载体。其走向具有多样性，其性质具有复杂性，

不可一概而论。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中，虽然国家的领导人在一般情况下，主观上客观上或多或少要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但在东欧这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执政党及其党和国家领导人个人能够起到非常特殊的作用。

南斯拉夫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传统，尤其是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他们有耽于浪漫和尚武手段的习性^②。南一位普通的母亲在谈到南苏冲突时说的一段话，颇能代表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她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在希特勒的权势处于极盛时代，那时整个欧洲大陆在他脚下，我们撕毁了他签订的条约。当美国人的权力在1946年处于高峰时代，那时全世界人人害怕原子弹……我们打下他们的飞机，因为它们侵犯我们的国土。如今，当斯大林的力量大到了极点的时候，我们不接受他的最后通牒。这使我想起了1914年小小的塞尔维亚驳回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我们知道怎样保卫我们的这块土地。”^③波兰是东欧民主的摇篮。波兰的民族性格中有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一面，也有不服权威，不服纪律，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的一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波兰、匈牙利反俄、仇俄的情绪和心理一直很强烈。战后波匈少数民族仅占2%~3%，单一民族国家更易激发这种情绪和心理^④。从1956~1989年，仅三十多年的时间，波兰就发生了5次危机（1956年，1970年，1976年，1980年，1989年）。每次都是先由物价上涨引起经济危机，进而导致政治危机。波兰党领导人也动辄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如盖莱克重修华沙的皇宫，从而赢得了具有爱国精神的波兰人民的心^⑤。斯大林曾经无可奈何地说过：“共产主义不适合波兰人，因为他们过于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⑥至于匈牙利的国民性，卡达尔就曾经说过：“至于说到匈牙利民族特性的本质，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它的古代历史。在匈牙利，过去常常有人说，匈牙利人民是一个孤单的民族，在世界上象一个孤儿一样。显然，这种历史的孤独感使匈牙利人对侮辱和赞扬都很敏感。匈牙利人是容易

动感情的，如果他们受到鼓舞，那这种热情会是无限的。”^⑦这种“民族的孤独感”一方面固然能萌发民族自尊心，爱国热情，但同时也容易引发狭隘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1977年，匈牙利经过多年交涉，终于重新获得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法西斯德国劫获、后又辗转到美国的王冠，匈举国欢庆，认为这是匈牙利民族的一大胜利，视该王冠为匈牙利民族存在的象征。匈牙利的民族意识之强由此可见一斑。民主德国的民族优越感和对斯拉夫人的反感是普遍的。这既有历史形成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德国在文学、哲学、音乐、科学等方面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德国人工作态度认真、严谨，守纪律，这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但德国历史上长期割据分裂，很晚才实现国家的统一，对其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是有独特的影响的。小邦小国小朝廷，养成了德国人狭隘和防御心理，培养出夜郎自大和狂妄自负，轻视异民族，好争斗，易狂热，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战后，曾有苏联虐待国内讲德语的少数民族的说法，后来又有关于红军野蛮对待德国战俘的报道，及苏联拆卸德国的工厂设备运往苏联，将残存的工厂的产品拨归苏联使用，这种作法令德国人包括民主德国人反感^⑧。于是在斯大林刚一去世后就发生了东柏林事件。这种民族优越感甚至在乌布利希等民德共产党领导人身上也有流露。乌布利希不仅瞧不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样的小党，教训哥穆尔卡和波兰党，而且对苏联党和勃列日涅夫也不大恭敬^⑨。乌布利希的这种态度引起了苏领导人的不满。勃列日涅夫曾指责乌布利希在指示苏联、苏共应该怎样工作，“他的狂妄自负溢于言表，他轻视别人的经验”^⑩。罗马尼亚是斯拉夫民族中的孤岛，民族危机感特别重，对国家主权特别敏感。罗国家行为中的民族主义成分甚至比南斯拉夫还多得多。南斯拉夫在1948年以前不存在反俄国的传统。而对俄国心怀恐惧和仇恨，如同对土耳其人那样，却是罗马尼亚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当沙皇俄国帮助罗马尼亚人结束土耳其人数世纪以来对罗的统治时，它索取的代价

是割去罗马尼亚的一大块领土。19世纪30年代，罗花了一大笔钱修建了一条防御俄国人的防线，使布加勒斯特成为继巴黎之后世界上设防最严密的首都。战后，苏解放罗，其代价是割去了比萨拉比亚^①。罗时刻没有忘记这一笔账。阿尔巴尼亚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排他性达到了过于敏感的程度^②。这两个国家把反抗土耳其的王公——斯堪德培（阿）和米哈伊大公（罗）分别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只有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少有或没有反俄的历史传统。1938年张伯伦在慕尼黑称捷为“一个不为人知的国家”。捷民族反抗性比起波兰、匈牙利来说相对要弱一些。但1968年事件使俄国人这个几百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朋友一夜之间变成了仇人。在东欧，一部反俄剧本的上演（如波兰1968年春上演的《先人祭》），一场对苏冰球赛的胜利（如1968年2月在奥运会上捷克以5:4胜苏联队），都能激起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运动^③。东欧各国民族性格中有某种不成熟性，从众心理重，自持能力差，总是企图依附于某一大国去对付另一大国，自立能力较弱。如历史上利用俄国来反抗土耳其求得民族独立，又想利用法国来对抗俄国。东欧历史上还经常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现象。如一战后东欧各国实行议会民主制，与法英结成同盟；德国法西斯兴起后，各国又一窝蜂实行军事独裁制度；二战后从多党联合执政到共产党一党专政；从人民民主专政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1989年以后，历史又翻了过来，各国反对派从非法到合法到执政，共产党从执政到下台到非法。因苏联模式的弊端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因斯大林的错误而完全否定斯大林的全部，把苏东同盟时期称为“苏占时期”、“殖民时期”。瓦文萨甚至坚决不去莫斯科参加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50周年活动（1995年）。近几年来，“东欧西行”又成为潮流。另外，“大匈牙利”、“大罗马尼亚”、“大保加利亚”也是具有历史传统的^④。从客观上来讲，东欧的这些民族性格是苏东同盟中的消极因素。

国家民族主义在苏东关系中表现更多。在苏南冲突中，南斯拉夫坚决要把苏南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象苏联那样看成是意识形态之争。铁托说：“不管我们之中的每个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多么爱，但他决不会因此对他自己也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少爱一些。”^⑮铁托顶住苏联的压力，走独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并力图扩大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以致引起了赫鲁晓夫的警惕。赫鲁晓夫一直认为，在揭露斯大林的暴行后，铁托明显地在追求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⑯。西方有的学者认为铁托追求自己成为仅次于赫鲁晓夫的、欧洲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二号人物。1964年，罗马尼亚国防部长萨拉扬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详细地叙述了罗党和军队在解放罗马尼亚中所作出的贡献，“罗马尼亚军队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鼓舞下，同光荣的苏联军队一起奋勇作战”，还与事实不太相符地有意指出“苏联的贡献居于第二位”^⑰。齐奥塞斯库在国际舞台上刻意要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英雄形象，以使自己与铁托相提并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透露了波兰之所以需要苏联，是因为波兰的安全之所需。哥穆尔卡批判那些攻击波苏友谊的人是不顾波兰的生存，他们的所作所为，仿佛波兰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孤岛上。他们完全是不现实的，应该毫不犹豫地予以谴责，因为他们寻求自由权利这样的奢侈品，而不顾波兰的根本利益^⑱。同时，哥穆尔卡还打算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建立起一种“铁三角”关系，即华沙—柏林—布拉格轴心，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密切合作，最后形成一支与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相抗衡的力量。该计划由于民德的反对而告吹^⑲。继任的波兰党的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也几乎不加掩饰地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主要目标和最高权利就是波兰人的幸福与劳动人民的幸福”，把民族利益置于社会主义利益之上^⑳。盖莱克下台后还公开承认，“我们从自己方面来说，不断努力为我国争取获得华沙条约第二号国家的地位而工作。当时我认为，从我国人口数

量来看，或从所占有的领土面积来看，以及从我国正在上升的经济地位等理由来看，这是我国应当享有的”^②。民主德国因为自己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认为自己应享有与苏联的特殊关系。乌布利希认为，凡是对民主德国有利的事情，总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利，从而也就对苏联有利^③。他曾当着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面，大谈民主德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乌克兰，不是白俄罗斯。即便是一贯比较听话的保加利亚，在自己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也强调，“保加利亚共产党把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看作是民族的事业，也看作是国际主义的事业”^④。匈牙利也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看成是国际利益。东欧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或在同盟内提出了一些倡议，如波兰 1958 年提出了中欧无核区的倡议，保加利亚进而提出了巴尔干无核区的建议。这些倡议和建议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其实这些倡议与建议中包含有东欧一些国家民族主义的动机。波、保、罗等国担心，一旦西方对它们进行核打击，苏联不会给它们提供核保护。这些建议可使它们摆脱对苏的依赖。关于在经互会内部经济专门化的设想最先其实是民主德国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民主德国的民族利益。民主德国因为自己的经济技术基础比较发达，希望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不愿为其它比较落后的盟国所拖累。但赫鲁晓夫一开始就接受并支持了这种观点，从而导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欠发达国家对苏联的不满和反对^⑤。有一些带有民族主义动机的倡议很快被苏联认识到了，破坏掉了。如战后初期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建立保南联盟的设想。季米特洛夫甚至还提出将来要建立一个包括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联邦。这些设想都受到了斯大林的批评。匈牙利的纳吉·伊姆雷 1947 年写了一篇文章，谈了关于多瑙河流域各弱小人民民主国家的相互依赖性和兄弟般团结的必要性。他说：“在多瑙河流域各国里，大致相同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占据统治地位，即使它们之间在发展水平上还有差别，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方向都是人民民主方向。”^⑥南斯拉夫、

保加利亚等国支持纳吉的倡议，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反对，纳吉的设想没有能够实现^②。波兰和罗马尼亚不愿把粮食拿到经互会市场上出卖，而宁愿卖给西方赚取外汇^③。波兰甚至从苏联获得便宜的粮食，不是为了满足国内的人民生活需要，而是以它作饲料养猪制成咸肉卖给西方赚取硬通货^④。1963年，苏联不得不花黄金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而以低于世界市场平均价格的价格向波兰提供粮食。波兰则向美国出口粮食获得黄金和美元。赫鲁晓夫恼火地说，我们从土地中得到黄金，而你们（波兰人）从我们的帮助中得到黄金^⑤。东欧有的国家以即将遭到西方侵略为由，要求苏联重视自己的国家利益，甚至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置于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之上。如民主德国乌布利希在1967年4月危言耸听地对勃列日涅夫和哥穆尔卡说，根据民主德国已掌握的情报，联邦德国正策划在几个月内向民主德国边界发动武装进攻，以便把冷战变成热战。这不仅要把民主德国卷进去，而且会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被迫在一定程度上也卷进去^⑥。东欧各国经常以国内可能出现政治动乱为由，向苏联索要便宜的能源和经济援助，如80年代初波兰危机时期卡尼亚就这样干过^⑦。更有甚者，打西方牌，巧妙地在东西方之间施展外交手段，以西方来牵制苏联，为自己谋利。如波兰盖莱克搞高速发展战略，向西方大借外债；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在东西方集团之间左右逢源。南还故意强调苏联对他们国家的威胁，以藉此获得更多的美援^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是斯拉夫民族，它们也利用这一点来与苏联拉特殊关系，以期争取特殊的好处。如哥特瓦尔德就曾向斯大林要求捷加入苏联；保加利亚曾计划将保变成“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⑨。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一篇宣言中讲：“历史和战争的经验证明，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斯拉夫统一战线才能防止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犯，这个基础就是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协议。”^⑩这个宣言很容易使人想起历史上由西部斯拉夫人提出来的泛斯拉夫主义。

利用领导人之间“亲密关系”为国家和个人谋取好处最典型的要数保加利亚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夫科夫。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关系“非常密切”。1971~1974年，他们每年都要一块打猎或度假，并“讨论”国家大事。这一方面有利于他巩固个人权威，另一方面也为保加利亚谋取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比如，70年代欧洲发生能源危机时期，保加利亚照样以便宜的价格从苏联获得石油、煤、金属、木材、棉花，等等。苏联供应的能源和原料大大超过了保加利亚本身的需要。经常发生这种情况，载着苏联货物的车皮到达保加利亚后甚至都不用“卸货”，就直接从东部边境开往了西方国家。有人作过一个初步统计，仅对苏联石油产品的再出口一项，就使保获得利润8亿美元。苏联驻保外交人员曾经企图干预和阻止保的这种“抢劫行为”，但遭到失败，其中一些人还被从保召回，因为他们胆敢反对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两国最高层之间的协议给保加利亚的好处还反映在相互贸易中产品的价格问题上。它保障了保加利亚很多工业产品可获得近300%的利润，而保的一些质量不高的次品也流入了苏联市场。对保农业出口价格的“调整”使苏联每年要补偿保加利亚上亿卢布^⑤。

在苏联所犯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错误中，实事求是地说，东欧很多国家也有份，甚至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东欧一些国家的推动下干的。东欧国家内部矛盾重重，民族矛盾，领土纠纷，宗教冲突，历史恩怨，错综复杂，层出不穷。各国既有历史的旧账，又有新国家、民族利益及各国党、党的领袖在苏联集团中的地位之争，它们也有利用苏联或互相利用去打击别国抬高自己的一面，或是出于国家民族主义，或是出于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或是出于教条主义，或是出于所谓国际主义的动机。1948年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虽然东欧党有些领导人，如波兰的哥穆尔卡、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在思想上同情铁托和南斯拉夫，但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最终都参加了对南斯拉

夫的围攻和批判。南斯拉夫与周边社会主义邻国的边境事件不断发生。如1949年在阿-南边境上发生124起事件，1950年发生65起，1951年头7个月发生56起。在保南边境，1949年发生了63起事件，1950年发生123起。在南匈边境，1950年就发生了795起^③。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借反“民族共产主义”、“反铁托分子”之名打击自己党内、政府内的竞争对手，如阿尔巴尼亚趁机以“南斯拉夫的间谍”为名处死了霍查的竞争对手科奇·佐治。赫鲁晓夫执政后曾要求阿为科奇·佐治恢复名誉，阿坚决拒绝^④。拉科西在匈牙利也趁机除掉了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拉伊克^⑤。对于1956匈牙利事件的处理，除了阿尔巴尼亚外，赫鲁晓夫征求过所有华约国家的意见，甚至还冒着危险连夜赶往南斯拉夫征求铁托的意见。除了波兰的哥穆尔卡认为苏不应出兵，也不应撤军，而应等匈牙利工人阶级自己起来推翻本国的反革命政府外，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南斯拉夫）都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以“挽救革命”。一贯以民族主义倾向著称的罗马尼亚“国内派”领导人乔治乌·德治，这回表现得特别积极，他与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一起，表示愿以自己国家的军队与苏军联合行动^⑥。哥穆尔卡利用匈牙利事件为波兰谋利。11月15日，当匈牙利的局势已成定局的时候，他率一个波兰代表团到苏联进行谈判，赢得了对方在经济上和国家主权问题上的重大让步。苏取消了波欠苏的5亿美元债务，以及波按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苏运送煤炭的任务；1957年波还将获得苏140万吨粮食和用以购买苏联货物的7亿卢布的贷款。关于驻波苏军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明确规定驻波苏军不能影响波兰的国家主权，不能干涉波兰的内政事务^⑦。民主德国与波兰有矛盾。波兰想与西方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民主德国反对。乌布利希利用苏联去压波兰就范，反对哥穆尔卡的改革，强调“在苏联的领导下”和“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才能繁荣和发展^⑧。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有利益之争，阿利用苏联、共产党情报局压南斯拉夫；当赫鲁晓夫改善同

南的关系时，阿就骂赫鲁晓夫同“修正主义”妥协，与苏联反目。苏与阿尔巴尼亚发生冲突后，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追随苏联，断绝与阿的经贸往来，降低外交级别^④。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苏联方面施加了经济的、外交的、政治的种种压力，与捷方面进行了多次接触和谈判，在使用政治方法还是军事手段问题上反复犹豫，表现出了相当的耐心^⑤。民主德国的领导人乌布利希、波兰的领导人哥穆尔卡，保加利亚的领导人日夫科夫对于推动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华约华沙会议上，乌布利希甚至教训主张对捷克采取较温和态度的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说：“卡达尔同志，如果你认为你是在用反对意见和保留意见来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话，那你就犯了一个大错误……美国—联邦德国一旦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下一步就会轮到匈牙利。卡达尔同志，这些事情你是不可能，也不会理解的！”^⑥他们这样做是担心“布拉格之春”会给本国体制带来冲击，从而也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让民主德国直接参与武力镇压捷克改革，这可以说是苏联的极大败笔，易使人联想到30年前法西斯德国对该国的入侵。“布拉格之春”被华约五国的铁蹄碾碎了。1980~1981年当波兰再次发生危机，团结工会成立时，包括苏联、民主德国甚至罗马尼亚的所有东欧国家结成了统一战线，一致反对，因为担心波兰的样板会对自身的政权和制度带来致命的危险^⑦。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东欧各国人民之所以抛弃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东欧之所以要脱离苏联阵营，是与东欧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集团在执政过程中所犯下的很多过失和错误有关的。不能说苏联没有责任，但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苏联和苏共，归罪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中欧国家，如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在文化传统上亲近西方，属于天主教文化圈，崇尚个人主义、民主、自由，而俄罗斯属于东正教文化圈，崇尚集体主

义，村社文化的影响很大。巴尔干国家，如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位于欧亚两大洲交通枢纽，受到了东西文化的双重影响，有自身的特色，与俄罗斯文化不尽相同。文化特点的不同必然经常影响到这些国家对苏联的态度。二是各国经济建设中的具体操作问题。各国在各自的建设过程中或多或少地犯了错误，不全是苏联模式、苏联党的责任。东欧各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使用了暗剑伤人、造谣、诽谤、破坏等手段，来搞倒自己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实事求是地说，南斯拉夫很早就与苏联交恶，早从1948年起就不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实行不结盟路线，在国内走的是南斯拉夫特色的自治的社会主义道路，而非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从60年代初期起也脱离了苏联阵营，但阿在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外交上的孤立主义，早已超出苏联模式，但这并不是苏联强加的。在苏联阵营内部，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进行改革，搞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匈牙利模式”，苏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进行干预；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领导下，在苏联阵营内虽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但在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比苏联还胜一筹；昂纳克领导的民主德国是典型的苏联模式的翻版。当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改革时，罗和民主德国两国或公开反对，或阳奉阴违。也就是说，各国社会主义遭到挫折，不都是苏联模式的原因。实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完全是苏联强加的，也是东欧一些国家领导集团（民族利益集团）利益之所在。民族利益集团与苏联模式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关系。苏联模式是东欧各国民族利益集团的统治依据和权力来源。苏联在东欧的统治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和各国民族利益集团的权力垄断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竭力通过维护苏联模式，一方面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另一方面得到了现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把自己与苏联模式从而与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事业联系在一起，获得某种冠冕堂皇的“合法性”，因而也有意无意地

让苏联也承担它们的错误和责任。东欧各国的这些民族利益集团之间既相互竞争，同时利益与共，相互支持。

由于各国共产党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因此共产党领导集团和领袖个人因素也对苏东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铁托取得南领导地位之前，南斯拉夫由于民族、宗教、文化、历史的原因并没有反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后俄国与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民族的关系也比较好，为什么唯独在铁托时期关系不好？这里面有否铁托集团本身的原因？有否可能不致于搞到那种地步？铁托个人因素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苏南冲突前斯大林在南斯拉夫人民心中的威信特别高，他被编入了歌曲。《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被一次又一次地再版，尽管是在极为困难的行军条件下^④。情报局批评南斯拉夫时，许多人纳闷：这是怎么啦？到底应该相信情报局和斯大林，还是应该驳斥它？铁托会怎样号召？^⑤诚然，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是苏南冲突的主要原因，苏联的力量与影响大大超过了南斯拉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同时，铁托骨子里是有骄傲之处的。在东欧各国新政权的领导当中，只有铁托是受到超乎党的范围以外的人民的普遍拥护服从的国家的象征和英雄。东欧其它国家“强有力的人物”之所以强有力是依靠莫斯科，而铁托是依靠自己固有的权力而成为无人可以取代的、强有力的领袖人物^⑥。正像赫鲁晓夫说的，铁托后面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另外，南斯拉夫有自己40个师的武装力量，加上不与苏联交界的地理原因，因而有与斯大林抗衡的条件。铁托量斯大林也不致于轻举妄动。铁托还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世界中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⑦。铁托就曾经放弃过与打算调解苏南关系的德共领导人威廉·皮克会面的机会，因讨厌拉科西而拒不接受邀请参加匈共代表大会；拒绝苏联和同情南斯拉夫的哥穆尔卡的建议，不去参加情报局会议（先是定于1948年5月于乌克兰，后苏让步为6月于布加勒斯特举行），使南失去了许多解释自己的立场、争取东欧国家的理解和同情的机会，

结果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宣布开除南斯拉夫^⑤。铁托领导的南共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当时在亚德里亚海的一个光秃秃的岛上，关押了许多“情报局分子”，即那些同情情报局和斯大林的决议的人，仅这个岛上就有上万人。其中不少人作为祖国的敌人被处死^⑥。南斯拉夫禁止说俄语，尽管很多人会讲俄语。1952年南共联盟六大宣称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帝国主义国家^⑦。这种攻击显然不符合实际，反过来无疑会伤害苏联党和人民的感情。当1955年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来南斯拉夫，主动与铁托和解，希望恢复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时，铁托持冷淡的矜持态度，表现了不应有的自尊和怠慢，不让翻译赫鲁晓夫表示求和的讲话，说在场的人都懂俄语，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令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难堪^⑧。

铁托还力图扩大自己在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影响。在谈到《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时，铁托说：“就我们来说，在同苏联的关系中，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我们已经改善了两国关系……迄今已经通过了两项宣言，一项是在贝尔格莱德通过的，另一项是在莫斯科通过的。不仅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而且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这两个宣言事实上都应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⑨1956年南先是支持纳吉反对拉科西；后又支持苏联出兵推翻纳吉；干预匈牙利事件后的匈的政局安排。本来赫鲁晓夫准备以明尼赫·费伦茨为首组阁，卡达尔参加政府。铁托对卡达尔有好感，认为任命卡达尔组阁比明尼赫要好。就这样达成了关于卡达尔出任匈共领导的的谈判。南斯拉夫人在邀请纳吉进入自己的大使馆后，事实上建议他保持中立^⑩。铁托扩大自己和南共的影响的倾向引起了赫鲁晓夫的警惕，他把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归咎于南斯拉夫的影响^⑪。1957年南向各国党宣传南共七大纲领。与苏关系缓和以后，南虽参加了莫斯科会议的讨论，但又拒绝在文件上签字，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968年南与罗马尼亚一起支持捷克改革，给苏联

以形成新的小协约国集团的气象，加重了苏联对捷克的怀疑。

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生活水平都比苏联优越，德意志民族自大和自负无论是在其人民还是在其领导人身上都表现得比较明显。1964年，乌布利希对勃列日涅夫公开表示，苏联的成就不如德国。他甚至想“指示”苏联、苏共应当怎样工作^⑤。1970年，乌布利希在莫斯科谈到苏德合作时说：“我们必须和苏联加深合作。我们很明白，我们一个小国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希望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来发展合作，我们不是白俄罗斯，我们不是苏联的一个国家。”^⑥乌布利希的发言和表现激怒了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不久由昂纳克取代乌布利希担任民主德国党第一书记的职务。昂纳克骨子里也认为，民主德国干得不错，苏联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民主德国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但程度不同，不像苏联那么尖锐^⑦。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经济方面的成就非常自信，因此对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改革持保留态度。1986年，在接受联邦德国《时代》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民主德国青年团机关报《青年世界报》的总编辑曾这样表达他对苏联的看法：“在我看来，苏联在历史上有过丰功伟绩，因为它打败了希特勒，赢得了战争。但是，在技术进步方面，它并不是我们仿效的模式。”^⑧，对苏联的看法明显有保留。

阿尔巴尼亚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好斗性集中地体现在其执政近半个世纪的领导人霍查的身上。阿虽为小国、穷国，地理位置又偏远，但不能容忍别人的忽视。恩维尔·霍查就曾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关于匈牙利问题，苏联同志们丝毫无意打扰别人，从未把事情经过和他们准备采取什么措施的情况通知过我们的领导人。”^⑨赫鲁晓夫对阿及其领导人不大重视，霍查曾对他说：“你也应该到阿尔巴尼亚去看一看，因为别的地方（指其他东欧国家）你都去过了。”一次他与赫鲁晓夫发生争执说：“我尊重你，你也应该尊重我。”阿对苏联主动与南斯拉夫改善关系大为不满。1961年9月，赫鲁晓夫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说：“你们（美国

人)在希腊也设有基地,并且从那里威胁着我们的盟国保加利亚。”霍查等阿领导人十分敏感,认为苏把阿排除在苏的盟国之外,这等于告诉西方苏联不再给阿提供保护^④。阿还故意冷淡和侮辱访阿的苏联代表团。阿退出苏联阵营后,反对苏东国家召开欧安会,反对苏美首脑会谈,认为苏与“帝国主义”谈判,“妥协”,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马列主义的“背叛”,宣称地拉那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自然阿劳动党领导人霍查就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了。勃列日涅夫两次试图同阿和好,第一次是通过波兰人邀请阿参加1965年1月华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第二次是邀请阿参加同年3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都被阿断然拒绝了^⑤。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退出了经互会的活动,1968年后又退出华约。霍的继任者阿利雅继续奉行与苏的绝交政策。1987年1月他在地拉那会见选民时说:“我想再一次说明我国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我们说过并重申:如同迄今为止那样,我们今后也不会同他们妥协,不会同他们保持任何一种关系,不会有任何一种交流和合作……生活证明我们党是正确的。1/4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复辟,它的对外政策同美国一样是帝国主义的。使我们同修正主义的苏联分手的冲突没有消失。相反,它更深化了,同它的矛盾变得更加不可调和了。对我国,对和平和各国人民的自由,苏联和美帝国主义一样构成了威胁。”^⑥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事实上没有。阿不断地制造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又不断地去消灭敌人,与全世界吵架。阿批判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美国是“帝国主义”,中国是“民族沙文主义”,等等。西方有些学者和政治家称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孤岛”,“巴尔干的幽谷”,犯了“围困综合症”,是“斯大林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⑦。

罗马尼亚在苏联集团中巧妙地实施外交手段,掌握分寸,使自己处于外交上的有利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一方面在经互会内,在华约内,尤其是在对外关系领域中唱与苏联不和谐的调

子，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但另一方面并不脱离苏联阵营，也从不触动苏联最敏感的意识形态领域，保证了自己避免遭武力入侵的厄运。齐奥塞斯库力图突出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扩大罗马尼亚的影响，树立罗马尼亚和齐奥塞斯库的形象^⑥。

匈牙利的纳吉·伊姆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在政治策略上都不是成熟的政治家。纳吉的班子中作家和记者等知识分子起了主要作用。纳吉没有自己的主见，不能有力地控制局势，相反被局势推着走。他所依靠的是一些没有政治经验的、狂热的年轻人。纳吉上台伊始，宣布事件是反革命性质，后又很快宣布为人民民主运动；解散国家保安部队，把起义者编入国家正规部队；宣布实行多党制；退出华沙条约，宣告匈牙利中立，要求联合国保护^⑦。各种反动势力趁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导致苏联两次出兵，引发了一场波及全民族的大悲剧。卡达尔后来在分析纳吉集团的主要错误时认为，虽然纳吉在反对拉科西的基本问题上是正确的，但使用的方法却是有害的。他们把党内的和政府内的问题公开化。虽然纳吉集团并不是反革命的发动者，但他们被事件所牵制，所束缚，所左右，从最初工人阶级的立场滑向了反革命的立场，从而成为反革命的代言人^⑧。至于杜布切克领导的“布拉格之春”，导致苏联入侵的根本原因不是其经济改革，而是其政治改革。60年代苏东阵营的经济改革其实最早始于苏联（1965年），进而波及到捷克（1966年）和匈牙利（1968年）。改革的方向是放弃集权管理体系，走向非集权化^⑨。捷“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提出政治方面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更多的民主。杜布切克等人天真地认为，自己是忠于社会主义，忠于苏联的，因而苏联不致于怎么样。殊不知，政治方面的改革已经触犯了苏联最敏感的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华约国家的多次会谈，施加压力，都没有引起杜布切克等人的足够的注意，没有预感到对捷党、国家和人民迫在眉睫的危险。勃列日涅夫多次向杜布切克施加压力。杜被逼不过，曾多次说：就请您们

采取您们中央政治局认为正确的措施吧！如果您们认为我们欺骗了您们，就请您们中央政治局采取必要的措施吧！杜布切克还表示自己要辞职，要求选出一位新的党的第一书记取代自己^⑦。在得知苏军的闪电式入侵后，杜布切克还感慨地说：“我一辈子致力于同苏联的友谊，真没想到他们这样对待我们！”^⑧据知情者的透露，1968年1月~8月这一时期，杜布切克宁愿个人承担苏联领导人所有不公正的攻击，目的只是为了不要由于向捷克斯洛伐克公众通报这些攻击而在捷引起人们对苏联持批评态度。杜布切克直到最后时刻都相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践踏一个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情况了^⑨。作为一个政治家，杜布切克的某些想法和做法显然过于天真了。后来的捷克总统、剧作家哈维尔在自传中批判了杜布切克，不能像铁托和齐奥塞斯库那样动员人民，紧密地与人民联成一体，坚决表示保卫祖国，决不向任何人侵犯者妥协，以致于苏联人也认为华约的军事行动不会遇到抵抗^⑩。其实，从历史和国民性来看，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被夹在两个大国之间（俄、德）的、关键时候容易被人遗忘的小国，国民性不像波兰、匈牙利那样反抗性、斗争性强，容易妥协，如1938年英法通过“慕尼黑阴谋”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了德国；1948年，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使捷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68年华约的用兵，使用了“闪电战法”，也估计到了捷不会、无力、也来不及抵抗。

东欧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时为了自保，或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前途，不敢坚持原则，害怕得罪苏联；甚至违背本国人民的意愿以逢迎、讨好苏联的事情屡有发生。如苏南冲突时，曾担任过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也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参加了这个大合唱。波兰人民大部分同情1968年捷克改革，然而哥穆尔卡不顾本国人民的情绪，不仅对捷克出了兵，而且是推动苏侵捷的主谋之一^⑪。波兰有很多犹太人，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相当一部分波兰人民同情以色列，但哥穆尔卡却还是追随苏联支

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在国内亲自发动了反对犹太主义的运动。与哥穆尔卡个人因素的影响有关，波兰从1956年的改革苏联模式到回归苏联模式，惧怕和反对改革。哥穆尔卡在“中东危机、中苏争论、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等问题上的忠诚表现得到了苏联的奖励，1968年11月在波兰党的五大上表现出来了。由于有勃列日涅夫的有力支持，哥穆尔卡才勉强得以重新当选为波兰党的第一书记。他深知自己地位已动摇，感叹地说：“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了。”^⑥匈牙利人民和卡达尔本人是同情捷克1968年改革的，但匈牙利还是伙同苏联镇压了布拉格之春，虽然匈不是主要的推动者^⑦。保加利亚追随苏联比较紧，苏保关系比较亲密，除了民族、宗教、语言、历史等原因外，保加利亚领导人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是很重要的原因^⑧。波兰也有政治家谴责雅鲁泽尔斯基“在对苏联朋友的关系上过于温顺”^⑨。阿尔巴尼亚是另一种类型，阿是一个偏僻的、闭关锁国的落后的小国，内政上实行专制主义，外交上实行孤立主义，思想上实行教条主义，阿领导人害怕同苏联这样的大国发展关系会对自己的统治地位产生不利的影 响。其实，阿人民很需要苏联帮助，然而其领袖霍查、阿利雅等人却硬要与苏联对着干，以显示自己革命的坚定意志。勃列日涅夫时期曾数次主动要求改善同阿的关系，遭到拒绝。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联方面作好了与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的准备，阿尔巴尼亚政策中也出现了新的动向，但没有涉及到苏阿关系。有的苏联学者通过研究档案材料认为，苏阿之间的分裂其实是在新的时代得到克服的^⑩，但由于阿的孤立主义外交方针最终没有实现。

注 释

① 参见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册，第132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③弗·德第耶尔：《铁托》，第363页，纽约西蒙与休斯特公司，1953年版。

④（俄）格·马拉施科等：《中东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第139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美）约翰·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万花筒》，第12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⑥（联邦德国）彼德·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第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⑦见阙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第38~3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⑧（美）C·布雷德利·沙尔夫：《民主德国的政治与变革》，第186页，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⑨参见欧文·魏特：《目击者——哥穆尔卡译员的自述》，三联书店，1974年版。

⑩⑪⑫⑬周懋庸编著：《从红色“帝后”到天涯孤侣》，第58、58、59、17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⑭⑮（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第212、419、355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⑯参见佩罗·兹拉塔尔：《霍查政治传记》，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⑰（苏）马尔楚里：《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与社会主义世界》，第129页，明斯克，1982年版。

⑱菲利斯·奥蒂：《铁托传》，第252页，纽约麦格劳山图书公司，1970年版。

⑲《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5期，第85页。

⑳（美）罗宾·雷明顿：《华沙条约》，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㉑尼古拉斯·贝瑟斯：《哥穆尔卡：他的波兰和他的共产主义》，第244~245页，1969年版。

㉒㉓㉔㉕（波）欧文·魏特：《目击者——哥穆尔卡译员自述》，第31、67、33~34、135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②(联邦德国)彼得·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③(波)雅努什·罗利茨基:《中断的十年——盖莱克答记者问》,第11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④⑤(美)J·布朗:《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 1968~1975》,第82、80~8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在实践中》,第79页,莫斯科,索菲亚,1974年版。

⑦(匈)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第264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⑧参见(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内幕 1948~1953》,第230页,南粤出版社,1979年版。

⑨《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3期,第90页。

⑩《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51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⑪《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4期,第79页。

⑫(美)约翰·克莱默:《东欧和1990~1991年的“能源”冲击》,《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1年第6期,第98页。参见B·И·沃罗科夫:《1980~1981年波兰事件:来自老广场的观点》,(俄)《历史问题》1995年第10期,第99页。

⑬⑭(美)乔治·霍夫曼、弗雷德·华纳·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184、132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⑮(保)普拉门·特兹维科特夫:《保加利亚的过去:从历史到明天》,《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92年5~6月号;《东欧中亚译丛》1993年第1期,第26页。

⑯《苏联与波兰——国际主义联系 历史与现实》,第322页。

⑰⑱(俄)尤·洛沃巴什主编:《东欧前“主人”政治肖像》,第49页,第159页,莫斯科,1994年版。

⑲(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 1939~1973 文件与评注》,第44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⑳参见佩罗·兹拉塔尔:《霍查政治传记》,第213~214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㉑参见(捷)贝利康:《禁止公开的文件》,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⑳《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5期，第76页。

㉑（波）杰瓦诺夫斯基：《哥穆尔卡执政的十四年（1956～1970）》，《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年第2辑，第163页。

㉒参见列舍特里科夫、斯米尔诺娃：《苏阿冲突》，（苏）《共产党人》1990年第9期。

㉓参见《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 莫斯科的看法 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5年第1期。

㉔（联邦德国）彼德·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第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㉕㉖㉗ H·B·波波夫：《翻开新篇章：国际问题、事件、人物》，第129、131、132～133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9年版。

㉘《苏联二次大战后的外交政策》，第241页，黄宗浩译，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

㉙（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内幕：1948～1953》，南粤出版社，1979年版。

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第11～78页，贝尔格莱德，1952年版。

㉛（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㉜㉝《南苏关系 1939～1973 文件与评注》，第478、48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㉞ B·A·穆斯塔夫：《苏联与匈牙利关于1956年事件的新的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3年第1期，第18页。

㉟（联邦德国）《时代》周刊1986年6月27日。

㊱恩维尔·霍查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

㊲特加·古纳瓦达纳：《赫鲁晓夫主义》，第32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

㊳佩罗·兹拉塔尔：《霍查政治传记》，第270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㊴1987年1月28日阿利雅在地拉那会见阿选民时的讲话，阿《人民之声报》1987年1月29日。转引自《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7年第4期，第144～145页。

⑤ 参见杨达洲编译：《恩维尔·霍查与阿尔巴尼亚》，《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年第2辑。

⑥（法）卡特琳·迪朗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⑦ B·A·穆斯塔夫：《苏联与匈牙利关于1956年事件的新的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3年第1期。

⑧ 阙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一份未被烧毁的文件”，第119~12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⑨（苏）《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第88页。

⑩ P·比霍亚：《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 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材料》，《近现代史》1995年第1期，第42页。

⑪（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⑫ 伊日·贝利康等：《禁止公开的文件》，第20~21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⑬《哈维尔自传》，第92~93页，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⑭ ⑮（美）斯蒂芬·费希尔—盖拉蒂：《东欧各国共产党》，第247、250~254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⑯（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 1945~1970》，第5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⑰ 参见（波）杰瓦诺夫斯基：《哥穆尔卡执政十四年（1956~1970）》，《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年第2辑，第171页。

⑱《苏联的对外政治活动和外交活动（1985年4月~1989年10月）》，（苏）《国际生活》1989年第12期，第74页。

小结与思考

冷战时期苏东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原因是复杂的。战后苏东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并结成同盟，不是完全偶然的。东欧本身是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定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这是内因。苏联军事力量在东欧的客观存在及其影响和作用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但毕竟是外因。在当时国际冷战格局的大气候下，苏东国家在国家利益（安全，经济，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互利用，进行了不无成功的合作。不能否认的是，在近半个世纪的苏东同盟关系中，存在着真诚的国际主义的因素，尤其是这个同盟建立的初期，苏联为东欧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建立和巩固东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给予了很多帮助，作出了很多牺牲。东欧许多国家（如波、匈、罗等）民族意识、民族反抗精神是非常强的，如果把苏东同盟看成是苏联武力使然，像历史上的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一样，显然是不科学的。诚然，如果没有苏联红军的存在，或许在有些国家（如波、匈、捷等）就不会有共产党的顺利掌权，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苏东同盟的建立（在这里，雅尔塔体系的安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样，如没有东欧本身的因素的作用，东欧共产党人的掌权和随后苏东同盟的建立也是不太可能的，即便苏以武力强迫之，也不可能为时达半个世纪之久。两者缺一不可。何况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捷克和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力量也比较强大。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集团在维护苏东同盟方

面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些是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单纯依靠武力维系而没有任何基础的帝国所不同的。苏联与东欧的关系（1945~1991年）显然不同于苏联同阿富汗的关系（1979~1988年）。苏东同盟关系也明显不同于建立同盟前的苏东关系（1945年以前）和同盟垮台后的俄东关系（1991年后）。艾萨克·多依彻认为战后东欧旧的制度已经很难存在下去，而革命的力量又太弱小，因此出现了这种“半是征服半是革命的”政治现象^①。这个分析有其中肯的地方。因此把半个世纪以来苏东关系骂得一团漆黑，把苏东同盟的建立完全归结于苏联的强制，全盘否定苏东关系史，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苏东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国际主义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与苏联一样，东欧国家在实践中大多自觉地维护苏联和苏共的威信，把苏联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把苏联的今天看成是自己的明天。其中也有真诚的国际主义因素和成份，尤其是在苏东同盟建立的初期。1989年剧变以后，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下台。但1993年以来，以前波兰共产党为主体的民主左派联盟先后在大选中击败团结工会和瓦文萨，组织了联合政府并出任总统；匈牙利社会党（原匈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的左翼力量也在议会选举中捷报频传，1995年俄罗斯共产党在议会大选中大获全胜，该党领袖久加诺夫作为现任总统叶利钦的主要对手参加了1996年俄罗斯总统角逐。2000年俄罗斯共产党在俄国家杜马选举中仍为第一大党团，久加诺夫再次参加了俄总统竞选。苏联东欧地区左翼力量卷土重来使国际社会大为震动。西方舆论界称之为“新政治潮流”。各国左翼力量的重新崛起表明，社会主义在该地区仍有深厚的社会基础^②。

苏东分道扬镳，也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相近之处又有诸多不同的政治文化，迥然不同的民族意识和历史传统，既有尖锐矛盾也有真诚合作的历史过程构成其历史基础；

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的滥用和走样，民族性格和传统的格格不入，各国领导人个性与水平的不同，还有苏联政策的变化和西方军事遏制与和平演变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立统一，综合互动，这些都是苏东同盟最终破裂的原因。当然，苏东关系由同盟到破裂的整个过程是与这些国家国内生活的演变，特别是党的性质的变化是不可分的，本文只是着重探讨国际方面的因素，故对各国党的内部演变不多涉及。

在苏东阵营中，苏联是最强大的国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东欧是小国，弱国，苏联的实力大于东欧各国实力之和，苏联对东欧的影响远远大于东欧对苏联的影响。虽然对于苏联来说，有些错误难以避免，但有些错误本可避免却没有能够避免。其中，苏联的大国主义以及作为大国主义的集中表现的大党主义是主要原因。国际主义因素经常与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沙皇俄国的地缘政治战略相吻合或一致。强行推行和维护苏联模式，恩威并施，文武兼济；粗暴干涉各国内政，惩治和镇压“异端”思想和行为，高悬达摩克利斯剑；扶植“亲苏派”，打击“民族派”；苏在华约和经互会中占据霸主地位，动辄干涉别国内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公然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侵略东欧“不听话”的主要国家；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华约和经互会组织谋取民族私利。如果说苏联模式是苏联控制东欧的内在机制，那华约和经互会就是苏联控制东欧的两条外部纽带。苏还实行沙俄式的控制手法，对东欧国家区别对待，分清亲疏远近，分化东欧各国，防止其呈铁板一块。苏对华约的控制明显于对经互会的控制，因为华约关系到政治立场问题，直接由各国党掌握，而经互会关系到具体利益问题，主要由各国政府操作，等等。所有这些都严重伤害了东欧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因此，从国家关系来看，苏东关系的破裂，苏联要负主要责任。

国际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是两种决定苏东关系的主要因素。

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初期，不仅苏联领导人，就是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都把保卫苏联看成是国际主义的主要内容，把苏联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把苏联的今天视为自己的明天。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国际主义因素的作用越来越下降，而国家民族主义的作用愈来愈上升。它们时而一致，时而冲突；时而前者占上风，时而后方占上风；在一致时往往前者占上风，在冲突时往往后者占上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冷战格局逐渐稳定下来，国际主义逐渐成为双方手中滥用的一张“牌”。而国家民族主义力量却愈来愈上升，逐渐聚积、沉淀，终于在一个合适的国际大气候下酿成剧变。

在苏东从“牢不可破的友谊”到全面断绝关系的过程中，苏联与东欧双方是平行发展的，它们有交叉，有变化，并且紧密联系，两者不可偏废。在苏东交恶中东欧也有原因。东欧的国民性，东欧国家民族主义，东欧某些领导人的个性和思想及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以及东欧党的错误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和影响。东欧国家也想打国际主义旗号并利用苏联谋取私利。客观上，苏联一方面要给予东欧以国际主义援助，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大国主义对东欧的伤害，这里有一个颇难掌握的适“度”操作的问题；而对于东欧来说，一方面要苏联的国际主义，另一方面又不要苏联的大国主义，这也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主观上，东欧民族的不成熟性，把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斯大林的错误而否定斯大林的全部，再加上从众心理与连锁效应，这些都是造成苏东分裂的重要因素。

因此，与国内外某些学者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苏东全面结盟不能完全归功于苏联和斯大林，苏东分道扬镳也不能完全归罪于苏联和戈尔巴乔夫。苏东结盟，既有苏联因素的作用，也有东欧本身的基础；苏东交恶，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苏联方面，主要表现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这里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原因；既有理论和政策方面的不完善，也有实践和

具体操作的错误；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苏联模式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国际主义与各国具体利益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打着国际主义的招牌，行民族利己主义之实，甚至搞大国主义和强权政治，最终是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带来危害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实力较量，更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取决于以经济、科技、知识、信息为主的综合实力和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和较量。苏东关系中既有成功的经验，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教训是深刻的，并且有待于我们继续研究和思考，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同各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

还在十月革命前（1916年），列宁就论述了通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问题。他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③在苏东社会主义体系出现以后，在1947年以前，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并没有违背这一原理，曾多次指出“条条大路通向社会主义”。东欧各国领导人也纷纷表示要走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波兰道路，匈牙利道路。保共领袖季米特洛夫就曾说过：“每一个国家都会走向社会主义，但不必按照某种刻板的模式，不必一定走苏联的道路，而应取决于自己的历史、民族、文化和其他条件。”^④只是随着冷战的发生和日趋激烈，斯大林放弃了对这一原理的遵循，强使东欧各国回到苏联模式上来。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除了苏联之外，又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循，东欧各国领导人虽然提出了要走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理论上并不完善，实践上更没能展开。最后，基本上都是对苏联模式的照抄照搬，而没有能够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制度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结

合。这两者的结合问题没能解决好，埋下了以后危机的种子。赫鲁晓夫一方面提出要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一方面又说“南斯拉夫自治形式没有什么不好”，缺乏一套系统的理论指导。作为一套系统的、完整的理论，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来的，这就是有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该主义可以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无产阶级“国际专政论”；苏联“大国责任论”；东欧“有限主权论”。该主义的出台可以说宣布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的死刑。哥穆尔卡提出的“波兰道路”，捷克提出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道路，东德强调自身国家利益的“乌布利希主义”等主张，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思想是相悖的，被彻底判了死刑。东欧太弱小了，苏东力量的悬殊又是如此之大，因此这些主张只能处于受压制、流产的命运。只有国际形势的缓和和苏联政策的调整才能改变这种命运。

其实，1945~1947年东欧各国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实行联合政府和混合经济形式，既符合当时的东欧各国内部各派政治力量对比，又符合东欧一些国家的民主的历史传统，还是对各国原有的祖国阵线、人民阵线的继承和发展，符合当时这些国家的国情和民情。斯大林人为地强迫东欧国家抛弃了这种选择，提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违背东欧各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违背了历史的发展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使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基础先天不足。正如后来（1988年）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感慨说的，“社会主义过早地取得了胜利”，“是个早产儿”，还没有发育成为“壮汉”^⑤。可以说，1948年的转折孕育了1989年的危机。苏不顾东欧各国国情，强行推行并武力维护苏联模式，动辄干涉东欧各国的内政，压制东欧人民的意愿。镇压和惩处“异端”思想和行为，伤害了东欧人民的民族感情，损害了东欧各国的国家利益，使它们产生了对苏联的反感和对社会主义的怀疑，从而使苏东关系蒙上了阴影，增强了东欧对苏联的离心力。苏联在这方面犯了大党主义的错误。

(二) 关于国际主义和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苏东同盟关系中，至少有三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苏联的国家利益、东欧各国的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具体操作由各国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掌握。此外，国际形势也对苏东关系产生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联模式、经互会和华沙条约既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苏联和东欧各国国家利益之所需。最初这三者要做到一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主要是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结合，表现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色彩。但是随着各国利益的多层次和多侧面的发展，它们更多地和经常地发生矛盾和冲突。何况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历史、国情、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又有很多不同之处，因此能否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能否保住苏东同盟的关键。

事实上，苏东各国领导人都在不断地探索把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办法。斯大林最初还能允许东欧走不同于苏联的人民民主道路，但在冷战拉开序幕的情势下，转而实行阵营对抗战略，把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等纳入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不许越雷池一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曾威胁罗马尼亚国王说，如果不按苏联的意志办事，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将不复存在。赫鲁晓夫对阵营对抗战略作了一些调整，实行一种可称之为“和平渗透”的战略，但他也只是在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收收放放，犹犹豫豫，未跳出斯大林模式的框框。一会与南斯拉夫和解，一会又说情报局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一方面说通向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一方面又威胁波兰，出兵匈牙利。赫鲁晓夫时期的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曾在一次讲话中说：“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遭到进攻，苏联将迅速回击。”^⑥言外之意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在处理苏东关系方面，系统地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是在勃列

日涅夫时期。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就是勃列日涅夫主义（西方有学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的门罗主义”）的绝好实践。这表明，东欧的利益必须服从于苏联的利益，这是对“苏联的利益即国际主义的利益”的翻版。莫斯科的一些官员在私下谈话时将波兰称之为“维斯瓦各省”^⑦。与此同时，一些东欧国家，如民主德国（乌布利希主义），波兰、匈牙利，也把自身利益看成是国际主义事业，实际上也就高于苏联的利益。阿尔巴尼亚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对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垄断权提出了挑战。戈尔巴乔夫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调整苏东关系。应该说，最初他调整苏联传统的东欧政策，承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检讨苏联过去的错误，尊重东欧的意愿，敦促东欧改革，从东欧撤军，以及推动苏美关系的和解和打破苏联外交的孤立局面，这些都是基本正确的和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后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压力下步步妥协，节节退让，让出了东欧，最后竟至丧失了原则性，事事、处处迎合西方，甚至乞求于西方保护自己摇摇欲坠的总统宝座，终于导致了东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式的激变和苏联对东欧的全面失控。

在苏东阵营内部，对于东欧国家来说，其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直接受苏联对外战略及其内政的影响。苏联的国内形势从两个方面影响到苏东关系。首先，如果苏联要改革，外交上就意味着其对东欧控制的相对放松，并以东欧改革的成效来证明苏联改革的正确性；其次，苏联改革一般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国际环境的缓和有助于苏联放松对东欧的控制。如赫鲁晓夫改革时期，70年代的缓和时期，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都是如此。相反，国际形势紧张会加剧苏对东欧的控制，如战后冷战初期，勃列日涅夫军备竞赛也对苏东关系带来了影响。原因也在于苏联是大国、强国，东欧是小国、弱国，在综合国力方面，苏不仅大于任何一个东欧国家，而且大于所有的东欧国家之和。实力的差距太大导致相互影响的不平等。

因此，战后苏联历届领导人没有能很好地解决把社会主义各国利益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利益有机地加以结合的问题。苏联大国主义和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共存和斗争是贯穿战后苏东关系史的一条红线。双方都在利用国际主义为自己谋利，国际主义被滥用了，走样了。苏联在这方面犯了大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错误。

国际主义实践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各国具体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问题。从民族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民族和国家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利益集团。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存在就是客观的，并且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因此，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核心、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民族主义也就不可能不是一种潜在的、恒常的力量。战后苏东关系的历史充满了不平静，这两种国家民族主义力量的抗争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双方的力量对比也是不断地发生变化的。当然，苏联是主动的一方，当它的控制减弱时（如在苏联领导人更替时期），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就上升并表现出来；而一旦苏联加强控制，东欧就暂时被压下去了。但东欧国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深深扎根于民族土壤的“生命之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依靠高压和武力只能暂时得逞，而其“生命之根”，是压不倒的、灭不了的。纵观一部战后苏东关系史（1945～1991年），既是苏联从最初推行苏联模式、继而维护苏联模式到最后放弃苏联模式的过程，同时也是东欧从最初接受苏联模式、继而反感苏联模式和改革苏联模式，最后抛弃和推翻苏联模式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既是苏联模式在东欧从最初建立、发展，继而出现危机，到最后全面失败的过程，也是东欧国家民族主义从最初在某种程度上遭到压抑，继而逐渐聚积和上升，最后全面复兴的过程。

东欧国家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虽然他们的领导人都是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目标是既保

持共产主义但又要坚持国家独立，同时提高自己国家的生活水平^⑧。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首先是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共产主义者，在很多场合下甚至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极端爱国主义者。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如何处理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关系，在尊重各国具体国情、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其矛盾与冲突，这是国际主义实践的关键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既不能在“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旗号的掩盖下搞大国霸权主义；也不能在“人类的利益大于阶级利益”、“和平共处”的幌子下无原则地退让、投降。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这是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承认的，“对于东欧国家来说，1989年东欧剧变与其说是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不如说是从东部邻居的依附中解脱出来”^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苏东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三）关于和平演变与经济发展、苏东剧变的关系问题

冷战时期苏联东欧从牢不可破的友谊到全面断绝关系，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西方的和平演变无疑也是原因之一。和平演变是一种政治文化。和平演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个阵营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等方面的竞争和较量，是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在苏东集团与西方集团的这种竞争和较量中，总的来说，西方集团处于主动的、进攻的地位；而苏东集团处于被动的、防守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集团在经济、技术和综合实力方面的领先。据一位西方学者的研究，冷战时期作为两大阵营的领袖，美国最重视国内政策，发展经济、科技；而苏联最重视的是对外方面扩军备战^⑩。战后初期由于战争的破坏，苏联国内经济极为困难，危机四伏。其超级大国地位是靠军事力量强撑起来

的，外强中干。在这种情况下，苏本应在国内休养生息，在国外致力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但斯大林没能抓住机会，调整内外政策，而是在国内继续发展了备战体制，在国际上争夺势力范围，与西方展开阵营对抗。赫鲁赫夫和勃列日涅夫都继承了斯大林的阵营对抗战略，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与美国展开了全球争夺，使苏联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和困境。为了从政治上得到东欧，苏联经济上又付出了代价，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但这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否则就无法在上层建筑领域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在实践中也是站不住脚的。苏东都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原来就比较低，因此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就更显艰苦。可是，几十年来，苏联模式和苏联领导下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的全面的阵营对抗没有给苏东带来优越。苏联落后于美国，东德落后于西德，匈牙利不如奥地利，保加利亚搞不过希腊，所以，苏东剧变，苏东同盟关系的瓦解，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们综合实力的竞争中打了败仗。苏东分道扬镳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大失败是同时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综合实力搞上去，尤其是经济、科技和文化建设，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有效地防止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而且，和平演变也是相互的。当然，经济的落后也是种种原因造成的，苏联东欧在竞争中的失败也与国民素质、历史基础和具体国情有关系，不仅仅是制度及其操作的原因。由于社会主义一般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的，要搞好现代化建设，赶超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绝非一日之功。这就要求我们同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要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

(四) 对苏东地区历史上的“分”与“合”的特点的思考

这里所讲的“分”与“合”，即分裂与统一，既可以指领土、民族方面的，也指经济、政治意义上的，还可以指宗教、文化层次上的。

东欧与西欧相比，不仅是地理位置不同，而且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问题诸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东欧历史上是一个充满了不稳定的和悲惨的世界。除了俄罗斯外，都是小国、弱国、穷国，是被周边大国瓜分、鱼肉和宰割的对象。从地理位置而言，它扼欧亚交通的要冲。就文明形态而论，它是东西文明的分野。土耳其、德意志和俄罗斯长期在这里角逐，东正教与天主教的争雄由来已久，新教和穆斯林也各有地盘；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泛土耳其主义竞争激烈。欧亚大陆突然崛起的强大势力，如拿破仑的法国和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帝国曾像闪电一样鞭击该地区。本世纪初，苏维埃俄国与帝国主义协约国集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在这里较量；苏俄世界革命战略与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在这里争斗；两次世界大战皆以东欧为发端。巴尔干成为欧洲的火药桶，全球最敏感的神经中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又成了苏美冷战的起源，雅尔塔体系的板块“交合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这里直接对峙和交锋。东欧成为两种社会制度对抗的前沿阵地。今日，东欧又是体制选择和模式转换的试验场，北约东扩问题的焦点。波黑和科索沃先后成为冷战结束后出现在东欧地区的战场。

第二，大国外交在东欧起决定性作用。东有俄罗斯，南有土耳其，西有德意志和奥匈帝国。列强环绕，虎视眈眈。它们既竞争、争夺，又相互合作，主宰着东欧小国的命运。中欧的中心问题是波兰问题，主要是俄罗斯与德意志、奥地利在此争夺；东南

欧的中心问题是东方问题（巴尔干半岛和黑海问题），主要是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在这里较量，后来英法也参加进来。

由于东欧极其重要的地理、战略位置，欧洲及世界其他大国也积极参与了对东欧命运的安排。如维也纳体系（1815年，英、俄、奥、普），凡尔赛体系（1919年，英、法、美），雅尔塔体系（1945年，美、苏、英）都是如此（如斯大林与邱吉尔之间有名的“百分比协定”），东欧没有自己的发言权。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和战争造成的大国的“兴”或“衰”对东欧国家“合”或“分”的决定性影响。革命或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常常带来某个大国的“兴”，某个大国的“衰”，而这对东欧小国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如俄罗斯历史上，曾因打败拿破仑法国（1815年）和打败希特勒德国（1945年）而两度强盛，第一次强盛使它成为镇压1848年东欧革命的宪兵和神圣同盟的主要力量，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皆落入俄军之手；而第二次强盛使东欧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形成势力范围上的“合”势。相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垮台，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中欧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巴尔干国家纷纷独立。由于苏联的隐退，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形成势力范围上的“分”势。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东欧民族运动的“分”与“合”，表现为从泛民族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世界革命），再到国家民族主义（STATE-NATIONALISM，东欧剧变）的特点。

第三，东欧内部小国之间分裂，民族主义狂热，矛盾错综复杂。各国的民族矛盾，种族纠纷，领土争端，意见分歧，利益摩擦，互相拆台，十分激烈^①。东欧各国间经济联系也很薄弱。从民族上来看，苏东地区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包括东、西、南三支）。从宗教上来讲，苏东地区以东正教为主体，同时中欧以天

主教为主，巴尔干小部分地区被伊斯兰教同化。从文化上论，既有相同或相近的斯拉夫文化、东正教文化，以及苏东阵营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但同时并存着拉丁文化、天主教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苏联模式的生搬硬套，即苏联化；本应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结果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形式，民族主义的内容。在冷战时期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经互会和华沙条约，是以苏联的强力维系的，东欧各国与苏联主要是垂直联系，相互之间横向联系不多。这说明，东欧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并不团结，远不是铁块一板，这也为大国的奴役和争夺提供了条件。

这就使得东欧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地区战火纷纭。本世纪以来，东欧所遭受的战争时期要比西欧长，如两次巴尔干战争（1912年），俄罗斯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则一直延续到1920年。两次世界大战皆以东欧为发端，第一次是在南部的塞尔维亚，第二次是在北方的波兰。在每次世界大战中东欧国家总是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相互厮杀。苏东巨变以后，在巴尔干半岛上，前南斯拉夫境内延续达4年之久的波黑战争是战后欧洲史上时间最长的战争。因科索沃问题，北约发动了空袭南联盟的战争。这里既有领土、民族、宗教、历史矛盾交织在一起，背后还有大国势力的插手和争夺。

东欧各国既有反抗列强鱼肉的一面，又有企图利用大国，甚至有意投靠的一面。如为了对付日耳曼人的侵略，西部斯拉夫人最早提出泛斯拉夫主义的主张，希望借助于俄国的力量；而俄罗斯打起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号，去“解放”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人。而南斯拉夫人也乐于利用俄罗斯来赶走土耳其人，因为依靠自身是力所不及的。依靠俄国战胜土耳其后，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大增。为了反对俄罗斯的统治，阿达姆·密茨凯维奇等波兰诗人又想借助于西方的力量。他们警告说，不能把俄罗斯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因为俄罗斯专制君主不仅要对自己的势力范围实行极权统治，而且要把这种奴役扩展到整个自由世界^①。东欧一

罗斯负有特殊的使命，俄罗斯有特殊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有人称俄罗斯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民族”^⑭。如果说欧洲联盟（原西欧经济共同体）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一个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的崭新模式，那么俄罗斯则以自己的表现证明自身的存在，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启示。既有相近又有很多不同的政治文化，迥然不同的民族性格的历史传统，既有尖锐矛盾又有真诚合作的历史前提，是苏联东欧国家战后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从“牢不可破的友谊”到全面断绝关系的历史基础。

第四，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构成东欧历史发展的规律。俄罗斯推翻蒙古二百多年的统治后终获统一，17世纪陷入分裂再获统一，国家一度落入当时的强国波兰和瑞典之手。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罗斯帝国“这个各民族的大监狱”分裂，苏联使其再度统一，二战后把势力推进到整个东欧，1991年苏联解体。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倒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在东欧激变中再度分裂。几个世纪以来，由于频繁战争而导致的领土变迁是家常便饭，如一战后，波兰、苏俄的领土东移；二战后，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西移。几百年来，民族迁徙，文化同化，宗教改革也时有发生。如俄罗斯化、日耳曼化、伊斯兰化、斯拉夫化^⑮。二战以后，由于冷战的兴起，东西欧分裂成两个明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阵营，“两个欧洲”、“欧洲的两部分”。苏东剧变以来，在东欧地区出现了“分”的高潮的同时，在西欧地区则出现了“合”势的高潮，主要表现为欧盟的发展、北约的东扩和东欧的政治经济变革。但是，分中有合，苏联虽然解体了，但在前苏联地区独立国家联合体有加强的趋势（尤其是在经济、海关、军事和交通方面）；中亚五个伊斯兰国家成立了中亚联盟；纳扎尔巴耶夫还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设想。在中欧地区成立了维谢格拉德集团和“中欧倡议”组织；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建立了联邦。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

系已走出剧变初期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狂热、敌对的时期，开始走向正常化^⑥。俄罗斯与东欧剧变虽然对于苏联是政治上、经济上的分离，但对于西欧则是文化上、经济上的回归。东西欧虽然一“分”一“合”，看似矛盾，但北约、欧盟东扩，法国想回到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瑞士也宣布要加入北约，意味着它将放弃坚持了数百年的中立立场；东欧地区各国都在进行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改革，向西方模式靠拢；随着苏东巨变，西方天主教、基督新教在东欧和独联体内的一些国家势力相对增强了^⑦，呈现了一种西方文化东扩的趋势。因此，从宏观角度来看欧洲似乎又在“合”。但同时，东正教的势力更深入俄罗斯社会，南斯拉夫联盟、芬兰、摩尔多瓦、奥地利等国公开宣布不加入北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坚决反对北约东扩，而乌克兰则成为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同时也是北约与俄罗斯双方争取的对象。科索沃战争实质上也可以理解为一场北约东扩与反北约东扩势力的斗争。由于科索沃战事的发生，出现了关于俄罗斯、白俄罗斯、南斯拉夫联盟和乌克兰结成斯拉夫国家联盟的动议和主张。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也是俄对北约的警告和对北约东扩的回击。所有这些说明，西方与俄罗斯、东欧与西欧之间仍然暗藏了一种潜在的竞争和争夺之势。

注 释

① (英) 艾萨克·多依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 635～636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参见车宏卿：《东欧国家左翼力量复兴原因浅析》，《东欧中亚研究》1995 年第 5 期；赵振英：《浅析保加利亚社会党大选获胜的原因》，《东欧中亚研究》1995 年第 3 期。

③ 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8 卷，第 163 页，人民出版社。

④ H·波波夫主编：《翻开新的一页》，“在那个困难的时期”，第 414

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⑤ 铭真：《日夫科夫与保加利亚》，第9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⑥ 三豆村、曹志为：《毛泽东两次苏联之行》，第1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 (美) 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主义与苏联的前途》，第14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⑧ (美) 约翰·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第11~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⑨ (俄) 《美国》杂志1994年第12期。

⑩ 参见西孟斯：《冷战终结了吗？》，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0年版。

⑪ 《在通往全欧合作道路上的东欧》，(苏)《近现代史》1990年第1期，第80页。

⑫ (俄) 列奥里特·柳克斯：《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第51页，莫斯科，1993年版。

⑬ (俄) 尤里·波尔科夫：《俄罗斯与欧洲：能否成为伙伴？》，(俄)《自由世界》1996年第3期，第53页。

⑭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莫斯科，1918年版。

⑮ 参见保尔·雷托斯基：《当代中东欧的民族主义》，“帝国、战争和中东欧的民族国家”一节，伦敦，1995年版。

⑯ 李兴：《90年代中欧国家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欧洲》1996年第2期。

⑰ 参见(俄) 尤·舍夫措夫：《白俄罗斯的宗教变化》，(俄)《自由世界》1996年第8期。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一、主要中文参考文献

① (美) 凯尔迪什主编:《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② (美) J·布朗:《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 1968~1975》,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③ (美) 约翰·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 (美) 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 姜琦、张月明著:《东欧三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⑥ 李兴:《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⑦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43卷,第28卷,人民出版社。

⑧ (苏) B·马夫罗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⑨ R·赫坦巴哈:《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⑩ 费·丘耶尔:《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

1992年版。

⑪(日)三好修:《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⑫(南)马尔科维奇、(美)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⑬(南)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⑭(意)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 第六卷 下册 当代各国经济》,商务印书馆,1991年。

⑮(捷)姆林纳日:《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世界知识出版社,1930年版。

⑯马细谱:《战后东欧——危机与改革》,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

⑰(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新华出版社,1933年版。

⑱菲利斯·奥蒂:《铁托传》,纽约,麦克劳山出版公司,中文版,1970年版。

⑲(美)丹尼森·拉西诺:《南斯拉夫的新实验 1948~197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⑳(美)乔治·霍夫曼、弗雷德·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册》。

㉑(波)扬·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㉒(美)斯蒂芬·费希尔—盖拉蒂:《东欧各国共产党》,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㉓(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若·亚·麦德维杰夫:《政治日记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㉔(英)威廉·肖克罗斯:《罪行与妥协——卡达尔·亚诺什和革命以来的匈牙利政治》,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②⑤ (美) S·比亚勒:《波兰与苏联的统治》,《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年第2辑。

②⑥ 刘祖熙:《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②⑦ (联邦德国) 彼德·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②⑧ (美) 约翰·莱夫特维奇·柯里:《波兰危机与生存策略》,《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年第2辑。

②⑨ 王文修主编:《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经互会》,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③⑩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中文版,1949年第6期,1960年第6期。

③⑪ 刘邦义:《哥穆尔卡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③⑫ 胡燕芬:《经互会国家合作和一体化的作用、问题和发展前景》,《苏联东欧问题》1990年第2期。

③⑬ (美) 约翰·克莱默:《东欧和1990~1991年的“能源冲击”》,《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6期。

③⑭ (美) 布雷德利·沙尔夫:《民主德国的政治与变革》,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③⑮ (美) 罗宾·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③⑯ (美) 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 1945~1970》,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③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和华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⑱ 《戈尔巴乔夫与东欧》,《东联东欧问题译丛》1987年第1期。

③⑲ (美) 哈里特·斯考特、威廉·斯考特:《苏联的武装部

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④①（美）米·切辛斯基：《华约组织中的波兰军队和波兰军官》，《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年第2辑。

④② 特加·古纳瓦达纳：《赫鲁晓夫主义》，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

④③ 张文武等主编：《东欧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④ 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⑤ 江流、徐葵主编：《苏联剧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④⑥（美）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 1939~1973 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⑦（南）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 1956 - 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④⑧（俄）布尔拉茨基：《领袖与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④⑨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④⑩（美）亚历山大·帕谢克、罗杰·卡内特：《东欧剧变：政治改革的社会基础》，《苏联东欧译丛》1991年第1期。

④⑪《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4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④⑫ 周懋庸：《从红色“帝后”到天涯孤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④⑬ 洪长泰：《东欧和苏联之间》，七十年代出版社，1979年版。

④⑭ 黄宗浩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台湾幼狮出版公司，1984年版。

⑤④ 佩罗·兹拉塔尔：《霍查政治传记》，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⑤⑤ 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⑤⑥ 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⑦ 赵桂林、韩金城：《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年第4期。

⑤⑧（波）杰瓦诺夫斯基：《哥穆尔卡执政的十四年（1956～1970）》，《苏联东欧译丛》1982年第2辑。

⑤⑨（波）欧文·魏特：《目击者——哥穆尔卡译员的自述》，三联书店，1974年版。

⑥⑩（捷）伊日·贝利康：《禁止公开的文件》，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⑥⑪（英）艾萨克·多依彻：《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⑫（美）小杰克·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⑥⑬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⑥⑭ 刘祖熙主编：《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⑥⑮《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⑥⑯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中译本，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⑥⑰ 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⑱ 李兴、周雪梅：《论苏联模式与苏东关系》，《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2期。

①⑨ 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①⑩ 李兴：《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论苏东剧变的历史基础》，《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①⑪ 李兴：《论经互会的问题与苏东关系》，《世界历史》1997年第6期。

①⑫ 李兴：《论国际政治中的政治文化因素》，《欧洲》1998年第1期。

①⑬ 李兴、周雪梅：《论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东关系的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1期。

①⑭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①⑮（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①⑯（保）托多尔·日夫科夫：《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①⑰（英）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

①⑱ 张月明：《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①⑲ 李兴、周雪梅：《论苏东交恶中的东欧原因》，《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1期。

①⑳ 李兴：《1944～1948年苏联的东欧政策透视》，《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

㉑ 李兴：《文化民族主义：论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㉒ 阚思静、刘邦义主编：《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

㉓ 李兴：《论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

《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④ 李兴：《论东欧“分”与“合”的特点》，《北京大学学报·欧洲历史研究专刊》，1997年。

⑤ 李兴：《论苏联与东欧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因素》，《北大史学》第5辑（1998年12月）。

二、主要外文参考文献

① Баграмов · Э · 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 и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1, No. 2.

② Беляев · Ю · Н, Страны СЭВ в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Москва, 1984.

③ Борьб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за торжество Ленинского учения о партии, 1967 ~ 1971 по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м и советским публикация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86, No. 12.

④ Будкина · В · С, Великий Октябрь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содружество, Кие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87.

⑤ Валента · И, Советское вторжение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ю, 1968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 3.

⑥ В братском союзе—курсом мира и соз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85, No. 6.

⑦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Апрель 1985г. ~ октябрь 1989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89, No. 12.

⑧ В · В · Мавродин,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еди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51.

⑨ Волокитина · Т · В, Мурашко · Г · П, Носкова · А · 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 ~ 1948, Наука, 1993.

⑩ Волокитина · Т · В, Марашко · Г · П, Носкова · А · Ф, Н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44 ~ 1948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No. 1.

⑪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1, No. 2.

⑫ Воронков · В · И, События 1980 ~ 1981гг. в Польше взгляд со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5, No. 10.

⑬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ереломе (1989 ~ 1990), Москва, 1991.

⑭ Вроньский · С, Ещё раз о советско—югославском конфликте, Проблемы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1990, No. 4.

⑮ Георгист Георгие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а, 1983.

⑯ Гиренко · Ю · С, СССР—Югославия 1948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88, No. 4.

⑰ Горенко · А · В, 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86, No. 10.

⑱ Гиренко · Ю · С, Югославия: система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литика не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89, No. 2.

⑲ Дубинин · Ю · В, 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Хельсинки, 1975,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No. 45.

⑳ Желицки · Б · И, Венгрия 1956г.: эволюция оценок венгерских историк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2, No. 3.

㉑ Живанов · С, Реформы 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ах: трудност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Коммунист, 1989, No. 17.

⑫ Жилин · П · А,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арми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1949 ~ 1980гг. Москва, 1984.

⑬ Зеленин · В · В, Цветкович · С, Советско—югослав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 ~ 1941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2.

⑭ Зеленин · В · В, Цветкович · С, Советско - югослав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 - 1945: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2.

⑮ Зубкова · Е · Ю,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орма 1945 ~ 1964, Москва, 1993.

⑯ Зуев · Ф · Г,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Польш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Наука, 1993.

⑰ История ЦК КПСС, 1991. №. 2.

⑱ О развитии обстановки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и нашей политике в этом регион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КПСС (22 января 1991г.),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 3.

⑲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КПСС и СЕПГ: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полиздат, 1987.

⑳ Кирпичников · В, К итогам 40 - го заседания сессии СЭ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85, №. 9.

㉑ Классы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сло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удьбы, 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20 ~ 60 - е годы, XX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2, №. 6.

㉒ Князев · Ю,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революции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Коммунист, 1990, №. 14

㉓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е перемен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89 ~ 1990) , Москва, 1991.

㉔ Манусевич · А · Я, Народно -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го -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㉕ Марцуль · Г · С, Опыт СССР в решен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вопроса и мир социализма, Минск, 1982.

⑳ Матерский · В · К,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ериодизации польско – 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межвоенный период,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стория, 1995, No. 4.

㉑ Мурашко · Г · П,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основ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го –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9.

㉒ Мусатов · В ·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процесс перемен,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1, No. 2.

㉓ Мусатов · В · И,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ое событие 1956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 1.

㉔ Мусатов · В · И, Трагедия Имре Надя,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No. 1.

㉕ Наринский · М · М, 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NO. 3.

㉖ Наринский · М · М, 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 2.

㉗ Нежинский · Л, Союз во имя мир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родов к 30 – летию со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аршав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㉘ Новопашин · Ю · С,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после 80 – х: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роблем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5, No. 4.

㉙ Отношения СССР и ГД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49~1955, Москва, 1974.

㉚ От правды никуда не уйдешь——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1968г., Кентавр, 1993, No. 4.

㉛ Парсаданова · В · С, Помощь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и поль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1944 ~ 1949),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88, No. 4.

48 Пихов·Р·Г,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1968г, взгляд из Москвы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ЦК КПСС,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No. 1.

49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тран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зарубеж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Москва, 1991.

50 Попов·Н·В, Открывая новые страницы: между - народные вопросы: события и люди,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

51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голод и преступность. 1946 ~ 1947гг,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No. 5.

52 Потапов·А·В, Кризис ГДР 80 - х годах и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Герман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1, No. 5.

53 Решентников·Л, Смирнова·Н, Советско—алба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Коммунист, 1990, No. 9.

54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1917 ~ 199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55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Востоком и Западом :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концепции, Москва, 1994

56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1992.

57 Рыхловский·Б, Единство стран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го подход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87, No. 8.

58 Савинов·К·И, Варшавский договор - фактор мира, щит социализма, Москва, 1986.

59 Секретная советско - югославская переписка 1948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 No. 10.

60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страны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 эволюция и круш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ередина 40 - х ~ конец 80 - х

гг. XX в.,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91, No. 1.

⑥1 Советско—венгер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 ~ 1948, Москва, 1969.

⑥2 Сталинская модель социализм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е, крах, 20 ~ 80 год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0, No. 2.

⑥3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взгля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89, No. 17.

⑥4 Страны — члены СЭ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⑥5 Стыкалин · А · С, Орехов · Е · Д,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и позици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СССР,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 1994, No. 3.

⑥6 Уроки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го кризиса 1968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2, No. 6.

⑥7 Хрущёв · Н · С,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0, No. 2 - 12; 1991, No. 1 - 12; 1992, No. 1 - 3, 6 - 9, 11 - 12; 1993, No. 2 - 10; 1994, No. 1 - 8, 10 - 12; 1995, No. 2.

⑥8 Шаститко · В · М, Страны СЭВ прямые связи и товарно — денежные инструменты.

⑥9 Шевяков · А · 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Румынией 1944 ~ 1949, Москва, 1985.

⑦0 Щит или меч? к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доктрин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89, No. 4.

⑦1 СССР в систем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осква, 1986.

⑦2 А · С · БУК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ССР со странам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осква, 1987.

- ⑦③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918.
- ⑦④ Леонид Люкс,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Западом и Востоком, Москва, 1993.
- ⑦⑤ М·А·Маслин,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1992.
- ⑦⑥ Воен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Наука, 1988.
- ⑦⑦ 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США, 1966.
- ⑦⑧ П·А·Тулаев,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опыт собор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Москва, 1992.
- ⑦⑨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1992.
- ⑧①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Востоком и Западом: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концепции, Москва, 1994.
- ⑧② А. Г. Здравомысл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Москва, 1997.
- ⑧③ В·В·Седов,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ранняя история Славян, Наука, 1979.
- ⑧④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ГУ, 1990.
- ⑧⑤ 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 – болгар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осква, 1958
- ⑧⑥ В·Л·Инина, Великая “хроника” о Польше, Руси и их соседях XI—XIII вв., МГУ, 1987.
- ⑧⑦ 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Обществен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связ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и Югослав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57.
- ⑧⑧ Восточный вопрос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 VIII – начало XXв., Наука, 1978.
- ⑧⑨ 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осква, 1988.

88 С·В·Чугров, Россия и запад: метаморфозы восприятия, Наука, 1993.

89 А·Ф·Носк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20~60-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1991.

90 А·Миллер, Авторитарный и тотаритарный опыт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опы,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6, № 7.

91 Ю·Шевцов, Белорусь в религиозном измерении,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6, №8.

92 Р·Т·Рапцова, Ватикан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Москва, 1989.

93 С·И·Данченко, Русско-сербск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связи (70~80-е годы XIX в.)

94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связ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и Югославии, Москва, 1957г.

95 В·А·Дьякова, А·Я·Манусевича, И·С·Миллр, Очерк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связе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и Польши, 1815~1917, Москва, 1976.

96 Д·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спытания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0. 1.

97 Ю·С·Новопашин, Бывшие "хозяева"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ортреты, Москва, 1994.

98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 1995.

99 Джузеппе Боффа, От СССР к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неоконченного кризиса, 1964~1994, Москва, 1996.

100 Ю·Н·Фнасьев, Другая война, 1939~1945, Москва, 1996.

⑩⑦ Alvin Z. Rubinste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 Imperial and Global*, Seco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5.

⑩⑧ George W. Simmonds, Editor: *Nationalism in the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end of Brezhnev and Kosygin*, The University of Detroit Press, 1977.

⑩⑨ Robin Okey, *Eastern Europe 1740 ~ 1985 Feudalism to Communism*, London, 1986.

⑩⑩ Geoffrey Swain and Nigel Swain,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1993.

⑩⑪ Stephen Carter, *Russian Nationalism: Yesterday, Today, Tomorrow*, London, 1990.

⑩⑫ Giles Merritt, *Eastern Europe and USSR – the Challenge of Efreedom*, London, 1991.

⑩⑬ J·F·Brown, *Eastern Europe and Communist Rule*, Duke University, London, 1988.

⑩⑭ Paul Latawski, *Contemporary Nationalism in East Central Europe*, London, 1995.

⑩⑮ Garrison and Gleason, *Shared Destiny Fifty Years of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Beacon press, Boston, 1985.

附录：

**对李兴所著《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
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一书的意见**

《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在博士后期间继续研究的成果。本书对苏东关系史进行了全面的、多视角和多学科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见解，对于研究二战以后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以及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很有意义。本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特别是引用了近年来国外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因而更值得重视。目前在我国学术界这样的著述不多见，故愿为之推荐出版。

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会长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之骅
一九九九年四月三日

**对李兴所著《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
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一书的意见**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的。它是数年研究的成果。史料丰富，条理清晰，有一定学术水平。

有关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目前我国尚无专著问世。此书有某种填补空白的作用。

对苏东关系，以前的著作多给予全面肯定，现在的又多全面

否定。其实，国际关系十分复杂，从无理想境界，找出问题进行指责并不困难。史学应着重研究各国间的矛盾冲突是如何调整解决的。对解决问题的方式、分寸、时机、得失等问题也应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部著作的长处和短处也都在这方面。它比较客观地阐述了苏东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两个方面。既讲到了结盟的必要性，也讲到了各国的利益差别。既讲到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也讲得到了东欧国家自身的一些问题。这是很难得的。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研究的视野比较宽阔。不仅从政治方面，而且从文化及全球形势的角度探讨了苏东关系的演变，但有些问题的剖析尚待深入。

总之，苏东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很难要求李兴的著作把所有的问题都讲清楚。但他作了可贵的努力，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因此，我推荐出版此书。

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秘书长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天新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后 记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又在博士后期间继续研究的最终成果，它历时6载，六易其稿。虽备尝艰辛，但不满意之处仍有不少。

衷心感谢我的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之骅研究员。作为本人的博士生导师，本书从提纲编写到细节安排，字字句句他都一把关，一丝不苟。作为我国苏联东欧史学会会长和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先生学问渊博，阅历丰富，为人谦和，乐于助人。攻博时，所谓年少气盛，并不总能认识到导师的好，也并不总乐于听导师的话。参加工作了，离开了导师，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实在是语重心长。

感谢武汉大学出版、武汉大学社科处、武汉大学人事处教师办，武汉大学原政治与行政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它们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精神支持和资金赞助。武汉大学法学院罗志刚教授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本书撰写了序言。

感谢关心过本书并提出过良好建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天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廖学盛研究员、闻一研究员、吴恩远研究员，马细谱研究员、马龙闪研究员；中共中央编译局郑异凡研究员，金雁研究员；中国史学会东方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张文武研究员、郑羽研究员、倪孝铨研究员、向祖文编审；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黄宗良教授、叶自成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王正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建华师兄、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胡延新师兄、公安部朱玉彪师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吴伟副教授等等。

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周雪梅女士。在本人攻读博士、博士后期间，他一直陪伴在我左右，与我共同度过那段清贫却充实的时光。当我选择回到家乡的武汉大学工作时，她又无怨无悔地同我一起南下江城。她支持我求学，促使我进步，不慕虚荣，不图功利。本书最终能得以问世有她一半的功劳。

李兴一介书生，身无长物，别无本事，欠亲朋好友、上下左右太多，惟有更加勤勉，鞠躬尽瘁，尽心尽力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力争做到不负社会的培养，大家的厚爱之万一。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本书疏漏和不足之处肯定不少，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李 兴

2000年4月于武汉大学珞珈山